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 成果報告

近代台灣天主教史的三階段研究：清末、日治及戰後國府統治初期(3/3)

計畫類別：個別型計畫

計畫編號：NSC93-2411-H-002-009-

執行期間：93年08月01日至94年07月31日

執行單位：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暨研究所

計畫主持人：古偉瀛

計畫參與人員：葉品君、劉嵐松、楊舒寧、黃子寧、蔡明峰、李修平、徐苑書

報告類型：完整報告

處理方式：本計畫可公開查詢

中華民國 94 年 10 月 31 日

中文摘要及關鍵詞：

本報告為三年期計劃的完整報告。研究內容主要從天主教 1859 年二度東傳台灣起，以迄 1965 年的國民政府時期止，天主教在台灣近代的傳教史，為便於研究而大致將此段傳教史區分如下：

第一階段，自 1859 年，迄 1895 的晚清時期止。此三十六年中，天主教在台灣這個移墾社會的奠基及傳播，並處理傳教背景、發展及與社會之關係；此外，亦分析傳教糾紛的原因與模式，最後綜論清季臺灣天主教再傳的特點及其限制。

第二階段，自 1895 日本殖民統治時期始，迄 1945 的國民政府接收時期止。在此五十年之中，台灣天主教在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傳播情況；此外，亦處理此時期天主教的傳教發展，其如何因應外在環境的變化，而做出的政策移轉，最後綜論此時期天主教的特點及其限制。

第三階段為戰後 1945 年到 1965 年前後止。在大戰之後，國民政府舉遷來台，而大陸的天主教會亦受此影響至台發展。故本階段主要以遷台之事為分野，分述台灣天主教會的急速發展的原因及特色，以凸顯遷台之前後的重大轉變。最後提出一綜合性的看法。

關鍵詞：

天主教、基督教長老會、民教糾紛、道明會、傳教士、西班牙、監牧、里脇淺次郎、涂敏正，聖統制，修會，教會學校，慈善事業、郭若石、田耕莘、于斌。

英文摘要及關鍵詞：

This report is a complete report of three year's project. It is a history of Catholic mission of modern Taiwan, covering from 1859, when the Roman Catholic Church reentered Taiwan, up to 1965, one of the climax of the missionary effort under the Nationalist rule. This report is conveniently divided into three parts:

The first stage, from 1869 to 1895 when the Japanese took over the whole island, the Catholic Church took root and began to spread in this immigrant society. In this report, the background, development and its social relationship of missionary endeavour is discussed. In addition, the pattern and the causes of conflicts between the Catholics and the local people were explored and analyzed. In the end, the characteristic-features and its limitations of this reentrance period of the missionary efforts were summarized.

The second stage, from the beginning of Japanese Colonial Government in 1895 to the retrocession of Taiwan into the Nationalist Chinese Government in 1945, the spread of the Catholic faith in Taiwan under the Japanese rule is discussed and reported. How the Church in Taiwan, in response to the change of environment, changed its missionary policies is also explored and analyzed. The features and limitations of these policies are also summarized at the end.

The third stage lasted from 1945 to 1965 when the numbers of converts reached its high point.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the Chines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started to rule Taiwan and later moved to this island. Most clergymen were expelled and many went to Taiwan for refuge. Taiwan after 1950 had unprecedented number of

religious persons coming over and the Church was greatly affected positively, or maybe also negatively. These developments before and after the dividing 1950 are explored and discussed in this report. The reasons behind so many new converts in this stage was also analyzed. Last but not least, the general overview is offered.

Keywords:

Catholic church, Presbyterian, conflicts between people and the Catholics, Dominicans, missionary, Spain, Apostolic Prefect, Satowaki Asajiro, Tu Mingcheng, Hierarchy , Religious Orders, Catholic schools, Charity works, Archbishop Joseph Guo, Cardinal Thomas Tian Gengxin, Cardianl Paul Yu Bin

目錄

一、	前言.....	1
二、	研究目的.....	1
三、	文獻探討.....	2
	(一)、檔案.....	2
	(二)、文獻史料.....	4
	1. 總類.....	4
	2. 人物.....	8
	3. 地區.....	11
	(三)、研究著作.....	16
	(四)、學位論文.....	22
四、	研究方法.....	23
五、	結果與討論.....	24
	(一)、近代台灣天主史三階段研究—— 第一階段：清代時期〔1859~1895〕.....	24
	(二)、近代臺灣天主教史的三階段研究—— 第二階段：日治時期〔1895~1945〕.....	56
	(三)、近代臺灣天主教史的三階段研究—— 第三階段：戰後台灣天主教的發展〔1945—1965〕.....	86
六、	計畫成果自評.....	177
七、	參考文獻.....	178
	(一)、發表論文.....	178
	(二)、西班文史料.....	235
	(三)、日文史料.....	282
	(四)、中文史料.....	293
八、	附錄.....	299

報告內容：

一、前言

本計劃主要研究問題在於近代臺灣天主教的傳入與發展，除了 1622 年至 1646 年西班牙道明會玫瑰省會士從菲律賓傳入北臺灣，進行短暫的傳教，後來停了兩百多年外，天主教在臺灣近代的傳教大致可分為三階段，即：

(1).1859 年至 1895 年道明會士在臺灣的傳教：這一時期道明會士再度來臺傳教，可說是一個新的開始。由於臺灣此時正式開港，各國勢力也逐漸進入此地，因此傳教事務往往與中外貿易結合成為糾紛的口實。這一時期有幾個歷史問題，一為天主教與基督教長老會傳教士在南臺灣的互相競爭，二為臺灣的民教糾紛問題，三為清朝官員、閩南與客家人對於天主教的政策及態度，這些問題構成本期研究的主要項目。

(2).1895 年以後至 1945 年的發展：由於在 1895 年日本軍進攻臺灣的戰爭中，有些天主傳教士及傳道員的態度以及臺灣各地的反日情緒，使這一時期的天主教史研究加入了民族以及除了中西交涉外，又多了日本這一因素，此時期的天主教歷史發展為第二年的研究主題。在日治時期的天主教最大的特色是民教糾紛在殖民政權開始穩固後大量減少，日本對教會採取准許合法傳教的政策，但也並不大力提倡，到了日治後期，中日關係緊張時，採取嚴格監督及壓制政策，此階段的台灣天主教，仍由道明會主理，沿續舊制，由於日本治台積極去中國化，教會也在大正年間成立了台灣監牧區，教會乃受與日本較密切的西班牙道明會傳教士管理，在太平洋戰爭開始前後，改由日本派來的里脇淺次郎(Satowaki Asajiro)任監牧，管理台灣教會，並與首位台籍神父涂敏正密切合作，為日後地方教會奠定基礎。

(3).1945 年以後至現在：1945 年日本投降後，臺灣天主教脫離日本影響，尤其隨著國民政府在 1949 遷臺以後，由於中國共產黨對天主教的敵視態度，教廷選擇繼續支持國民政府，大量中外神職前來臺灣傳教，為教會史上少見的高密度現象，也使得天主教在台灣有與以往全然不同的策略及方向，再加上國內外局勢的變化，使得臺灣天主教有極快速之發展，但從六零年代後期，開始進入停滯，其中原因也值得進一步瞭解。也是在這一時期天主教開始建立各級學校與醫院，並從事許多社會慈善事業，對臺灣社會有很大的影響，但與天主教在台灣的整体地位卻不太相稱，其中的因果關係也加以敘述及探討，台灣天主教在此三階段的發展過程中，逐漸邁向由量到質，立足台灣，放眼普世的真正地方教會。

二、研究目的

本計劃的緣由起於臺灣天主教發展史在學術上仍有很大的空白尚未填補，已填補者也不無改善的空間。本計劃希望釐清之處，大致而言約有數端：

1.教中人士以日語或西班牙語記述天主教會的發展，不僅在閱讀上造成困難，對於天主教外人事環境的記述則往往忽略，這對於正確認識天主教與外在社

會環境的互動並無幫助，因宗教不能脫離社會獨自存在，故非參照各方文獻，才能釐清天主教在臺灣社會上的發展。

2. 歷來論臺灣天主教者，不少在使用基本資料上有明顯的欠缺，不是主要以輯錄天主教士事業及言論為主，不利用官方的文書檔案，或者即是只有官方出版的帶有偏見的出版品，以帝國主義侵略及人民的英勇抵抗來解釋一切的教會衝突；這些在學術探討上是明顯的缺陷。同時，由於臺灣駐有外國官員與外國人民，他們對臺灣教務的觀測也具有相當的參考價值，過去並未加以妥善分析利用，本計劃自應加以填補。

3. 天主教道明會士在基督教優勢資源的壓力下，如何發展出一條與基督教有別的傳教路線。

4. 來臺灣傳教的是駐在菲律賓的西班牙道明會玫瑰省會士，他們以馬尼拉為根據地，以向異教人民傳教為主要職責。他們的策略與國籍教士、本土教士以及其他修會的傳教士之間，他們間的互動與對傳教事業的影響，值得注意與探討。

5. 在第二階段中加入了日本的因素，使得教會情況更為複雜，但仍努力在地方教會的建立上，緩步推進，並且也在本期建立了第一個台灣天主教的教育事業——靜修女中的成立，這些變化都值得探討。

6. 在第三階段中，國民政府遷台，大量中外神職人員也進入台灣傳教，造成空前的情況，加上國內外局勢變化，入教人數暴增，但在 1965 年後漸衰，其中的來龍去脈及因果關係也在探討分析之列。

總之，本計劃目的在期望跳脫原有的觀念，釐清天主教在臺發展的歷史事實，在前人的研究基礎上，整理出一個大致的輪廓，為文化交流及世界宗教史，尤其是本地化與全球化之間的衝突與互補，提供一值得參考的研究。

三、文獻探討

文獻探討分為檔案、文獻史料(總類、人物、地區)、研究著作、學位論文等項，茲分別介紹如下：

(一)、檔案

Archives of the Holy Rosary Province of the Order of Preachers, Manila, Philipines.

聖道明傳道會玫瑰省檔案乃 Santo Tomas 以及 Santo Domingo 大學的聯合檔案。其中包括在台灣傳教的個人傳教士信件及長上之信件，以及從傳教士向馬尼拉總部的報告。此外，此檔案也有一大批二手史料，包含印行的傳記以及省會的報告等。道明會玫瑰省在第一二三期是唯一在台灣傳教修會，因此其為最重要的史料，然而到了第四期，道明會只是數十個在台灣傳教修會中的其中之一而已。雖說如此，但其檔案對台灣南部的天主教史而言仍然很重要。

El Correo Sino-Anamita

El Correo Sino-Anamita 月刊創刊於 1866 年，對於當時傳教士的信件曾集結

成集，內容包含許多在台灣、中國大陸、日本等地傳教的傳教士寫的信件，以及各年度向馬尼拉寫的台灣教務報告。¹國立台灣大學圖書館特藏室有若干本，為日本帝大時收集的史料，但並不全，計有 1862-64 年 12 封信，1886 年、1887 年、1902 年、1907 年、1908 年、1910 年、1911 年及 1913 年度的由台灣寄出的信件。

El Siglo de las Misiones Dominicanas

1914 年創刊，出版於西班牙的 Bilbao。

Misiones Dominicanas

在馬德里編輯的月刊，創刊於 1917 年，也收錄有一些信件。

Les Missions Dominicaines, Amiens, 1921.

包括 1921 年及其後的台灣教會資料。

Missioni Dominicane, Firenze.

起自 1928 年，收錄部份台灣教會資料。

Acta Prop. Fide(A.P.F.)

羅馬教廷傳信部檔案，其中藏有台灣的傳教資料。

公共檔案局檔案

英國倫敦「公共檔案局」(Public Record Office，簡稱 PRO)中有些有關台灣民教衝突檔案，特別是 FO.228 檔卷內。

《**教務教案檔**》，中央研究院近史所編，共七輯，1974-1981。

尤其其中第二輯(1974)第三冊，1272-1541;第五輯(1977)第四冊，2073-2168。討論在台灣發生的傳教糾紛，充分顯示清朝官方立場，同時也收錄有外國照會。

《**清末教案**》，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福建師範大學歷史系合編，北京，中華書局。

自 1996 起陸續出版，已有三卷。

馮用、吳幅員輯，《**劉銘傳撫台前後檔案**》，收入沈雲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輯，第 734 號。

*第四期來台灣傳教的各修會，在其總會都有檔案室，其中大部分在羅馬，

¹此條及以下數條西文資料乃取自 Rev. Van Hecken, C.I.C.M.(賀歌南神父), *Missiologie van Taiwan*, partly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by Rev. A. Van Lierde, C.I.C.M.(栗鵬舉神父),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atholic Church on Taiwan", *Verbist Study Notes*(《懷義通訊》), no. 6, 7, 9(1985, 1986, 1988).

也有一些分散在各國，如美國紐約州的馬利諾會(The Society of Maryknoll)即是一個在台中傳教多年的修會，該會在紐約州的會館就收藏許多在第四期來台傳教的資料。

(二)、文獻史料

1. 總類

《台灣事情》

日據時代出版的有關台灣情況報導，其中有各縣廳各種宗教信仰人數統計表，十分精細。

《聲》

日本天主教半月刊雜誌，在 1900-1945 年陸續出版，偶爾有台灣教會消息。

《日本カトリック新聞》

內含日本治台期間台灣天主教的消息及報導。

Bulletin de la Soc. Des M.E.P.

為巴黎外方傳教會的雜誌，從 1920 年到 1961 年。

村上玉吉，《南部台灣誌》，台南市：台南州共榮會，昭和九年，491-2。

張德澤，《清季各國照會目錄》，北平：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文獻館，1935-6 年。

共出版四冊，其中第一冊為英國照會，第 395、400；美國 974。

善導週刊社，《善導週刊》，高雄：天主教高雄教區出版，1955。

為發行已近六十年的老刊物，特別注重報導台灣南部的教會相關訊息。

China Mission Bulletin

1949 起在香港發行。

《恒毅》

為中國天主教國籍修會主徒會為紀念其會祖剛恒毅樞機(S. Costantiti)而於 1951 年 8 月在台灣創刊的雙月刊，迄 1998 年 4 月已出版至第 486 期。《恒毅》有些文章敘述台灣教會史，例如 1979 年 6 月出版的一期就有高雄鄭天祥主教所寫的文章。另外，該刊物也載有一些回憶五零年代來台傳教時的生活，甚具史料價值。

教友生活週刊社，《教友生活》，臺北：天主教臺北教區，1952。

除了春節外，每星期出刊一次，目前已發行六十多年，其中有保有許多珍貴史料，報導全球及台灣相關教會訊息，教宗敕諭、主教牧函等。

《台灣天主教手冊》(Catholic directory of Taiwan)

《台灣天主教手冊》(*Catholic directory of Taiwan*)為天主教重要資料的資訊手冊，其內包含各教區的組織、人事、修會、事業及主要負責人名單，並有目前教區情況之統計數字，十分有用。本手冊原本稱為 *Catholic Directory of Taiwan*，於1955年由臺北的華明書局正式出版，從1956年起加上中文書名《台灣天主教教士通訊錄》，1959年改為《台灣天主教通訊錄》，1969年始採用今名，並由天主教教務協進會出版。其英文名稱則有不一致的變化，有時稱為 *Taiwan, ROC, Catholic Directory*，有時又稱為 *Catholic Directory, Taiwan ROC*，到2001則稱為 *Taiwan Catholic Church Directory*。

林虛中編撰，《天主教與本省人》，臺北：華明書局，1956。

Pablo Fernandez, *One Hundred Years of Dominican Apostolate In Formosa*, translated by Felix B. Bautista and Lourdes-Bautista, Quezon City, Philippines, 1959.(黃德寬譯，《天主教在台開教史，道明會士的百年耕耘》，臺北：光啟出版社，1991。)

台灣南天書局1993年重印。此書原名為《道明會在台傳教百年誌》，由道明會從檔案中收集69封信和報告編輯而成。這些信是百年來在台的傳教士向道明會總部設於馬尼拉的玫瑰省省會長所做的報告。原文為西班牙文，經 Fernandez 譯為英文，後又經黃德寬神父譯為中文，惜其中有少部分由於攻擊基督教太激烈，未能譯出。

高道隆，《天主教在台灣一百問題》，高雄左營天主堂，1960。

王世慶，〈日據時期台灣外事日誌〉，《台灣文獻》，11:2(1960)，237-254。

Mis. Et. de Paris

巴黎發行，從1962年開始，報導在花蓮傳教的巴黎外方傳教會的工作。

《鐸聲》

於1962年10月正式在台灣復刊，其中有不少教史資料。

《見証》

早在1963年12月即有以此為名的天主教刊物，原為傳道員專屬刊物；但現在的同名月刊是在1970年9月正式由台北總主教區支持的刊物，為一般信眾而

辦，其中有些討論台灣天主教史的發展。

台灣銀行研究室編，《台灣文獻叢刊》，第 190 種，《清穆宗實錄選輯》，117-129。

台灣銀行研究室編，《台灣文獻叢刊》，第 198 種，《清季外交史料選輯》，210-211。

台灣銀行研究室編，《台灣文獻叢刊》，第 203 種，《籌辦夷務始末選輯》，306-313；340-341；407-422。

台灣銀行研究室編，《台灣文獻叢刊》，第 259 種，《淡新檔案選錄行政編初集》，252-283。

台灣銀行研究室編，《台灣文獻叢刊》，第 273 種，《東華續錄選輯》，314-6；318；320。

《籌辦夷務始末分類索引》，台灣台聯國風社，1963。

其中有英國在台案專節索引。

《文獻叢編》，台灣台聯國風社，1964/3。

與台灣有關的部分，請參見：30/1a，3b，4a，5a。

汪富雄編輯，《今日「台灣天主教」大鑑》，台南：台灣真道社，1967。

鄭淑敏等，《寄語中國天主教》，台南：聞道，1968。

顧保鵠，《台灣天主教修會簡介》，台中光啟出版社，1968。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 China, 29, Sessions 1868-1872, Irish University Press, 1971, China, no.3(1869), Correspondences respecting Missionary Disturbances at Che-foo and Taiwan, 93-149.

〈台灣天主教的將來〉，《鐸聲》，10:7(1972/07)，26-34。

宋雅青編撰，《天主教基督活力運動在華發展歷程》，天主教基督活力運動中華民國總會，1978。

輔大社會學系編，《台中中興大學天主教大專同學會研究》，臺北：輔大社會學系，1978。

徐建蒙等編輯，《中國天主教教友傳教協進會創始十週年紀念專輯》，臺北：中國天主教教友傳教協進會，1981。

丁松青 (Barry Martinson S.J.) 著，三毛譯，《清泉故事》，臺北：皇冠，1984。

丁松青 (Barry Martinson S.J.) 著，三毛譯，《蘭嶼之歌》，臺北：皇冠，1984。

單國璽，〈天主教在台灣現況之研究序〉，《鐸聲》，25:5，(1987/05)，27-28。

中國主教團傳教委員會編，《福傳文集》，臺北：中國主教團傳教委員會，1987。

宋祖思，《關懷山胞與福音傳播》，台南：聞道，1987。

趙松喬編撰，《珍惜今天，明天才會更好—台灣天主教的前途與命運》，台南：聞道，1987。

《台灣省天主教修院簡介》，中國主教團聖職委員會，1988。

羅四維 (Daniel Ross) 著，吳博修譯，《輔仁大學宗教生活》，臺北：果園，1988。

福音傳播推行委員會編，《福傳大會文獻》，臺北：福音傳播推行委員會，1988。

福音傳播大會編，《福傳大會手冊》，臺北：福音傳播大會，1988。

李淑美編，《宣教在台灣》，臺北：新新生命雜誌社，1988。

劉巨烘等編輯，《中國天主教教友傳教協進會創始二十週年紀念專輯》，臺北：中國天主教教友傳教協進會，1992。

張舜明主編，《天主教為國祈福聖母環島巡禮紀念專輯》臺北：中國天主教教友傳播協進會，1994。

黃連生編，《白冷會在中國傳教史料》，台東：天主教教義中心，1995。

行政院新聞局編，《福音「新」傳：Serving a changing society：Catholicism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on Taiwan：天主教在台灣》，臺北：新聞局，1997。

中國主教團秘書處編，《**在基督內重建一切**》，臺北：天主教教務協進會，1998。

Harold M. Otness, *One Thousand Westerners in Taiwan, to 1945; A Biographical and Bibliographical Dictionary*, Taipei, Institute of Taiwan History, Preparatory Office, Academia Sinica, 1999.

作者為美國南奧勒岡大圖書館學教授，多年來致力於搜集來台西人資料，從有紀錄迄 1945 年間約有一千人的姓名及簡歷撰成此《來台西人辭典》，由中央研究院台史所籌備處出版，其中有些是傳教士，為一便於參考的工具書。

潘貝頌，《**紮根本土傳生機**》，高雄：多明我，1999。

鮑曉鷗(Jose Eugenio Borao Mateo), *Spaniards in Taiwan, 1582-1682*(2 Vols.), 臺北：南天，2001/3。

此為鮑曉鷗教授所蒐集到有關十六至十七世紀在台灣西班牙人史料，譯為英文，共有兩冊，其中有許多是與天主教傳教活動有關的資料。

葉金作等，《**台灣天主教會本地化福傳之推行策略：2002 年徵文選集**》，臺北：華明書局，2002。

林保寶編著，《**奉獻：從發現珍貴的老照片看半世紀前巴黎外方傳教會的傳教士在花蓮的傳教工作**》，臺北：天下雜誌，2002。

陳方中、吳俊德編，《**中梵外交關係六十年史料彙編**》，臺北：輔仁大學天主教史料中心，2002。

于斌講演，徐斌筆記，《**中國天主教文化協進會**》，北京：益世報館。

2. 人物

涂敏正蒙席，**日記手稿(1936-1949)**。

涂敏正神父為開台首位本籍神職人員，祖父為彰化縣羅厝邀請西班牙道明會神父前來開教的元老。塗神父生於 1906 年，自幼常在教堂，後至廈門進入修道院，並到香港華南塗心院深造，1936 年 12 月 19 日在鼓浪嶼主教座堂晉鐸，1946 年曾續任里脇淺次郎為台灣代理教區長之職兩年之久，其後傳教雲嘉地區，逝於 1982 年，其日記對於三、四十年代台灣天主教史頗有參考價值。(本文獻為施麗蘭修女提供之影印本，謹此致謝。)

雷震遠，《**于斌總主教小史**》，越南：自由太平洋協會，1959。

羅光，〈田耕莘樞機的遺信〉，《傳記文學》，12:4(1968)，頁 27-29。

鄭爵銘神父逝世十週年紀念集編輯委員會，《鄭爵銘神父逝世十週年紀念集》，彰化：鄭爵銘神父逝世十週年紀念集編輯委員會，1974。

費聲遠（Vérineux, Andrew Jean）撰，董增順譯，《回憶錄》，花蓮：華光書局，1980。

康寧雜誌編輯委員會，《于斌樞機主教逝世週年紀念特刊》，臺北：康寧雜誌，1980。

羅光，《七十自述》，1981。

毛振翔，《我這半生》，台北：東大，1982。

李霜青編，《于斌樞機紀念文集》，臺北：康寧雜誌，1983。

鄭公事蹟編輯小組，《鄭公爵銘神父事蹟（1914-1964）》，臺北：天主教基督服務團，1984。

謝冰瑩等著，陸達成、趙可式編，《葡萄香醇時：張志宏神父紀念文集》，臺北：耕莘青年寫作會，1987。

羅光等，《于斌樞機主教逝世十週年紀念文集》，新莊：輔仁大學，1988。

楊傳亮，《田耕莘樞機主教傳》，1988。

許秀鳳主編，《慨當以慷——培養三位神父的家庭》，高雄：善導週刊，1994。

吳終源等，《林天助主教逝世百日紀念專刊》，嘉義：嘉義教區主教公署，1994。

陸多默，《蓋夏姆姆的故事：主顧傳教修女會會祖》，台北：光啟出版社，1995。

中國主教團、臺北總教區、主徒會聯合製作，《郭總主教若石紀念專刊》，臺北：恆毅月刊社，1996。

王蜀桂，《袁國柱神父——耶穌會生涯五十年》，臺北：百達，1997。

羅光，《生活自述》，臺北：輔大，1997。

《聖母孝子百歲人瑞高師謙老神父專集》，臺中：天主教臺中教區，1997。

雷化民（Franz Leimer）著，陳信吉編輯，《口蜜腹劍—雷化民回憶錄》，臺北：一橋，1998。

楊廣仁，《中國于斌樞機》，臺北：中國天主教文化協進會，1998。

陳梅福編，《唐汝琪主教紀念文集》，1999。

Tone Ciglar 著，陳龍譯，《麥熟的芬芳：範鳳龍傳教醫師傳奇》，宜蘭：天主教靈醫會羅東聖母醫院，2000。

狄剛，《狄剛總主教文集》，台南：聞道，2000。

天主教依納爵基督生活團編，《愛我所愛：耶穌會士孔達仁神父紀念文集》，臺北：天主教依納爵基督生活團，2001。

牧神父九秩嵩壽祝壽文集編輯小組，《天人合一：牧育才神父九秩嵩壽祝壽文集》，臺北：牧神父九秩嵩壽祝壽文集編輯小組，2001。

劉家正等，《緬懷杜華》，臺北：甦生雜誌，2001。

林保寶，《愛者：石仁愛修女在馬祖》，臺北：天下雜誌，2001。

劉振旺總編輯，《讓愛永遠年輕：百歲童心·蒲敏道神父的故事》，東石：聖心教養院，2002。

楊淑美主編，《春風十裏百花香：一位耶穌會士的見證》，台中：中流基督生活團，2002。

黃德寬，《另一種見證：黃德寬神父紀念文集》，臺北：光啟，2002。

吳偉特、朱立德編著，《滿面春風的僕人：朱勵德神父》，臺北：光啟，2002。

耶穌聖心修女會編，《蔡文興主教紀念文集》，2003。

翁似蘭主編，《單國璽樞機主教 80 嵩壽專刊》，高雄：天主教高雄教區主教公署，2003。

天主教台灣明愛會編，《耶穌的邀請：梅冬祺神父的信仰之旅》，臺北，2004。

臺北聖神同禱會、耶穌會青年使徒工作小組編，《走過風火人生：王敬弘神父紀念文集》，臺北：光啟，2004。

鄭再發著，潘家群編，《台南四十一年鄭再發總主教台南牧靈暨福傳心聲》，台南：聞道，2004。

杜華神父紀念集編輯委員會，《杜華神父紀念集》，臺北：甦生雜誌。

汪惠娟編，《羅光總主教生活小記》。

黃宗樂等，《寧靜致遠德厚流光：恭賀張神父宇恭先生執教三十週年》，新莊：輔仁大學。

3. 地區

聞道社編，《台南教友意見調查報告》，台南：聞道社，1971。

楊傳亮主編，《嘉義教區成立廿週年紀念專刊(一九五三~一九七三)》，1973。

此類教區成立週年紀念之刊物頗多，然而有些紀念冊編輯倉促，品質參差，史實也間有錯誤，使用時必須謹慎，本文僅舉一些較重要的資料。

劉宇聲編纂，《臺北總教區二十五年史》，臺北：上智，1974。

黃竹榻編輯，《台中教區天主教羅厝教會簡史》，埔心：天主教羅厝教會，1975。

輔大社會學系編，《竹北地區教友調查報告》，臺北：輔大社會學系，1977。

李良編纂，《高雄教區十五年史》，高雄：高雄教區主教公署，1977。

潘竹軒，《萬金莊百年傳教拾穗---慶祝無玷聖母堂傳教 118 週年堂慶》，高雄聖道明堂，1979。

戴瑞文等編輯，《高雄市救世主堂十一週年紀念特刊》，高雄：救世主堂，1980。

石萬壽，《台南市宗教志》，《台灣文獻》，32:4(1981)，3-56。

毛振翔等，《板橋聖若望天主堂建堂廿五週年紀念慶祝特刊》，臺北：聖若望天主堂，1984。

劉鴻蔭編，《永和天主堂建堂三十週年紀念特刊》，台北：永和天主堂，1985。

張耀先編輯，《天主教新竹教區慶祝成立廿五週年紀念冊（主曆1961-1986）》，1986。

宋雅青等編，《天主教台南教區的成長：台南教區成立廿五週年紀念》，1986。

黃忠偉編，《天主教高雄教區成立廿五週年紀念冊》，高雄：善導週刊社，1986。

永泉教義研究中心編著，《天主教新竹教區慶祝成立二十五週年紀念冊》，新竹：新竹主教公署出版，1986。

台中教區主教公署編，《台中教區的開創與成長：台中教區成立廿五週年紀念》，台中：台中教區主教公署，1987。

孫靜潛等，《天主教碧岳神學院 25 週年紀念 1962-1987》，台南：碧嶽神學院，1987。

周菊香，〈天主教在高雄〉，《高市文獻》，1:3(1988/12)，149-177。

楊成斌等，《邁出二十五年：中華聖母台南教區主教座堂建堂 25 週年特刊》，台南：台南教區主教座堂，1989。

許秀鳳總編輯，《高雄市救世主堂廿週年特刊》，高雄：唐力，1989。

《天主教門南開教一百週年紀念》，1990。

廖百村編集，《聖加大利納堂開教三十週年紀念冊（1961-1991）》，高雄：聖加大利納堂，1991。

巴義慈編著，《天主教會新竹教區三民本堂開教 37 週年暨聖十字架堂 25 週年銀慶紀念特刊》，桃園：天主教復興聖十字架三民天主教堂，1991。

聖家堂編，《天主教聖家堂建堂四十週年紀念特刊》，臺北：聖家堂，1992。

翁宏傑等編，《台南大灣聖若瑟堂慶祝開教百週年特刊(1892-1992)》，台南：大灣聖若瑟堂，1992。

杜勇雄編，《高雄教區山地開教四十五週年特刊》，高雄，1993。

廖鶯等著、慈親樓編輯，《天主教慈親樓建立十週年紀念(主曆 1983-1993)》，高雄：多明我，1993。

許秀鳳總編輯，《天主教高雄鼓山露德聖母堂一三〇週年慶特刊》，高雄：鼓山露德聖母堂，1993。

許明秀、劉偉瑛執行編輯，《天主教新莊聖保祿天主堂開教四十週年紀念特刊 1953-1993》，臺北：天主教方濟會佳播印刷，1993。

黃芝英等編輯，《天主教高雄教區法蒂瑪聖母堂開教四十五建堂三十週年暨主保堂慶紀念特刊》，高雄：法蒂瑪聖母堂，1993。

黃素瓊編，《天主教新竹教區東南街天主堂建堂四十週年紀念特刊》，新竹：東南街天主堂，1994。

陳梅福編，《頭份天上之母堂開教四十週年慶紀念特刊》，頭份：頭份天上之母堂，1994。

周成薇編，《三十而立：台南教區主教座堂中華聖母朝聖地建堂三十週年紀念特刊》，台南：天主教台南教區主教座堂，1994。

黃連生編，《白冷會在中國傳教史料》，台東，1995。

台南教區傳教指南編輯委員會編，《台南教區傳教指南》，台南：徵祥出版社，1996。

劉徵祥，《天主教台中教區田中耶穌聖心堂開教百年紀念專書》，1996。

李莉總編輯，《天主教楊梅法第瑪聖母堂開教嗣十五週年紀念冊》，桃園：天主教楊梅法第瑪聖母堂，1997。

徐嘉文總編輯，《孝愛之家：廿五週年銀慶紀念特刊》，高雄：孝愛仁愛之家，1997。

劉獻堂等，《新竹市耶穌聖心堂朝聖地建堂廿五週年紀念特刊》，新竹：耶穌

聖心堂，1997。

蘇撫群等編，《天主教通化玫瑰堂建堂四十週年紀念專輯》，臺北：通化街玫瑰堂，1997。

狄剛等，《三重聖母聖心堂落成紀念特刊》，臺北：三重聖母聖心堂，1998。

李文琰總編輯，李文琰總編輯，《桃園市聖母無玷聖心天主堂新聖堂落成紀念特刊》，桃園：聖母無玷聖心天主堂，1998。

邱秀卿主編，《天主教台中教區員林聖體堂開教百年紀念專刊（1898-1998）》，台中，1998。

李昭明主編，《天主教新竹教區聖母聖心主教座堂建堂四十週年特刊 1958-1998》，新竹：主教座堂，1998。

黃月，〈慶祝天主教沙爾德聖保祿女修會來台服務 40 年特刊〉，《保祿醫訊》，第 28 期，2000。

《天主教花蓮教區主教座堂教區中心落成紀念》，花蓮，2000。

盧樂榮等編輯，《聖維雅乃天主堂建堂四十週年楊蒙席成斌晉鐸五十週年金慶紀念文集》，台南：聖維雅乃天主堂，2000。

李若望等著，《天主教會花蓮教區田埔堂區成立五十週年金慶特刊》，花蓮：天主教田埔堂區教友傳教協進會，2000。

臺北總教區 50 周年紀念特刊編輯委員會，《感恩 50：臺北總教區五十週年特刊 1949-2000》，臺北：臺北總主教公署，2000。

《天主教台中教區羅厝耶穌聖名堂開教 125 週年紀念特刊，1875-2000》，2000。

劉振忠等，《天主教嘉義教區西螺聖伯鐸天主教堂慶祝開教九十六週年（1905-2001）建堂五十週年（1951-2001）重建新聖堂祝聖落成紀念冊》，雲林：西螺聖伯鐸天主堂，2001。

Crawford, R. ed., *Fiftieth Anniversary Marynoll Society Taiwan (1905-2001)* 《瑪利諾會在台灣五十週年紀念版》: *Biographic and Autobiographic History of the Taiwan Region*, Taichung, 2001.

呂道南總編輯，《天主教靈醫會蘭陽傳奇 50 年》，宜蘭：天主教靈醫會，2002。

劉超然等，《活出更豐富的生命：天主教聖母聖心會修女會創會七十週年特刊（1932-2002）》，台中：聖母聖心修女會，2002。

陳啟聰等編輯，《天主教台南教區耶穌聖心天主堂建堂 40 週年紀念特刊》，台南：台南教區耶穌聖心天主堂，2002。

天主教臺北總教區聖家堂編，《天主教聖家堂五十週年紀念特刊》，臺北：天主教臺北聖家堂，2002。

侯若瑟編輯，《天主教公教會聖道明傳道中心建立三週年紀念冊》，臺北：臺北聖道明傳道中心，2002。

《比利時方濟會在南港、汐止、瑞芳開教金慶》，方濟會，2003。

耶穌聖心修女會創會五十週年特刊編輯小組，《耶穌聖心修女會創會五十週年特刊》，田中：耶穌聖心修女會，2003。

陳正家編輯，《徐匯中學創校 153 週年在台復校 40 週年特刊》，臺北：徐匯中學，2003。

歐思定總編輯，《天主教白冷外方傳教會來台傳教五十週年紀念專輯》，台東：天主教白冷外方傳教會，2003。

《新營天主堂開教五十週年紀念特刊》，2003。

《瑪利諾會修女會在台灣五十週年》，2003。

陳忠夫等編輯，《竹東天主堂建堂五十週年紀念特刊（1954-2004）》，竹東：竹東天主堂，2004。

蘇漢璋（Eamon Sheridah）編，《聖高隆會來台二十五週年慶（1978-2003）：台灣傳教工作回顧》，聖高隆會，2004。

《佳里天主堂開教五十週年慶特刊》，2004。

關西天主堂編，《關西天主堂開教 50 週年金慶特刊》，2004。

劉國瑞,楊瑞嬌,葉昭誠等編,《赤水天主堂傳教百年紀念刊》,2005。

以下數種為出版年代不詳的出版品：

《我們的家園：聖母聖心修女會》，台中：聖母聖心修女會。

天主教聖母聖殿編,《天主教教會萬金聖母聖殿簡介》,屏東：天主教聖母聖殿。

黃懌憬等,《七苦聖母堂建堂六十週年專刊》,嘉義：民生堂訊雜誌社。

聖家堂特刊籌備小組編,《天主教臺北聖家堂建堂三十週年紀念特刊》。

劉峙同編,《中國天主教文化協進會創立五十週年紀念特刊》。

蘇立德等編輯,《感恩惜福：善導之母天主堂 30 years》,高雄：善導之母天主堂。

(三)、研究著作

楊多默口述,大國督編,《台灣カトリック小史》,杉田書店,昭和16年。

方豪,〈台灣天主教史略〉,《善導週刊》,1950/02/07;方豪,〈台灣的天主教〉,收入林熊祥等著,《台灣文化論集》,臺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1954,463-472。

這兩篇短文內容相近,均整理早年天主教在台灣的大致輪廓。文章雖僅具大要性質,但卻將天主教從南部北傳的順序及地點,以很少的篇幅交代完畢,提綱契領,一目瞭然。對於當時的學術界而言,達成有效提高台灣天主教研究能見度的功用。

Walter Loedding, O.P. “*Missionary Century in Taiwan*”, *China Mission Bulletin*, Hong Kong, 1959, 991-996.

楊多默口述,大國督編,陳嘉陸譯,《天主教來台傳教壹百年簡史》(《台灣カトリック小史》,杉田書店,昭和16年),高雄教區出版,1960。

馮用,〈大稻埕洋教案〉,《臺北文物》,8:3(1959),40-42。

Tong, Hollington(董顯光), *Christianity in Taiwan: A History*, Taipei, China Post, 1961.

文懷德著，〈台灣開教史〉，《鐸聲》，1965。

1965年之第31、34、35、36、37、38期。此文似從西文譯成，其中人名頗有錯誤，然亦有些史實可資參考。

李佳果、趙文詞編，《天主教在台人員人材剖析》，1969。

中村孝志，〈十七世紀西班牙人在台灣的佈教〉，收入賴永祥，《台灣史研究初集》，臺北：三民書局，1970，107-120，136-142。

此文將十七世紀的西班牙傳教史敘述得相當詳盡。雖然作者在文中一再強調西班牙傳教士雖有極大傳教熱情，但所留資料不多。雖然如此，中村教授仍能整理出相當清楚而完整的脈絡，令人欽佩。若與下文西班牙籍鮑曉鷗教授的文章作一比較，可以發現幾點特別貢獻：1.由於中村是日本人，不免從日本人的角度來看此事，但也正因為此，他對日本政府和台灣的關係、對在菲國的西班牙殖民地政府、以及與道明會的來往，有較完整的交代。例如，他在討論西班牙為何會佔領基隆時，就描述了日本歷史上的背景以及和西班牙的互動因素；2.由於中村並非從傳教士或熱心信徒的角度來寫，是故能跳脫「自己人」角度，「詳人之所略，略人之所詳」，特別是對政治面及社會面；3.由於中村也精研當時台灣全島歷史，包括荷蘭人在南部的歷史，因此談此主題較能觀照全面。遺憾的是，此篇譯文並未附上註解。

張炳楠監修 李汝和主修 李添春原修 王世慶整修，《臺灣省通誌·卷二，人民志宗教篇》，台中：臺灣省政府印刷廠，1971/6/30。第一冊第四章，頁85-132。

天主教部分收錄於本篇第四章，共分為五節：第一節，明季臺灣之天主教；第二節，清代臺灣之天主教；第三節，日據時期臺灣之天主教；第四節，光復後臺灣之天主教；第五節，天主教之教法及其影響。前四節介紹臺灣天主教發展歷程，從明萬曆四十七年(1619)論起，迄於民國六十年，雖時代跨度極大，然內容簡略，僅就其要者加以說明。第三節與第四節內附有統計資料表格，包括教堂與傳教所的分佈位置，傳教士及教友人數，學校、醫院、修院與修會統計等，對於臺灣天主教的研究具參考價值。第五節則簡單介紹天主教的名稱由來、傳教方式、教義大要及教會組織。文中關於來臺天主教傳教士的姓名，部分採用外文直接音譯，對於研究者較為不便。

Grichting, Wolfgang. L. "The Priest's Social Prestige in Taiwan.", *Neue Zeitschrift für Missionwissenschaft*, 27(1971), 173-87.

Richardson, William. J. "Early Missionary Activity in Formosa, 1624-1662.", *Neue Zeitschrift für Missionwissenschaft*, 28(1972), 108-16.

Humphrey, Delos. *The Catholic Church in Taiwan*, Taipei, Wisdom Press Co., 1974.

Rowold, Henry. "Seventeenth Century Roman Catholic Mission in Taiwan.", *South East Asia Journal of Theology*, 15:2(1974), 68-79.

江傳德，〈台灣教會發祥地，玫瑰聖母堂傳教史〉，《恒毅》，28:10(1979/05)，50-4。

鄭天祥，〈台灣天主教開教簡史〉，《恒毅》，28:11(1979/06)，23-24。

史文森 (Allen J. Swanson) 著，盧樹珠譯，《台灣教會面面觀—1980 的回顧與前瞻》，臺北：中國主日學協會，1981。

瞿海源，〈台灣地區天主教發展趨勢之研究〉，《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第 51 期(1981)，129-154。

中央研究院社會研究所的所長瞿教授，以其心理學社會學的背景，從事台灣天主教及基督教發展趨勢的探討，尤其注意到在 1949 年後入教人數大幅成長，但在 1964 後教會卻開始發展遲滯。瞿氏探討其中興衰的原因，認為可從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變遷及教會本身的狀況來分析。

鄭天祥，〈台灣天主教會一百二十五年簡史〉，《鐸聲》，22:6(1984/06)，1-8。

鄭天祥，〈台灣天主教發展史大綱〉，《鐸聲》，22:6(1984/06)，8-9。

Chang, Mark. "A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in Taiwan." in M.D. David, ed., *Asia and Christianity*, Bombay: Himalaya Publishing House, 1985, 14-40.

中國主教團傳教委員會編印，《天主教在台灣現況之研究》，臺北：光啟出版社，1987。

此書是由輔仁大學當時的社會系主任黃俊傑教授所主持的調查研究，以作為 1989 年時天主教福音傳播大會時的參考資料。該書乃是一份相當實用的社會調查，前後花了三年的時間，發出了 6508 份問卷。第一次 2100 份問卷中，收回 47%；第二次訪問了 4432 人收回問卷 4408 份，回收率答 99.4%。全書計有九十個表，五十二張圖，書後並附有中英文問卷樣本。全書共分為三篇，第一篇〈神父、修女、教友領導人對天主教會及福音傳播工作之看法〉；第二篇〈一般教友、冷淡教友、非教友對天主教會及福音傳播工作之看法〉；第三篇〈台灣社會與福音傳播〉，亦即討論整個大環境和傳教之間的關係。

林其泉，〈洋教在台灣的傳布和台灣同胞的反洋教鬥爭〉，收入四川省哲學社會科學會聯合會、四川省近代教案史研究會合編，《近代中國教案研究》，成都：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7，180-196。

張春申，〈天主教在台灣傳福音的現況與未來方向〉，《神學論集》，

74(1988/01), 549-574。

Rev. Van Hecken, C.I.C.M.(賀歌南神父), **Missiologie van Taiwan**, partly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by Rev. A. Van Lierde, C.I.C.M.(栗鵬舉神父),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atholic Church on Taiwan**”, *Verbist Study Notes*(《懷義通訊》), no. 6, 7, 9(1985, 1986, 1988).

事實上，本文前邊許多有關檔案資訊是從此文中摘出的。

古偉瀛，〈**台灣天主教史—史料與研究簡介**〉，收入張珣、江燦騰合編，《當代台灣—本土宗教研究導論》，臺北：南天書局有限公司，1989。

瞿海源編纂，《**重修臺灣省通志·卷三，住民志宗教篇**》，南投：省文獻會，1992。頁 341-562。

天主教部分收錄於本篇第四章，內容與架構基本上承襲《臺灣省通志》。全篇共分為四節：第一節，十七世紀西班牙人在臺傳教概況；第二節，天主教二度傳入臺灣；第三節，日據時期臺灣的天主教；第四節，光復後天主教發展概況。除了潤飾《臺灣省通志》的文字外，本文還添入大量新資料，包括黃德寬譯《天主教在臺開教記》及近代臺灣史及天主教會史的研究，尤其是在第三節與第四節，第四節尤甚。在第四節中，一方面記述天主教的傳教經過與發展，還分析天主教在臺成長及其後停滯的原因，及共黨佔據大陸後，大陸各教區之主教、神父、修女及信徒來臺的情形及對臺灣天主教的影響。補充大量的資料與研究成果，為本文優於《臺灣省通志》之處。

方豪，《**台灣早期史綱**》，臺北：學生書局，1992。

1980年中國天主教史權威方豪教授去世後，從其遺稿中整理出一部《台灣早期史綱》，其中第十一篇，〈西班牙人的佔據台灣北部〉，主要也是談到西班牙人在北部的傳教經過。文章內容大體和中村的記載相同，但有趣的是此文站在中國人的觀點來看天主教發展的過程，因此在詳略上也和中村氏有異。例如作者較著重於傳教書籍本土化，傳教書籍部分漢字譯文的解說，以及天主教傳教地區的古今地名等，都有詳細的補充與說明。由於此書是遺稿，對於出處無法做進一步地要求。

江傳德編纂，《**天主教在台灣**》，高雄：善導週刊社，1992。

此書在1940年之前的台灣教會史大多為1941年出版的大國督編的《臺灣力トリック小史》的中譯；其後的記載則以江氏擔任傳教員時的經歷及觀察為主。

鮑曉鷗 (Jose Eugenio Borao Mateo), **Spanish Sources for the History of Taiwan**(〈**台灣史中的西班牙文史料**〉)，收錄於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系，《台灣史料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1994/06，37-47。

這篇文章可說是在台灣地區首次有系統地發表關於台灣天主教會史的西班牙文資料，不但包括檔案、書信，也有一些重要著作。對十七世紀荷蘭人及西班牙

牙人在台歷史有深入研究的日本學者中村孝志曾指出，荷蘭人與西班牙人對於資料之保存有不同的態度：荷蘭人較積極，留下許多可貴的資料；西班牙人雖然傳教極為熱情努力，但紀錄不多。鮑氏此篇文章可說是一重要補充。

中國主教團傳教委員會編，《天主教在台灣福傳推行評估研究報告》，臺北：中國主教團傳教委員會，1994。

宋光宇，〈試析四十年來台灣宗教發展情形〉，《台灣經驗(二)——社會文化篇》，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4，頁 175-224。

此文基本上反駁瞿海源對於天主教在六零年代為何教友人數大增原因，認為主要的原因乃因眷村當時需要救濟品，但不可說是「因社會經濟的好轉而減低了對宗教的需求」，因為一旦生活改善，就不到教堂，但可能轉成其他信仰。

羅漁，〈天主教傳入台灣的歷程〉，收入淡江大學歷史系，《台灣史國際學術研討會：社會、經濟與墾拓論文集》，1995/05，67-108。

Mateos, F.(沈啟元), *China Jesuits in East-Asia: Starting from Zero(1949-1957)*, Taipei, 1995.

這是一本尚未對外公開發行，但已被批准閱讀的耶穌會在台灣第一個十年的歷史，書中將耶穌會來台後如何從無到有，並擬定未來方向的歷程。

翁佳音，〈西班牙道明會在北台灣的宣教〉，《台灣教會公報》，第 2381 期(1997)，第十版。

此短文略評了此期道明會傳教的特色及成功之因，並對當時傳教地區地名有進一步討論。

施麗蘭，〈涂敏正神父與裏脇淺次郎教區長〉，《鐸聲》，第 362 期(1997/01)，55-60。

簡炯仁，〈屏東縣萬巒鄉赤山、萬金莊的平埔族與天主教道明會〉，收入國史館，《台灣開發史論文集》，臺北：1997/05，167-187。

施麗蘭，〈十九世紀的台灣教案〉，《見證》，第 27 卷，特刊(1997/08)，79-103。

丁立偉(Olivier Lardinois SJ)，〈台灣原住民族的社會問題——天主教觀點研究〉(上、下)，《神學論集》，第 111-112 期(1997)。

劉錦昌，〈台灣天主教「本地化」概況——以《神學論集》來觀察〉，《神學論集》，第 111 期(1997)。

賴慧真，〈清季晚期台灣教案（鹹豐九年-光緒十一年，1859-1885）〉，《史學會刊》（師大），第41期(1997)。

Ralph Covell, *Pentecost of the hills in Taiwan : the Christian faith among the original inhabitants*, (Pasadena, Calif. : Hope Publishing House, 1998).

此書對原住民的皈依及當局政策均有分析。

鮑曉鷗 (Jose Eugenio Borao Mateo), *The Catholic Dominican Missionaries in Taiwan, 1626-1642*(〈在台灣的道明會傳教活動，1626-1642〉)，收入林治平主編，《台灣基督教史:史料與回顧》，臺北：宇宙光，1998，33-76。

此文除了利用現存檔案，特別是兩位道明會士 Esquivel 以及 Aduarte 兩位的紀載外，另外再加上其他相關材料，尤其是另一位道明會士 Maria Gonzalez 來華(包括台灣)所撰寫的道明會士的傳記。

鄭淑蓮，〈台灣教案之試析（1859-1868）〉，《弘光學報》，第31期(1998)。

古偉瀛，〈十九世紀台灣天主教(1859-1895)---策略與發展〉，《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系學報》，22(1998/12)，91-123。

Bornemann, Fritz 著，薛原、潘薇綺譯，《聖言會在華傳教小史》，臺北：天主教聖言會，1999。

郭文般〈台灣天主教的政教關係〉(1999，國科會專題研究計劃)。

陳文德，〈月旦月曼阿美族的宗教變遷：以接受天主教為例〉，《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第八十八期》，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2000。

張英陣著，〈天主教在台灣的社會服務〉，《社區發展季刊》，第89期(2000)。

Ku, Wei-ying, "Conflict, Confusion and Control: Some Observation on the Missionary Cases in Nineteenth Century Taiwan." in Koen De Ridder ed., *Footsteps in Deserted Valleys: Missionary Cases, Strategies and Practice in Qing China*. (Louvain Chinese Studies VIII). Leuven: F. Verbiest Foundation/Leuven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11-38.

陳方中編著，《于斌樞機傳》，臺北：台灣商務，2001。

郭文般〈台灣的宗教與社會〉，收入王振寰編，《台灣社會》(台北巨流出版社，2002)，頁57-101。

丁立偉，〈台灣山區傳教工作今昔：以新竹教區尖石牧靈區為例〉，《神學論

集》，第 134 期(2002)，頁 546-567。

古偉瀛，〈台灣天主教史上的里脇淺次郎與涂敏正〉，《20 世紀台灣歷史與人物—第六屆中華民國史專題論文—》，2002/12，185-208。

簡鴻模，《祖靈與天主—眉溪天主堂傳教史初探》，臺北：輔仁大學，2002。

簡鴻模等，《當達悟遇上基督》，臺北：輔仁大學出版社，2004。

丁立偉、詹端慧、孫大川合著，《活力教會，天主教在台灣原住民世界的過去、現在、未來》，台北光啟出版社，2004。

此書兼具歷史、報導及訪問紀錄，是一本有關台灣原住民接受天主教信仰來龍去脈的記載。其中第一部分〈台灣天主教原住民地方教會歷史〉與本研究最有關係，詳細討論台灣各地原住民皈依的情況，並分析其中的因素。

(四)、學位論文

Richardson, William. J. *Christianity in Taiwan under Japanese Rule*. St. John's University, New York, 1971. Ph. D. Dissertation. 231 pp.

此書是作者在美國紐約聖若望大學的博士論文，撰文時利用了一些教會檔案，例如當時在高雄台灣監牧區的資料。然而，此論文並非專門以天主教為研究對象，而是包括了基督教在內，因此天主教只有一部分。此論文篇幅雖然不大，但分為九章：首章談 1895 年時的台灣情況；次章談 1895 年時的基督宗教情形；三章敘述日本對台的佔領；四章交代日本在台灣的殖民統治；五章處理日本在台灣的發展；六章說明此時期三派兩教的發展；七章主要討論神社參拜所引發的問題；八章則描述二次大戰期間的教會遭遇；末章則為對三派兩教在日據五十年來的整體表現作出評估。

Peter, J. Barry. *A Brief History of the Missionary Work of the Maryknoll Fathers in China*,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 A. Thesis, 1977.

詹明勝，《天主教祭祖運動之探討》，台南神學院畢業論文，1978。

郭文般，《台灣光復後基督宗教在山地社會的發展》，1985，台北：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黃嘉斌，《非營利事業行銷，以高雄市天主教為例初探》，高雄：國立中山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1993。

張政章，《1945 年以後台灣西部平原地區天主教教堂建築之研究》，台中：私立東海大學建築研究所碩士論文，1993。

陳台芳，《監牧關懷：對台灣天主教監牧工作之研究與反省》，臺北：輔仁大學宗教研究所碩士論文，1993。

蔡蔚群，《台灣教案研究(1859-1885)---以地方交涉為探討重心》，臺北：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06。

楊嘉欽，《高雄前金天主教聚落研究》，台南：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8/06。

楊君為天主教二次入台老教友之後人，因此所用之史料頗多原始珍貴者，足資參考。

薛亞聖，《台灣之天主教組織特性與教會醫院》，臺北：國立台灣大學醫療機構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

陳鑑江，《台灣之天主教組織特性與教會醫院經營策略取向關係之研究》，臺北：國立台灣大學公共衛生學院醫療機構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

林鼎盛，《儀式與意義：台灣天主教羅厝堂區為例》，臺北：國立台灣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

楊惠娥，《天主教在台灣中部之傳教—以羅厝教會為例》，台南：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

劉益誠，《萬金、赤山地區天主教眾日常生活研究》，台南：國立台南師範學院鄉土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

黃照明，《戰後台灣天主教的本土化—以蘭陽舞蹈團為例》，臺北：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

黃子寧，《天主教在屏東萬金的生根發展（1861-1962）》，臺北：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

許育勝，《天主教台中教區田中堂區之發展》，臺南：國立台南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

林淑理，《台灣天主教傳道員之福傳生涯與培育》，臺北：天主教輔仁大學宗教學系碩士論文，2005。

四、研究方法：

除了從前述資料來立論外，在具體方法上，大致從天主教道明會的傳統傳教策略、台灣當時的政治經濟及社會環境，尤其是近來學者對於臺灣移墾社會的地緣關係及祭祀圈，以及天主教與長老會教之歷史差異來解釋教會糾紛；此外，並試圖用近人所提出的教會史研究方法的反省如鐘鳴旦(Nicolas Standaert)、陸保祿(Paul Rule)等人所提出的反省及建議來探討這一段的台灣天主教史。對此的具體討論，請參考本報告附錄一之論文〈談儒耶交流的詮釋〉中有對於各種研究取徑特點的介紹及分析。

在書寫的方式上，仍以貫時性的寫法將台灣天主教的發展呈現出來較為清楚。另也試圖在有些場合使用「論述分析」(discourse analysis)，針對傳教士的書信內容，來解讀傳教士的行為。從這些書信中，看到身處在第一線的傳教士，依教會及修會的規定必須定期寫信給其長上，而信中的互動可以看出許多當時傳教士所面臨的問題，以及企圖解決的努力；更重要的是從這些文獻中可以看出隱藏在其背後的一些預設及動機，以此來想像當時的歷史情境。

五、結果與討論：

天主教自 1859 年二度入台之後，經歷過三次政權的更換，包括從入台之後至 1895 年的晚清時期，1895 年到 1945 年的日本殖民統治時期，以及 1945 年之後的國民政府時期。面對每一次政權更替所帶來的新局面，台灣天主教會在每個階段都曾有過相關之反應與調整，因而在各個階段呈現出不同的特色與樣貌。在此結果與討論中，我們將分別述之。

近代台灣天主教史三階段研究— 第一階段：清代時期 [1859~1895]

壹、第一期：1859-1869 草創階段

一、天主教再傳的背景

道明會的來台本是一種宗教情懷的再現，但它的開始卻與戰爭離不開關係。西元 1858 年第二次英法戰爭暫時和談，簽訂中英中法天津條約，條約中規定清朝再開新口岸，臺灣地區開放安平、淡水、基隆、打狗數港，並保障天主教與基督教在中國的傳教工作。例如中美天津條約中就有規定：

耶穌聖教，又名天主教，原為勸人行善，凡欲人施諸己者，亦如是施於人。嗣後所有安分傳教之人，當一體矜恤保護，不可欺侮凌虐，凡有遵照教規安分傳習者，他人毋得騷擾。¹

¹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纂；劉寧顏主纂，《重修台灣省通志·住民志·宗教篇》(台中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89-1998)，頁 345。

教廷傳信部得知後，立刻通知明會總會長歐志神父，並授權准許玫瑰省(菲律賓)道明會士開始台灣地區傳教。中斷百餘年的宗教事業至此才重新出現。

但另一方面，若說天主教的再傳憑恃的是條約所賦予的權利也不盡然。固然中央條約的簽定是傳教的重要基礎，但地方錯綜複雜的利益糾葛才是教士所要面臨的真正問題。以 1859 年教士初登台所發生的事件為例，便頗能見商業利益在地方官吏心目中之重要性可能更甚條約。這件戲劇性的事件是這樣的：

1859 年元月，菲律賓道明會決定來台重新開教，派遣教士郭德剛(Fernando Sainz)由馬尼拉動身前往福建，與廈門的洪保律 Angel Bofurull 教士會合以後，共同來台。五月十九日，一行人在打狗(今高雄港)，但隨即引起地方居民的側目，一時之間謠言四起，鳳山知縣馬慶釗聞訊之後派遣差役帶著官方的禁令，要求傳教士們離開。當差役將教士帶至埤頭(今高雄縣鳳山市，當時的鳳山縣城所在)審訊時，知縣馬慶釗顯得相當不耐，但在考慮到此事可能會引起國際糾紛，遂決定諮詢當時在打狗的外國鴉片貿易商的意見。這名商人可能是基於同為在台外國人的立場，對傳教士頗有袒護，但是官員仍然要求一筆保證金，以保證傳教士未來的行為良好，此舉引起了這名商人的強烈反彈，拿出手槍威脅馬知縣：「閣下之好意不敢領受，但要求之保證金，絕不能應命。如要我手中之保證金者，余可多奉送不爽，尊意需若干，請開一數目，余決不吝送予閣下。」馬慶釗聽到這一句話後馬上道歉，並保證釋放傳教士，對此，郭德剛評論道：「左輪手槍顯然有意想不到的力量。」這位以手槍威脅知縣的鴉片商人，應該是定居於打狗的美國人盧宜(Captain M. Rooney)。²

盧宜是美國人羅賓奈(William M Robinet)的合夥人之一，他經常以武裝的船隻載運鴉片來台銷售。而羅賓奈更早在 1855 年即與台灣道成立一項協議，規定羅賓奈以協助當局追捕海盜，以及每艘來台貿易船隻繳納一百元的噸稅為條件，取得獨占台灣樟腦的經銷權利，並獲准在打狗成立一洋行。由此可知台灣開埠以前，台灣道已私下允許外國商人前來從事貿易活動，並從中獲取可觀利益，所以當郭德剛等人抵台後，馬慶釗諮詢洋商的舉動就不令人感到意外了。因為傳教問題牽涉中外關係，可能影響商業地方官自己的收入。由此可見得，清季天主教能在台灣開始傳教，憑恃的不僅僅是條約所賦予的權利，而還有一些涉外關係如台美商的實力支持³，但與赤裸裸的外國軍事力量支撐有所不同。1860 年 10 月，英法聯軍再次北犯，咸豐皇帝北避熱河，清朝不得已承認天津條約，正式換約，天津條約加開台灣各口岸，並准許各口傳教。至此台灣傳教才成為合法。

道明會傳教初期尚有下列數事值得注意，略可反應傳教初期與台灣移墾的互動關係。

二、道明會與民間初期之互動

4. 與社會低下階層的關係

1859 年 6 月鳳山知縣之事才剛告一段落，郭德剛居所又為地方住民所侵奪，

2 Geroge W. Carrington, *Foreigners in Formosa 1841-1874*, (reprint, Chinese Materials Center, Inc, 1978), pp.248；蔡蔚群，〈教案—清季台灣的傳教與外交〉[臺北：博揚，2000]，頁 33-34。

3 蔡蔚群，前揭書，頁 33-34。

無奈之餘只得另尋住處。先是於9日聞悉前金有一民房出售，但賣主表面上裝以海運業為生，其實便是海盜，交涉未果後，郭德剛又向另一賊首交涉，始租屋得成。⁴若將此事與前面鴉片商人盧宜一事合而觀之，則幾乎天主教來台初期與之接觸者皆為海盜或走私販子等社會邊緣之人，由此現象吾人可以想見傳教初期之困境。面對台灣移墾社會中複雜的各方勢力，教士往往只能尋求其中較為低下的階層以為援助，而在上層社會中始終欠缺影響力。此種情況從日後與原住民的合作也可見一般。在與這些邊緣勢力互動的過程中，道明會歷來向下層傳教的策略可能再度在此得到了肯定。

5. 與外僑的關係

另一件足以反應道明會與地方複雜關係的是德國輪船事件。1859年9月一艘德國汽船駛入打狗港受到當地民眾的攻擊，搶劫船上財物，並殺死該船船長，當地外國商人立刻組織反擊，燒毀街道與儲鹽倉庫。事後四日，鳳山守備隊擬進駐前金抵禦外商之攻勢。但不料當地民眾卻於此時請求郭德剛神父代為調解，使官兵不要駐紮當地，以減輕當地民眾之負擔。郭神父隨後於駐軍與鴉片商人雙方間交涉，然未能成功，郭神父為免諸方責難，乃避往廈門。

此事今日觀之甚為可怪，固然近代中西外交以教士作為中介本屬常事，但何故又要由神父代表地方向官府反應。或許教士填補了移墾社會缺乏士紳溝通上下的功用。

6. 困境中的發展

1859年6月，在輪船事件發生之前，郭德剛神父已開始了傳教的準備工作。他先到台灣當時的首府台南(清代原稱「府城」，為求敘述之統一，此後除了引文外，均以今名「台南」代表「府城」)進行考察，值得注意的是他「為了避免別人注意，我穿著工人的衣服，走在城裏頭」。⁵這和十六世紀利瑪竇(Matteo Ricci)的換上士大夫衣著的策略有很大的不同。蓋當時的台灣，士紳少，穿著士服正易引起他人的注意，這不是郭神父這位唯一在台灣的天主教傳教士所樂見。另一個原因可能是前後兩期傳教的對象不同所致。由此可知，當我們運用文化衝突的概念來理解台灣天主教發展時，便需要更為謹慎的考察所謂文化與受傳對象之間的對應關係。

1859年9月下旬，神父在知悉德輪船事件平息後，再度回到打狗開始推展傳教事業。不久首先有三位慕道者接受洗禮。⁶11月下旬，郭神父在高雄草創臨時聖堂，即今日之高雄玫瑰聖母堂基址。1860年初，在前金成立台灣最初之聖堂。1861年，郭德剛赴今日屏東縣的萬金莊平埔蕃社傳教。陪伴郭的是一傳教員楊篤(時人稱之為「篤哥」以示親切)，此為屏東傳教之始。但他們在路上遇到客家住民的阻撓。其後又派一傳道師「斌哥」(可能是從廈門來台的瑞斌)到當地一年，得到不少慕道者。一八六二年五月有兩位該地慕道者被帶到高雄的前金天

4 大國督編，《台灣カトリック小史》，杉田書店，昭和16年，頁122-124。

5 同上註，頁125。

6 陳嘉陸譯，《天主教來台傳教壹百年簡史》，高雄，1960，頁31。但另有一說是第一位領洗者為名「達仔」，聖名若瑟，由郭德剛神父於一八五九年十一月十三日領洗，代父為傳教員楊篤(阿篤哥)。見善導週刊社編輯，《天主教高雄教區成立二十五週年紀念冊》，高雄，1986，頁59。

主堂受洗。⁷

一八六二年七月孤身奮鬥的郭神父有了助手，兩位同會人士楊真崇(Andres Chinchon)神父與黎茂格神父 Miguel Limarques「經過艱難的航程後」來台。這兩位神父分別乘不同的船隻抵達，或許是擔心萬一船難得以有活口，而不致全部遇難。這時在台灣南部已有三位神父，但不到一星期他們就遇到台灣常見的天災—地震與颱風，這使得楊神父「意氣消沉」。地震所造成的破壞和斷垣殘壁，或是駭人的傷亡是他們未曾經驗過的。從教士的記載中我們可以想見當時之慘況。

七月八日的地震真是恐怖，就我所知，僅台南地區已有五百多間房屋倒塌，被房屋壓死的人超過三百。很多地方出現裂痕，台南北方遭到海水倒灌，整個區域成了魚池，原先稻米的田地，現在只有海鹽了。

似乎地震侵襲還不夠，隨後又來了強烈的颱風，接連不斷的暴風，使死亡人數和損失俱增。⁸

1863年正月，黎茂格神父任為萬金本堂駐於此地。但正當客家族與該社之間，發生劇烈之爭鬥。神父只住了數日即回。1863年10月郭神父親自再去，結果遇上首次較嚴重的暴力事件。但在此之前，我們先看看在傳教初期所遇到的其它困難。

傳教士首先面臨的問題是居民冷漠的態度。神父認為中國人「仍表示不喜歡我們，對我們不理不睬，甚至輕視我們，多次以粗野的字眼，如豬或狗來稱呼我，侮辱我。但是，在一切凌辱中，最令我傷心的是，他們說傳教士只是到這裡說故事而已。」從這段紀錄固然可以反應傳教士眼中住民粗鄙的形象，但若若站在當地人的角度，傳教背後的西方勢力本就令人疑懼，復加鴉片商人與海盜等勢力的糾葛，對於神父自然無甚好感。事實上，這種摻雜了各種政治社會事件的負面印象，從對傳教士的謠言最能表現，也因為這些謠言，往往造成許多誤解與衝突。

這些衝突包括不准修路、不准進教堂、辱罵、口角等。另外更為激進的要算是燒打教堂及傳播謠言了，下面即是一個生動例子。教會方面在1864年4月17號發出的信中記載：

那時正是中午十二點，我剛準備降福餐桌上的食物的時候，溝仔墘的傳教師跑了來。……他一進屋裡，就伏在我的腳前，開始斷續地抽泣……。「一切都完了。」他邊哭邊說：「他們來天主堂搶東西，搶走了我們僅有的三頭牛，把屋裡的病人擄走且想要殺我。」很明顯地，他說的是那些外教人，他們常常破壞我們的工作。當我要傳教師說明細節時，來了一個人，他的哥哥也被抓去，這人具體地報告了真相。……溝仔墘教會是不久以前才建立的，我認為它的位置是最理想的，溝仔墘正介於萬金和前金之間……。現在我的喜樂變成了痛苦，溝仔墘教會已被完全破壞了，它是那麼新的堂區，甚至還沒有一個人領洗呢。⁹

7 大國督編，前揭書，頁142。

8 同上註，頁48。

9 黃德寬，《天主教在台開教記》(Pablo Fernandez, ed., One Hundred Years of Dominican Apostolate In Formosa, translated by Felix B. Bautista and Loudes-Bautista, Quezon City, Philippines, 1959)，

有關謠言的記載則是在 1865 年 10 月 4 日良方濟神父的報導：

兩個月以前，在台南的基督教牧師被一個患腿疾的漢人請到家裏去。這位牧師也是個醫生，他發現那人的腿已生疽萎縮，就想動手術切除它。但是被病人的親友阻止了，他們宣稱醫生想要用那條腿製造鴉片。

因此事件，使我們的困難更趨複雜，現在很多本地人認為傳教士來台灣，並不是像我們自己說的是來傳揚福音，而是來殺人並製造鴉片。當然，是很可笑的，但是無知的本地人卻信以為真。¹⁰

值得注意的是以「鴉片」作為謠言的內容很有象徵意義。以往我們聽到的多是採生折割，取睛煉銀之類的，如今在台灣卻是以此具有暴利且作為英國侵略的工具的物品來造謠。其他的謠言有井中下毒，或是跟前來調查的人類學家合謀佔領台灣以及挖取死人心肝等等。¹¹如同前述，這種現象顯見各種經濟或是政治上事件往往在台灣住民心中不規則的轉化成某些看似荒誕的謠言，甚至成為天主教揮之不去的原罪。由此我們來看 1863 年之後漸趨頻繁的暴力衝突也就不那麼奇怪了。

7. 暴力事件

在討論此事件之前，有必要說明一下當時在台的天主教會組織。原來郭神父一人在台時，為了在台灣傳教能永續經營，早在 1860 年 8 月 7 日在馬尼拉及福州主教會議上即推選福建的翁安當(Mariano Anton)神父為區會長(Vicar Provincial)，¹²次年來台就任。但因水土不服，於同年 11 月返回福建，而區會長一職即由郭德剛神父接任。¹³在他管轄之下，本有黎、楊兩位神父，但黎茂格神父在一八六三年四月奉召返回馬尼拉，只剩兩位神父在台，一直要到 1864 年 1 月才再有一位良方濟神父(Francisco Herce)來台支援。¹⁴所以當 1863 年 10 月暴力事件使郭神父受傷後，由楊真崇神父寫了如下的報導：

(從前金到萬金的路上)幾分鐘後出現了十一個相貌邪惡的人，身上都帶著矛、刀和槍，從他們的外表就知道他們的意圖。他們向會長神父(郭德剛 Sanchez)示意，問是要錢或是要命。…他們搶走神父的錢後，還不滿意，並搶走了他的行李、衣服、書籍、日課本子、酒、麵餅、祭衣和樂器，並且打傷了他的一個手掌，因為有個匪徒要攻擊神父的隨從，神父伸手去擋。…和神父同行的山地人，試圖要保護神父，他們中有一個以勇敢著稱的，曾拿出槍來要射殺匪徒，但被神父阻止了。…這事發生時，大約有兩百多個外教人圍觀，但都袖手旁觀，沒有人出來遏止暴

光啟出版社，台北，1991，頁 51-2。

10 同上，頁 60。

11 陳嘉陸，前揭書，頁 33 及 38，挖取死人心肝；頁 37，井中下毒；頁 35，外國謀攻台灣之陰謀。

12 有些書上譯成「副會長」，如陳嘉陸，前揭書，頁 31，但細按原意應為台灣地區的長上，故稱區會長較妥。

13 同上註，頁 31-32。

14 江傳德編纂，《天主教在台灣》，善導週刊社出版，1992，頁 280。

行...。這次我們向駐在港口的英國領事提出控訴，希望能遏阻匪徒，並找回被搶走的東西，英國領事很幫忙，我們非常感激。¹⁵

8. 土地糾紛

這段話中有趣的是傳教士早期遇事直接找領事協助。當時並無西班牙領事駐台，只有英國領事，而此人就成了各國在台利益的維護者。至於此事的發生的原因，還需要從當時客家人與原住民衝突的背景說起。當時對萬金教會敵意最深的是客家人，他們祖先自廣東省北部移民來台灣後，成為直接跟原住民接觸的人，特別是當時的平埔族。也由於漢文化較原住民文化高，平埔族也成為受迫害的對象。而今教會勢力進入平埔族部落，客家人自然為了維護其既得利益，而成了教會的主要敵人。當時的衝突層出不窮，只是沒有發生重大命案而已。根據教會資料分析，客家人在萬金附近發生之糾紛主要為土地的掠奪：

...客家族利用熟蕃之幼稚社會生活弱點，以喧賓奪主之計，不擇手段詐騙蕃眾，佔其耕地，爭其家財，計劃漸次擴展客家之勢力。受其甘言所惑之部份蕃眾喪失土地，成者受高利貸之害，致將祖先傳下之家室財產等被奪，又被誘共營不諳之事業，終歸失掉。而多年積蓄之財產，悉數被騙盡等等，之不與聞之慘劇無日不起，致熟蕃之勢力日漸傾倒。¹⁶

教會見此情況，一方面組織平信徒團體，亦即「聖母會」，¹⁷協助原住民生活趨於正常，戒除不良嗜好；另一方面為了顧及所有番社中一百二十戶的住民生活，乃「大量購置田園，將蕃眾移居此處，建設一熟蕃之小樂土」。¹⁸值得注意的是這種購買土地，放領給附近居民耕作，改善其生活，最終將該社區成為均屬同一宗教信仰之「教友村」，此亦和在中國大陸傳教的許多天主教傳教士一樣的策略。但此策略在台灣施行時，卻未奏效。當 1868 年在屏東縣溝仔墘(今之屏東縣竹田鄉)客家莊傳教的良方濟(Francisco Herce)神父為顧慮到貧困之客家族教友，擬四處交涉購買土地，安定其生活，但「異教徒均開法外之高價，無任何人出讓土地，致此一計劃歸於泡影」。¹⁹其中原因固然與教會經濟能力較差有關，但也有可能是台灣複雜的地緣結構影響了正常土地的交易。

9. 與客家族人之衝突

除了 1863 年嚴重的暴力事件外，還有許多教會受客家族人攻擊之事，略述於後：

15 黃德寬譯，前揭書，頁 50-1。

16 陳嘉陸，前揭書，頁 39。

17 聖母會...一般之我民族中，每遇有婚嫁，喪葬時，不論貧賤富貴均不惜費用，盛放鞭炮，或者盛宴招待親友之習慣，為此常不顧及經濟耗費金錢，以致債台高築被迫作出不義之行為者不鮮其人。而此一弊風不久亦滲透至熟蕃社，致之陷入苦境之日，教會當局為將此苦境，由客家族之壓迫中救濟熟蕃為目的，遂勸誘有力之教友，於一八七七年組織聖母會，以所得之捐款購置地產，將該收益之一部，充為貧困教友之婚嫁葬祭等補助費，以減輕其生活負擔所設立者，該會自成立至今經七十餘年之久，今尚為隆盛活躍教會之中而不衰。陳嘉陸，前揭書，頁 40。

18 陳嘉陸，前揭書，頁 39。

19 陳嘉陸，前揭書，頁 44。

1864年二月七日，客家民眾藉口萬金一名教友不祭拜祖先，不出錢演戲，故於夜間攻擊萬金教會，並縱火，打傷救火教友。不過萬金聖堂並未被焚，之後客家民眾威脅教友不准上教。1864年春郭德剛神父派傳教師阿成哥從萬金到竹田鄉溝仔墘開教，建立聖堂。但四月十日，客家仇教民眾便將溝仔墘的堂區搗毀。據稱此次事件起因係為一名十一歲的教友患病，乩童妄稱此病乃信教所致，當地居民不忿，故大舉攻擊溝仔墘堂區。六月七日，客家人再度率隊破壞、搶掠溝仔墘堂區，此後溝仔墘便不斷為客家人襲擊，以致最後的荒廢。十一月，客家民眾攻入萬金教會，但未造成重大損害。1865年12月聖誕節時，客家人再度攻擊萬金鄉的傳教士，並發表若干反教告示。指責傳教士來台搶奪礦產，霸佔領土。1866年11月29日，客家民眾燒毀萬金天主堂，數年經營完全被破壞，財物被搶掠一空，事後並佈告教堂內暗藏骷髏。1867年2月2日，萬金教友殺死兩名客家人，起因於這兩名客家人似欲盜牛，客家人不甘，本欲武力報復，未成，後向鳳山縣知事提起正式訴訟，向教會提起賠償銀百兩的要求，為主管神父李嘉祿拒絕。該年郭神父到溝仔墘開教時，在山區被客家匪徒綁架，匪徒要求一千八百元贖金，經過領事與知縣營救後，郭神父付五十元贖金脫險。1868年4月2日，客家暴民襲擊溝仔墘天主堂，將房屋與農田完全燒毀。此年有一名客家人混入教會，似欲得財或欲對神父不利。另有一些反教謠言流傳，如逮捕教友一人賞五十元，逮捕傳教員賞一百元，逮捕傳教士可獲得賞金一千元等。以及教友將毒藥投入井水，欲毒害鄉民云云。

10. 對北部與深山原住民的傳教

相較於與客家族之間的衝突，道明會教士對於原住民反而有更深的期待，除了向漢人及原住民的平埔族傳教，也到過北方試探恢復教區的可能。另一方面也曾嚐試向深山的原住民，亦即當時所謂的「生蕃」傳教。但在中國官府眼中，這些所謂內山之生蕃凶頑難馴，經常容易滋生事端。如果外國人與之接觸，更難保會發生什麼不幸。一旦演變為教案，對於地方官實為棘手之事，因此官府有如下佈告：

查臺灣南北兩路，番社遼闊，人鮮明理。如入內山，生番兇頑更甚。外國傳教士，如有前往，設遭不幸之事，中國地方官更難保護。嗣後應由領事官諭知傳教士：如往各處遊歷，須請蓋印執照註明赴何處字樣，不可載入番社及內山一帶。倘有不遵，輕入其地，致有別事，莫謂中國地方官不加保護也。

再查臺灣係閩、廣兩省之人居多。閩人中，又以漳、泉兩府為多。向來各分黨類。閩與廣不和，漳與泉又不和；即泉州一府之中，如晉江、南安、安溪、同安亦均不睦；時有爭鬥之事。此三籍中，邇來俱有奉教者。如有爭鬥，自應仍照中國律例辦理，不得牽涉教案，以昭允協。

在此佈告的第二段提到：「此三籍中〔廣、漳與泉〕，邇來俱有奉教者。如有爭鬥，自應仍照中國律例辦理，不得牽涉教案，以昭允協。」由此則可見當時許多與教會有關的衝突，可能背後有漢人地緣結構之影響。無怪對於當地官府〔甚至於住民而言〕，傳教士的活動雖然未必有害，但他們積極的與各種勢力交通，就無疑會使得本來已經錯綜複雜的移墾社會情勢，變的雪上加霜，因此在禁

絕不成之後〔無奈有條約保障〕，劃清教案與地方衝突的界線當然是至為必要的。

不過，儘管官府有如此的態度，但傳教士對於原住民的傳教依舊不遺餘力，在《臺陽見聞錄》有記載：

同治五年，訪聞鳳邑港東上里萬巾莊(即名力力社)，有外國洋人開設天主教堂，引誘社番習教情事。遂即選派妥丁，協同下淡水縣丞所派親丁，馳赴確查，並傳通事潘水泉、土目潘政山、隘首潘德安，詳細詢問。據稱：該社向住番丁，離傀儡山僅止二里，自同治元年間，即有洋人到彼，用銀勾騙社番，認為同宗，築蓋茅屋居住。至本年始□土查看。該社蓋有磚屋三間，坐東北、向西南，兩邊草屋二十餘間；又搭蓋樓屋一座。內有漢人，假充洋人，設堂傳教。所有萬巾、赤山、加匏朗三莊社番，約男婦二百餘人聽其所惑。每日在堂念經，名為禮拜。並稱：去年亦有洋人到內山勾結生番，給予犒賞酒肉。旂後洋人，亦有進內山遊玩，同行者僅止三、四人。閩、潮、粵莊之人，均不信從入教。²⁰

以下分述各地區原住民之傳教事業。一八六五年四月間良方濟神父就直接遇到萬金附近的內山居民，當原住民發現他不是漢人時，都熱情地寒暄，並開始問許多問題。良神父這樣寫道：

他們說我能為他們工作，教導他們的同胞，使他們非常高興…，他們的語言竟和菲律賓話那麼相似。我送給他一些禮物和酒，他們高興得難以形容，邀請我入山拜訪他們的村子，但是教友勸我不要去，說應當謹慎些。²¹

同年五月三十日，郭神父帶了兩位菲律賓人同去內山，因為郭神父覺得原住民的語言和菲律賓人很接近，他去的時候也帶了一些酒及禮物受到很熱烈的歡迎。但是還是發現語言畢竟不通，無法從事任何傳教活動。他們也一度想購買一位幼童，訓練其成為傳教員，然而當時「生蕃」並不出售任何幼童，此計劃因而作罷。²²一直要到日據時代才有再往內山傳教的努力。

1865年3月一群蛤仔灘(現在宜蘭附近一帶)的平埔番訪問郭德剛神父請派傳教士，談話中發現此族自十七世紀以來就已使用陽曆，可能是西人所歸化的後代，酋長越過山水來找傳教士。神父不忍拂其虔誠之心，及將來擴展教區計，不顧神父及傳道師之不足，遂與頭目約定遣派一富於經驗之傳道師至該社，但此人到了台南就生了一個月的病，病癒後，又走了十二日才抵達三貂角。然由於當時有戰爭，原住民皆忙於備戰，而無暇傳道。²³這位傳教員在當地居住之時，曾親眼見到漢人：

把那一帶三十六個村莊中的十四個放火燒掉。這十四個村子就是一直拒絕接受漢人的統治和影響的。當地的民眾聽說漢人逼近村子，都逃跑

20 《臺陽見聞錄》，〈洋人引誘社番入教〉，頁 50。

21 黃德寬，前揭書，頁 56。

22 陳嘉陸，前揭書，頁 48。

23 同上，頁 47。

了，房子被夷平時也無暇去回顧。傳教師跟著當地人跑到山裡避難，…實在不是個傳教的時候，人們還是驚慌不安，怎能接受福音？²⁴

不久傳教員錢用光了，只得回南部。北部傳教也因而暫時中止。

但在 1868 年，道明會又開始計劃基隆的傳教。基隆本為道明會十七世紀傳教之處，郭德剛神父等一直想恢復老教區的傳教。他們念念不忘兩百多年前在基隆殉教的同會會士。²⁵1868 年 10 月間，郭區會長派遣良方濟神父及一傳教員，乘菲律賓教友伯多祿·加連志諾(Peter Qualentino)的帆船，從台南安平乘舟到基隆，前後共花了四十天才抵達。次年又自馬尼拉派一華人神父江味增德(Fr. Vincent Kang)前來基隆協助。良方濟神父以七百元買了一房子，又得江神父之助，不少慕道者來，但不幸的是良神父水土不服，染病後於次年返回高雄，餘下江神父及傳教員也染重病離開，教會乃委托當時在該地推廣茶葉的英國人達陀氏(John Dodd)²⁶及前文提到之加連志諾照顧，但也僅能維持到 1880 年，其後將土地及房屋賣掉，暫時結束該地的傳教活動，²⁷一直要到日據時期教堂才重開。

但值得注意的是，與十七世紀西班牙的傳教事業相比，道明會士並未訴諸該國之武力。這當然一方面西班牙國力已大不如前，另一方面恐怕也是當時其策略是以和平手段為主，想以宗教的優越性爭取台人的好感。更重要的恐怕是此時的社會結構已與過往大不相同，中國政府的介入，地方紛雜的勢力，都使得傳教的更為困難。

1865 年西拉雅族(Siraya，平埔族一支，居今台南縣新市，此熟蕃族後來受漢族之壓迫，遷居於高雄縣旗山及台東縣方面之山地)頭目前來高雄要求神父派員至該蕃社傳福音，此人即是曾在一八五九年款待過郭神父的人。但惜因當時神父不足，只有三位，且路途遙遠，未能如其所願。後來，長老會傳進該社，得到不少信眾。²⁸在此值得注意的是，當居住在台南的蕃族要求傳教時，神父以路途遙遠並人手不足而拒絕。但是當宜蘭的蕃族同樣要求傳教時，神父的反應卻是「神父不忍拂其虔誠之心，及將來擴展教區計，不顧神父及傳道師之不足，逐與頭目約定遣派一富於經驗之傳道師至該社。」需知宜蘭之於高雄較諸台南之於高雄其距離相去不止數倍，何故神父捨近求遠，實在令人費解。但如果考慮到當時南部住民對天主教之態度，則北部作為先輩傳教的故土，毋寧更讓教士有美好的嚮往與神聖的使命感。1866 年春，南台灣番社總頭目出示「其他部落不准入信天主教，若民眾私自入信，後有何損害，概與總頭目無關云云。」這無疑反映了南部傳教的困境。

11. 南部傳教的阻力

1866 年時，整個傳教情況仍不是太樂觀。此年年初郭德剛區會長向馬尼拉總部報告萬金附近的溝仔墘教堂的不幸遭遇，以及漢人和原住民間的敵意：

24 黃德寬，前揭書，頁 64。

25 不論是大國督編的書或是 Fernandez 編的書信集都提到在基隆傳教受難的會士。甚至在大國督的書前的扉頁上，題有懷念殉教士的短詩。

26 江傳德，前揭書，頁 112。此人即英商寶順洋行之主人，在台北經營茶葉有名。

27 陳嘉陸，前揭書，頁 52-3。

28 陳嘉陸，前揭書，頁 46-7。

關於不幸的溝仔墘堂區，我簡單地說明一下，您必定記得，我們很努力的在那裡蓋了兩次房子，但是兩次都被洗劫並破壞。從那時起，我就沒有再去過那個地方。……半年來，有許多的變化，情況改變不少。以前，走在通往溝仔墘的路上，無可避免地要遭到匪徒埋伏掠奪，現在有些進步了，附近的兩個村民代表會同意把捉到的盜賊送往官府。所以竊盜案件減少了一些。

然而，基督徒仍須非常小心，儘可能的保守秘密。不隨便談論信仰，以免遭到報復。對最神聖的權利(信仰)也須保持沉默。…這裡的漢人也大談自由，但是他們所謂的自由，就是使本地人成為奴隸。如果本地人想要繼續保有漢人所允許的一點自由，就必須向漢人磕頭。…為此，基督徒必須加倍小心，如果他要到溝仔墘—漢人、客家人大本營—就得提高警覺，否則一定會遭遇不幸。²⁹

從上述的論述中可以看到道明會士在台灣的傳教政策上，因地制宜而將傳教對象進行切割，以平地原住民為主要的爭取對象，而將漢人(亦即閩南人)及客家人劃分為對立面。這裏地方上的自治組織也發揮了作用，而對於「自由」的概念與中國人的想法之間的落差，也在此表現無遺。道明會士的基本預設根本就是宗教自由與生俱來，是不可讓渡的人權；而他們認為漢人心目中的自由則是開墾及定居的自由，自由買賣的市場自由，而最後的結果將導致萬金平地原住民受到漢人的奴役，而這正是道明會士想方設法要加以避免的。

也就在同一年，一八六六年，郭會長派傳教員嚴振(另有一說其名叫嚴超，³⁰或稱向佰先生)³¹辦理孤兒院，亦即傳統所說的育嬰堂。嚴氏赴台南就任後，先以二十五圓在八吉境地方向民婦陳氏租一房屋，³²收容孤兒，並花錢僱用乳母哺育年幼嬰兒；一年後有六十多孤兒入院，同時也找到數位慕道者，其中有一位名叫林水龍者，成為本島出生最早的一位傳教員。³³

由於設施漸備，郭會長本想從此將總部遷於台南府城，但其購屋行動受到阻礙。郭神父原本花了兩百四十元買的房子，但不久就被逐出。在抗議無效後，只得在一八六八年以六十二元之價款，在台南郊外購得土地，而在僱人開工又屢被阻撓之下，只得自建小屋安頓下來。³⁴

12. 安平教案與排外風潮

也是在此年(1868)爆發了十九世紀本島最嚴重的教案兼國際交涉事件。³⁵天主教同基督教同受影響，從三月到五月，南部排外風氣很盛。先是此年三月間，

29 黃德寬，前揭書，頁 64。

30 善導週刊社編輯，前揭書，頁 59，提到從廈門來的傳教員中有嚴超。

31 《天主教台南教區的成長，台南教區成立二十五週年紀念》，台南，1986，頁 72。

32 賴永祥，《教會史話》，台南，人光出版社，1990，頁 270。

33 陳嘉陸，前揭書，頁 49。

34 陳嘉陸，前揭書，頁 50。

35 此事件英方所認知的有關細節請參考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 China, 29, Sessions 1868-1872, Irish University Press, 1971, China, no.3(1869), Correspondences respecting Missionary Disturbances at Che-foo and Taiwan, pp.93-149。有趣的是英外交官只關心傳教士，對於華人傳道員如高長並不認為在其保護及營救職責之內，請參考 p.95-96。p.99 提到教堂及教士受害情形。

英商怡記洋行在台中梧棲地方採買六千餘元之樟腦準備出口，但被清廷扣留，隨後發生逼退郭神父在台南買屋事件，及騷擾基督教禮拜堂事件。三月十九日基督教英國耶穌教長老會馬教士的傳教師高長，被控以藥迷昏婦女，在埤頭被抓入監。馬教士不服，向本國領事提請協助。於是英領事吉必勳與臺灣道梁元桂晤談，雙方不但未獲諒解，且事後證實臺灣道有意派人襲擊吉必勳(John Gibson)

，臺灣道更有意驅逐甚至殺害英國商人畢麒麟(W. A. Pickering)。當時畢麒麟正在臺灣北部收買樟腦，吉必勳不能容忍，於同治七年十二月命令英將加當率兵攻佔安平府城，在英方要求得到解決之前，暫將安平府城作抵。安平府城陷落時，清將江國珍被擒，服毒自盡，英軍並向臺灣士紳官員索得四萬兩軍費。據云天主教會亦分得銀二千兩。清朝政府於同治八年向英國展開外交交涉，大致以英國退還軍費四萬兩與安平府城，清朝容認馬教士的傳教自由作結。³⁶

正當安平教案發生期間，排外風氣更加熾熱，四月二日，另一傳教員莊清風在高雄附近被殺，心肝被剖食。³⁷四月十八日排外行動蔓延到南邊的屏東，溝仔墘天主堂被焚，³⁸良方濟神父欲前往官府投訴，被圍住險些挨打。五月三日台南小東門外的天主堂被搶，³⁹除了良方濟神父遭官府留置外，嚴傳教員在混亂中被捕，在監獄中兩個月，出來後不久即去世，死時才三十多歲。⁴⁰而原來孤兒院所收留之三十名，只好由分居於各地的教友照料。其時英國外交官的紀錄也提到了對基督宗教的壓制：

1868年分巡台灣兵備道梁元桂追隨其前任的政策，對舊教在台灣府城內所購買地產，拒予批准；又對襲擊舊教教會一事，不加任何關切—教士們正向官員們覓取救助，但挑唆暴行的正是這批官員，「他們竟允許並鼓勵對天主教與新教及其信徒之最無恥的謠言，使在整個台灣南部，傳播無阻；直至各衙門的走卒們，覺得民眾的情緒十分激動，而可無所忌憚地率領眾人，搗毀附近的所有教堂」。四月初，溝仔墘天主教堂遭掠奪焚燒。⁴¹

1868年5月後，教會這次受到的風暴才稍為減輕。⁴²1869年七月十九日，郭德剛神父因身心過勞不支而離台，第一期的傳教也至此告一段落。

貳、第二期：1869-1886 向中部推進

道明會在台傳教的第二階段從一八六九年郭德剛神父榮調香港道明會會

36 《清末教案》，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福建師範大學歷史系合編，第一卷，北京，中華書局，1996，頁617。

37 〈台灣英民被擾各案情節單〉，《清末教案》，頁677-8。

38 黃德寬，前揭書，頁87-9。

39 賴永祥，《台灣史研究》(原文為 James W. Davison. The Island of Formosa, Past and Present, 1903)之第十四章譯出。又見於 James Davison, 《台灣之過去與現在》，收於《台灣研究叢刊》，第107種，頁270。

40 Pablo Fernandez, ed., One Hundred Years of Dominican Apostolate In Formosa, translated by Felix B. Bautista and Lourdes-Bautista, Quezon City, Philippines, 1959, p.129。

41 見〈台灣開埠前後的涉外事件〉，收於賴永祥，前揭書，頁136。

42 此整個事件也可參照《籌辦夷務始末》(寶璽等編，北平故宮博物院影印，1930，台灣國風出版社重印，1963)，同治朝，卷62~68均有處理有關台灣樟腦事件及教案之史料。

長，結束十年在台華路藍縷的工作開始，一直要到一八八六年何安慈(Celedonio Arranz)神父北上和尚洲(今日之蘆洲市)為止。此期間相較於上一期草創階段的動盪不安，應屬比較安定時期，主要的發展為中台灣的開教：在新會長楊真崇的推動下，為今日台灣中部的天主教做了紮根的工作。

一八六八年的動亂最後迫使法國副領事亦即英國代理領事吉必勳(John Gibson)及清廷地方官去職，⁴³英國領事卯和(Robert Swinhoe)回任。在英方外交官跟總理衙門往返交涉多次後，清廷答應保障傳教士安全，傳教士得以在台南定居下來，天主教會並得到兩千兩的賠償，⁴⁴以重建被焚的教堂，並分別在台灣縣及鳳山縣處罰了十名肇事的前軍人及百姓。⁴⁵至此天主教的發展才算擁有比較穩固的官方基礎。

一八七一年九月十一日，李嘉祿(Ramon Colomer)神父成為台南本堂，他重建教堂獻給該會聖師聖多瑪斯·阿奎那(St. Thomas Aquinas)。一八七二年一位越南籍的韓若望(John Han)神父⁴⁶取代他，此人是一很有學問的讀書人，可與士紳維持較好關係。

一、中部的傳教

(一)、竹仔腳的傳教

一八六九年有一居住在竹仔腳(彰化縣員林鎮永靖鄉之竹子腳)之士紳來高雄，面請楊真崇會長到其家鄉傳教。楊會長鑑於當時在台之神父無一熟悉中部情形，且台語也尚未精通，於是決定在一八七二年派一富有經驗的傳教員「阿成哥」(Placido A-Sieng-Ko)去開創新局，阿成哥由一位教友陪伴下到達竹子腳，立即成立一傳教所，找到一些慕道者，但後來因為教會並不願介入一件因債務而引起的殺人事件，因而得罪當初邀請來此開教的地方大戶，慕道者在其勸退下日漸減少，阿成哥也在次年申請退休，接任者林水龍傳教員未能立即赴任而使此地傳教事業中斷。⁴⁷

在此債務事件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阿成哥本欲「將此事作一圓滿合理的解決」⁴⁸，顯見當時傳教士也頗能認知到自己仲裁地方事務的能力與特權，而此種特權如在德國輪船事件中所見〔代表居民向官府交涉之功能〕，可能相當程度上與地方士紳重疊，甚至於因為條約的加護，更為徹底的取代士紳亦未可知，事實上類似的狀況在沙崙仔的傳教中亦可見到。

43 《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 65，頁 8-9。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 op. cit., p.52-53。

44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 op. cit., p.141。

45 Rev. Van Hecken, C.I.C.M.(賀歌南神父), *Missiologie van Taiwan*, partly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by Rev. A. Van Lierde, C.I.C.M.(栗鵬舉神父),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atholic Church on Taiwan", 出版於《懷義通訊》(Verbist Study Notes), no.7(1986), p.9; 又賴永祥，前揭書，頁 270。

46 他是一位在越南受到政治迫害而逃出來的神父，後被派來台灣，同會士稱他為 Tunquino 神父，從發音來看，應是叫「東京」神父，應該是指其來自越南東京之故。參見 Fernandez，前揭書，頁 120；但江傳德稱之為杭若望神父，於一八九二年返回越南東京，次年罹病去世，見氏著，前揭書，頁 282-3。

47 江傳德，前揭書，頁 118-9。

48 江傳德，前揭書，頁 118。

(二)、羅厝教會的發展

除了竹仔腳士紳的邀請外，另有一位羅厝莊(今彰化縣埔心鄉羅厝村)的居民涂心⁴⁹常往南部經商，在高雄聽了神父講述天主教義後很感興趣遂與鄰近的親友如後壁厝的劉江、崙頭黃迴枝、新厝的劉鎮等與莊中有名人士商量後，於一八七五年春季到高雄要求教會派人來羅厝莊開教。是年五月楊真崇會長就派原駐老埤的本堂神父吳萬福(Vicente Gomar)，率領傳教員林水龍到羅厝莊，此地離竹仔腳不遠，吳神父選定後壁厝租一所民居，作為傳教所兼神父住所，不久全後壁厝居民皆來慕道，一八七七年吳神父以一百一十元在羅厝購買一大塊土地作為教堂基地，但傳教工作仍在後壁厝推行至一八八二年。⁵⁰

一八八〇年七月十五日，吳萬福神父奉命調離羅厝，繼任者為前一年方從菲律賓派來在前金之何安慈神父，由於教友增加，何神父乃於一八八二年耗資一千二百圓在前些年所購土地上建一教堂及神父居所—道理廳，此廳後來傾倒，乃於一八八七年再播出一百十四圓建立新的道理廳。同年三月七日何神父奉命前往台灣北部和尚洲開教。繼任者為李嘉祿神父，五年之內熱心傳教，一八九一年調至萬金，再由當時在羅厝學習台語之林茂德(Nemesio Fernandez)神父繼任。⁵¹林神父傳教熱心，但其方式引起頗大的糾紛及衝突，將在後面討論。

(三)、沙崙仔的發展

由於彰化的羅厝與府城台南間往返須四日，交通不便，教會乃想在其中間地區建一中繼站，俾供休憩；而基督教前不久也在此搶先傳教，並且相當成功，⁵²乃在一八七六年在沙崙仔(今嘉義縣大林鎮中坑)租一民屋，改建為臨時教堂，派遣羅厝的王靈牧(Jose Nebot)神父及焦姓傳教員駐在此地，初期遭人丟石破瓦，並被偷走兩百元的傳教經費，但仍堅持下去。傳教的實際狀況，我們可由王靈牧神父的報告中一窺端倪。

…可能您已知道，台灣會長神父很早想向北部發展傳教活動。為了奠定發展的基礎，已利用各種機會，派遣傳教師的北部，先行調查設立本堂的可能性。這位傳教師認真負責，深入了解當地居民的想法。他回來後指出，那些邀請傳教士去請要理的民眾，並不是真想做基督徒，他們只是希望傳教士利用特權保護他們。⁵³

(四)、藉教以保身家

由此報告不難推想，大多數台灣住民邀請教士傳教，可能都是基於類似的心態，寄望傳教士利用特權保護他們；而在此論述中也可見到傳教士對於傳道員助手的信賴及借重其擔任開教的先鋒，這在人生地不熟之傳教區是很重要的，也是

49 涂心即是日後成為台灣島上第一位本地的神父涂敏正的祖父。涂神父的一些事蹟，請參見施麗蘭，〈涂敏正神父與里協淺次郎教區長〉，《鐸聲》，第362期(1997/01)，頁55-60。

50 江傳德，前揭書，頁119-120。

51 江傳德，前揭書，頁120-1。

52 黃德寬，前揭書，頁112。

53 《重修台灣省通志·住民志·宗教篇》，頁353。

事半功倍的一種方法。但是另一方面，若觀諸開教至今所受到的官府制肘，以及與地方勢力糾纏等狀況，則教士的特權似乎也備受限制。然而若考慮到教士面對官府時，背後所挾帶的條約保障，則住民的要求就稍微可以理解了。正因為傳教士有如此特殊的身分，所以當教士深入地方的衝突時，便成為打破強弱形勢的新力量。也因此，官府極力希望澄清地方衝突中的教會因素，以免使本來複雜的地緣結構更加的不可收拾。以致於官府宣稱「此三籍中〔廣、漳與泉〕，邇來俱有奉教者。如有爭鬥，自應仍照中國律例辦理，不得牽涉教案，以昭允協」。⁵⁴「奉教之華人，遇有訟事，應由地方官照例辦理，教士亦不得干預。」⁵⁵又在日本侵台時，福建巡撫王凱泰針對夷務奏呈中，也可以看到這種區隔教會與民眾的企圖。茲引如下：

天主教傳入中國，不能不按照條約，為之保護。無如莠民恃教為護符，作奸犯科，逋逃淵藪，教士多方徇庇，官吏敷衍含容，良民受屈，積不能伸，怨毒日滋，禍害愈烈，天津前事可鑒也。論者謂地方官不能撫循百姓，百姓藉教以保身家，非民無良，乃官驅之。第小民稍有人心，從不為彼所惑。入其中者，必先有藐法格官之意，而後動於惡。此風斷不可長。臣愚，以為教士雖外國人，教民則中國百姓也。以中國所轄之民，准彼傳教，固已曲全和誼，必不可以自主之權，由彼擅握，致使大拂民情。應令已入教之人，開列姓名，報官存案。其續入者，稟由地方官查無過犯，方准照約保護。儻係現在案犯，及先無報案者，概不准作教民論，教士不得過問。或亦補偏救弊之一法。可否飭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會商住京公使，議覆施行，伏乞聖裁。⁵⁶

又在 1877 年丁日昌所上摺子可見：

臺北淡水廳轄境五六百里，官長威令之所不及，天主教因而簧鼓其間，數年以來尤覺恃勢橫行，無惡不作，臣於去冬路過艋舺時，訪知該教民等魚肉鄉里，稍有身家之人，被其凌虐，不可勝計。必遵逼使入教，而後始安死生。其尤甚者，有該廳所轄之和尚洲民人李東面，並子李先登即李溫岸，倚侍入教多年，自稱教首，疊犯各案，拒捕傷差，實堪痛恨。

⁵⁷

其實丁日昌所提到的天主教應該是北部的長老會，因為當時北部並未有天主教的傳教士活動，更不用說華人信徒了。丁氏恐怕就像太平天國時的曾國藩一樣，將西方傳入的宗教一律視為天主教。不論如何，清朝官方欲區隔民教之心是無庸置疑的。

教會的特殊身分使百姓可以「藉教以保身家」，而這正是官府所擔心的。不過若說此時教會與反清勢力有什麼瓜葛，似乎又言之太過。教會對此似乎也有所注意，在李嘉祿神父的一封信中，便提到「愛好和平的村民更喜歡傳教士，而遠避革命份子，這些革命份子要藉暴力和流血來推翻清朝政府」。⁵⁸顯然，依賴政府條約保障的教會也樂見信徒的安份篤實〔雖然對於信徒動機的理解似乎顯得一

54 《臺陽見聞錄卷上》，〔洋人引誘社番入教〕，頁 49。

55 《淡新檔案選錄行政編初集》，〔第二二一 告示 光緒七年八月初八日〕

56 《臺灣文獻叢刊·同治甲戌日兵侵臺始末，卷四》，〔十一月庚戌(十一日)福建巡撫王凱泰奏〕。

57 〈光緒朝月摺檔〉，丁日昌片(光緒三年年 2 月 27 日)。

58 黃德寬，前揭書，頁 92。

庸情願了〕。不過，儘管教會有如此認識，但在後來依然可以見到教士與地方牽扯過深的案例，甚而進一步導致傳教事業的挫敗，此節待林茂德神父一段再行討論。

二、 其它地方的發展

雖然北部傳教有上述的困難，但傳教工作依然持續下去。一八七九年王靈牧神父被調往萬金，接替者為越南籍的韓若望，此人漢學基礎深厚，且兼通醫術，常為人施診治病，頗得當地知縣及士紳之禮遇。

韓神父在職時，以六百元購得現有之土地，並建一教堂及道理廳。在任兩年後又被調往前金，繼任者為何安慈神父，兩年之後再由吳萬福神父接任，在位四年後於一八八七年五月由甫來台半年的高恆德(熙能)(Francisco Giner)神父接任，高氏為學閩南語，混入兒童中與之嬉戲，不久即能講一口流利之方言。高氏在職期間，又價購一廣大的土地，兩年內建立了一座大的教堂。⁵⁹

韓若望神父擔任沙崙仔本堂的次年，亦即一八八〇年有兩位住在埔姜崙(今嘉義縣土庫鄉埔姜崙)的慕道者領洗，該處離沙崙仔有四里，但山路崎嶇，前來參加教會儀式相當辛苦。韓神父乃定期前往埔姜崙傳教，終於使得原來兩位信友的親戚皈依。一八七七年，高熙能神父擔任沙崙仔本堂神父時，更熱心來埔姜崙傳教，終於在一八八九年成功地使村中最有聲勢的劉有來家族中的八人接受信仰，乃成立一小堂區。⁶⁰

另外，自從沙崙仔成為羅厝及台南間的中途站後，王靈牧及韓若望神父也常到其附近四處傳教。一八八二年，傳教至斗六，在該地設一道理廳，附近石龜溪不少人信教，乃建一臨時聖堂，而雲林之西螺也建一道理廳。⁶¹

(一)、 本地傳教員的培養

一八七二年楊真崇神父在前金擔任區會長時，認識到傳教員的重要性，他在一封信上提到：

我們工作中唯一可靠的「本錢」是，本地傳教師的協助，他們為我們開路，準備園地，使本地人對我們有好感，這時候傳教士才出面，收割傳教師所播種耕耘的莊稼。我相信這個方法不是最好的，但連基督徒也這樣做，他門派遣傳教師，帶著破舊的聖經和小冊子，深入市場向民眾大聲喧講⁶²

由此則天主教卻對於深入地方與本土傳教員的重視，似乎是來自於基督教的刺激。實際上，就在此信前不到半年的時間，就有另一封信提到基督徒對天主教原本傳教方式的譏刺。基督徒認為天主教教士拒絕去市場宣講福音，是懦弱的表現。也許是不堪基督徒的批評，也許是鑑於基督教傳教的成功，在高賢明神父的

59 江傳德，前揭書，頁 127-132。

60 陳嘉陸，前揭書，頁 58-9；江傳德，前揭書，頁 130-1。

61 江傳德，前揭書，頁 133-4。

62 黃德寬，前揭書，頁 108。

籌劃下，請求道明會玫瑰省撥出六百元，於一八七三年十月設立了一所「傳教員養成所」。這間養成所本欲培養本地傳教員，協助神父傳教。然而當時全島教友稀少，無人願意入學，不得已，只好從福建省招募若干人來台學習，但開學不久，大多數人均因水土不服而生病，兩年不到就停辦了。⁶³

(二)、 民教衝突

此時期在南部也繼續傳教。一八七〇年萬金教會派人到北邊附近老埤(今屏東縣內埔鄉老埤)傳教，慕道者約有二十餘人。教會以六十二元購買一筆土地，搭建一茅屋，開設傳教所。一八七四年，吳萬福神父被任命為首任本堂神父，但次年即再被派往中部的羅厝，此地遂改由萬金天主堂本堂神父兼管。在此後的十年中，雖有因教友蓋房被指為造成鄰童病死之小糾紛，⁶⁴民教之間大致無事。一直要到一八八四年中法戰雲密佈之際，才再有一次較嚴重之衝突。

這次衝突是由於民眾向教友要求祭典捐獻所造成的。⁶⁵後來因為教友拒絕引發民眾的不滿，遂偷教友之牛而引發打鬥，進而造成兩名非教徒的死亡而使爭端擴大，傳教士不願交出參與打鬥的教徒，而致教徒再被攻擊，且住屋被焚，地方政府介入，將與事者捕獲。由於中法戰爭結束後之官方採取較寬大政策，對攻擊並燒毀教友住屋之人，僅要求賠償二百八十元，⁶⁶但在教會方面有一名教友則因前次爭鬥中發生命案，而於一八八六年二月二十四日被斬首示眾，英國領事官以為此案並非因信仰問題而引起，乃堅持不干預而教會無法得到外交支援，⁶⁷經此事件後，老埤村之教友乃有一部份遷往南邊不遠之萬金，一部分則到高雄的五塊厝(即今日高雄市苓雅區五塊厝)另開新局，老埤教堂自此關閉。高雄五塊厝小堂區成立於一八八一年，為在高雄地區除前金外，開創之一新堂區，⁶⁸後接納自老埤遷來之教友，成為另一教友聚居之區。

(三)、 文化層面的阻礙

又因為此事，使得清廷正視天主教信仰與地方信仰之間的摩擦，為免引起爭端，清廷於是決定凡「習教之民，向例地方迎神賽會之事，勿與勒捐」。⁶⁹但即使如此教士傳教時仍遇到許多阻礙，這主要來自於三個方面：一是偶像崇拜、二是社會習俗、三是基督教的競爭。就前兩點而言，從高賢明神父在一八七一年所寫的一封信中便可明見：

63 江傳德，前揭書，頁 121-2。書中雖未明言何年開辦，且說是由良神父開辦的，但是從其他的書信上來看，應該是在楊真崇會長任內的事，且是由高賢明神父籌劃甚多，見黃德寬，前揭書，頁 108；111；114。

64 陳嘉陸，前揭書，頁 56；江傳德，前揭書，頁 122-3。

65 江傳德，前揭書，頁 123。

66 另一資料顯示不同金額：「又，十年九月，准額領事照會：日斯巴呢亞教士王鐸德稟：鳳屬下淡水社老埤庄教堂，被潘幼黨眾圍擊；經代理鳳山縣李嘉棠責令庄眾賠修，折價銀一百二十六元，給領完案。」見《臺陽見聞錄》卷上，〈洋務〉，頁 31。

67 陳嘉陸，前揭書，頁 57；江傳德，前揭書，頁 123-6。此次案件因在英國公共檔案局存有紀錄，Public Record Office, FO.228, 1885, Taiwan to and from. p.432, 1885/11/20, no.43。

68 陳嘉陸，前揭書，頁 59。

69 參見淡新檔案選錄行政編初集第二一七告示，光緒十七年六月初九，頁 11503—4

實在曾有許多人來聽我們宣講福音，但卻因拜偶像的傳統執迷不悟，…還有不少人心地善良，但因一些阻礙而不能成為教友；這些阻礙大多出自父母的威嚇，如果繼續聽道理或領洗，就不能繼承財產。在中國人眼中，繼承財產是很重大而實惠的事情。⁷⁰

傳統崇拜偶像的風俗與繼承家產的社會習慣對於傳教是很大的阻礙，而這兩點又因為基督教的競爭而加劇，且看下面：

我們傳教工作遭遇許多困難，我立即可以舉出幾個例子，像基督教長老會使用特殊的手段，來吸引人聽道理；又本地人的心全被無數的偶像，迷信惡習所籠罩。……雖然在中國歷史中，沒有皇帝反對我們，但是迷信和偶像崇拜的習俗卻根深蒂固。本地人並不輕視我們的宗教，但他們認為天主教不是古老的宗教，而且不夠普遍，對他還是存著疑心。他們常常對我們大聲叫嚷：「妳們要向我們傳教，可是你們的宗教那麼新奇，和我們的生活方式格格不入，我們怎能接受？何況我們的祖先根本沒有聽過這個宗教，我們的智者和官吏也反對。」⁷¹

面對這種障礙，教士並非沒有反應。譬如前面所提，學習基督徒在市集宣講與訓練本地傳教師一事，便頗能見教士之調整與努力。除此之外，教士傳道時也試圖引用孔子或其它中國聖哲的章句，⁷²以博取當地人的認同，然而收效甚微。

三、小結

綜觀此期，台灣天主教似乎已從一八六八年教案中的陰霾中走出，教會在教案中得到賠償，除了物質的獲得外，教會地位也較前穩固。此時期由高雄、台南向中部彰化、雲林一帶發展乃自然之事。也由於傳教士太少，且教士重視教友品質，故領洗後，仍十分照顧教友，不輕言離去。也因為如此，台灣天主教在中南部奠定重要的基礎也在此時。二十世紀七十及八十年代本土出身的神父修女多半是在這些地區接受早期宗教教育的。北部的開展則有待第三期。中法戰爭雖在此期發生，但天主教受到直接影響是要在北上之後才發生。

參、第三期：1887-1895 重回北部

第三階段為何安慈神父在一八八六年北上後到一八九六年日本據台為止。此時期一方面繼續在北部擴大傳教範圍，同時在中部及南部繼續傳教。其中所遇到的麻煩也不少，比較大的一是在彰化，另一則是在台北。

首先是繼續中南部的傳教，一八八九年，即高熙能神父任職沙崙仔的三年，在埔姜崙西邊八公里處有一小村莊名叫「鹿寮」（雲林縣元長鄉鹿寮村），有一相當富裕的平民罹重病後，因接受高神父之傳教而得痊癒，乃全家信教，一八九三

70 黃德寬，前揭書，頁 96。

71 黃德寬，前揭書，頁 110。

72 黃德寬，前揭書，頁 134。

年在此地建立小教堂，信者漸多，成為開教以來傳教最順利的地區。⁷³

高神父在中部傳教四年後一度被調回南部前金訓練修生，但日後並未出現新神父，神父此活動顯然未取得成功。一八九〇年他在台南永康鄉的大灣村開教。次年夏天再度被任命為中部沙崙仔的本堂神父。⁷⁴

一八九二年高神父也抵達他里霧(斗南)傳教，先設立傳道所，得到若干信眾之後，建起臨時聖堂及神父宿舍，但在日本據台戰事時，毀於兵火。⁷⁵

(一)、台北的傳教

台北的最初傳教之地是在和尚洲，此跟基督教長老會的內部糾紛有關。原來加拿大的長老會早在一八六三年即定居台北，傳教活躍，到了一八八三年有些信友與偕叡理(George Leslie Mackay,或稱馬偕)牧師發生爭議，為此信友李兼葭南來羅厝，⁷⁶邀請天主教前來台北傳教。⁷⁷其時羅厝為何安慈神父所管理，他先在一八八四年五月下旬，派遣兩位教友先去觀察；一個月後又派另一傳教員李益北上，何神父更在一八八六年六月下旬親自去考察。他在當地停留五天，所見所聞相當滿意。在他的印象中，認為北部人求道熱忱高，是一有希望的傳教沃土。⁷⁸

區會長良方濟神父充分考量後，決定了向北部傳教的計劃。乃於一八八七年三月七日派何神父再往北部，與傳教員陳沛然及兩名教友同行，經十二日方抵該處，乃以每年一百元的房租，向李頭租了一間道理廳，有一位基督教徒跟何神父在一起，協助當地的傳教。⁷⁹同時何神父也往大稻埕，以類似召開佈道大會的方式傳教，在附近的六館口街(今日之建成區六館里)，向一位名叫李錦江的租屋，每年年租一百元。在此兩處安頓下來後，乃將進展的情況向良方濟會長報告。⁸⁰良會長於是親自北上視察教務，所到之處受到北部民眾的歡迎。有一段記載如下：

在「蒞臨之當日，和尚洲之教友，每戶揭旗點燈結彩，又到處盛放鞭炮，熱烈歡迎」，「歸途時，並乘[坐]以除知府外，無人敢乘[坐]之豪華之轎，鑼鼓喧天，人山人海，行列歡迎至城外。」⁸¹

這些高姿態的行動與長老會明顯發生利益衝突，而此時正逢中法戰爭結束後不久，民間對於法國尚懷怨恨之時，因而，何神父在台北定居四個月後，遭到下列指控：「天主教為先年攻擊台灣之法蘭西國教」。⁸²此舉意圖顯然要煽動北部人反對天主教之情緒。事實上此控訴也未必全然空穴來風，據台陽見聞錄所記，在

73 陳嘉陸，前揭書，頁 60-1；江傳德，前揭書，頁 134-5。

74 江傳德，前揭書，頁 285。因此有些書上記載高神父於一八九〇年在斗南開教之說可能有誤。

75 陳嘉陸，前揭書，頁 61。

76 善導週刊社編輯，《天主教高雄教區成立二十五週年紀念冊》，高雄，1986，頁 11。

77 陳嘉陸，前揭書，頁 62；江傳德，前揭書，頁 139-140。

78 陳嘉陸，前揭書，頁 62；黃德寬，前揭書，頁 120。但二書對何神父北上之印象有相反之記載。本文以黃書為主，因為信上所言似較可信。

79 黃德寬，前揭書，頁 24-5；江傳德，前揭書，頁 140

80 江傳德，前揭書，頁 140。

81 陳嘉陸，頁 62。

82 Celedonio Arranz, "El Correo Sino-Annamita", Vol. XXII. Imprenta del Colegio de Sto Tomas, 1888, Tam-sui-Toa-tiu-tia, 10 August, 1887, pp.23-46, 筆者在此要感謝鮑曉鷗教授(Borao Matteo)提供這些資料，並譯成英文；陳嘉陸，前揭書，頁 63；方豪，前揭文；江傳德，前揭書，頁 140-1。

光緒十年八月法軍進犯之際，教友之活動便頗令當地居民懷疑。

……月十三日，法船闖犯滬尾口。該管新店街，素常教民甚多；而蘇水與眾教民，十四日突將家眷、物件倩船十餘隻，搬脫別往，以致民人懷疑教民必是勾引法人。⁸³

教友的特殊身分早已令人疑懼，而此時又當基督教之激烈競爭，無怪會有上述不利的指控出現。在另一份官府的報告中也可見到此時複雜緊張的情勢：

查天主教士法人甚多，民間亦但知為法人之教，台民與法積忿已久，豈有隱忍不發之理，一經聚眾，法令不能禁止，該教塗亂者弊雖無確據，而民間傳說，深信不疑。近年各省教堂之案，往往因此而起，且天主與耶穌勢不兩立，台北耶穌教民已多，將來不獨民教不能相安，即兩教亦不相安，台灣民情囂悍，動輒聚眾滋事，況與法人有難解之公憤，與其日後釀成事端，何如目前早為杜絕…。⁸⁴

台灣巡撫劉銘傳接到此控案後乃要求淡水知縣調查此事，結果何安慈的罪狀是其所持傳教証件僅為遊歷護照，且其租屋時並未向地方官申請，程序不合。何則回稱其護照是和在地傳教的加拿大長老會馬偕牧師完全一樣，此也經台灣道台及英國駐安平領事霍必瀾(Pelham Laird Warren)証實，而馬偕牧師卻可自由行動，毫無限制；至於租屋之事，何則承認稍有瑕疵。十天之後知縣前來教堂移走教堂招牌(rotulo)，何神父則尋求英國駐淡水領事翟理斯(Herbert A. Giles)以及西班牙駐香港領事 Mr. Ortuno 之協助，由他們提出抗議。此時，淡水知縣向何神父致歉，因為他原以為何神父是在傳佈法國宗教，現在方知是誤會。一八八七年七月十日，西班牙駐港領事 Mr. Ortuno 告知何神父避免跟法國人有任何來往，並要他「在未跟 Mr. Giles 商量之前，勿有任何行動」。Mr. Ortuno 也寫信給劉銘傳，請他勿干預此事。七月十八日劉銘傳將何神父所租的屋主兩位下獄，其中之一還被迫將年租一百元還給何。

何神父仍請翟領事出面協助，但英領事以未經西班牙正式授權而不介入。⁸⁵八月十日在 Mr. Ortuno 之堅持下，劉銘傳終於提出三條件，亦即教堂中不准女性進出，傳教士不包庇匪類；不得在市中心或市場活動；教友婚喪，不得前往其宅與人混雜。茲將原文錄於下：

何鐸德開堂設教，必須擇僻靜之所，不得在大街通衢，有礙居民地方。所傳之教，務須同耶穌一樣，勸人為善。教士須立品待人，堂內不得收養婦女及包庇匪類、不受尊長約束。凡遇教民家中婚喪之事，教士不得前往干預，以避嫌疑。彼此輯睦，而免滋事。⁸⁶

十月二日劉銘傳將此三條公佈於大稻埕各街道，而何神父則暗中在大稻埕的歐洲人聚居之地區內租了一屋。十月中，英領事翟理斯通知何神父已得西班牙駐廈門領事之正式授權，乃在其協助下找地蓋堂，⁸⁷終於在一八八八年六月，何安慈神父在和尚洲花了一千五百元買了一塊六百餘坪的土地地，建了四間房屋。其

83 《臺陽見聞錄》，〔洋務〕，頁 50。

84 《清穆宗實錄選輯》收入在《台灣文獻叢刊》第 190 種，頁 2121。

85 Arranz, ibid。

86 《臺陽見聞錄》，〔洋人引誘社番入教〕，頁 49。

87 Arranz, op. cit., Toa-tiu-tia(Tam-sui), 1 November 1887, pp.47-76。

中一間為臨時教堂，一為神父宿舍，其餘二戶為道理廳以及女傳道姑婆之宿舍。

88

一八八八年，何安慈神父也在台北城「太平境」之一角落租一屋作為道理廳，在該處傳教約一年之久；同時也四處尋找適合傳教蓋堂的土地，最後在大稻埕新店尾(今日圓環附近)，花了一千元買一片地，開了一間道理廳。一八八九年以三千元建了一座兩樓的屋宇，寬十五尺，深五十尺，樓上為神父住宅，樓下充作教堂，一直使用到一九〇五年。⁸⁹

除了和尚洲及大稻埕，滬尾(Hobue，今之淡水鎮)也是新傳教之地，一八八九年，何安慈神父曾在附近的興化店(今北縣三芝鄉興化村)開教，一八九〇年三月十二日，畢大齊(Francisco Pitarch)神父被派往此地任本堂神父，但受到長老會教友的排斥，同年返菲律賓，六月二十二日雷賽逸(Blas Saez Adana)神父抵台，立刻駐在此地為本堂神父，直到一八九五年。而一八九一年何安慈神父應小基隆(今北縣三芝鄉)庄長之請，舉辦了一次成功的佈道會，會後乃設一傳道所，請吳錢傳教員駐在該地，然而與當地長老會信眾不斷發生衝突，有一次還遭到一百五十名人士攻擊傳道所，一直要到馬關約後日本據台，衝突才平息。⁹⁰

(二)、林茂德神父的爭議

一八九〇年四月十二日有兩位神父同時來台，一位是前面提到的雷賽逸神父立即被派到滬尾傳教外，另一位是受到最多爭議，也可說是雄才大略的林茂德神父。林神父先被派在彰化羅厝學習閩南語。林神父頗善於交際，勸說大批人士慕道，據說當時甚至有遠從數日旅程外的嘉義來聽林神父講道的。有一說法稱當時慕道之人數達到五千人之多，但多帶有自私目的，主要是想為改善自己的物質生活。有些得不到林神父資助的就轉而憎恨他，甚至連教會也被牽連，造成當地居民間相當嚴重衝突。尤其是一件教友張鳳私宰牛隻事件，張氏被官府捉去，林神父大力營救，赴衙門交涉，兩造互控，林神父指責彰化地方政府迫害教友，選擇性辦案，且聲明張氏已向駐軍及官方納稅；清方則控林神父態度囂張，出入扈從甚多，且帶武器，對慕道者給予旗幟等；⁹¹最後，彰化知縣羅東之遭罷黜，而林神父在一八九五年三月五日也被調離台灣，前往廈門，但一年後再度來台，前往台北城照顧患病的何安慈神父，七月六號還寫了一封信給同會的會士，談到寶島的美麗及返台的愉快，次日就暴病而死，卒年不到三十歲。⁹²

此事件可做為第一期傳教事業中教會與民間關係的重新檢討。本來隨著傳教事業日趨穩定，教士與地方民眾自然有更頻繁的交往，事實上，教會也試圖採取許多作法，以拉近與當地人的距離，譬如市集講道，或是重用當地傳教師。但是林神父的失敗，顯示了在台灣這樣複雜的社會情勢下，畢竟不能過度的介入地方事務，因為難測的人心、糾纏的地緣結構甚至於教士的特殊身分，都可能引起難

88 陸嘉陸，前揭書，頁 64。

89 陳嘉陸，前揭書，頁 64；江傳德，前揭書，頁 143。

90 陳嘉陸，前揭書，頁 64；江傳德，前揭書，頁 144-5。

91 《教務教案檔》，第五輯，第四冊，頁 2095-2115。

92 據說是感染霍亂而死，但據何安慈神父的描寫其暴卒之狀又不像是得此病的病狀，他才到達三天，死前全身冒冷汗，還可掙扎走到何神父房間跪下要求為他施行終傳聖事。見 Fernandez，前揭書，頁 188；192。

以預料的災難，而如何與地方保持適當的關係，便成為日後仍須面對的重要問題。

(三)、小結

台灣近代天主教發展的第三期乃傳教士北上台北城傳教到日本佔領台灣為止。此期由於法國在一八八四年中法戰爭時所造成的敵意，同屬歐洲人的西班牙人在台北城定居不久，傳教士及教會就被誤會為跟法國有關。此期面對加拿大長老會的競爭，傳教方式比較是以佈道大會或跟基督教辯論的方式來吸引群眾。⁹³此時期初有中法戰爭的後遺症，後有日本據台引起的動亂，再加上一八九〇年來了一位在性格上企圖心很強的林茂德神父在中部的高姿態活動，並且被人利用，造成中部教會相當大的困擾，終致教會及官方兩敗俱傷的局面。是故，戰爭與激烈的行事作風往往對於傳教最為不利，尤其在當時的台灣為然。蓋複雜的社會情勢與國際衝突本已使教士求一平靜穩定的發展空間而幾不可得，而戰爭與激進行為恰恰為這原本緊繃的局面雪上加霜，在處處衝突、制肘與阻礙中，道明會教士為清朝時期的傳教事業劃下了句點，但也為台灣南中北的幾個地方打下教會的基礎。

肆、傳教策略及發展回顧

敘述了各期的重要發展及特色之後，以下想就傳教對象的角度來看道明會在台灣的傳教策略。

在一個新地方開教很重要的關鍵恐怕還是綜理其事並擬定傳教策略的傳教士。然而在此時期能來台灣傳教的道明會士屈指可數。總計在日本據台前，來到台灣傳教之道明會神父全部只有二十三位，其中有些只停留短時間，也有不幸英年早逝者。同時在台灣的，在一八六〇年代為三名，七〇年代也不足十人，八〇年代及九〇年代也都平均只有六、七人，最多時不到十人。茲依據江傳德先生的紀錄，整理當時的在台神父名單如下：⁹⁴

1859	洪保祿	郭德剛			
1860	郭德剛				
1861	郭德剛	翁安當			
1862	郭德剛	翁安當	黎茂格	楊真崇	
1863	郭德剛	黎茂格	楊真崇		
1864	郭德剛	楊真崇	良方濟		
1865	郭德剛	楊真崇	良方濟		
1866	郭德剛	楊真崇	良方濟	李嘉祿	
1867	郭德剛	楊真崇	良方濟	李嘉祿	

93 Celedonio Arranz, "El Correo Sino-Annamita", Vol. XXII. Imprenta del Colegio de Sto Tomas, 1888, Tam-sui-Tao-tiu-tia, 10, Aug. 1887, pp.23-46; 江傳德，前揭書，頁 140-4。

94 資料來源，請參照江傳德，前揭書，頁 148-9。

1868	郭德剛	楊真崇	良方濟	李嘉祿, 韓若望	江味增德
1869	郭德剛	楊真崇	良方濟, 高賢明	李嘉祿, 韓若望	江味增德
1870	楊真崇	良方濟	李嘉祿	韓若望	高賢明
1871	楊真崇	良方濟	李嘉祿	韓若望	高賢明
1872	楊真崇	良方濟	李嘉祿	韓若望, 吳萬福	高賢明, 嚴達道
1873	楊真崇	良方濟	李嘉祿	韓若望, 吳萬福	高賢明, 嚴達道
1874	楊真崇	良方濟	李嘉祿, 王靈牧	韓若望, 吳萬福	高賢明, 嚴達道
1875	楊真崇	良方濟	李嘉祿	韓若望, 吳萬福	高賢明, 王靈牧
1876	楊真崇	良方濟	韓若望	吳萬福	高賢明, 王靈牧
1877	楊真崇	良方濟	韓若望	吳萬福	高賢明, 王靈牧
1878	楊真崇	良方濟	韓若望	吳萬福	王靈牧
1879	楊真崇	良方濟	韓若望	王靈牧	吳萬福, 何安慈
1880	楊真崇	良方濟	韓若望	王靈牧	吳萬福, 何安慈
1881	楊真崇	良方濟	韓若望	王靈牧	何安慈
1882	楊真崇	良方濟	李嘉祿	韓若望	王靈牧, 何安慈
1883	楊真崇	良方濟	李嘉祿	韓若望, 黎克勉	王靈牧, 何安慈
1884	良方濟	李嘉祿	韓若望	王靈牧	何安慈, 黎克勉
1885	良方濟	李嘉祿	韓若望	王靈牧	何安慈, 黎克勉
1886	良方濟	韓若望	何安慈	黎克勉	高熙能, 黃神父
1887	良方濟	韓若望	何安慈	黎克勉, 吳義烈	高熙能, 黃神父
1888	良方濟	韓若望	何安慈	黎克勉	高熙能, 吳義烈
1889	良方濟	韓若望	何安慈	黎克勉	高熙能, 吳義烈
1890	良方濟	韓若望	何安慈, 林茂德	黎克勉, 雷賽逸	高熙能, 吳義烈
1891	良方濟	韓若望	何安慈	黎克勉, 雷賽逸	高熙能, 林茂德
1892	良方濟	韓若望	何安慈	黎克勉, 雷賽逸	高熙能, 林茂德
1893	何安慈	黎克勉	高熙能	雷賽逸	林茂德
1894	何安慈	黎克勉	高熙能	雷賽逸	林茂德
1895	何安慈	黎克勉	高熙能, 鐘利默	雷賽逸, 良加略	林茂德, 白若瑟

1859~1895 來台神父中外名字對照表

中文名字	外文名字
洪保祿	Angel Bofurull
郭德剛	Fernando Sainz
翁安當	Mariano Anton
黎茂格	Miquel Limarques

楊真崇	Andres Chinchon
良方濟	Francisco Herce
李嘉祿	Ramon Colomer
韓若望	John Han
江味增德	Vicent Kang
高賢明	Federico Jimenez
吳萬福	Vicente Gomar
嚴達道	Manuel Tarazona
王靈牧	Jose Nebot
何安慈	Celedonio Arranz
黎克勉	Isido Clemente
高熙能(恆德)	Francisco Giner
黃神父	Francisco Pitach
吳義烈	Pedro Aguirre
林茂德	Nemesio Fernandez
雷賽逸	Blas Saez Adana
鐘利默	Tomas Masoliver
良加略	Leon Gallo
白若瑟	Jose Alvarez

這些神職人員數量少，經費也不足，在傳教士寫給馬尼拉修會總會的信件中，提到經費之拮据，例如訪問各地時，因為乘轎太貴，只好徒步，並且羨慕基督教會經費之充裕。⁹⁵除了「穿著也不能太講究外，」在飲食方面更是節儉：「就量來說，只夠吃飽，沒有剩餘；就質來說，很貧乏。神父們每天吃的就是一盤米飯，蔬菜湯和一碗肉羹粥。守齋的日子，則吃個蛋和魚(靠海的地方才有魚吃，若近山區，則根本不可能吃到魚)。若是可吃肉的日子，也常是每人吃一片又硬又韌的牛肉，難得吃一回雞肉。」⁹⁶總之，「所有的經費，還不夠支付傳教區最起碼的開銷。事實上，這一點錢連維持現況都不夠。」⁹⁷

協助傳教的重要人物是傳教員及姑婆，這些人早期都是從福建過來的，後來自己想訓練，一八七二年時成立的傳教學校並未成功，本地人興趣不大，其中原因之一是待遇太差。高恆德神父就在一八八七年的一封信上提到：「我們必須增

95 黃德寬，前揭書，頁 128。

96 黃德寬，前揭書，頁 128。

97 黃德寬，前揭書，頁 128。

加傳教師的物質待遇，他們的表現遠比基督教傳教員好，但薪水卻很少，還不到後者的一半。為此，我們的傳教師必須另外兼差以糊口，無法全日做傳教工作，效果也大受影響。」⁹⁸前面提過，傳教員的增加是這些傳教士認為台灣天主教會要永續經營的最重要方法。⁹⁹然而，本地傳教員訓練失敗後，只有依靠大陸來的傳教員以及一兩位本地非正式訓練出來的人員。茲介紹比較有貢獻的幾位。

嚴超，聖名味增德，係陪伴郭德剛神父最早從廈門來台灣的傳教員之一。終身未娶，據稱每日念三串玫瑰經，隨神父各地傳教，並將自己僅有之全部財產四十元捐給教會，進行慈善事業。前文提到他在一八六六年擔任傳教員時，在台南受郭神父之命照管孤兒院，後因一八六八年教案下獄，釋回後不久死亡，死時才三十八歲。¹⁰⁰

另一位最初來台的傳教員為楊篤，聖名安德勒，原信佛教，後隨洪保祿神父聽道，一八五四年受洗，來台後，在前金教會教導天主教教義，同時並講授漢文，態度親切慈祥，一八七〇年八月十五日入聖道明第三會，翌年發願，成為在台最初之華籍會士，但身體虛弱，一八八五年病逝，在世四十歲。¹⁰¹土生土長的傳教員最早的是阿成哥(原名可能是鄭阿成¹⁰²)，他是屏東縣萬金鄉赤山附近的原住民。其部落名稱為「加飽朗莊」。他出生於一八一三年，本信佛教，在一磚廠工作，五十歲時慕道，一八六三年十月五日領洗，之後拋妻別子，全部奉獻給教會。其時教會初期，傳教困難，萬金及溝仔墘教堂被焚重建，阿成哥均親自監工，夜間則教要理。一八七二年加入道明會第三會，次年發願，後更前往彰化竹仔腳及沙崙仔等地傳教，羅厝莊的教堂也是他監工修建的，晚年有眼疾，且耳聾腳跛，但仍經常祈禱。一八九四年一月十八日去世。¹⁰³

另一位早期重要傳教員則是漢人，姓名為陳論，但人稱「阿論先」(Celedonio A-Lun-Sien，即台語阿論先生之意)¹⁰⁴，日據後，以其名訓讀為「沛然」，故台灣許多傳教手冊均稱之為「陳沛然」。阿論先出生於彰化縣員林鎮林仔街，成年後方在員林領洗，後在員林街協助何安慈神父在中部傳教。何氏後調往台北，他亦跟隨何神父去和尚洲、台北城、興化店以及小基隆，也親自監督大稻埕的教堂工程，將自己花了一千五百元建成之房屋也捐給教會，家境似乎不錯，並善於交際。日人據台初期，因日人之重視，做了一些事，並得日本勳章，死於一八九九年。

¹⁰⁵

另外按照中國傳統頗嚴男女之防，為避免誤會及謠言，天主教會內男傳教員避免對婦女直接傳教。又在一般家庭中若婦女信教，則有可能一家大小都會信。因此在傳教初期有所謂「姑婆」，也就是終身不結婚的女傳道。這在大陸北方叫「貞女」，南方有的叫「姑娘」。在台灣傳教史上也扮演過重要角色。但是在在一八九五年前尚未有正式的女傳道，只有少數幾位領過洗的熱心婦女協助神父傳教，如在屏東萬金附近赤山的原住民婦女妮仔姑，她在一八六四年八月十五日領洗，領洗後常去探望病人，「為三個仍未皈依的兒子日日祈禱，有時候，妮仔整夜給

98 黃德寬，前揭書，頁 129。

99 黃德寬，前揭書，頁 108-9；129。

100 江傳德，前揭書，頁 104-9。

101 江傳德，前揭書，頁 153-4。

102 善導週刊社編輯，前揭書，頁 61。

103 黃德寬，前揭書，頁 134-7；江傳德，前揭書，頁 81-4。

104 此人可能就是日本當局稱之為「張德潤」者，詳見下階段的敘述。

105 江傳德，前揭書，頁 151-5。

人講要理，直到黎明。」她死於一八七一年，得年六十歲。¹⁰⁶

在禮儀及教堂風格上此時的台灣天主教會也有一些刻意安排：當時習慣將教堂佈置得十分富麗堂皇，一八六六年李嘉祿神父提到他很喜歡從菲律賓寄來的東西：「鑲金的圖畫，美麗的花卉和祭衣，為我們有很大用處，可以很方便的裝飾聖堂，由於台灣民眾仍很崇拜偶像，我們必須使聖堂富於吸引力方能打動人心。」¹⁰⁷這裏有趣的是天主教會有意配合台灣民間信仰的習俗，而對教堂內部裝飾上做了較能配合地方人士的安排。而且在重要的教會節慶，會舉行遊行，有時是將聖母像抬出遊行，有時是舉行「聖體」遊行。熱鬧的程度，連道教的「師公」都爭著跑出來看。¹⁰⁸

當時信眾赴教堂參加禮儀和今日做法不同之處在於或許是住處路途遙遠，交通不便，平時每個月的第一個星期日，「大家都來辦告解、領聖體」，通常一待就是一整天。有時他們會唱聖歌，大部份是拉丁文的，但有時也唱中文的「玫瑰聖母歌」，「這是會長神父的意思，他說拉丁歌民眾無法了解。」¹⁰⁹由此再度可見當時教會當局努力要使一些禮儀活動地方化，以便民眾容易接受。除了彌撒外，重要的儀式還有朝拜聖體，唱聖歌，公唸玫瑰經，聖體遊行則頗有此間拜拜時遊行的味道：「彌撒後是聖體遊行，我們有兩頂垂帳，分別由老年人和年輕人撐著，隨鈴聲行進，教堂外則鞭炮聲四起，學生則在聖堂內詠唱聖歌，朝拜聖體。」¹¹⁰每有慶祝活動燃放鞭炮恐怕是此間或大陸地區特有的風俗。

在第一階段時，由於新堂區建立不久，而有些地區表示出異常的熱情。一方面教會擔心新領洗的信眾信仰基礎不穩，需要常有傳教士在旁支援輔導；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應該是擔心治安問題，且在傳教士極缺的情形下，因而不敢輕舉妄動。一八七二年楊真崇區會長提到北部村莊領袖的邀請，但他有所保留：「最近，收到一些北部村莊首領的信，他們請我和別的神父去拜訪；希望他們是邀請我們去傳教，但也可能是引誘我們北上，而後加害。所以我決定觀察一段時間確實了解他們的意向再說。」¹¹¹

對外傳教動力及模式，除了傳教士本人之熱心為基礎外，如前文所述，或是一些原住民村莊為了對抗漢人或官方壓迫，主動邀約；或是剛好有熱心慕道者在南部接受信仰後，主動引介傳教士或傳教員至其家鄉開教者；或是如台灣北部因為與長老會競爭有限的傳教空間及其他修會的競爭傳言。最後一點我們可以從中法戰後由於法軍曾佔領過淡水數月之久，道明會十分懷疑有他國天主教傳教士來北部傳教。按照當時教廷的規定，台灣全島應由道明會士綜理教務，進行傳教，任何人即使想要在台灣傳教，也應該先徵得該會在馬尼拉或廈門代牧區的同意，這也是為何在中法戰後，良方濟會長派遣何安慈神父到台北來傳教之一因。

良方濟在一八八六年向總會報告說他聽另一位傳教士得到消息：「在淡水有一個人，無論就行事或外觀，必定是一位天主教神父。他似乎已從官員那裡得到一塊土地，且許可建天主堂。報告中說他穿毛製的黑袍，所以必定是位司鐸。」

106 黃德寬，前揭書，頁 98。

107 黃德寬，前揭書，頁 65。

108 黃德寬，前揭書，頁 65。

109 黃德寬，前揭書，頁 66。

110 黃德寬，前揭書，頁 67。

111 黃德寬，前揭書，頁 105。

¹¹²良會長以為此人應是一位隨軍司鐸，在中法戰爭時登陸，「當他們看到基督教有那麼多教堂，而找不到天主堂時，一定會努力推動傳教工作的。」¹¹³因而認定到北部推展傳教工作是「迫切需要的」。而通常開教的模式是先派一位傳教員了解當地的情況，如果感受到當地居民的熱情及友善，就會在附近先租一間民屋，當作道理廳，或稱保守所，由傳教員定期在農閒時，或夜間為村民講道，經過半年一年後由傳教士神父來施洗。在有數十位教友後，傳教士就會買土地，再設法向馬尼拉總會要錢蓋教堂及神父、傳教員住所，然後就以該教堂為根據地，向四處傳教。而每位傳教士之間的距離應該在一天的腳程內，以便互相照應。

人民接受信仰的動機，固然有些是真誠的，願為信仰犧牲原來較富裕的生活，忍受別人的嘲諷；¹¹⁴但也有「只是希望傳教士利用特權保護他們」。¹¹⁵這種心態固然值得商榷，但是以接受一新的宗教信仰—尤其是背後有外國勢力在撐腰的宗教—作為對抗政治上的迫害或社會的不義恐怕也是很自然的一種情況。

通常一地區若稍大，每年新領洗者二十來人；小一點的地區則十來人，早期有傳言說凡要信天主教的民眾，在入教前需要擔任神父的傭人達一年之久，¹¹⁶這種傳聞恐怕是當時道明會神父為新信者的準備期較長，為防止民眾領洗後又離開，乃採取重質不重量的施洗策略。楊真崇區會長在一封信上說：「…我們給望教者[亦即慕道者]付洗前，都要求一段考驗的時間，使他們確實明白，什麼是應該放棄的，什麼是他要參與的，什麼是永恆救恩的希望。我們強調無論什麼時候，質都勝於量。」¹¹⁷

或許有人會問，當時傳教士人數如此少，為何不培養一些本地的神職人員？事實上，培養本地聖職的概念從二十世紀初才較為教廷所注意，而一直要到一九二六年教宗碧岳第十一世才大聲疾呼，要求加緊培養本地神職，並且不能歧視對待。¹¹⁸此舉也顯示當時傳教地區本地神職之缺乏以及受到西方傳教士差別待遇。可以說要到一九三〇年代本地神職才在中國被認真討論，但雖然許多歐美傳教士都承認此重要性，但當要付諸行動之時，尤其是要讓中國神職人員領導西方傳教士時，就面臨了實際的困難。¹¹⁹換言之，我們不可能要求當時的道明會士有培養神職的想法。他們當時真心以為只要訓練本地傳教士就夠了。因此在一八七二年的教務報告中楊真崇會長即提及在高雄前金的教堂中：「和我在一起的，還有幾位從大陸來的年輕人，由我們施以教育和信仰的道理，希望有一天，他們能向自己的同胞傳福音。」而同時在屏東縣萬金庄的良方濟神父「身邊也有一批年輕人受他指揮，都是台灣人(平埔族)，不久他們就可以外出宣講福音了。」¹²⁰可見當時教會還是有計劃分批培養傳教員，為當地人士的皈依打下基礎。楊會長的結論是「我們工作中唯一可靠的『本錢』是，本地傳教師的協助，他們為我們開路，準備園地，使本地人對我們有好感，這時候傳教士才出面，收割傳教師所播種耕

112 黃德寬，前揭書，頁 123。

113 黃德寬，前揭書，頁 123。

114 黃德寬，頁 115-7。

115 黃德寬，頁 112；又見頁 110；民眾接受基督教的動機也相當類似，頁 107。

116 黃德寬，頁 107。

117 黃德寬，頁 118。

118 參見教宗本篤十五世在 1919 年 11 月 30 日的牧函以及碧岳十一世的通諭「Rerum Ecclesiae」。

119 參見 Peter J. Barry. A Brief History of the Missionary Work of the Maryknoll Fathers in China,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 A. Thesis, 1977, pp.117-129。

120 黃德寬，前揭書，頁 104；住在萬金庄的都是平埔族。

耘的莊稼。」¹²¹要一直要到二十世紀三零年代才有本地神職出現。

在社會事業上與基督教積極行醫並創立學校等方面有很大的不同。但是最初也有意思要成立一些小學，幫助兒童識字，但其目的是要從小孩子促使父母接近教會。一八六七年李嘉祿神父就想在溝仔墘設一所小學堂：「…起初來的人很多，而且都有興趣聽我們講道理。這給我們很大的鼓勵，想成立一座學校，幫助小孩學習讀書寫字。我們相信這些小孩是很好的媒介，能促使他們的父母認識教會。」¹²²一八七二年良方濟神父在萬金也「正考慮設立學校，使教友和非教友都能接受教育…」。¹²³可見在台灣天主教也考慮過設學校的計劃，並非只從事慈善事業。所設立的社會事業為孤兒院，先是在台南辦，一八六八年動亂後，南移高雄，彰化羅厝後來在一八七五年也辦有孤兒院。¹²⁴

至於在傳教時所遭遇到的困難，與十七世紀有一大不同就是乘船的海難事故減少很多，不論是翻船或海盜打劫而遭難的情形都很少。傳教士們由於渡海技術之進步及公權力的較能貫徹，海盜行為隨時減少，十九世紀後期的傳教士們當時來往福建台灣之間似乎十分方便，台灣與菲律賓的來往也頻繁，傳教士不乏回菲國述職，開會或養病的。

綁架勒贖也發生在早期的傳教史中，一八六七年十月李嘉祿神父的一封信上提到郭德剛區會長被綁架的經過：「郭神父是被一幫客家人挾持，那些暴徒綁架郭神父而索取贖金。」他們要求一千八百元，事發後「一位傳教士設法到台南求見官員，告知綁票事件，並請其下令釋放被綁走的神父。在場的除了駐台南的英國領事外，還有葡萄牙領事和兩個菲律賓人，官員決定要解決這個架事件。」當天下午傳教士和官方派出的一隊士兵前往綁架地點。有趣的是「那隊士兵走得很慢，他們不願意夜晚進入客家人的村莊，以免遭到埋伏，遂在村外宿營，等待天亮。」這當然只是想以武力威脅。可是在另一面郭神父已答應給歹徒五十元贖金，事件解決了。¹²⁵然而此事有後遺症。本來萬金莊附近的居民恨客家人，今聽說政府派兵來處理此綁架事件，「民眾們覺得傳教士權勢很大，連政府官員都支持傳教士，也只有傳教士能幫助他們不受客家人的壓迫。為了公平起見，他們願成基督徒，幫助傳教士。」¹²⁶這種想法也是近代以來基督宗教在東方受到民眾歡迎的原因之一，但這也是日後許多問題的根源。新宗教對這些人而言只是解決舊問題的新方式而已。¹²⁷原住民和客家人之間的衝突前面提過，這邊有更具體的例子：

本地人(平埔族)很恨客家人，客家人亦以迫害本地人為樂。到目前為止，客家人已破壞了兩個村莊的農田，把種植的稻穀、甘蔗、蔬菜和甘藷都燒掉，他們威要進犯溝仔墘，破壞農田，燒毀全村。大家都在談論，

121 黃德寬，前揭書，頁 108。

122 黃德寬，前揭書，頁 75。

123 黃德寬，前揭書，頁 104。

124 江傳德，前揭書，頁 270-5。

125 同上，頁 76-77。

126 同上，頁 78。

127 此種情形在中國也有，亦即人們之改信宗教是想借由新的力量來處理舊的問題，而教案之起也多沿著舊的衝突發生。參見 R.G. Tiedemann, "Christianity in a Violent Environment, The North China Plain on the Eve of the Boxer Uprising", in Jerom Heyndricks, C.I.C.M. ed., *Historiography of the Chinese Catholic Church,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 (Leuven, Belgium, Ferdinand Verbiest Foundation, 1994), pp.138-144。

客家人正在儲存軍火，以便侵襲溝仔墘。客家人勇猛且報復心很強，加上兵力懸殊，可以輕而易舉地辦到。¹²⁸

綁架事件屬於地區性的某些族群所為，官方並未參與，只是協助解決。然而在都會中傳教士所面臨的問題則不只是少數人，事實上，各色都市人，甚至官方也或明或暗地反對。最常見的衝突就是買地建屋的問題。前文提到一八六七年郭區會長花了兩百四十元在台南府城買了一棟房子。但很快就受到地方官帶了大隊人馬將他逐出，然後，「有一位法官走上前來…用誇張傲慢的語氣，而且很鄭重地宣佈：我必須放棄我的房子，回到以前每個月用兩元租來的小屋。」郭神父抗議無效；「官員看我沒有武力做後盾，決定不理我的請求…。在這島上法律只是死文字，毫無氣息的紙屑而已，他們的法律即是強權公理。在這裡，人們看重的是勢力，或能買到的金錢，如果在別的國家發生這種事情，那麼法庭立即會加以干涉，在此地卻不然，官員接到老百姓的控訴常裝聾作啞。」不過很有意思的一點，是在陳訴完這些抱怨外，郭神父很認真的提出解決之道，這就是信仰：「唯有信仰普及後，才能避免這種混亂的情形。」¹²⁹

清朝官方的為難也是傳教上的阻礙：大體而言，比起大陸，台灣的地方官對基督宗教較不受中央遙控，有其主見，而且做法因而而異，敵意也較深，且官方介入也較明顯。例如在同治五年(一八六六)台灣官員公佈了一份禁令，按傳教士的說法是文字上沒有什麼直接攻擊天主教，但其目的在消滅它。所寫的內容直指教會的政治陰謀：「經過仔細調查後，我們發現在萬金莊、赤山和加飽朗等地，有各階層的男女老幼，大約兩百人，接受了新的宗教信仰，那宗教迫使他們在祈禱中彼此聯合…此後，我們嚴厲禁止任何人受洗…如果允許民眾皈依這宗教，一旦信友增多，他可能要散佈革命的種子。」¹³⁰有趣的是文件中特別提到一句：「你們都知道，加入新宗教高聲歌唱是不可饒恕的(reprehensible)。¹³¹當時清廷見到這一批信眾最令其不安或是不習慣的，恐怕是一群人集合在一起，且高聲誦唱官紳民都聽不懂的歌曲或經文，如能設想當時情況，或許就易了解這批群眾會被叛亂陰謀聯想在一起。又如一八六八年台南天主堂院子內就有清朝軍人放馬來吃草：「一群士兵帶著馬到教堂的院子裏吃草，那些馬很自然把文生細心照顧的花園、草木都弄壞了…」。¹³²這些行動都可看出在台官方介入宗教事件中頗深。¹³³

傳教士與百姓接觸一久，原先的誤會，尤其是荒誕的謠言就漸漸破解了。大約在一八九〇前後，台灣排外的情緒即已比較平靜，一直要到馬關割台後，才又掀起另一波高峰。我們可從黎克勉神父的信中略知一二。一八八七黎克勉神父從萬金寫信給總會時，提到「您一定很高興知道，我們在這兒都很平安。政府當局讓我們隨意活動，不作不公平或無理的要求；民眾也能接受我們，不像傳教士剛來時，常受到迫害。感謝天主，不再有反對的活動了。如今我們可以呼吸自由空氣，毫無畏懼地宣講福音。」¹³⁴然而正在此時，如前面所提過的，台北附近還發

128 同上，頁 79。

129 同上，頁 82-3。

130 黃德寬，前揭書，頁 69。

131 黃德寬，前揭書，頁 69；英文原文見 Fernandez, op. cit. p.79。此字譯成「不可饒恕」太重了，似乎應譯為「應受譴責的」。

132 黃德寬，前揭書，頁 101。

133 清廷對基督宗教的政策，可參閱拙著，〈清末對基督宗教的政策〉，收入淡江大學歷史系，《第二屆政教關係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1991，頁 51-67。

134 黃德寬，前揭書，頁 126。

生了劉銘傳巡撫不准何安慈神父租屋傳教之事。大致而言，一直要到了一八九〇年，可以說一般的敵意已消除。有的只是如今日的困難：「台灣目前是相當平靜，沒有反對者來迫害我們，如果說我們今天還有敵人，那就是老百姓的『物質主義』，除了錢以外，他們似乎不想別的東西。」¹³⁵

伍、結語

綜合起來觀察，若跟中國大陸的教案作一簡單的比較，有些同異之處值得注意。六〇及七〇年代台灣教案跟大陸類似，多半是由許多荒唐無稽的謠言引發，如迷藥害人，井中下毒等，但不同的是這邊多趁拜拜遊行時燒屋投石辱罵。大陸上發生的是經常在鄉試期間，讀書人集中在省城之時。先以揭帖形式出現，再煽動那些考試結束後心浮氣燥的學子，往往一觸即發。八〇以後沒有亂編的荒唐謠言，但反對者訴諸較恐怖的民族主義或反對當政者的指控，這些指控繪聲繪影，比起採生折割，挖眼煉銀之流言容易讓人相信。例如，指稱傳教士跟法國勾結，或在日本據台初期的跟日本勾結之指控。而在日本控制全台後，又遭相反的指控，使教徒受到雙重傷害。無論如何，在信教未自由時期，不管以何種名義或動機來反對外來宗教，甚至去燒去搶，羞辱迫害信教者，往往都可以找到非常光明正大的藉口，這正是所謂「私人意圖變成公眾意圖的轉化」，亦即「私益轉為公義」。¹³⁶教會在這種情形下受害最深，因為很不容易得到平反。

台灣教案最大的一次是一八六八年，跟樟腦出口有關的；隨後發生的較大的事件，如一八八四-五年的燒毀教堂也是因為中法戰爭促發對洋人的惡感而引起的；一八九五-六年的動盪更嚴重，而這也是中日戰爭的後遺症。然而，整體而言，道明會在台灣傳揚天主教，一開始並不是以武力為後盾，而綜其在台灣主導傳教的九十年(1859-1949)當中，也是儘可能的以和平手段出現。台灣天主教史上的「帝國主義」的色彩並不顯著。近來有學者指出，台灣的民教糾紛其實與地緣關係密切。由於漢人地緣結構與「祭祀圈」的關係，實為教徒與民間迎神賽會分攤問題的一個主要衝突原因。¹³⁷

從道明會在台灣傳教所面臨的困難中，可以對其傳教策略及發展情況做一整體觀察。在策略上，道明會在中國一直固守著從下層社會傳教的傳統，跟耶穌會的利瑪竇不同，或許也因此少了一些對中華文化的欣賞及吸收。由傳教員先到一地去打前鋒，使本地人對天主教較有好感，時機成熟後，神父最後才出面。¹³⁸如同當時大部分的傳教士一樣，道明會對培訓本地神職並沒有太大的興趣，只希望能訓練出好的傳教員。對原住民較同情，但也向漢人平行傳教。由南向北，先在步行可及之區設立道理廳，再建小教堂。十九世紀末葉，台灣政治中心北移，天主教會的區會長居所也隨之從高雄北移台北，但是並未放棄在中部及南部的據點，以高雄，台南，彰化為中心，向附近推展，但若傳教效果不大或遭反對太烈，

135 黃德寬，前揭書，頁 131。

136 H. Rasswell & Kaplan, *Power and Society*, (1952), 轉引自李若文，〈晚清教案研究的回顧與展望〉，國史館主辦，「中華民國史專題第四屆討論會」，民八十六年十二月十八日至二十日，頁 15。

137 蔡淵潔，〈台灣傳統漢人地緣結構與清季的民教衝突〉收入在《台灣社會經濟史國際學術研討會—慶祝王世慶先生七五華誕》，2003。

138 Fernandez, *op. cit.* P. 141。

也有關閉教堂的情形，如溝仔墘及老埤的小堂就消失了。

跟內地不同，由於十九世紀下半葉，台灣新開墾的土地已漸漸稀少，人口卻日增。爰是，只有在初期階段高屏及彰化等少數地方教會可以購置田地讓教友或非教友耕種，以吸引信徒。後來土地不夠，這種情形就不復存在了。而且在台灣內地及都市的區別，隨著交通的發達，到底也不像大陸那麼明顯，也就沒有像在大陸，天主教多在鄉下傳教，基督教則多在城市。也正由於如此，在台灣，天主教跟基督教的磨擦也較大陸多得多，因為雙方所要爭取的對象都是一般民眾，而且都是以外國傳教士為主的，教義又大同小異的情況下，狹窄的空間中互相攻擊的情形就更激烈了。今天看來，雙方攻訐似乎無聊，但在當時卻是使得不論是天主教或是基督教，在傳教時都覺得是在兩面作戰，一方面跟清廷的抵制，另一方面得防備對方的阻撓。

在民眾方面，固然當時台民中，士紳反教的力量似乎不像在內地來得那麼大，秘密社會的反教也未如在大陸一般在十九世紀最後一二十年所呈現的激烈程度。雖然傳言台灣是天地會的發源地，然而未有証據顯示秘密社會在台灣の民教衝突中發揮任何積極的作用。不過在公權力方面，如前所述，清朝駐台官員在阻礙傳教一事上，扮演了較內地更大的角色，這或許是天高皇帝遠的想法。總之，以上所觀察到的十九世紀台灣天主教發展情況，整個時期都跟大陸密切相關，人員多來自大陸，方法上也有不少模仿之處，尤其同是道明會傳教的福建省。其發展方向是由南往北，與台地漢人開發趨勢略同。其發展的速度相當緩慢，但並未停止，其傳教策略溫和而保守，從一開始的面對敵意到其中的一些混淆衝突，到日本據台後的控制與安定，台灣天主教經歷不同的時期及問題，其中許多和大陸類似，但多少也有些相異之處，這也多少呈現了台灣在十九世紀下半葉的一些風貌。

天主教二次入台的數十年中，所面臨的問題十分棘手，而掌握的資源又很有限，然而在這一階段，也由南部經中部到達了北部，除了後山，儼然已經奠定繼續發展的基礎。經過一些民教糾紛及涉外事件後，台灣為日本殖民政府所統治，台灣教會所將遭遇的挑戰仍在，但其性質卻有很大的不同，而這是我們第二階段的主要內容。

附錄一，

天主教在台傳教第一期(1859~1895)開教時間地點表：

開教時間	開教地點	開教者
1859 年	前金	郭德剛神父
1861 年 1862 年	萬金 山下	郭德剛神父
1863 年	溝仔墘	郭德剛神父
1866 年	台南	郭德剛神父
1870 年	老埤	
1872 年	竹仔腳	楊真崇神父
1875 年	羅厝	吳萬福神父
1876 年	沙崙	王靈牧神父
1877 年	埔姜崙	韓若望神父
1881 年	五塊厝	
1882 年	斗六	王靈牧神父
1887 年	和尚洲	何安慈神父
1888 年 1889 年 1890 年 1890 年	大稻埕 淡水興化店 樹仔腳 台南大灣	何安慈神父 何安慈神父 高恆德神父
1891 年	斗六	
1892 年 1892 年 1893 年	他里霧 大目降 鹿寮	高恆德神父 高恆德神父

附錄二，(1859~1895)被任命為道明會玫瑰省台灣區會長之神父：

翁安當會長(V. Rev. Mariano Anton, O.P.)

郭德剛會長(V. Rev. Fernando Sainz, O.P.)

楊真崇會長(V. Rev. Andres Chinchon, O.P.)

良方濟會長(V. Rev. Francisco Herce, O.P.)

高賢明會長(V. Rev. Federico Jimenez, O.P.)

王靈牧會長(V. Rev. Jose Nebot, O.P.)

良方濟會長(V. Rev. Francisco Herce, O.P.)

何安慈會長(V. Rev. Celedonio Arranz, O.P.)

(資料來源：楊多默口述，大國督編，《台灣カトリック小史》，杉田書店，昭和16年。)

附圖一，1859~1895 天主教在台分佈圖：



參考資料：Pablo Fernandez, *One Hundred Years of Dominican Apostolate In Formosa*, translated by Felix B. Bautista and Lourdes-Bautista, Quezon City, Philippines, 1959, p.32, 132, 161.

近代臺灣天主教史的三階段研究— 第二階段：日治時期〔1895~1945〕¹

壹、與日本政府的互動

一、領台前後的動盪

1895年的甲午戰爭開啟中國現代史悲慘的新頁，在一種頹唐絕望的氣氛下，中國人開始認真的思考當如何面臨這一個「列強以爭平等」的新世界。然而相較起來，就在這一個變動的時代，台灣的天主教，疲於應付開始時的動盪，許多工作人員四散逃離。唯有局勢稍安之後，對日本殖民當局的態度才比較明顯的表現出來，²此蓋由於台人之武裝抗日於社會秩序有極大破壞，形成教務推展嚴重的阻礙，而清朝的統治力顯然不足以控制這一局面，因此日人嚴厲之手段反成教徒之期待。³

另一個使教徒傾向日本的原因，可能在於部分日人信仰天主教已有時日，相較於民間信仰深厚的台灣人自然更易溝通，而作為一個快速現代化的國家，日本顯然有宗教自由的人權概念，也使教士較為放心。教士的書信中曾提到某位日本的皇家衛士便是信徒，並能以漢字與教士溝通。但這樣的情況畢竟是以上層政府官員為限，就全部的人口而言，日本信徒的數目仍然遠低於中國信徒。⁴即使如此，教士仍有樂觀的理由，因為真正關鍵的也許不在於日人對天主教的信仰程度，而是他們對民間宗教的排斥態度，這個才是使得教士支持日人甚於清朝的原因。

也許，日本人控制全島後，會使傳教工作容易些，他們已經表示不喜歡中國人的迷信，開始有計劃的破除工作，那麼我們將可能少一些阻礙了。⁵

儘管教士上述親日的態度可能僅僅出於傳教之考量而未涉民族問題，但對於台灣一般民眾而言卻不作如此想。光緒 21 年(1895 年 9 月)，在斗六及嘉義兩處教會爆發嚴重的暴力事件，其事之發端便與抗日有關。八月三十日軍欲進攻斗六的前夕，當地謠傳高公恆德神父及林茂德神父或為日軍之嚮導，遂有民眾攻擊斗

1 本篇報告多取材於〈台灣天主教史上的里脇淺次郎與涂敏正〉，收入在《20 世紀台灣歷史與人物—第六屆中華民國史專題論文—》，民 91/12 頁 185-208；〈從修會到教會—里脇淺次郎與台灣天主教〉(未刊稿)。

2 William J. Richardson, *Christianity in Taiwan under De Japanese Rule {1895~1945}*, (New York: St John's University, 1971.) 其實不止天主教，新教也希望台灣能由日本統治，認為有助於傳教事業，在日據的前 35 年〔1895~1930〕大致都是這樣和諧的狀況，但直到九一八事變及神社崇拜問題發生後，日本人也開始排斥傳教士。

3 在此我們不禁要重新檢討過去認為戰亂總有利於宗教的解釋。因為它忽略了各個時期宗教在傳教策略與組織上的差異，往往可能造成截然不同的狀況。在台灣天主教早期的發展史上，固然有因為遭逢動亂，而尋求精神安定之信眾。但另一種入教模式是，教士透過長期在地方的經營，建立穩固的人際網絡與社會參與，藉此拉近了舉群眾的距離，進而引人入教。而這種與穩定社會並行的傳教模式顯然會受到戰爭的嚴重影響。這說明了宗教畢竟是社會的一部分，縱使它有「超社會」的目的與功能。

4 大國督，前揭書，頁 442，1941 年時台灣的日本教友 238 人，而全島約有九千多人。

5 黃德寬譯，前揭書，頁 148。

六教會，雖然大多數信徒皆事先避難，但仍有幼童被殺害。當時仇教者普遍認為「日軍之攻佔台灣之舉，係天主教徒之密告通敵所致」，又當時尚未撤退留住台灣之滿清官吏，亦於各處貼出告示嚴禁民眾提供房屋，或保護教徒，並被查出不論任何人等均格殺勿論。其中以斗南最受兵災，因為附近有日本皇家駐紮，日軍發動討伐「土匪」數次，當地臨時聖堂及神父宿舍都被燒毀；⁶其實不只是天主教徒在戰亂中受害，長老會教徒受到更多殘害，尤其是在南部，十月13日麻豆人耶穌教徒當地人約二十名被殺，其原因乃該教徒不願加入反日軍而被殺，被殺名義乃稱該耶穌教徒跟日本軍密通。當時在附近的英國長老會牧師巴克禮(Barclay)要向日本政府索賠，但日本殖民當局的回答如下：

從總督府來看對耶穌教信徒特別保護是不能的，受害者是否基督徒乃偶然之事，從總督府看來，同樣都是土人之間相互鬥爭而已。

要是全島平定歸我，若我法令行遍全島，從今以後和平了，若發生事情，總督府不必等到別人的請求，自會處理是非，對案件作相當圓滿的處理。可是，對於戰亂而引起的間接事情不是我們要審議的，請將此意思轉達給英國領事。⁷

在動亂時代，舊的傷痕會再度浮現，當時的對立會激化，而新的緊張關係更會觸發衝突。日本接收台灣時，就是這種情況，教士及教徒先是被非教徒指控為日本佔領軍的幫手；⁸等到日人平定此地後，又受到非教徒指控教徒乃反日份子，因而受到再度傷害，⁹這些民教糾紛，有些可能是私人恩怨或是想趁火打劫，而卻可以有一種冠冕堂皇的名義，例如反對日本侵略或是協助安定秩序來合法化這些行為，「私人意圖變成公眾意圖的轉化」，亦即「私益轉為公義」。¹⁰

至明治二十九年(西一八九六年)春始歸平靜。在日本的西班牙傳教士為了其國人在台灣的保障，在明治32(1899)年8月2日爭取公布了台灣總督府令第七十一號「外國人取扱規則」，規定外國人在一地停留二十四小時以上者，要將其身份資料向所屬警察機關登記，以及對外人居留台灣之管理規定；此條例在明治三十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總督府令第八十六號及次年一月八日第九十五號令經過小部分的修訂。

對教會及信徒並無特別規定，僅有明治三十二年七月三日總督府第四十七號令，公布「社寺教務所說教所建立廢合規則」以及明治三十九年二月五日總督府八號令「墓地火葬場及埋火葬取締規則」，認可基督徒的埋葬。台灣天主教十分平穩地存在發展著，只不過該年(1906)中部發生大地震，羅厝、樹仔腳及斗六等

6 大國督，前揭書，頁247。

7 耶穌教徒逆殺處分件狀況報告，錄於明治28年(1895)10月14日，《台灣史料稿本》，頁453-492。

8 當然，當時也有傳教員為日本政府效力之事，見《台灣時報》，1919年9月〈敘勳¹⁰榮光千有⁵本島人〉，張德潤，員林人，36歲，1897/12/15八等瑞寶勳章，乙未四月內渡廈門，數月後回大稻埕，往錫口迎日軍，赴員林，收籍北斗台南間。雲林匪亂，自募人伙200，運送彈藥，後助戰於南投草鞋墩埔里，北斗林杞埔集集間，後同街總理，家屋受匪燒失數回。此人似乎就是大國督書上提到的陳沛然，因為陳氏日人稱呼其為「阿論(潤)先」，見大國督，前揭書，頁266-267。

9 參見涂敏正，〈雲林縣傳教史略〉收入《堂區通訊》，斗六市中華路八十號天主堂，第66期。

10 H. Rasswell & Kaplan, Power and Society, (1952), 轉引自李若文，〈晚清教案研究的回顧與展望〉，國史館主辦，「中華民國史專題第四屆討論會」，民八十六年十二月十八日至二十日，頁15。

地教堂受到一些災害。

教會用地方面，日方承認一八六五年二月二十日的中法「法國教堂入內地買地照會」以及一八九五年四月十二日及五月二十六日的中法之間「法國教堂入內地買地來往照會」，也即是日本承認道明會所持有的台灣土地。¹¹

明治三十年(1907)五月十日總督府第十五號「對外國人土地建物賣渡讓與交換貸渡質入書入相關規則」公布後，明治三十二年七月十七日稍有修正，八月二日又隨之公布了台灣總督府令第六十三號「對外國人土地賣渡讓與交換場合等相關規則」；此外明治三十八年六月三日律令第三號公布「台灣土地登記規則」，七月十日總督府令第四十三號「台灣土地登記規則施行規則」，之後明治四十五年二月二十九日，律令第一號「台灣永代借地權令」、總督府令第十三號「台灣永代借地權令施行規則」及第十四號「永代借地及其上之建物登記規則」等公布後，外國人均一體適用。所以台灣從清朝以來的對外國人土地所有權的規定自此確立。¹²

由上述種種的現象看來，日據時期的台灣天主教所面臨的問題：包括教務推展、地方治安與民眾對西人身分的疑慮，¹³都仍然延續上一時期未有太多變化。然而若考慮到日本與過去清朝之間的差異程度，我們便不得不承認自甲午戰後，一個新的時代畢竟來臨，而這是在台灣的天主教徒也絕對無法迴避的。下面的一段史料，便頗能表明天主教徒所初面對的日人究竟是怎麼樣的形象。

這次交涉的經驗，使我發現日本人有一套很特殊的官僚作風，通常中間坐的是主管，四周則是職員，每一個人都面色沉重，埋首於文牘中，中午休息時，則以鐘聲為記號，鐘聲一響起，個個就變得生龍活虎，很快的離開辦公桌去吃飯。

我希望拿到護照後，不會再遭受日本軍警的刁難，當滿清統治台灣時，她們從不會無緣無故的檢查護照。

日本人正好相反，他們對護照最苛刻，絕不放棄任何檢查護照的機會。

日本當局發給歐洲人的護照，只限用一年，而且只適於往來台灣本島和澎湖。

要得到永久性護照，唯一的方法是成為日本政府的職員，即使純粹榮譽性的掛名的都可以。這是保證我們留在台灣的方法。據英國領事說，在日本的法國傳教士已接受這種安排。如果我們要長避免刁難和困擾，也只有這麼做了。¹⁴

台灣天主教在日本領台後，主其事的西班牙道明會神父在日本殖民當局眼中，如果沒有敵視，也至少有一些問號，而且一開始當然要展現日本統治者的權威，其方式之一就是在有關公權力場合對其統治權威的展限，例如限制神父護照的發放，所以黎克勉才需要與日本交涉。在神父的眼中，日本官僚的種種現象顯然是過去在清朝官員身上所未見的。其中包括大批受雇的政府職員，而不在是在

11 高木一雄，《大正・昭和天主教會史4》(東京，聖母騎士社，昭和60年)，頁13-19。

12 高木一雄，前揭書，頁20。

13 陳嘉陸譯，《天主教來台傳教壹百年簡史》，頁69；73。

14 黃德寬譯，前揭書〔1897，黎克勉神父〕，頁151。

鄉間盤根錯節的胥吏；日本展現現代國家那種嚴密的社會控制，而非清朝鬆散的治理。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日本的統治下，教士要留在台灣，最好要成為日本政府的職員。這是在清朝治理時期所罕見的。其中原因之一，可能是其他西方國家已經接受這種安排，遂成慣例。但更重要的理由是，日本與中國對宗教根本態度的差異。中國作為一個傳統的帝國，一向以政治原則去處理大部分的問題，而鮮少顧及〔也許根本未意識〕宗教與社會之間複雜的意義。¹⁵於是可以看到在天主教傳教第一期，清朝竭盡各種努力，使天主教避免各種社會性或政治性的參與，即使教士往往取得了近乎士紳的權力，可是政府也從未賦予其相應的地位。但反觀日本，作為一個現代國家，其對於宗教與社會的認識自然遠邁清朝——宗教在此轉化為一種意識形態，被視為國家內「合理的存在」。也唯有在此情況下，教士才能保留宗教的身分，而非轉化為士人的身分〕。

二、日治初期的教務：台灣監牧區的建立

國民精神為現代國家的產物，這正是甲午戰後的中國所欠缺的。台灣相對於中國如何能快速的接受國家概念，實為近代思想中值得考慮的地方。這對於天主教而言，亦是嶄新的課題。它一方面帶給教會過去所未有的崇高地位，另一方面，新的問題卻也隨之而來。在國家權力的擴張情勢下，清治時民眾「藉教以保身家」¹⁶的情況不再出現，傳教士自然也不能再以世俗的動機來勸人入教。當時的傳教士如此寫到：

自從日本人占領台灣以來，即使這種錯誤動機的信仰也蕩然無存了。日本完全控制本島事務後，傳教士以不再有這種保護的特權，日本人推行各種計畫時，不喜歡別人，尤其是歐洲人來干擾。¹⁷

台灣在典型的警察政治之下，治安維持和衛生設施；甚至於勸業、土木、徵稅、及地方一般行政，都由警察來執行。這使民眾認知如果需要什麼保護，也不必去找傳教士，而可逕自求諸於國家，這是教士在慶幸日本統治帶來安定之同時，所始料未及的。這無形之中，無疑地減損了天主教的地位。

不過大體而言，日人對於天主教與傳教士仍然尊敬。這可能並非宗教本身的緣故，而是與兩個附帶的價值相關。其一是日本人相信天主教對於撫慰民心、安定社會有益處。其二是日人對歐洲文化本來就有傾慕之心。

我們不妨將觀察的角度更為擴大，則天主教與日本政府之型態亦反應了新教革命之後宗教的發展的結果：教會與政權的關係已不若以往緊張，但是一旦教會過度的涉入政治與社會事務，則仍會招致政府之疑忌，甚至鎮壓。十八世紀，各國對耶穌會的打壓便為一明顯的例子。因之近代國家，不論歐美乃至日本，皆在一定程度上，表現宗教寬容的立場〔也可說是疏離〕，卻同時限制了教會的社會功能。

教會工作人員方面在二十世紀初有了一些變化。由於傳教事業需要女性助手，尤其是在高雄的孤兒院需要有更稱職的人員照顧，自從 1903 年起，首批道明會修女來台，一位是西班牙籍的若瑟芬修女(Sr. Josepha, O.P.)，另一位是菲律

15 這個現象在孔復禮〔Philip Kuhn〕，《叫魂》〔台北：時英，2000〕一書有精采的描述。

16 《臺灣文獻叢刊·同治甲戌日兵侵臺始末，卷四》，〔十一月庚戌(十一日)福建巡撫王凱奏〕

17 黃德寬譯，前揭書，〔1953，羅厝教務報告〕，頁 152。

賓籍的羅撒修女(Sr. Rosa Remedias, O.P.)。¹⁸ 自此以迄太平洋戰爭爆發時，前後有二十八位修女來台服務，多半在孤兒院，也有五位在靜修女中擔任音樂、圖畫、手藝及英語等專門科目的教師。¹⁹ 值得注意的是山內とも及坂本小須磨修女，因其為日本籍，在戰爭期間，西國傳教士被嚴密控管之際，她們的身份較能發揮很大作用。

為了便於向婦女傳教，也有了傳教姑婆的引進，依林淑理的記載：

開教之初到日據時沒有傳道婦女的養成機構，因男傳道員不方便直接對婦女講授教理或佈道，亟需女傳道皈依家庭主婦，進而引領全家入教，鞏固家庭信仰。教會當局曾於1900年，聘請廈門教區兩位通曉閩南語的女傳道(含笑姑婆、Phai姑婆)來台協助傳教，成效良好。1906年又聘請四位女傳道(月姑婆、添姑婆、種姑婆與鑾姑婆)到中南部各教會推行傳教工作，頗受教友敬佩，成為後來本地女傳道的模範。此後聘請來台的女傳道因水土不服而返回廈門，教會當局決定在高雄試辦女道傳養成所。最初招募四位，只有學習能力較佳的兩位擔任女傳道，後來也中斷培育計畫。1921年重新正式開辦一屆女傳道員養成所，由聖道明傳教女修會(Religious Missionaries of St. Dominic, OP)管理，招收十名志願者，經過四年訓練與教育，有江要(愛姑)、楊羅撒姑、陳殘姑、潘里姑、許隨姑、翁姑、稅姑等七位學成畢業，投入各地傳教工作。她們的足跡遍佈全島各處、另三位(鐘意姑、鐘納姑、黃失福—利亞姑)回家修道，並協助傳教工作。

1926年第二次開課，訓練了六名女傳道員(受理—不纏姑、李專姑、林瑞蓮姑、李謙姑、蔡豔杏姑與潘安慰姑)，另外斗六三位新教友(周貴美姑、江譯—足姑、廖鶯姑)，在白裴理神父指導下，經過三年的研讀要理，成為女傳道員。1937年第三屆，也是最後一屆，培育了七名女傳道(阿香姑、林碧蓮姑、鐘稻姑、李善姑、黃巧—阿早姑、蘇勉姑、陳愛玉—吟姑)。這些女傳道員雖未發守貞誓願，但默許為基督淨配，堅守貞德，一生完全奉獻於教會，在俗世中推動傳教工作。²⁰

在傳教士方面，截至明治末期(1911)為止，台灣天主教會共有十二個堂口，有三、四十個傳道所，這期間在台的道明會士有白若瑟(Jose M. Alvarez)，良加略(Leon Gallo)，鐘利默(Tomas Masoliver)，馬守仁(Manuel Prat)，多瑪斯(Tomas Pascual)，洪羅烈(又名洪瑕玉，道明會中善於用閩南語之雄辯家)(Angel Rodrigues)，杜默爾(又名陶神父)(Toribio Toval)，良伯鐸(Pedro Prat)，吳達查(Bonaventura Gordaliza)，明義德(Juan Beobide)，高恆德(Francisco Giner)，楊多默(Tomas de la Hoz)，林茂才(又名林啟明、林茂材、林謀材)(Clemente Fernandez)，白斐理(Felipe Villarrubia)，閃佑道(Justo Sasian)，包神父(Faustino Rodriguez)等十五位。

台灣教務方面，我們首先將(1895~1813)被任命為道明會玫瑰省台灣區會長

18 江傳德，前揭書，頁278。

19 大國督，前揭書，頁389-392。

20 林淑理，〈台灣天主教傳道員之福傳生涯與培育〉，臺北：天主教輔仁大學宗教學系碩士論文，2005，頁77-78。

之神父名列於下：²¹

何安慈(Celedonio Arranz, 1893 年)

黎克勉(Icidero Clemente, 1897 年)

高恆德(Francisco Giner, 1900 年)

馬守仁(Manuel Prat, 1906 年)

杜默爾(Toribio Toval, 1908 年)

這些區會長負責所有道明會士的事務，在台灣成立監牧區前，他們工作顯然要處理教會內外大小事務。他們常住在高雄前金，但也有搬遷之時，例如在 1898 年黎克勉區會長高昇為廈門教區長，接其位置的是高恆德，他就以斗南為區會長辦公地，然而當時地方不靖，且高會長常巡視各地，無法常在斗南處理會務，乃將區會移到台南辦公。²²

馬守仁神父於 1903 年由淡水調至羅厝為本堂神父，推行教務不遺餘力，1905 年 4 月在教堂內創辦一所傳道學校，招收十四名學生，1907 年白斐理神父被調來協助辦理傳教學校，並自菲律賓馬尼拉聖多瑪斯大學取得西文打字印刷機，除了訓練，也出版不少教義書及祈禱書。羅厝教會因此成為台灣天主教一個很重要的中心，此或許因為是地處中部，便於南北聯絡有關。根據 1911 年七月的報紙報導，羅厝教會不但地位重要，還開辦孤兒院：

員林支廳羅厝庄天主教會，由西班牙天主公會本部，每年補給佈教費一千六百圓。且購有田園九甲餘，則本島天主教會中久已占第一地位。故從來於本島緊要職務，常由該教會裁定之。聞該教堂曩收致本島人孤兒教育之，名曰天道學生，目下已有十數名，而裝置印刷器於教堂內，臨時刊行教大意，令各信者習之云。²³

文中似乎將孤兒院與傳道學校混成一體，事實上兩者均有²⁴，而此學校在 1915 年隨著馬神父遷移到台北蓬萊町。²⁵

鑑於本地的教友方面數目日多，台北林茂才神父 (Clemente Fernandez)，乃英年早逝的林茂德神父(Nemesio Fernandez)之兄，於 1906 年完成台北市第一所教堂在蓬萊町(大稻埕)，但完成後卻因市區改正抵觸都市計劃道路因而在 1908 年被拆，1911 年在舊堂附近新店尾地段蓬萊町 29 號空地上花了三萬餘圓興建歌德式蓬萊町大堂，是北市當時最雄偉的建築之一。

林茂才神父在台北十分活躍，我們在當時的報紙上看到他有時會與長老會牧師辯論，也與不同意見者爭辯。²⁶且看 1906 年八月十四日的一則報導：

21 大國督，前揭書，頁 288-289。

22 大國督，前揭書，頁 345-346。

23 見 1911/07/14 日《臺灣日日新報》的報導。網址：

<http://ci22.lib.ntu.edu.tw:8085/twhannews/user/index.php>。

24 大國督，前揭書，頁 322-324。

25 江傳德，前揭書，頁 188。

26 見 1908/10/31 日及 1908/11/13 日《臺灣日日新報》的報導。網址：

<http://ci22.lib.ntu.edu.tw:8085/twhannews/user/index.php>。

．．．艋舺布埔街二十二番戶呂斑虎，本年三十三歲，屠獸為業，不知何時歸依天主教，日往頂新街天主教堂，見家人之祀祖先，心殊不滿，而其妻陳氏柑與弟婦陳氏紅兩人，皆不以為然，不與之同。本月十日午後六時頃，忽有天主教宣教師林茂才，與其他宣教師及通譯各二名，擁至斑虎之家，謂既入天主教，家中所祀祖先牌位及神佛之像，應遷之教堂。言訖遂欲攜去。陳氏柑及陳氏紅兩人，則曰信教者只有斑虎一人，祖先乃我等所祀，不敢從命。宣教師終不聽，必欲攜去乃已。遂大唇舌，聲傳戶外。鄰近有連中者聞，之與其鄰百餘人，結隊而至。彼等皆深惡天主教者，因黨二女而詰責斑虎，且同聲相應，痛罵天主教幾不絕口，如波翻濤湧然。同街甲長玉恐其釀成大事，一面先來彈壓，一面請警官前來調查。越日呼其關係者來訊。據天主教側云：教會中人不能祀神佛及祖先。結局使為親族協議，著斑虎一人別居，各遂其信教自由以願，其事始得歸著云。²⁷

這次民教糾紛不但顯示林茂才的傳教熱忱以及當時對新入教者的作法，也看出在日治時代不再像清朝，若有民教糾紛時，由當地的保甲體系組織居中協調，縱使反教情緒熱烈，人多勢眾，也得由公權力介入調停，並確保宗教之自由。

前期的教會隸屬系統，到了1913稍微有了轉變。自馬關條約割讓日本以來，台灣雖歸日本統治。但在台之教會還依然歸廈門代牧區管轄，雖然在理論上這屬於宗教的業務區域，對國際無任何之影響，但於地理上同一教會分屬不同國之政府，對於教務上種種之連絡，甚感不便。遂於1913年7月19日，奉羅馬傳信部之命令，成立台灣監牧區(Apostolic Prefecture)，脫離廈門之管轄而獨立，形成一新的傳教單位。而被舉為初代之教區長者，為林茂才神父，監督全教區，歷時七年，直至1920年由原在日本四國教區傳教的楊多默(Thomas de la Hoz)接任監牧之職，直到太平洋戰爭爆發的前夕。

大正三年(1914)十月一日調查當時全台教務情況如下：教友中台灣人有三四五二人，日本有六五人，外國人有十五位，總計三五三二人；道明會中有會院長一人，傳教士九人，傳教員三十一人，小教區九處(高雄、萬金、台南、埔姜崙、樹仔腳、田中、羅厝、大稻埕、淡水)，教堂三十四座，小聖堂或臨時聖堂十所，祈禱廳二十處，傳教學校一座，學生十六人；道明會修女三人，小學九所，學生三二〇人，孤兒院二座，其中有七十七名兒童。²⁸大正七年(1918)十月一日時的教務情況則為：教友中台灣人有四一二二人，日本有一二〇人，外國人有十位，總計四二五二人；道明會中有會院長一人，傳教士則有十人，傳教員三十六人。²⁹

而在教務關係上也由福建逐漸轉移到日本的四國教區，因為該區也是道明會玫瑰省的托管地。由於政局及教會在台灣的大環境逐漸穩定，道明會的總會長Rodrigues(據日文ルドピクス譯出)在1917年六月八日來台灣巡視教務。³⁰當時報紙報導如下：

27見1906/08/14日《臺灣日日新報》的報導。網址：

<http://ci22.lib.ntu.edu.tw:8085/twhannews/user/index.php>。

28《聲》，no.471(1915/02)，頁46。

29《聲》，no.517(1918/12)，頁46。

30《臺灣日日新報》1917/06/10。請參考《台灣日誌》，大正六年六月八日，網址：
tbmc.infolinker.com.tw/twchrapp/start.htm。

羅大司教來臺：羅馬加特力教魯媚尼古會(作者按：即天主教道明會)大司教羅魯默幾斯，氏為視察東洋布教狀況途次，一行五名搭便船香港丸，於八日入基隆港。同日搭南下直行列車抵北，受多數信徒迎接。即乘自動車訪問安東總督于官邸，更訪問高田長官代理，然後入大稻埕教會堂。信徒數百名揚煙舉式，盛為之迎。香港教會聞之，亦專派遣書記長一名，來臺迎接。出入如是莊重。一行昨九日直行列車下南。

也就在此年我們見到道明會首次大投資於青年女子教育，亦即靜修女中的誕生，其開辦費用是道明會出的，此舉或與此次巡視有關。次年道明會馬尼拉分會會長 Teisling 來台巡視全島，據涂敏正神父的回憶，分會長捐款重建斗六天主堂。³¹大正九年九月十六日台灣教區長林茂才調回馬尼拉，十二月八日四國教區長楊多默兼任台灣教區長而返台。但其實在此調動之後面最主要的原因是在前一年的八月，日本政府代表信次郎海軍大佐向羅馬教廷交涉在南洋群島的德國籍傳教士遣送的問題，同時也暗示台灣監牧區應該脫離廈門主教而獨立。³²楊多默上任後，自西班牙購入印刷機，於是出版了《善牧》及《公教要理》以及其他的漢字出版品。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由於國際聯盟委任日本管理南洋群島，而要建立軍事基地，台灣成了日本帝國防衛的最前線，尤其是美國針對菲律賓的防衛在太平洋強化其海軍基地後，台灣在軍事上的重要性日益增強。因此有好幾道法令公布施行，希望漸漸地使台灣與日本內地相同的情況。³³

此期間，台灣教會史上有一件較特殊的事件是羅馬教廷派特使 Giardini 於 1923 年一月時，前來屬地台灣視察³⁴；日本在 1919 年首次有教廷派遣使節駐紮，³⁵三年後來台也是很自然的。使節由一位日本神父陪伴，一月十日自東京出發，二月一日自基隆返回，先到台北，參觀大稻埕教會及靜修女中，並受到總督府高規格的接待；再轉往台中，參觀佈道大會；再往南部高雄，有樂隊歡迎，參觀孤兒院，又到萬金，訪問原住民教友，再回高雄，並贈金五百元重建五塊厝教堂。³⁶北上台南，再參加台語佈道會；訪畢由台南前往埔姜崙教會，途中順便經過斗南教會，接受台糖公司接待，再到斗六教會，再赴田中教會，從田中到員林教會，再到附近極具田園風光的羅厝庄，最後才取道員林返回台北，教廷使節對道明會在台灣的傳教工作印象深刻。³⁷

教會發展至大正十二年(1923)八月，其教友總數有五千一百四十五人，外國傳教士十一位，男傳教員二十三位，女傳教員十四；而道明會修女也有八人，聖嬰會女三名。³⁸大正十三年八月，其教友總數有五千二百六十四人，有七十三位成人受洗，外國傳教士十位，男傳教員二十八位，女傳教員十四；而道明會修女

31 涂敏正，〈雲林縣傳教史略〉收入《堂區通訊》，斗六市中華路八十號天主堂，第 66 期。

32 高木一雄，《大正・昭和天主教會史 4》(東京，聖母騎士社，昭和 60 年)，頁 25。

33 以上資訊，均請參見：高木一雄，《大正・昭和天主教會史 4》，頁 13-19。

34 大國督，前揭書，頁 374，但顯然年代有誤，應為 1923 而非 1924。

35 首任使節為 Fumasoni Biondi 總主教，〈《日本カトリック年鑑》〉，(カトリック中央協議會，1985)，〈年表〉，頁 26-27。

36 大國督，前揭書，頁 374。

37 早坂善奈朗，〈臺灣メグリ，使節ニ隨行シテ〉，上中下，《聲》，no.568；569；570(1923/03；04；05)；頁 20-28；39-45；26-32。此遊記之全文今譯出，附在本報告參考文獻項下，請參考。

38 《聲》，no.578(1924/03)；頁 54。

也有七人，聖嬰會女三名。³⁹十四年(1925)，其教友總數有五千三百六十二人，外國傳教士十一位，男傳教員二十七位，女傳教員十四；而道明會修女也有七人，聖嬰會女二名；十一所教會，十二所聖堂。⁴⁰

三、靜修女中之建立

日本領台後，關於台灣的女子教育，到1945年二次大戰結束的日本殖民時代，從教育行政面可依序分為四期：第一期：台灣總督府國語學校時代(1895-1909)；第二期：台灣總督府高等女學校官制期(1909-22)；第三期：改正台灣教育令期(1922-43)；第四期：中等學校令期(1943-45)。其內容分別敘述如下：

第一期：相當於初等教育，而在1897年4月30日在國語學校第一附屬學校女子分教場的出現，是女子教育的開端，這是以本島人作為教育對象的。這之後，女子分教場當作第三附屬學校，手藝科的畢業生成為公學校的教員。一方面，對日本女子以國內的高等女學校施行標準而進行的高等普通教育，在1904年依台灣總督府命令，在國語學校內，而在三年後，附設一中學校。

成為第二期的總督府高等女學校官制(1909)中規定，從中學校獨立出來，依據在國內的高等女學校令的標準而被設置、營運。又，在這個時期規定「私立學校設置廢止規則」(1898)、「私立學校規則」(1905)。

而且，台灣教育令也改正了，其中第二條規定：「教育方面，乃基於有關教育的天皇勅語中的主旨，培養忠良的國民為基本要義」。

第三期，制定改正台灣教育令(1922)，以前有以本島人的中等教育機關作為高等普通學校的內地人的高等女學校不同系統的教育制度，但是現在統合了。又私立學校令規定，各私立學校乃由州知事、廳長以及台灣總督作為其監督，對於校長、教員的解職、學校的閉鎖、罰則都規定是監督官廳的權限。

推進皇民化教育的第四期，在制度上是1941年的國民學校令發佈以後。中等學校令在四三年，其後兩年的台灣從日本的支配下脫離。⁴¹

天主教的傳教士苦於人力及財力之缺乏，一直無法與長老會在教育推行方面相匹敵，直到1917年才在台北圓環附近由「財團法人台灣教區天主教會」為日本來台以及本地的女子施行初中及高中普通教育而批准創立的學校設立了第一座正式的教育機構—靜修女中，培養合乎宗教精神的女子，從長遠來看有助於台灣社會的發展，也有助於傳教目的。

此年林茂才監牧，向菲律賓馬尼拉聖道明支會借款六萬元，於蓬萊街聖堂斜對面的馬路旁邊，以八百三十六坪土地，興建兩棟校舍及一棟五百六十坪之宿舍，得到當時日總督府之許可，於西一九一七年四月一日，舉行盛大之開學典禮。首任校長即為林監牧，林校長雖抱遠大之志願，因為教務工作繁重等原因，致無法兼顧而委託道明會來接手學校的經營及管理。⁴²此時乃屬於前述的第二期階段，到了一九二二年，日本當局要進行第三期改革，乃引用明治三十八年(一九

39 《聲》，no.588(1925/01)；頁60。

40 《聲》，no.611(1926/12)；頁68-69。

41 山本禮子，〈日本統治下における台灣キリスト教主義の相剋——台南・長榮高等女學校の軌跡——〉，富坂キリスト教センタ編，《近代日本のキリスト教と女性たち》，東京，新教出版社，1995。頁147-9。

42 大國督，前揭書，頁291-292。

〇五年)，第八八號私立學校規則廢止之府令，將此校廢除，而立刻將在校之學生重行編入經許可之新設私立靜修女學校，全然將教育與宗教脫離，依照日本之教育方針以教育婦女為宗旨。

前面提到該年羅馬教廷派遣一位特使，特別從日本前來台灣視察教務，隨行的日本神父早阪奈善郎寫了一段當時的靜修女中的情況如下：

其間參觀了西班牙道明會修女管理的靜修女學校，接受總督府的午宴招待，女學校的歡迎會，台北教友的歡迎會等，過了三天很有變化的生活。靜修女學校本來只是從小學程度到補習科專修科的程度，大約從去年開始提升為高中程度，而正式得到承認，現在女生約有四百人，據說該校還有約一百名以前殘留下來的小學校學生。學生中約有三分之二是日本人，三分之一是台灣人，不過由於語言的關係，日本人與台灣人的教育全部分開，這是因為台灣人原來住在家中一向不懂日文，所謂公學校是只有台灣人上的小學，這才開始學日語並接受日本式的教育，然而自然與日本人比起來其語言較差，結果不得不在女校中實施日台分教制，這並不太好，無論如何，學校日漸發達，校舍增築不在話下，誠可賀也。由於住宿生很多可知，從各地來的學生有不少。與修女交談得知，目前在傳教方面並未有太大的效果，這是時間的問題，年年很多的畢業生離開這學校，將來也有可能有些皈依的淑女，正如其他的多少教會學校的例子，台灣出現了靜修女中，每次念及培養天主教的婦女，懷抱得救的真理的地方，她們將會感謝那些身著白衣的道明會修女在靈修上的努力，大家都會承認而且清楚說出。

當初校制有第一部、第二部以及特別科等不同的三個學部。第一部為日本渡台的女子而設，預備科三年，高女科四年；第二部為本地女子而設，初等科四年，高女科三年；特別科則設有英語、法語、西班牙語及音樂等，學生可選一科或數科，修業年限從一年到三年不等。1922年十月三十一日，日本統治當局廢除過去的私立學校規則，靜修女學同時廢校，但在同年十一月八日，以新的法令批准設立「私立靜修女學校」，原有學生以其當時的年級再復學，由楊多默（Thomas de la Hoz）為第二屆校長。辦學方針乃遵從總督指示與宗教脫離關係：「本校乃奉戴天皇聖旨，遵行大日本帝國的國策，專為培育最具人格的帝國善美的婦女而從事國民精神教育，作為辦學宗旨。」

靜修女中尚於民一九二四年增設日文，歐文打字部，由在校學生之志願實地指導，至一九四〇年培訓出來一百五十名結業生，在各公私機構服務，受到各界之好評。到了一九三五年二月七日，又為了配合時代要求，修訂一部份之學則，同時設立家政科，修業年限為三年，於五月一日開學。至一九四〇年為止，該校除校長一人外，有男女職員二十二名，在校生七百四十人。畢業生高中部計有二千一百十三名，家政科三二七名。每年招生之定員為一百二十名，一九四〇年增至五百八十五名，一九四一年為六百五十二名。⁴³

到了一九三六年，日本政府逐漸施壓，要使教會完全退出教育，以配合以神道軍國主義的政權，於是遵從台北知事之要求指示，「將從前管理學校的財團法人台灣天主教會脫離，並組織一個新的財團，校長楊多默慨然退職，由創校伊始就已擔任顧問的小宮元之助內定為接任新校長之職，積極改善整個學校」等報

43 大國督，前揭書，頁 293。

導，對於此點，今川知事對於靜修女中的改革有如下的談話：

「在本州所屬私立中學的改善充實，與其同時併行的擴充中等教育機構的設施過程中，曾命令各個學校研商對策。由財團法人台灣天主教會所經營的靜修女中，州政府當局有意在第一階段任命日本人為校長並由其來經營學校，為此目的，需脫離教會的財團，設立另一財團，對此案子曾與教會當局數度會商。這次有幸得到駐守馬尼拉的教會首長的正式同意，而使得此事可以具體化，接著而來的學校內部改革及充實，使得學校得以向獲得「認定學校」的地位邁進」。⁴⁴1936年九月一日小宮元之助正式上任，在任三年五個月後因病解職；從1936年九月一日起，到1940年一月二十日在職。在資料的備考欄中記載在四一年死亡。當時的教頭薪水為210元，而校長在職期間並無領薪的記錄，繼楊多默校長之後的小宮，心中多少有所期待吧。後任人事由教頭鈴木讓三郎在1940年一月十九日處理校長事務，次年初就任校長職。1942年時，校長及教員共十四人；囑託書記（秘書職員）三人的體制，尚有，校主，舍監（其中有擔任音樂教學的）等共有九名修女擔任，其中八名為無給職。...

四五年三月的「沿革大要」有如此記載：「本校的目的乃奉戴天皇聖旨，培養人格高尚，家庭及社會都是有用的女子的高等普通教育」。台灣光復後，私立靜修女子中學納入中國學制中的初中及高中體系，各有三年的修業年限，而前述文中的「奉戴天皇聖旨」就消失不見了。⁴⁵

靜修女學校當時是全台灣唯一的私立女中，不是高等女中，而是較完整的純女子學校，當時馳名於內外。尤其對運動方面頗負盛名，在全台女子網球競賽大會中，連續四年均獲冠軍，而得總督之優勝盃，又曾代表本島遠征日本，參加明治神宮競技大會三次。而桌球也是稱霸全台，所向無敵。⁴⁶

貳、昭和時期的台灣天主教

一九二五年日本昭和天皇繼位，而政局一直向軍國主義及帝國主義的方向發展，台灣天主教也感受到日本軍國主義的壓力及衝擊，對教會的發展有相當的影響。本時期的教會可以從神職人員的變化、新教堂的創建、傳教的問題以及大戰期間的情形等四方面來討論。

一、神職人員的變化

整個日治時期以迄國府遷都來台為止的在台灣神職名錄，收錄於文章之後的附錄一。

在監牧區成立之後，有關修會事務，由區會長管理，從1913年到1945年間，

44 《台灣日日新報，1936/8/22》。

45 山本禮子，《植民地台灣の高等女學校研究》（日本東京，多賀出版，1999），Chap. V. 一九三〇、四〇年代におけるキリスト教主義學校の相剋，五，〈靜修女學校にみる校長の更迭〉，頁238-241。

46 大國督，前揭書，頁293。

道明會台灣區會長名單如下⁴⁷：

- 巴多瑪(Tomas Pascual, 1915 年)
- 洪羅烈((Angel Rodrigues, 1917 年)
- 吳達查(Bonaventura Gordaliza, 1919 年)
- 巴多瑪(Tomas Pascual, 1922 年)
- 高恆德(Francisco Giner, 1929 年)
- 良雅師(Julian Villegas, 1933 年)
- 洪羅烈((Angel Rodrigues, 1939 年)

最值得注意的是從 1936 年起，台灣有了第一位本地的神父出現，他就是羅厝出身的涂敏正神父。涂敏正神父，出生於 1906 年 8 月 30 日，於台中廳武西堡羅厝庄百五十八番地。⁴⁸

他出生後即領洗，由馬守仁(Manuel Prat)神父施洗，聖名雷蒙(Raymond)，四歲喪祖，五歲失怙，由於祖父改宗，在族譜上被除名，可以想像，在此孤立情況下，其家人與神父相當接近，教會也成為涂敏正少年時常去之處。他母親也在他十一歲時(1911)去世，此年他在舊館公學校畢業，幼年常在天主堂協助神父，當時擔任羅厝天主堂本堂神父的是山捷師(又名山濟慈，Felix Sanches, 1917/10/27-1951)，山神父有時以金錢考驗，涂氏誠實奉還，均不起貪念，1923 年先被道明會士送往台南傳道學校讀書，1924 年適逢原來在羅厝的老本堂神父當時擔任廈門主教的馬守仁神父來訪，因此就將他送往新成立的廈門白水營小修院修道，畢業後 1931 年又送到香港的香港仔之華南總修院唸書，其中身體不適，1933 年先赴港尾調養，1934 年還返台休養過一段時期，並到北部一帶傳教。1936 年 4 月 11 日晉升五品執事，12 月 19 日在廈門鼓浪嶼主教座堂，由馬守仁主教主禮，晉升天主教司鐸。次年元旦返台舉行盛大的首祭，成為台灣第一位本地神父，從此時起直到 1941 年五月間，涂神父首先被派在蓬萊町天主堂助理教務，然後又調往石碇，擔任本堂神父，直到 1940 年 9 月 20 號被調往樹仔腳。此期間一方面涂神父忙著傳教，另一方面也在協助外籍傳教士在傳教過程中與當地的人士發生的衝突；並以身為台灣人的較有利的身份，奉教會長上之命，代表教會與日本殖民當局週旋，以爭取教會之利益。隨著大戰日趨激烈，日本任命里脇淺次郎為台灣教區長，涂隨即受到里脇的重用，幾乎把他放在最近的位置，直到大戰結束，更將教區長的位置由涂來接替兩年之久。⁴⁹

除了涂敏正從 1937 年起為唯一台籍教區神父外，此時期尚有兩位教區神父出現。一位李天一神父，另一位是李惟添神父。李天一神父為雲林崙背鄉水尾人；李惟添出身高雄市前金玫瑰堂教友家庭，一位姐姐為道明會修女；這兩位本籍的年輕神父不像涂敏正被送到廈門修道，而是在日本的大修院畢業，在 1944 年 9

47 大國督，前揭書，頁 407。

48 此乃依據彰化縣埔心戶政事務所戶籍謄本，埔心鄉戶字第 002891，002892 號所載。

49 細節請參閱拙作，〈台灣天主教史上的里脇淺次郎與涂敏正〉，收入在《20 世紀台灣歷史與人物－第六屆中華民國史專題論文一》，民 91/12 頁 185-208。

月 29 日同時在東京晉鐸，這也反應出來時代的變遷。⁵⁰

其他的非西班牙籍神父則為道明會的二神吉德神父。後期來台的除了教區長里脇外，尚有岩永及古川重吉二位神父。這些日本神父留下來的資料很少，且零散，在台時間並不長，隨著日本殖民結束，也都紛紛返國。

二、新教堂的創建：

天主教在台傳教第二期(1895~1949)建堂時間地點表：

建堂時間	建堂地點	建堂者
1896 年	茄苳	
1897 年	員林	
1898 年	興化店	黎克勉神父
1900 年	埔姜崙	洪羅烈神父
1904 年	樹仔腳	洪羅烈神父
1907 年	大新	
1910 年	苦苓腳	閃佑道神父
1915 年	田中	閃佑道神父
1915 年	台中	馬守仁神父
1915 年	小白沙	馬守仁神父
1916 年	斗南	吳達查神父
1925 年	竹山	白斐理神父
1926 年	新化	
1928 年	樺山	楊多默神父
1929 年	土庫	良雅師神父
1929 年	面前厝	
1931 年	彰化	
1932 年	基隆	孫繼慈神父
1933 年	虎尾	良雅師神父
1933 年	小梅	良雅師神父
1933 年	石碇	洪羅烈神父
1933 年	新店	
1934 年	大湖	
1934 年	嘉義	良雅師神父
1934 年	左營	李安斯神父
1935 年	秀水	高恆德神父

在此昭和時期最重要的教堂應屬樺山堂的建立，此乃專為日本教友所蓋的小型歌德式教堂，由於有一些日本教友隨著殖民政府前來台灣定居，這些人的宗教生活需要照顧，因此在今日的忠孝東路口善導寺對面建立，紀念治台第一任日本

50 山人，〈懷念李惟添神父及四十年前的教會〉，《善導週刊》，1992 年 5 月 10 日。

總督海軍大將樺山資紀，於 1929 年七月一日完工，以照顧數百名日籍的天主教友，其中有些人也會偶而在日本的教會報紙《聲》上，報導台灣教會的消息。

下表則是一九四零年代日治末期台灣教堂的所在地及名稱，可以見到大小教堂合計，共有五十座，這是道明會在台灣獨立奮鬥的成果。⁵¹

區域	名稱（粗體為管轄教會）	所在位置
臺北市	樺山町天主堂	臺北市樺山町二一
	蓬萊町天主堂	臺北市蓬萊町二九
	石碇天主公教會	文山郡石碇庄
	新店傳道所	文山郡新店庄
	和尚州天主公教會	新莊郡鷺洲庄
	淡水天主公教會	淡水郡淡水街
	石門傳道所	淡水郡石門庄
	基隆天主公教會	基隆市堀川町
	四腳停傳道所	基隆郡瑞芳街四腳停
	暖暖傳道所	基隆郡七堵庄
臺中州	臺中天主堂	臺中市新富町
	彰化天主公教會	彰化市
	劉厝傳道所	彰化郡花壇庄劉厝
	三家春傳道所	彰化郡花壇庄三家春
	秀水傳道所	彰化郡秀水庄秀水
	羅厝天主堂	員林郡坡心庄羅厝
	員林天主公教會	員林郡員林街
	面前厝天主公教會	北斗郡竹塘庄面前厝
	番子田傳道所	北斗郡竹塘街番子田
	大東傳道所	
	田中天主堂	員林郡田中庄田中
	大新天主公教會	員林郡田中庄大新
	赤水傳道所	南斗郡名間庄赤水
鼻仔頭傳道所	員林郡二水庄鼻仔頭	
臺中州、 臺南州	斗六天主公教會	臺南州斗六郡斗六街
	竹山天主公教會	臺中州竹山郡竹山庄竹山
	勞水坑傳道所	臺中州竹山郡竹山庄勞水坑
	樹仔腳天主堂	臺南州斗六郡蔞桐庄樹仔腳
	水尾傳道所	臺中州北斗郡溪州庄水尾
	西螺傳道所	臺南州虎尾郡西螺街
臺南州	埔姜崙天主堂	虎尾郡土庫庄埔姜崙

51 大國督，前揭書，頁 437-441。

	斗南天主公教會	斗六郡斗南庄斗南
	鹿寮天主公教會	北港郡元長庄鹿寮
	土庫傳道所	虎尾郡土庫庄士庫
	崙仔頂傳道所	新化郡崙仔頂
	嘉義天主公教會	嘉義市新富町
	民雄天主公教會	嘉義郡民雄庄民雄
	小梅傳道所	嘉義郡小梅庄小梅
	大湖傳道所	嘉義郡大林庄大湖
	北港傳道所	北港郡北港街
	臺南天主堂	臺南市大正町
	大灣天主公教會	新豐郡永康庄大灣
	新化天主公教會	新化郡新化街
高雄州	高雄天主堂	高雄市苓雅寮
	五塊厝天主公教會	鳳山郡鳳山街五塊厝
	山下天主公教會	高雄市山下町
	舊城傳道所	岡山郡左營庄舊城
	鳳山傳道所	鳳山郡鳳山街
	赤山天主堂	潮州郡萬巒庄赤山
	潮州傳道所	潮州郡潮州庄潮州

值得注意的是在當的宜蘭、花蓮及台東並無教堂，而深山的原住民也尚未有進入傳教的行動，這一切都有待於後來國府統治時期的發展。不過日本在台灣山地的開發及統治，有人指出：「為原住民之歸依預備，不只是較叛逆的泰雅及賽德克族，且是全部山地原住民」。⁵²

三、傳教的問題：

據統計，截至昭和七年(1932)七月年為止，全台教友計有六九六三人。昭和十年(1935)四月二十一日早上六時全島發生大地震，新竹州及台中州之天主教堂受創最重。昭和九年(1934)，台灣教會發生所謂間諜事件，在高雄前金傳教的白斐理神父受命編纂台灣教會的歷史，到各地調查，在最後要附上台灣地圖，乃委況靜修女校的老師坂元コヅエ，老師再找他的學生山口幫忙，為日本憲兵隊懷疑從事間諜工作。⁵³ 可見當時日本已經開始對台灣的天主教會，尤其是西班牙傳教士及其所創辦的學校懷疑，並採取行動以示恫嚇。

昭和十二年二月，教廷在菲律賓馬尼拉舉行第三十三屆國際聖體大會，⁵⁴台灣教會也有不少傳教員及姑婆參加，實為當時台灣天主教會的盛事，⁵⁵表現出台灣教會屬於普世教會的一環。但不久蘆溝橋事變事變發生，台灣島民情況不穩，教會受到愈來愈嚴格的限制，日本政府加強皇民化教育，廢除報紙上的漢字，以

52 Ralph Covell, *Pentecost of the hills in Taiwan : the Christian faith among the original inhabitants*, (Pasadena, Calif. : Hope Publishing House, 1998), p.104.

53 《臺灣日日新報》，1934/02/11；又參見《台灣日誌》，昭和九年二月七日，網址見前。

54 顧保鵠，《中國天主教大事年表》，台中：光啟出版社，1970，頁79。

55 當時曾出版過一本照片集錦，有參加者照片，以及過境香港時的攝影等。

推動日語，廢止農曆新年並強制參拜神社。由於台灣成為國防第一線，總督再由文人改為軍人擔任，由於基隆成為要塞，教堂被迫遷移。昭和十四年(1939)七月六日總督府令第五十號「有關外國人之入國、居留及離開之文件」公布，同時在四月三十日廢除了明治三十二年的「外國人取扱規則」及大正七年的「有關外國人入國文件」。⁵⁶

對於天主教而言，長老會作為最大的對手，其實在教義方面的分歧，並不如想像的重要。反而在傳教手段上的不同，才是教徒關注之所在。另一個雙方重要的分歧，則是在擁有的設備與機構上。

我很羨慕此地的基督徒，他們有一部印刷機，每年印刷很可觀的書籍和傳單，散播全島各地。唯一對抗之法，是我們自己也有一部印刷機，印我們自己的書與傳單。⁵⁷

台南是最需要我們的地方，基督教完全控制了這地方，由於他們不虞財源，先後設立了學校、神學院、設備完善的醫院和藥局，都很成功。⁵⁸

基督教派台灣的潛力不可忽視，他們組織完善，有經濟充裕的學校，全套設備的醫院及大量的宣傳教師，他們的薪水足以養家，無後顧之憂，故能獻身於工作。基督教的派別很多，但最有影響力的是長老會—加拿大會在北部，英國會在南部。日本人也在台灣傳揚各種宗教，使得情勢更複雜，但仍以基督教佔多數，佛教僧尼較少。⁵⁹

天主教沒有什麼值得誇耀的漂亮建築，沒有設備完善的醫院，沒有神學院，沒有一樣比的上基督教。⁶⁰

台南是基督教長老會的基地，在一八六零年左右第一個英國長老會就在這兒工作了。長老會在台南建立了完善的醫院、神學院、印刷廠、出版社等，…相反地，天主教什麼都沒有，沒有醫院，沒有學校，沒有資源。⁶¹

從上述的論述來看，天主教在台灣的道明會傳教士在向其長上報導其傳教環境比起基督教長老會的優勢，而呈現出一些焦慮、羨慕及挫折，並透露出一些期望，能得到馬尼拉上級單位的同情、瞭解及支持，以對抗環境上的劣勢。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論述的發聲者並非同一人，但屬於同一機構，其同質性甚高，其目標也很清楚，而且雖有懷憂並無喪志。若更仔細分析，這些人在提出論述時，可能已經深思熟慮過，針對長老會的優勢，他們目前可以做的，並非建立醫院，因為在人力及政策上是不可能的；倒是在建立學校及成立印刷所的時機逐漸成熟，因此在這些論述中集中火力，明示或暗喻來要求提供此方面的支援。果不其然，第一所教育機構靜修女中在一九一七年成立，而第一座印刷所也在二十世紀初，以從菲律賓馬尼拉運送過來的新式機器而在彰化田中落腳，建立了印刷中心，印出不少傳教所需的小冊子，例如《四字經文》等。

56 同上註。

57 黃德寬譯，前揭書，〔1903，台南教務報告〕，頁157。

58 黃德寬譯，前揭書，〔1905，台灣教務報告〕，頁160。

59 黃德寬譯，前揭書，〔1928，台灣教務報告〕，頁192。

60 黃德寬譯，前揭書，〔1932，台灣教務報告—靜修女中〕，頁194。

61 黃德寬譯，前揭書，〔1936，台灣教務報告〕，頁198。

從上面可見得基督教在醫療、教育、印刷等設施的經營上之優勢，基督教藉此往往能以天主教所謂的「世俗的動機」誘人入教。但另一方面醫療、教育的設施固然成為基督教傳教的利器，但同時也讓教士俗務纏身，失去傳播福音的時間與本意。反觀天主教會，雖然缺乏學校、醫療等機構，使教士在傳教時沒有什麼後援，對於台灣社會福利等影響較少，名聲也不及長老教會，但另一方面，傳教士卻可隨心所欲地傳教，不受俗務機構所累。⁶²

面對長老會在設備上的優勢，天主教也逐漸在制度或傳教手法上走向「合理化」的過程。此實由於面對一個「列教平等爭勝」的局面，教會不再理所當然的擁有整個國家或地方，如同法國不再能理所當然的宣稱自己是一個天主教國家一般。因是種種講求績效之改革勢在必行，在過去可能是天主教所痛加批評的方法，如今也不得不隨時俱進。佈道大會的推行便是這樣一個例子。

最近，我們在嘉義舉行一連串的佈道大會，長達數日，為了維持人們的熱心，由三位神父和五位傳教師輪流向本地人宣講。在最初的三個晚上，參加的民眾超過四千，最吸引他們的是電影。電影放映機對我們而言真是價如黃金，因為沒有它，我們必無法招集這麼多人，我們選擇宗教電影，以無比的影響力向民眾傳達重要的訊息。⁶³

除了長老會，在中國大陸自發的一個教派「真耶穌教會」也在此時期傳入台灣。此教會於一九一七年由魏保羅創立於中國北京，魏氏「回溯過去所信所傳，多未符合聖經，自覺有復興使徒時代一樣的真教會，藉以更正萬教之使命」，死後由張靈生、魏文祥及張巴拿巴等到處傳教，在福建漳州傳教時，有台灣人黃呈聰等長老會信徒接受皈依，一九二六年三月黃氏等邀請張巴拿巴和郭多馬等來台設立教會，⁶⁴從此成為基督宗教的一大勢力，與天主教及長老會鼎足而三。三年之中便已對中南部的教會造成威脅：

時巧有於民國一三(一九二四)年起，有稱為真耶穌教之一怪教派流入該地〔埔姜崙〕，致力讒謗我公教一面擴充其佈教勢力，於我教會當然不能漠視，派兩位神父與兩位傳道師輪流至該地，一連三日間放映電影及公開演講會，徹底的反駁真耶穌教之謬論，立證我公教之真實性，其中亦有不少之長老教徒。自此會開後一般民眾對我教之研究如火如荼，因之求道者之數急激增加，致遂租民房為傳道所，而有一任長老教傳道師多年之某氏，率其全家至傳道所研究要理終則全家改奉我教，後來在西螺任我教之傳道師。此外尚有一長老教內之重要人士，亦繼而改奉我教。⁶⁵

民國一八年(一九二九)年真耶穌教於大林等處，不但對我公教仇視，甚至其他各派之宗教，悉遭該教之謬論所攻擊，致引起各教派之不滿紛至我教會共請我教出之據理揭破真耶穌教之謬理，我教會當局即於民國一

62 William J. Richardson, *Christianity in Taiwan under De Japanese Rule {1895~1945}*, {New York: St John's University, 1971.}

63 黃德寬譯，前揭書，〔1936，台灣教務報告〕，頁198。

64 以上資料參見真耶穌教會台灣總會發行，《真耶穌教會簡介》，(年代不詳)，頁1-3。

65 陳嘉陸譯，前揭書，頁97。

九(一九三〇)年三月中旬，利用放映基督為題之電影，開演講大會據理將真耶穌教之謬論悖理逐一曝露，使其啞口無言，無詞可辯而遁跡。⁶⁶

由文中不難想見佈道大會的成功，實因為它營造了一種具有煽動力量的氣氛與場合。這其實與天主教一直以來所期許，以教理的反覆解說來打動人心的做法，有些不同。但是如前所述，在一個競爭的時代，天主教也不得不自我推銷。

我們從此處也不難理解佈道大會的限制性：它固然能予人一時之感動，但卻無法維持長久的信仰。

近年來有些傳教方法很流行。就是一連幾天舉行公開的佈道大會。…雖然參加佈道大會的民眾，一時都很感動，但成效卻難以捉摸，也令人失望。…比較好的方法，還是傳統的樣子，深入民間…。⁶⁷

總體而言，日治時期在台的天主教教會其發展是不如新教教會。而使台灣人民較為記得的，也多半是長老會的教士。會造成如此的結果，固然與前述在傳教策略的差異有關，然而若尋求更深刻的解釋，則不能不從兩個教派在信仰上的基本特點著眼。

事實上，按諸兩教之歷史，有兩點必須特別注意的：一是天主教與長老教會之相異，尤其是對於世界事務上之態度；二是民間信仰對教會的影響。若由此重新檢視天主教與基督教在台灣的發展，則其成敗是不言而喻的。長老會(Presbyterianism)是以喀爾文(John Calvin, 1509-1564)的神學思想為基礎，認為人的靈魂是否得救早已預選命定，人自原祖以來即已敗壞墮落，只有上帝的恩寵能助人，人只有依上帝的話語，亦即紀錄在「聖經」中的指示生活，上帝有至高無上的主權，聖經是一切教義的基礎，上帝造世創世的目的並非在於滿足世人的需求，而是彰顯上帝的光榮，而人在世上應當儘力光榮上帝，度聖潔禁慾的生活，才能呈現出自己是上帝選民的品質。在儀式上，只接受聖洗及聖餐兩件聖事；在生活中，很重視教育及聖經的研究，並且很反對政府對於宗教事物的干涉。人們一般看他們長老會信者行為「正派且有秩序」(decently and in order)，並且在行為態度上表現出慷慨、友善、以及不斷地追求社會正義及改革。⁶⁸

而天主教當時對於神職人員的重視，對於聖經較少傳揚，教友屬於較被動的狀態，對社會事務也較少表現其主動參與的立場，與日本殖民當局之間的衝突反而不像長老會那樣劇烈。

四、大戰期間的情形：

日本國內早在太平洋戰爭前，首先在 1939 年制定宗教團體法，控制全國宗教，1941 年更批准了「日本天主教團」，全國的教區主教皆由日本神職擔任，台灣及東南亞有些托管地區也陸續由日本人擔任教區長，在 1941 年許多年青的神職被任命為主教，包括台灣監牧區在內。

昭和十六年三月二十日發佈台灣教區長由長崎出身的日本神父里脇淺次郎(Satowaki Asajiro, 1904-1996)擔任。里脇出生於 1904 年 2 月(一說 1 月 31 號)，

66 陳嘉陸譯，前揭書，頁 98。

67 黃德寬譯，前揭書，〔1928，台灣教務報告〕，頁 191。

68 <http://www.bartleby.com/65/pr/Presbyte.html>；<http://mb-soft.com/believe/txc/presbyte.htm>。

故鄉為長崎縣西彼杵郡外海的出津縣，⁶⁹此地偏處極為窮困的海邊鄉下，兩三百年來早已成為隱居於地下的「切支丹」定居之地，其祖先世代為基督徒，十九世紀末，法國的多羅神父至其鄉傳教，教堂就建在其家的斜對面不遠處，他小時候就常隨父母至教堂，而且很早多羅神父就鼓勵其修道之志。中學是在其鄰鄉黑中學，畢業後，到長崎入修院，1929年被送到羅馬烏爾朋大學深造，而其羅馬留學的經驗對其日後的辦教理念有深遠的影響，也對台灣教務不無衝擊。長崎最早的日本主教為1927年在羅馬祝聖的首位在地主教早阪久之助，因此對於教會本地化及地方教會的成長，有最深刻的體會。⁷⁰

里脇之所以被任命，除了時空環境，身為日本非屬修會的教區神職人員，加上長崎離台灣較近，更且他在羅馬受過完整訓練，較有國際觀，且熟習教廷情況及拉丁文，當為主要因素。

另一方面原來的教區長楊多默實在是被迫讓出位置來的，依據道明會台灣教務報告的記載：「1941年，良善而有才幹的楊多默監牧發現必須放棄職位，而移交給別人。因為日本當局已積極備戰，視台灣為戰線上的一環，且堅持必須由日本人出任教區首長。為此，來自長崎教區的日本神父里脇淺次郎被任命為台灣署理監牧，直到1945年戰爭結束，才交卸職務回國。」⁷¹

1941年七月二日里脇抵達基隆，七月六日為星期日，里脇正式在台北樺山町就職。對於就職情形，日本報紙有詳細的記載，其新聞標題為〈里脇台灣教區長劃時代的就職儀式，內地及台灣教友熱烈參與〉。⁷²

另一方面，由於日本對於國體的強調，對神道及神社參拜的要求提高，這對強調一神論的基督宗教有所衝突，幸好日本政府後來與教廷有所接觸後，對神社參拜有非宗教化之解釋，才化解此緊張，不過天主教到底還是一種外來宗教，外國傳教士的存在本身就是問題來源，這在台灣更嚴重，因為台灣天主教是以西班牙道明會士為主的傳教團隊。

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香港及東南亞諸國迅速被日本佔領，在對基督宗教的政策上，日本帝國政府也派遣日本教會人士組成宣撫班，尤其是天主教國家的菲律賓，更是動員不少力量，以穩住在菲國的統治。⁷³台灣因為天主教徒只有七千人左右，里脇赴台任教區長，似乎只帶了一位秘書以及一位神父上任。里脇在台灣，特別依重當時唯一本籍的教區神父涂敏正，一來在日本眼中較無間諜嫌疑，二來也是從修會到地方教會的過渡。

戰爭的爆發，立刻突顯了日人對教士不信任的一面，雖然不至於如同清治時期般，受到官民雙方的迫害，但是教士的隔離與遷徙仍不可免。

艦隊的準備，軍火的貯存，都要避免被敵人發現，所以日本當局下了一道命令，所有在高雄和基隆的外國人必須離開；道明會教士都是外籍，只有搬家一途。

69 有關里脇樞機的一生，有他在接受訪談時的自述，原登載於 The Japan Missionary Bulletin，1991，夏季號，後譯成日文〈里脇淺次郎樞機御屏聞應〉，頁6-13，本文中有關樞機一生行事，多以此文為據。

70 末吉矢作、里脇樞機卿，〈創刊60周年紀念ヲ以テ打甲ヲ以テ万歳ヲ以テ神生長崎行幸千舎舎藥所里脇樞機卿を聞く〉，《聖母の騎士》，1990/05，頁7-8。

71 黃德寬譯，前揭書，頁209。

72 昭和十六年(1941)八月三日，《日本カトリック新聞》，821，二版，

73 參看小野豐明、寺田勇文編，《比島宗教班關係史料集》(龍溪書舍復刻，2000)。

職務的調動不僅限於基層，上級也不可避免。楊多默監牧被迫辭職。新的堅牧里脇淺次郎⁷⁴將監牧辦事處遷往高雄，理由是：

高雄已對外國傳教士關閉，故需要一位能被日本當局接受的人駐留該地，以照顧教友。⁷⁵

日本政府也曾懷疑教士是美國之間諜，禁止教士與修女對外之聯繫，唯有日本籍之神職人員可以自由往來。⁷⁶監禁的狀況在各地有程度上的差異，譬如台北便較台南為嚴厲，一直要到一位教友擔任台北的主管後，此地的教士才稍有自由，但仍須受到管制。⁷⁷這樣戰時的疑懼眼光，其實嚴格說來，與清朝時期沒有太多的不同，然而針對這種不信任的解決方法上卻有極大的差異。清治時期，因為中國沒有正視宗教在國家之位置，所以每逢有亂，能夠為天主教向政府調解擔保的，往往只能是外國的商人，而絕少教內的人士。但是在日據之此時，宗教早已成為國家之中合理的存在，因之天主教往往能透過一些獲得日人信任的教內人士來免除疑忌，而無須借助第三者的協助。

日本政府另外在戰時成立「基督教奉公會」⁷⁸等組織，試圖在戰時整合宗教的力量以為國家所用。由上皆可見日本國家權力在戰時的極度擴張，政治與宗教本來疏離的狀況也因此前所未有的靠近。宗教卻在這時候被政府賦予了特定的角色，作為為軍國主義服務的工具。

當時在台灣的西班牙傳教士對於第二次大戰後期美國轟炸台灣的看法如下：

有人認為這樣大規模的轟炸，很不合人道且並非必要。對這觀點，我卻不敢苟同。〔因〕為上述幾個城市，集結了大批日軍，唯有摧毀他們的戰鬥力，才能早日結束戰爭。⁷⁹

轟炸的結果是台北大稻埕的蓬萊町天主堂慘遭炸毀，住在其間的神父們飽受驚嚇，幸好沒有傷亡。戰爭期間行動不便，教務之發展不多，唯一可以提到的是里脇監牧與涂敏正神父的合作，開啟了建設地方教會的契機，然而基礎未穩，道明會神父在兩年後就又控制了台灣的天主教會，不過很快地，隨著國共內戰的爆發，國民政府遷台，大量傳教士及神職陸續抵台，台灣天主教會又進入了另一階段。

參、日據時期台灣天主教的特點與限制

我發現生活在這兒很愉快，沒有不幸的意外和抵制，一切顯得非常平靜。⁸⁰但我能說，一八五九年的台灣，一定不是我們今天所知的寶島——那麼平靜、活力充沛、物產豐饒。那時的台灣和今日大不相同，對早期傳教士來說，是一片滿佈野獸的莽林，未開發的地方，島民很魯莽，時

74 關於里脇淺次郎生平及歷史角色，參見本報告參考文獻之學術論文部分。

75 黃德寬譯，前揭書，頁 200。

76 黃德寬譯，前揭書，頁 201。

77 此人應該就是當時在靜修女中當老師的大國(Okuni)督，見黃德寬，前揭書，頁 202。

78 〈標題:台灣教會各界成立戰時體制〉，《日本新聞》，昭和十七年(1942)八月九日，第 872 號

79 黃德寬譯，前揭書，〔戴剛德，二次大戰期間的台灣天主教〕，頁 203。

80 黃德寬譯，前揭書，〔一九二八，台灣教務報告〕，頁 186。

有騷亂和革命，彼此攻擊或反叛統治者。雖然滿清政府擁有全島，官吏有皇帝的教旨和武裝的兵勇，仍無法控制本地居民，有效地依法律施政。飄揚著的清朝旗幟，並非權力的象徵，只是告訴大家，這個島已有主人而已；人民不尊重這個旗幟，仍然任意行事。

但自郭神父離台到一八九五年日軍佔領本島的那時段時間，傳教進度又緩慢下來。因素很多，時局動盪不安是個問題，更別說人力缺乏和方法不足了。日本據台後，社會顯得平靜，人員也加倍了，然而依舊進度緩慢。我認為原因在於本地人的迷信，固執和偶像崇拜，另一方面仍是資源的匱乏和生活的不便，雖然我們人力增加了，但仍然沒有合適的傳教方法和工具，去擴展宣傳福音的工作。⁸¹

相較於清治時期，天主教在日據時代的發展，大體而言尚稱平順。其中更有幾點有利的條件，尤為過去所不能及。一、日本作為一個現代國家，它對領土的控制遠勝於清朝，因之社會安定，少有騷亂〔除了佔領初期〕，有利於傳教之發展。過去教會夾雜於分類械鬥中的窘境，在這一時期幾乎不見。二、日本人對於天主教教義之理解較高，少數日人自身即為教徒，在溝通方面較無問題。再加上日人對西方文化傾慕的態度，教士的社會地位因此也較清代為高。三、教會自身在傳道員的培訓、教士語言的學習、與教區的發展上都較過去進步。

儘管天主教有上述的成績，但是一種難以掩蓋的沉悶之情，卻隱隱的浮現。這可能與下列幾個不利於傳教的因素相關。一、固然日本政府強大的公權力維持了社會的安定，但於此同時也侵奪了教會部份的權力。譬如仲裁地方事務的機會。而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民眾入教的動機。二、教會本身在傳教人力及財力資源的欠缺。尤其相對於基督教在醫療、教育上快速的發展，與傳教技術的先進，天主教教士唯一可憑恃的，似乎只剩下不計艱辛、深入民間的精神。三、台灣民間的信仰畢竟仍然深厚，尤其是這種信仰與地緣關係結合成的祭祀圈，往往形成牢固的宗親網絡，使人很難打破，而單獨出來接受天主教的信仰。在整個社會底層鮮少變化的情勢下，道明會終究難有突破性的發展，而在日治後期，更因為日本政治的軍國主義及神道崇拜，對於基督宗教壓制更甚，使得天主教的傳教事業受到很大的負面影響。

最終，天主教在此一時期的發展所顯示的，其實也是宗教在面臨現代國家時無可避免的困境。在一個從社會安全到價值系統皆與國家政府緊緊相繫的時代裡，宗教要如何重拾過去的活力，成為最大的問題。⁸²儘管宗教透過其他的手段諸如傳道員的訓練、佈道大會的推行甚至於孤兒院的設置來適應這個夾縫中的新局。但畢竟那個「一個王國、一個君主、一個宗教」的時代已如明日黃花，天主教不可能像中古時期的歐洲所具有的普遍性的影響力，在台灣至多只能算是一個邊緣性的宗教。

學者指出日人統治台灣期間，對於教會產生了兩個重大影響，一是日本統治政策乃為原住民之歸依基督宗教作了很重要的預備工作，這不只是指較具叛逆性的泰雅族及賽德克族，而且包含全部的山地原住民；其二則是日本在 1920 年代

81 黃德寬譯，前揭書，〔一九二八，台灣教務報告〕，頁 188~190。

82 The Sacred Canopy by Peter L. Berger, Reprinted by permission of Doubleday & Company, Inc, Also reprinted by permission of Faber and Faber, Ltd., from *The Sacred of Religion* by Peter Berger. 轉引於吳潛誠編校，《文化與社會》〔台北：立緒，1997〕。

開始之宗教策略，配合軍國主義，引進神道及迫害基督宗教，導致當時的許多危機⁸³，也使得日本統治初期所帶來的社會秩序及在現代國家體制下宗教正常發展的機會因而結束。

83 Ralph Covell, *op. cit.*, p. 104.

附錄一，1895~1949 在台神父名錄

1895	李嘉祿	何安慈	黎克勉	高恆德	白若瑟	良加略	鐘利默													
1896	李嘉祿	何安慈	黎克勉	高恆德	白若瑟	良加略	鐘利默													
1897	李嘉祿	何安慈	黎克勉	高恆德	白若瑟	良加略	鐘利默													
1898	李嘉祿	何安慈	黎克勉	高恆德	白若瑟	洪羅烈	鐘利默		馬守仁	良伯鐸	巴多瑪									
1899	李嘉祿	何安慈	黎克勉	高恆德	白若瑟	洪羅烈	鐘利默		馬守仁	良伯鐸	巴多瑪									
1900	李嘉祿	何安慈	黎克勉	高恆德	白若瑟	洪羅烈	鐘利默		馬守仁	良伯鐸	巴多瑪									
1901	李嘉祿	何安慈		高恆德	白若瑟	洪羅烈	鐘利默		馬守仁	良伯鐸	巴多瑪									
1902	李嘉祿	何安慈	明表達	高恆德	白若瑟	洪羅烈	鐘利默	杜默爾	馬守仁	良伯鐸	巴多瑪		吳達查							
1903	李嘉祿	何安慈	明表達	高恆德	白若瑟	洪羅烈	林啟明	杜默爾	馬守仁	良伯鐸	巴多瑪	楊多默	吳達查	鐘利默						
1904	閃佑	何安	明表	高恆	白若	洪羅	林啟	杜默	馬守	良伯	巴多瑪	楊多	吳達	白斐						

	道	慈	達	德	瑟	烈	明	爾	仁	鐸		默	查	理						
1905	閃佑道	何安慈	明表達	高恆德		洪羅烈	林啟明	杜默爾	馬守仁	良伯鐸	巴多瑪	楊多默	吳達查	白斐理						
1906	閃佑道		明表達	高恆德		洪羅烈	林啟明	杜默爾	馬守仁	良伯鐸	巴多瑪	楊多默	吳達查	白斐理						
1907	閃佑道		明表達	高恆德		洪羅烈	林啟明	杜默爾	馬守仁	良伯鐸	巴多瑪	楊多默	吳達查	白斐理						
1908	閃佑道		明表達	高恆德		洪羅烈	林啟明	杜默爾	馬守仁		巴多瑪	楊多默	吳達查	白斐理						
1909	閃佑道		明表達	高恆德		洪羅烈	林啟明	杜默爾	馬守仁		巴多瑪	楊多默	吳達查	白斐理						
1910	閃佑道	包神父	明表達	高恆德		洪羅烈	林啟明	杜默爾	馬守仁		巴多瑪	楊多默	吳達查	白斐理						
1911	閃佑道	包神父	明表達	高恆德		洪羅烈	林啟明	杜默爾	馬守仁		巴多瑪	楊多默	吳達查	白斐理						
1912	閃佑道	包神父	明表達	高恆德		洪羅烈	林啟明	杜默爾	馬守仁			楊多默	吳達查	白斐理						
1913	閃佑道		明表達	高恆德		洪羅烈	林啟明	杜默爾	馬守仁			楊多默	吳達查	白斐理						
1914	閃佑道		明表達	高恆德	余智謀	洪羅烈	林啟明	杜默爾	馬守仁			楊多默	吳達查	白斐理						
1915	閃佑道		明表達	高恆德	余智	洪羅烈	林啟明	杜默爾	馬守仁				吳達查	白斐理						

	道		達	德	謀	烈	明	爾	仁			查	理						
1916	閃佑道	顏若瑟	明表達	高恆德	余智謀	洪羅烈	林啟明	杜默爾	馬守仁		巴多瑪	吳達查	白斐理						
1917	閃佑道	顏若瑟	明表達	高恆德	余智謀	洪羅烈	林啟明	杜默爾			巴多瑪	吳達查	白斐理	孫繼慈					
1918	閃佑道		明表達	高恆德	余智謀	洪羅烈	林啟明	杜默爾	蘇以道		巴多瑪	吳達查	白斐理	孫繼慈					
1919	閃佑道		明表達	高恆德	余智謀	洪羅烈	林啟明	杜默爾	蘇以道		巴多瑪	吳達查	白斐理	孫繼慈					
1920	閃佑道		明表達	高恆德	余智謀	洪羅烈	林啟明	杜默爾	蘇以道		巴多瑪	吳達查	白斐理	孫繼慈					
1921	良雅師	楊多默	明表達	高恆德	余智謀	洪羅烈		杜默爾	蘇以道		巴多瑪	吳達查	白斐理	孫繼慈					
1922	良雅師	楊多默	明表達	高恆德	余智謀	洪羅烈		杜默爾	蘇以道		巴多瑪	吳達查	白斐理	孫繼慈					
1923	良雅師	楊多默	明表達	高恆德	余智謀	洪羅烈	德增輝	杜默爾	蘇以道		巴多瑪	吳達查	白斐理	孫繼慈					
1924	良雅師	楊多默	明表達	高恆德	李安師	洪羅烈	德增輝	杜默爾	蘇以道		巴多瑪	吳達查	白斐理	孫繼慈					
1925	良雅師	楊多默	明表達	高恆德	李安師	洪羅烈	德增輝	杜默爾	蘇以道		巴多瑪	吳達查	白斐理	孫繼慈					
1926	良雅師	楊多默	明表達	高恆德	李安師	洪羅烈	德增輝	杜默爾	蘇以道		巴多瑪	吳達查	白斐理	孫繼慈					

	師	默	達	德	師	烈	輝	爾	道				查	理	慈						
1927	良雅師	楊多默	明表達	高恆德	李安師	洪羅烈	德增輝	杜默爾	蘇以道	二神吉德	巴多瑪		吳達查	白斐理	孫繼慈						
1928	良雅師	楊多默	明表達	高恆德	李安師	洪羅烈	德增輝	杜默爾	蘇以道	二神吉德	巴多瑪		吳達查	白斐理	孫繼慈						
1929	良雅師	楊多默		高恆德	李安師	洪羅烈	德增輝	杜默爾	蘇以道	二神吉德	巴多瑪		吳達查	白斐理	孫繼慈	陳若瑟					
1930	良雅師	楊多默	若瑟	高恆德	李安師	洪羅烈	德增輝	杜默爾	蘇以道				吳達查	白斐理	孫繼慈	陳若瑟	馬西略				
1931	良雅師	楊多默	若瑟	高恆德	李安師	洪羅烈	德增輝	杜默爾	蘇以道				吳達查	白斐理	孫繼慈	陳若瑟	馬西略				
1932	良雅師	楊多默	若瑟	高恆德	李安師	洪羅烈	德增輝	杜默爾	蘇以道				吳達查	白斐理	孫繼慈	陳若瑟	馬西略				
1933	良雅師	楊多默	若瑟		李安師	洪羅烈	德增輝	杜默爾	蘇以道				吳達查	白斐理	孫繼慈	陳若瑟	馬西略	羅真道			
1934	良雅師	楊多默	若瑟		李安師	洪羅烈	德增輝	杜默爾	蘇以道			戴剛德	吳達查	白斐理	孫繼慈	陳若瑟	馬西略	羅真道	包德良		
1935	良雅師	楊多默	若瑟		李安師	洪羅烈	德增輝	杜默爾	蘇以道			戴剛德	吳達查	白斐理	孫繼慈	陳若瑟	馬西略	羅真道	包德良		
1936	良雅	楊多	若瑟		李安		德增	杜默	蘇以			戴剛	吳達	白斐	孫繼	陳若	馬西	羅真	包德		

	師	默			師		輝	爾	道			德	查	理	慈	瑟	略	道	良		
1937	良雅師	楊多默	若瑟	高恆德	李安師		德增輝	杜默爾	蘇以道	涂敏正		戴剛德	吳達查	白斐理	孫繼慈	陳若瑟	馬西略	羅真道	包德良		
1938	良雅師	楊多默	若瑟	高恆德	李安師		德增輝	杜默爾	蘇以道	涂敏正	巴多瑪	戴剛德	吳達查	白斐理	孫繼慈	陳若瑟	馬西略	羅真道	包德良		
1939	良雅師	楊多默	若瑟	高恆德	李安師	洪羅烈		杜默爾	蘇以道	涂敏正	巴多瑪	戴剛德	吳達查	白斐理	孫繼慈	陳若瑟	馬西略	羅真道	包德良		Orencio Pérez
1940	良雅師	楊多默	若瑟	高恆德		洪羅烈		杜默爾	蘇以道	涂敏正	巴多瑪	戴剛德	吳達查	白斐理	孫繼慈	陳若瑟	馬西略	羅真道	包德良		
1941	良雅師	楊多默	若瑟	高恆德		洪羅烈	岩永神父+	杜默爾	蘇以道	里脇淺次郎	巴多瑪	戴剛德	吳達查	白斐理	孫繼慈	陳若瑟	馬西略	羅真道	包德良		涂敏正
1942	良雅師	楊多默	若瑟	高恆德		洪羅烈		杜默爾	蘇以道	里脇淺次郎	巴多瑪	戴剛德	吳達查	白斐理	孫繼慈	陳若瑟	馬西略	羅真道	包德良	古川重吉	涂敏正
1943	良雅師	楊多默	若瑟	高恆德		洪羅烈		杜默爾	蘇以道	里脇淺次郎	巴多瑪	戴剛德	吳達查	白斐理	孫繼慈	陳若瑟	馬西略	羅真道	包德良	古川重吉	涂敏正
1944	良雅師	楊多默	若瑟	高恆德	李天一	洪羅烈	涂敏正	杜默爾	蘇以道	里脇淺次郎	巴多瑪	戴剛德	吳達查	白斐理	孫繼慈	陳若瑟	馬西略	羅真道	包德良	古川重吉	李維添
1945	良雅師	楊多默	若瑟	高恆德	李天一	洪羅烈	涂敏正	杜默爾	蘇以道	里脇淺次郎	巴多瑪	戴剛德	吳達查	白斐理	孫繼慈	陳若瑟	馬西略	羅真道	包德良	古川重吉	李維添

	師	默		德	一	烈	正	爾	道	淺次 郎		德	查	理	慈	瑟	略	道	良	重吉	
1946	良雅 師	楊多 默		高恆 德	李天 一		涂敏 正	杜默 爾	蘇以 道	里脇 淺次 郎	巴多瑪	戴剛 德	吳達 查	白斐 理	孫繼 慈	陳若 瑟	馬西 略	羅真 道	包德 良	古川 重吉	李惟添
1947	良雅 師	楊多 默			李天 一		德增 輝	杜默 爾	蘇以 道	涂敏 正	巴多瑪	戴剛 德	吳達 查	白斐 理	孫繼 慈	陳若 瑟	馬西 略	羅真 道	包德 良		李惟添
1948	良雅 師	楊多 默			李天 一		德增 輝	杜默 爾	蘇以 道	涂敏 正	巴多瑪	戴剛 德	吳達 查	白斐 理	孫繼 慈	陳若 瑟	馬西 略	羅真 道	包德 良		李惟添
1949	良雅 師				李天 一		德增 輝	杜默 爾	蘇以 道		巴多瑪	戴剛 德	吳達 查	白斐 理	孫繼 慈	陳若 瑟	馬西 略	羅真 道	包德 良		李惟添

參考資料：

一、Richardson, William. J. *Christianity in Taiwan under Japanese Rule*. St. John's University, New York, 1971. Ph. D. Dissertation. 231 pp.

二、江傳德編纂，《天主教在台灣》，高雄：善導週刊社，1992。

三、Eladio Neira O.P. et. al. ed., *Misioneros Dominicanos en el Extremo Oriente 1836-1940*, Manil, Filipinas 2000.

說明：

一、表中林啟明神父即林茂才神父。

二、由於資料未提供，本表未收錄之神父計有 Cástor Osorno、Felipe Castilla Vicente、Agapito Villalba、Emilio Calderón、Gonzalo Alvarez、等五位。

中文譯名參考黃德寬譯，《天主教在台開教史，道明會士的百年耕耘》，臺北：光啟出版社，1991。江傳德編纂，《天主教在台灣》，高雄：善導週刊社，1992。

附錄二，外籍傳教士中外名字對照表

	中文名	外文名
1	李嘉祿	Romon Colomer
2	何安慈	Celedonio Arranz
3	黎克勉	Isidoro Clemente
4	高恆德	Francisco Giner
5	白若瑟	Jose M. Alvarez
6	良加略	Leon Gallo
7	鐘利默	Tomas Masoliver
8	馬守仁	Manuel Prat
9	巴多瑪	Tomas Pascual
10	洪羅烈	Angel Rodriguez
11	杜墨爾	Toribio Toval
12	良伯鐸	Prdro Prat
13	吳達查	Bonaventura Gordaliza
14	明表達	Juan Beobide
15	林啟明	Clemente Fernandez
16	白斐理	Felipe Villarrubia
17	閃佑道	Justo Sasiam
18	包神父	Faustino Rodriguez
19	余智謀	Eutimio Perez
20	顏若瑟	Jose Gavilian
21	孫繼慈	Felix Sanches
22	蘇以道	Gabriel Ormaechea
23	良雅師	Julian Villegas
24	德增輝	Vicente Prada
25	李安師	Elias Fernandez
26	陳若瑟	Jose M. Arregui
27	馬西略	Marcelino Delgado
28	若瑟	Jose Villaberda
29	羅真道	Ursino Gonzalo
30	戴剛德	Constantino Montero
31	包德良	Faustino Saez
32	二神吉德	Pio Futagami
33	里脇淺次郎	Satowaki Asajiro
34	岩永神父	
34	古川重吉(禎三)	Furukawa Shigeyoshi

說明：本表中外名，以黃德寬譯《天主教在台開教史，道明會士的百年耕耘》為主，江傳德編纂《天主教在台灣》為輔。

附圖一



日治時期台灣教會堂及傳道所分佈圖

近代臺灣天主教史的三階段研究— 第三階段：戰後台灣天主教的發展[1945—1965]

壹、前言

天主教自 1859 年二度入台之後，經歷過三次政權的更換，包括從入台之後至 1895 年的晚清時期，1895 年到 1945 年的日本殖民統治時期，以及 1945 年之後的國民政府時期。面對每一次政權更替所帶來的新局面，台灣天主教會在每個階段都曾有過相關之反應與調整，因而在各個階段呈現出不同的特色與樣貌。其中，反應最大、調整最多、特色樣貌也最顯明的堪稱戰後時期。1945 年日本戰敗臺灣回歸中華民國，四年後 1949 年大陸政權易手中共，國民政府撤退來台，戰後台灣的天主教在此政治因素影響下，大量的中國大陸天主教神職人員及修會團體遷台，讓臺灣天主教其發展產生了巨大變化，因而走出一條與晚清和日據時期都截然不同的路線。戰後台灣天主教的發展歷史，前人研究成果為社會學、人類學的通論與或是針對單獨議題之研究¹，針對歷史性之研究則尚缺乏整體的、通論性之研究成果²；目前相關的研究成果集中於碩士論文，議題則較集中於探討單一堂區³或單一議題⁴，本文的寫作目的，即是希望能夠透過相關資料的耙梳，為戰後台灣天主教的面貌歷史，整理出一個概略的輪廓，以及一些值得注目的特色，為台灣天主教史填上部分空缺。研究的時間範圍，則預定從戰後 1945 年到 1965 年前後。這段二十年左右的時間，曾被教會人士分為「速成時期」(1949—1960)和「鞏固時期」(1961—1971)。⁵本文則想以戰後大陸天主教會的遷台前後，作為討論分野，分述台灣天主教會的發展情況，以凸顯遷台之前後的重大轉變。

- 1 整體性研究如瞿海源〈臺灣地區天主教發展趨勢之研究〉、宋光宇〈試析四十年來台灣宗教發展情形〉，《台灣經驗(二)——社會文化篇》，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4，頁 175-224。(當中含天主教)、單獨議題如郭文般〈台灣天主教的政教關係〉(1999，國科會專題研究計劃)。還有就是人物傳記及外交史料如輔大史料中心陳方中〈于斌樞機傳〉臺北：台灣商務，2001；陳方中、吳俊德編，《中梵外交關係六十年史料彙編》，臺北：輔仁大學天主教史料中心，2002。
- 2 早期如的董顯光 1960，部分章節討論天主教 1950 年代之發展。近期的研究成果如原住民研究：丁立偉、詹婦慧、孫大川合著，《活力教會，天主教在台灣原住民世界的過去、現在、未來》，台北光啟出版社，2004，勾勒出部落教會之發展。
- 3 如楊嘉欽，〈高雄前金天主教聚落研究〉，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8。簡鴻模，《祖靈與天主—眉溪天主堂傳教史初探》，台北：輔仁大學，2002。楊惠娥，〈天主教在台灣中部之傳教—以羅厝教會為例〉，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張欣儀，〈天主教與地方社群關係之研究—以桃園地區為例〉，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簡鴻模等，《當達悟遇上基督》，台北：輔仁大學出版社，2004。黃子寧，〈天主教在屏東萬金的生根發展(1861—1962)〉，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其他論文參見本報告第一部分「文獻探討」。
- 4 如溫順天神父(馬利諾會在華傳教史)台大歷史系碩士論文。其中包括 1949 年在台發展部分。黃照明，〈戰後台灣天主教的本土化—以蘭陽舞蹈團為例〉，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
- 5 毛振翔，〈七十年來的中國天主教史〉，收於氏著，《我這半生》(台北：東大，1982.9)，頁 234。

貳、1945—1948年：恢復時期

1945年到1948年這一段短短的期間，筆者稱之為台灣天主教的「恢復時期」，當時的教務分別是由台籍神父涂敏正和西班牙籍道明會神父陳若瑟（Jose Arregui）帶領。進入戰爭時期後，日本政府對於外籍人士的顧忌防範，隨著戰況激烈程度日漸上揚，在1941年，首先下令所有外國人離開高雄和基隆等要塞地區⁶。並且實施「宗教團體法」，規定日本領土裡原本由外國人擔任教區長的地區，全部改由日本的神職人員接任。所以在1941年3月20日，發布命令台灣教區長改由出身長崎的日本神父里脇淺次郎接任，取代原先的教區長—西班牙籍的道明會神父楊多默（Thomas de la Hoz）。⁷緊接著在珍珠港事變爆發後，又軟禁外籍傳教士和修女，限制其行動自由，所以原屬於道明會的傳教權力和教務，轉移到日本籍的監牧里脇淺次郎和當時僅有的台籍神父涂敏正手中。1945年日本戰敗後，里脇淺次郎在1946年返回日本前，將台灣教務委任給涂敏正，涂敏正神父成為台灣的代理監牧，當時整個台灣監牧區的經濟情況，頗為困窘：

1946年5月2日 隔日台灣教務正式余代辦統治。隔日查帳，只有庫存金五百八十五元五角，是全教區的財產。為了經濟問題，日夜奔波，買收台北天國牧場貳萬元正。

1946年5月4日 因接任後教區經濟困難，無法可以維持，以致憂勞過多，致遭肝病大作月餘日，幾成不治。

1946年5月20日 于斌寄來救濟金四萬元。

1946年7月10日 開設教區援助會，聯絡全台教友經濟之援助。

1946年7月12日 經濟困難，修道女解散，自由生活。

1946年8月中 經了幾次交涉，即得到台灣救濟分署之同情，救濟了多少物資。

1946年8月中秋 得了省參議會援助台幣壹萬元正。

1946年8月20日 台灣教區財產前為外國人及日本人的名義，幾為政府沒收，後經余等極力交涉抗議才收回，變更余之名義。⁸

透過其日記，可以看到涂敏正除了開設教區援助會向教友募款外，又陸陸續續向救濟分署、省參議會和南京總主教于斌等求援，並運用其國籍身份，免於教會財產被沒收的命運。慘澹支持二年之後，1948年3月，教廷任命道明會神父陳若瑟擔任台灣監牧區第四任監牧，⁹情況依然辛苦。在涂敏正和陳若瑟管理台灣監牧區的時期，台灣天主教的教勢，基本上如同戰後的台灣社會，處於蕭條疲憊、發展停滯的狀態：

6 涂敏正神父日記未刊稿。

7 古偉瀛，〈台灣天主教史上的里脇淺次郎與涂敏正〉，收錄於《20世紀台灣歷史與人物—第六屆中華民國史專題論文集》（台北：國史館，2002.12），頁19。

8 〈涂敏正神父日記〉未刊稿。

9 江傳德，《天主教在台灣》（高雄市：善導週刊，1992.12），頁318。

陳(若瑟)神父首先碰到的就是經濟問題。要推動傳教工作 必須有大筆款項,但他卻一無所有。所以他所能依靠的傳教師,人數大為減少。

戰後的幾年,台灣老百姓生活很窮苦,必須勤工作才能維生。由於傳教師薪水微薄,所以很少有基督徒願意留任。少數幾位堅持崗位的,亦只是當作副業,以補貼他們的收入。

在這種情形之下,必然無法真正推動傳教工作。每個人都知道,傳教工作必須是專職的,如果只是利用零碎的時間或空暇,不可能有好結果。

由於經濟如此拮据,使得陳神父心有餘力不足,實在很可惜。¹⁰

然而值得一提的是,雖然這時期為經濟缺乏所困,天主教卻在此時成立了若瑟小修院;在台灣建立一間正式的修道院,培養本地的神職人員¹¹,是涂敏正的信念¹²,他不畏經濟上的困難,在1946年9月1日,利用原先高雄孤兒院的院址,成立台灣第一所小修院,首先招收學生12名,自己擔任校長。¹³涂敏正之後,接任的陳若瑟又籌備將小修院搬往高雄五塊厝,並在五塊厝建築校舍,於1949年6月10日落成,命名為「聖若瑟修院」。¹⁴在1949年中國大陸大量神職人員撤遷來台以前,道明會開教最早的前金堂區僅培育出一位本地神父—李惟添,而開教第二早的萬金堂區則還沒有培育出本地司鐸,天主教二度入台傳教近九十年的歲月裡,台灣僅僅培育出涂敏正、李天一和李惟添三位本籍神父,而他們都是遠至廈門或東京求學,方能接受完整的神學教育。這是作為制度化宗教的天主教會的特質:很難在短時間內於新傳教區開始進行本地神職人員的培植;另一方面,也暴露出在傳教區工作的修會受舊式的思想限制,對於培養本地人士擔任神職的不積極¹⁵。然而,建立正式的修道院進行人才培植對於傳教工作的重要性是連傳教士也不否認的:

由於台灣缺乏本地神父,所以修道院是迫切需要的。本地神父瞭解同胞的需要,精通本地語言,他們傳教應該比西班牙神父更有效果。道明會傳教士對台灣人來說,畢竟是外國人。¹⁶

從逐漸意識、到開始積極培養本地神職,是天主教在台灣傳教近百年後新的發展方向¹⁷。在此之前,台灣天主教教勢成長緩步:截至1940年的統計,台灣監

10 黃德寬譯,《天主教在臺開教記—道明會士的百年耕耘》(台北:光啟,1991.5),頁209-210。

11 天主教會中司鐸分為兩種:(1)由教區培植不屬修會者,稱教區司鐸 secular clergy 或在俗司鐸 secular clergy。(2)由修會培植者,稱修(入)會司鐸或在會司鐸 regular clergy。狄剛等編輯,《天主教英漢袖珍辭典》(台北:天主教恆毅月刊,2003),頁398。

12 1946年2月18日,田耕莘在羅馬聖伯多祿大教堂接受樞機榮銜。同年4月11日,田耕莘被任命為北平總主教,同年中國天主教聖統制正式建立;當時天主教會內國籍神職人員普遍的信念是亟欲培植本國籍的教區神職人員,建立起真正「本地化」的教會。

13 〈涂敏正神父日記〉未刊稿。

14 江傳德,前揭書,頁460。

15 古偉瀛,〈十九世紀台灣天主教(1859—1895)—策略及發展〉收錄於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系「台大歷史學報編輯委員會」編,《台大歷史學報》(台大: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系,1998.12),頁116。

16 黃德寬譯,前揭書,頁210。

17 里脇淺次郎培育李天一、李惟添成為神父,在1946年離台前將台灣教務交付涂敏正而非西班牙傳教士;涂敏正接辦台灣教務後成立修道院培育本地。神職身分的差異突顯出對於傳教工

牧區共有本堂區 14 處，分堂 15 處，傳教所 22 所，教友 9,737 人。¹⁸

參、1949—1965 年：巨變時期

台灣天主教由道明會一元領導的局面¹⁹，從 1949 年起，被完全打破，外在政治局勢的變化，使得台灣天主教的發展，由外而內，都產生了巨大變化，姑且名之為「巨變時期」。所謂的外在政治局勢變化，指的就是 1949 年之後，國民政府因在國共內戰中失敗，轉而撤退來台的情勢，當時來到台灣的大陸人民，估計超過一百萬人。除了軍隊、政府人員之外，原本在大陸各教區的眾多神父修士、修會的傳教士和修女，也陸續遷移來到台灣。中共的宗教政策，基本上將宗教看做人民的鴉片，其中天主教更被視為帝國主義的反共工具，立場本就尷尬。²⁰1950 年 5 月，政務院總理周恩來在接見基督教界的領袖時，一方面表示中國的宗教團體應該發起「反帝愛國」運動，切斷與帝國主義的任何關係，以為新中國服務，另一方面則將宗教界視為政府的統戰對象，強調在政治上可以彼此合作。這兩個指示成為中共建國初期的宗教政策主軸，而 1950 年的韓戰，更讓中共以「抗美援朝」為口號，鼓動國內反美情緒，連帶指責基督宗教與帝國主義的關連，加速對教會團體的控制，教會學校和教會醫院陸續由政府接辦，大批外國傳教士也在這種壓力下離開中國，據估計，從 1948 年底已開始有傳教士撤離，到 1951 年初，有 3000 多位傳教士離華，留在中國的只剩下 400 至 500 名，再到 1952 年底，大部分外國傳教士都離開了中國。²¹

「由於大陸淪入中共之手，鐵幕低垂之下，不僅不許基督教的傳教士入大陸宣教，並且還把原本在大陸宣教的傳教士們都趕了出來，此批被中共掃地出門的各國傳教士之宣教使命仍在，大陸傳教之門既然緊閉，只有來到台灣與港、澳地區。」²²離開中國大陸的國籍神職人員，部分離散至全球的華人社群中工作，絕大部份則轉往台灣工作；傳教修會在中國大陸關閉傳教之門後，也多轉往台灣與港澳地區繼續工作。²³大批神職人員與修女的到來，開啟了天主教在台灣的全新局面。以下將分從遷入台灣的天主教人與教會組織的建立、傳教工作、社會事業發展、美援物資的發放、對中國大陸天主教會使命(mission)的延續等方面，對「巨變時期」台灣天主教內部的各項轉變與發展進行討論。這些轉變與發展對於戰後的台灣天主教而言，是決定教勢發展的關鍵因素，也是此段歷史的突出特色。

遷入台灣的天主教人與教會組織的建立

1949 年前後大陸人士遷台的情景，道明會在 1949 年的台灣教務報告中即有注意，道明會針對大陸教友的語言問題，提出需要中國神父的看法：

作的不同態度：里脇淺次郎與涂敏正均為「教區司鐸」。

18 江傳德，前揭書，頁 310-313。

19 這裡的「一元領導」單指由男性神職人員對教區治理的「神權」：在日據時代，「聖道明傳教修女會」(Missionary Sisters of St. Dominic, OP) 也已進入台灣，進行輔助傳教之工作。

20 趙天恩、莊婉芳，《當代中國基督教發展史(1949-1997)》(台北：中國福音會出版部，1997)，頁 13。

21 趙天恩、莊婉芳，前揭書，頁 14-29。

22 查時傑，〈四十年來的台灣基督教會〉，收入於《民國基督教史論文集》(台北：宇宙光，1993)，頁 265。

23 也有部分傳教士轉往鄰近中國的其他國家繼續傳教工作，如日本即為一例。

監牧（陳若瑟）的另一個問題就是，不斷湧進台灣的大陸同胞，由於共匪佔據整個大陸，他們不得不離鄉背井逃難，這些同胞中有不少教友，必須有人照顧他們的精神生活。

不幸的是，彼此卻無法交談。因為他們大都來自大陸北方，所說的話，傳教士無法瞭解。除非能有中國神父，否則無法克服語言的障礙。

我們希望能有更多的中國神父，加入本地聖職行列。大陸的局勢似乎愈來愈惡劣，那邊的神父們都將避難來台，等候更好的時機重返大陸。²⁴

面對因戰亂避難來台的大陸教友，其語言和文化上的隔閡等問題，成為當時在台灣十數名西班牙籍道明會士與僅有的三名台籍神父所不能解決的問題。；陳若瑟監牧帶領下的在台道明會選擇以開放的態度，歡迎大陸修會的神職人員來台，共同解決大陸教友的牧養問題。

根據紀錄，在國民政府遷台之前，大陸的天主教事業，統計如下：

教育事業：上海震旦大學暨震旦女子文理學院、北京輔仁大學、天津津沽大學；高、初中共有 128 所；高小 450 所、初小 2,298 所。

社會事業：孤兒院 355 間；醫院、診療所、安老院共 1,154 間。

出版事業：「益世報」在六大城市出版，即北平版、天津版、上海版、南京版、西安版、重慶版。北平上智編譯館，各地周刊和月刊 22 種，印書館 16 處。

宗教人事：全國有 20 教省，設 20 位總主教；84 個教區，設 84 位主教；36 個監牧區，設 36 位監牧。教省中有 3 位國籍總主教，17 位外籍總主教；教區中有 28 位國籍主教，56 位外籍主教；監牧區中 36 位都是外籍監牧。司鐸總數為 5,348 位，其中國籍主教 2,348 位，外籍司鐸 3,000 位。修士共有 1304 位，其中國籍修士 728 位，外籍修士 576 位。修女共有 6,456 位，其中國籍修女 4,299 位，國籍修女 2157 位。大修院 16 座、小修院 104 座。教友人數約 400 萬人，教堂共有 2298 座。²⁵

由上可知中國大陸天主教神職人員的數目之龐大，

在戰亂中最早來台灣叩門的大陸天主教人員，包含多位來自各教區的逃難教區神職²⁶，依據江傳德的記載，當時陸續抵台的有下列諸位：

楊紹南	1948/4/29
楊慕時	1949/11
包萬才	1948/12/14
侯鴻祐	1948/12/14

24 黃德寬譯，前揭書，頁 210。

25 毛振翔，前引文，頁 246。

26 江傳德，前揭書，頁 425-441；頁 851-866。

郭若石	1949/1/5
蓋夏姆姆	1949
方豪	1949/2/14
齊見賢	1949
龔士榮	1949/5/22
趙光啟	1949/5/22
鄭無我	1949/5/22
王步融	1949/5/22
吳至德	1949/5/22
錢公博	1949/5/22
于斌	1949/5/28
歐陽徹予	1949
倪幼民	1949
丁逸民	1949
姚宗鑑	1949
馮盛泉	1949
齊佐漢	1949
華克施	1951/1
顧育德	1951/1
司密斯	1951/1
陸理德	1952/2/6
藍煜士	1952/3/21
羅德信	1952/4
盧沛揚	1952/5/23
德學智	1952/7/31
蘇以道	1952
苗克聖	1952

甘慎言	1952
高方濟	1952
韓德勝	1952(?)
杜明德	1953/2/23
周道南	1953/5/9
薛仁堪	1953/7/27
冉守謙	1953
賈愛賓	1954/7
盧萬德	1954/7
郭世光	1954/7
岳峙淵	1954/8/6
雷新基	1955
文懷德	1955
袁士林	1955
葛維德	1955
巴昌明	1955
王峻德	1959

在修會部份，則包括主徒會 (Congr. Discipulorum Domini, CDD)、聖母聖心修女會 (Missionariae Smi Cordis Mariae-Chinese Congr, CSCM)、玫瑰道明修女會 (Dominican Sisters of the Holy Rosary, OP) 和聖母無原罪傳教修女會 (Franciscan Miss.Sisters of the Immaculate Conception, SMIC) 等。²⁷

為了因應來台神職人員的急速增加，教廷首先決議在 1950 年 1 月 13 日，將原先的台灣監牧區，一分為二為高雄、臺北兩個監牧區，南部的高雄監牧區仍由道明會陳若瑟監牧負責，北部的臺北監牧區則交由國籍主徒會會士郭若石管理。²⁸ 臺北監牧區的管轄範圍，涵蓋西甲溪以北的整個地區，約 12,000 平方公里，人口總數 200 萬。高雄監牧區則包括西甲溪以南，大約三分之二台灣的面積地區，人口總數約在 400 萬左右。²⁹ 新監牧區的成立，標誌著天主教在台傳教工作新局的揭幕：

這新的監牧區大大地簡化了台灣的傳教工作。過去，全島的教務接由道明會

27 江傳德，前揭書，頁 451-453。

28 毛振翔，前引文，頁 248。

29 黃德寬譯，前揭書，頁 212-213。

神父負責；以其不足的人員及不足的資源，傳教工作如何做得徹底呢？現在大家分工，主徒會分擔了北部地區的工作，較佳的傳教成果是可以想見的，皈依的人數必會年年增加。³⁰

……主徒會士也幫了我們難以估計的忙。這些可敬的神父受派管理台灣北部新成立的監牧區，創立這個修會的是前宗座駐華代表剛恒毅總主教，目前任傳信部秘書長。北部的監牧區，除了少數幾個人口聚集中心，可以找到一些小的基督徒團體外，都沒有天主教的傳教士到過。不錯，台北及基隆的教友團體可以作為發展的核心，可惜我們的傳教工作並未能扎下根基。舉例言之，從台北到台中—需要整整五個小時的火車路程—一見不到一間天主教的聖堂，因此，主徒會的十五位會士面臨的困難與挑戰是不輕的。(李安斯)³¹

由主徒會掌管的台北監牧區之成立，打破過去台灣天主教由玫瑰省道明會單一修會負責傳教的局面，台灣的傳教工作逐步邁向分工化。而更進一步的意義，或許是台灣的天主教從此與中國大陸的天主教發展再度結合起來，而這一次的結合比起晚清，影響顯得更深且更遠。

隨著中國大陸天主教人的大舉來台，台灣傳教事業因而急速開展，佈教工作區域亦逐漸細分，台灣的教會體制亦隨之擴張。1950年，教廷決議在台灣劃分出第三個監牧區—台中監牧區，交由原先在中國廣西省傳教的美國瑪利諾會(Maryknoll Miss., MM)掌管。該監牧區是將原高雄監牧區所管理的台中市、台中縣、彰化縣及南投縣劃分出來所成立，佔地6500平方公里，從西甲溪以南到濁水溪為止。³²由瑪利諾會會長美籍神父蔡文興(William F. Kupfer)擔任監牧。³³1952年8月，教廷再度決議劃分出兩個新的監牧區，一是將原先高雄監牧區所轄之雲林縣、嘉義縣劃歸成為嘉義監牧區，由原先大陸華北山東省陽穀教區主教牛會卿擔任監牧。另一則是由台北監牧區劃出花蓮縣、高雄監牧區劃出台東縣，以台灣東部為範圍的花蓮監牧區，由巴黎外方傳教會(Miss. Exter. Parisiensis, MEP)負責，³⁴由原本大陸東北營口教區法籍監牧費聲遠(Andrew J. Verineux)擔任監牧。³⁵同時，延續著1946年中國聖統制建立的脈絡下，教廷正式宣佈台灣正式成為一個教區，成為中國的第21個教省(Ecclesiastical Province)；台北監牧區升格為總教區(archdiocese)，郭若石成為台北總主教(archbishop)。

郭若石總主教評論這件事的意義在於：「此次教廷決定在自由中國設總主教區，表示教廷對自由中國之重視，意義至為重大，在天主教世界中而言，自由中國國際地位因此而提高。」³⁶緊接著，教廷駐華公使黎培理(Abp. Antonio Riberi)由香港來台正式設立教廷駐華公使館。³⁷

1961年3月21日，教廷再度宣布重新劃分教區，將台南市、台南縣及離島澎湖劃出高雄監牧區，改為成立台南教區，由羅光擔任首任主教。將新竹、桃園、

30 黃德寬譯，前揭書，頁213。

31 黃德寬譯，前揭書，頁214-215。

32 黃德寬譯，前揭書，頁215。

33 江傳德，前揭書，頁492。

34 費聲遠著，董增順譯，《回憶錄》，(花蓮：華光，1980)頁70。

35 江傳德，前揭書，頁493。

36 〈郭若石昨返抵台〉，《聯合報》(1952.10.18, 01版)。

37 毛振翔，前引文，頁249。

苗栗三縣分出台北總教區，設立新竹教區，首任主教為杜寶晉。高雄監牧區亦同時升格為高雄教區，首任主教則由道明會國籍會士鄭天祥擔任。³⁸1962年4月16日，台中監牧區和嘉義監牧區，升格為教區。³⁹1963年，花蓮監牧區升格為教區，費聲遠晉升為主教。台灣七個教區升格為聖統制主教區至此完成。⁴⁰

主教區的建立完成象徵著本地化的天主教會聖統制之建立完成：「道明會歷經了三政權的轉換及戰後大量中外修會來台，管轄區域由全台灣，漸萎縮至濁水溪以南，再萎縮到高雄、屏東，最後則是完全地交出管理權，只負責幾座散佈於台南、高雄、屏東的教堂。」⁴¹而台灣天主教會的領導者也改由教區神職或其他新入台灣之傳教修會負責。至此，獨攬台灣傳教事務近百年的西班牙籍道明會士，在戰後1949年到1961年短短的12年間，從台灣天主教的領導舞台上退下，是此時期台灣天主教會值得關注的一大變化。

直至1965年為止，台灣一共有731位神父（包含教區神父）以及792位修女，分佈在台北、新竹、台中、嘉義、台南、高雄、花蓮等七個教區工作。

在教區中工作的教區聖鐸與修會⁴²統計如下：

台北教區：教區司鐸68人。男修會有主徒會、聖母聖心會（Cong. Immac. Cordis Mariae, CICM）、遣使會（Cong. Missionis (Lazarists), CM）、靈醫會（Ministri Infirmorum (Miss Camil), MI）、方濟各會（Ordo Fratrum Minorum Sti Francisci, OFM）、慈幼會（Salesians of Don Bosco, SDB）、救主會（Society of the Divine Saviour, SDS）、耶穌會（Societas Jesu, SJ）和聖言會（Societas Verbi Divini (Steyl Fathers), SVD）。女修會則有日據時代已在台傳教之聖道明傳教修女會（Missionary Sisters of St. Dominic, OP）、聖母聖心修女會、仁愛會（Daughters of Charity, DC）、聖保祿孝女會（Daughters of St. Paul, DSP）、十字架女兒會（Daughters of the Cross, FC）、耶穌孝女會（Filiae Jesu (Daughters of Jesus), FI）、瑪莉亞方濟各傳教修會（Franciscan Miss. of Mary, FMM）、雷鳴遠女子服務團（International Cath. Auxiliaries, ICA）、Miss Srs. of the Immaculate Heart of Mary (ICM)、靈醫女修會（Ministrae Infirmorum (Miss .Camil.), MI）、聖母無原罪女修會（Missionary Sisters of the Immac. Concept., MIC）、仁慈聖母傳教會（Mercedarias Misioneras de Bérriz-España (Missionaries of our Lady of Mercy), MMB）、本篤修女會（Ordo Sti Benedicti, OSB）、耶穌聖嬰方濟各修女會（Franciscan Sisters of the Holy Infant Jesus, OSF）、主顧傳教修女會（Providence Sisters Catechists-Chinese Congr., PSC）、聖心修女會（Religious of the Sacred Heart, RSCJ）、拯亡會（Helpers of the Holy Souls, SA）、救主修女會（Sisters of the Divine Saviour (Salvatorian Sisters), SDS）、聖神會（Servantes Spiritus Sti (Holy Ghost Sisters), SSp S）、社會服務修女會（Srs. of Social Service, SSS）、中華寶血女修會（Chinese Srs. of the Precious Blood）以及貞美傳教團（Societas Catechistarum Btae. Luciae）。

38 江傳德，前揭書，頁529。

39 顧保鵬，《中國天主教大事年表》（台中：光啟，1970），頁114。

40 顧保鵬，前揭書，頁117。

41 楊嘉欽，前引文，頁101。

42 關於來台的大陸各修會名稱、人數、時間和分佈地點，可參考本研究製作的統計表格〈附錄一：神職人員與教友數目（1952-1965）〉，以及〈附錄二：天主教教務年度統計資料（1954—1965）〉諸表。

新竹教區：教區司鐸 21 人。男修會有瑪利諾會、方濟各會、耶穌會和白冷外方傳教會。女修會則有聖德來會 (Congr. Stae Theresiae-Chinese Congr., CST)、耶穌孝女會、瑪莉亞方濟各傳教修會、德來會修女 (Teresian Institute, ITT)、聖母無原罪女修會、瑪利諾女修院 (Maryknoll Sisters, MM)、仁慈聖母傳教會、耶穌肋傷至聖痛苦聖母傳教修女會 (Miss. del Sacro Costato, MSC)、聖衣會 (Discalced Carmelites, OCD)、烏蘇拉聖心會 (Orsoline del Sacro Cuore-Parma. Ursulines of the Sacred Heart, OSC)、拯亡會、聖母無原罪傳教修女會 (Franciscan Miss. Sisters of the Immaculate Conception, SMIC)、沙爾德聖保祿修女會 (Srs. of St. Paul of Chartres, SPC)、Srs. of the SSHH. of Jesus and Mary (SS.CC.)、聖神會、盧森堡普慈方濟各修女會 (Fr. Srs. of Mercy of Luxemb)。

台中教區：教區司鐸 61 人。男修會計有聖母聖心會、耀漢小兄弟會 (Congr. Sti Joannis-B. (Chinese Congr.), CSJB)、衛道會 (Cong. Sti Viatoris (Viatorians), CSV)、瑪利諾會和耶穌會。女修會則有聖母聖心修女會、仁慈傳教會 (Sisters of Mercy, FCC)、瑪利諾女修院、主顧傳教修女會、主顧修女會 (Sisters of Providence, SP)、耶穌聖心修女會 (Srs. of the Sacred Heart of Jesus, SSH) 等。

嘉義教區：教區司鐸 46 人。男修會有遣使會、本篤會、耶穌會和聖言會。女修會則有中華聖母會 (Srs. of Our Lady of China, OLC)、福寧道明修女會 (Missionariae Dominicanae-Chinese Congr., OP)、聖家獻女傳道會 (Obl. St. Fam.-Catechist Sisters of the Holy Family, OSF)。

台南教區：教區司鐸 32 人。男修會有方濟各會和慈幼會。女修會則有仁愛會、德來會修女、聖道明傳教修女會、聖玫瑰道明傳教修女會 (Dominican Sisters of the Holy Rosary, OP)、聖家獻女傳道會、聖母無原罪傳教修女會和中華寶血女修會。

高雄教區：教區司鐸 15 位。男修會有已在台傳教百年的聖道明會 (Ordo Praedicatorum Sti Dominici, OP)、主母會(或名聖母昆仲會) (Marist Brothers, FMS)、遣使會及重整奧斯丁會 (Ordo R.S. Augustini, ORSA)。女修會則有聖道明傳教修女會、聖玫瑰道明傳教修女會、聖若瑟道明修女會、聖家獻女傳道會、聖母無原罪傳教修女會和吳蘇樂羅馬聯合會 (Roman Union Order of St. Ursula, OSU)。

花蓮教區：教區司鐸 6 人。男修會有巴黎外方傳教會、聖奧斯丁會和白冷外方傳教會。女修會則有聖十字架會 (Congr. Stae Crucis (Srs of the Holy Cross), CSC)、聖母聖心修女會、聖母醫療傳教會 (Medical Miss. of Mary, MMM)、吳蘇辣羅馬聯合會、聖女瑪爾大修女會 (St. Martha Institute, SMI) 和沙爾德聖保祿修女會。其中值得一提的是瑪爾大修會是費聲遠主教特別在本地成立的女修會，吸引了不少當地女子入會。

在過去的台灣天主教史上，從來沒有像這個時期一樣，同時擁有這麼多來自全中國各地神職人員和男女修會，共同在台進行佈教工作。直至 1948 年，台灣還只有 15 位神父，⁴³短短 17 年間，神職人員增加了數百倍。這不僅是在台灣史上前所未見的現象，依人口和面積來計算，和世界上其他地區的天主教會相比，台灣天主教神職人員的密度之高，也是極為特殊的現象。這與 1949 年前後中國流亡當時遷離大陸，欲來台灣繼續傳教事業的男女修會，就好像潮水般一波波地

43 顧保鵠，前揭書，頁 85。

湧入，最後各教區甚至人滿為患，只好拒絕後來者的申請：

一天，我收到普照會總院長修女——當然已不是以前那位——的一封信，請求我接受她的中國修女來花蓮工作。那時在教區內，已經有屬於八個不同修會的一百多位修女，其中包括我自己成立，正蓬勃發展的修會。⁴⁴當時，我怎麼回答她的要求？這並不難，我絕口不提十幾年前的事，簡單的寫：「修女，非常抱歉，沒有位子。」⁴⁵

傳教工作

1949年以前台灣天主教的各項事業，在台灣監牧區時期，在佈道成果上，如前所述，共有本堂區14處，分堂15處，傳教所22所；正式的修道院只有若瑟小修院一所；教育事業方面，則只有靜修女中⁴⁶一所；文字事業上面，日治時期在羅厝堂區，有一台從馬尼拉進口的印刷機，曾印過《熱心參與彌撒》等傳教小冊。⁴⁷社會事業部分，則是一直維持著從二度開教初期就開始的孤兒院，院址在高雄，由聖道明傳教修女會管理，羅厝堂區則有分院；⁴⁸至於醫療事業，沒有任何正式的醫院、診療所或是藥局。基本上，戰前由道明會負責的台灣天主教事業，長久處於一種乏善可陳的狀態，與同時期的基督教長老會根本無法比擬，對於這一點，道明會士也一直有著難以排解的焦慮：

……我們另有一個競爭者，我指的是基督教派。基督教派在台灣的潛力不可忽視，他們組織完善，有經濟充裕的學校，全套設備的醫院及大量的傳教師……。(巴多瑪，1928、5)⁴⁹

天主教沒有什麼值得誇耀的漂亮建築，沒有設備完善的醫院，沒有神學院，沒有一樣比得上基督教。但在這塊親手開墾的園地上，皈依者的數目，皈依者的虔誠與熱心，在在都使傳教士得到安慰。(未署名，1932.5.19)⁵⁰

道明會在財力和人力方面，都無法負擔起一套強大的外教會事業，變成與長老教會競爭信徒的一大弱點，這樣的情況隨著大陸修會抵台，獲得了質量上的解決。

首先觀察佈道事業，由〈附錄三：教友數目統計表（1953-1965）〉一表，可以看到至1965年，台灣天主教教友人數已達283,074人。較之1940年，信徒人數竟然增加了超過27萬人，佔當時台灣人口比例2.23%。1965年全台灣正確的堂區、分堂區及傳教所的數字無法得知，不過我們可以從台北總教區在1959年，

44 費聲遠指的是他於1960年在花蓮創立的瑪爾大山地修女會。

45 費聲遠著，董增順譯，前揭書，頁70。

46 「靜修女中的位址就在蓬萊町天主堂的東側，建校基金是向馬尼拉的道明會玫瑰省借支六萬圓，興建863建坪的二層樓校舍，及560建坪的學生宿舍，在1917年（大正6年）4月1日招生，林啟明為首任校長。1922年（大正11年）10月31日，以大正10年府令第一三八號，廢止明治38年府令第八八號私立學校規則。為此該校同時廢止，再於同年11月8日，據新法令重新許可設立「私立靜修女學校」。由1903年自馬尼拉來台幫忙傳教的聖道明傳教修女會(Religious Missionaries of St. Dominic)的修女負責管理學校。」黃子寧，前引文，頁174-175。

47 黃德寬譯，前揭書，頁181-182。

48 黃德寬譯，前揭書，頁193。

49 黃德寬譯，前揭書，頁192。

50 黃德寬譯，前揭書，頁194-195。

堂區已達 122 個的數字，⁵¹以及 1981 年，全台灣有堂區 408 個、分堂區 625 個以及聖堂 824 座的數字，⁵²以及上述 1965 年的教友人數，明白的感受到佈道事業的驚人發展。另外，有關於教堂的建立次序，董顯光觀察到當時天主教與基督教的不同模式：「另一個解釋天主教成長速度的原因，可以在天主教與新教傳福音模式的不同上發現。新教徒先從皈依信徒著手，再來建立教堂。他們首先皈依了足夠組成一個聚會禮拜數目的信徒之後，接著再建立一座教堂。另一方面，天主教徒則先建立教堂，從教堂擴大規模尋找信徒。從心裡層面來看，天主教的方式比較好。一旦這個教堂被當作一個新堂區的建立證明，神父就會為了讓它能夠自立自足，而一心一意地去皈依新的信徒。」⁵³他認為先建立教堂對於推廣教務有正面的好處，神父會更積極工作。花蓮教區的主教費聲遠就是抱持著這樣的想法，他覺得教堂的出現，對於教徒會有鼓勵作用：「有時，一座教堂的出現，不但能滿足村內教友們的熱心，更能增加他們的面子，並且對那些態度冷淡，仍在觀望的村民是一種激勵。我曾聽說過，在某些村莊，就有些行動緩慢的家庭，在教堂興建之後，才加入我們的行列。」⁵⁴所以甚至某些地區還只有望教友的階段時，就搭建起簡單的教堂「我們新堂區的起源是這樣的：傳道員是隨便召募來的，待遇不高；教堂也是隨便興建的，材料便宜。因為都是屬於臨時性的，我們在等待好日子的來臨。」⁵⁵

教堂的數目方面也可看出教務的進展⁵⁶：

時間\教區	台北教區		嘉義教區		花蓮教區	高雄教區	台中教區	總數
1955 年	46		10(嘉南教區)		11	23	15	95
1956 年	70		15		22	30	19	156
1957 年	111		22		29	43	19	224
1958 年	127		26		32	50	29	264
1959 年	133		28		34	45	29	269
1960 年	140		29		36	53	33	291
1961 年	152		33		41	41	60	327
	台北總主教區	新竹教區	嘉義教區	台南教區	花蓮教區	高雄教區	台中教區	
1962 年	76	87	44	34	44	38	37	360
1963 年	80	82	41	42	45	63	37	390
1964 年	89	93	44	44	76	76	36	458
1965 年	92	98	45	49	77	78	41	480

51 參考〈台北主教公署〉網站 (http://www.catholic.org.tw/taipei/new_page_1.htm)。若包含兼管的分堂等應有 133 座，見《台灣天主教通訊錄》，華明書局，1959 年。

52 毛振翔，前引文，頁 2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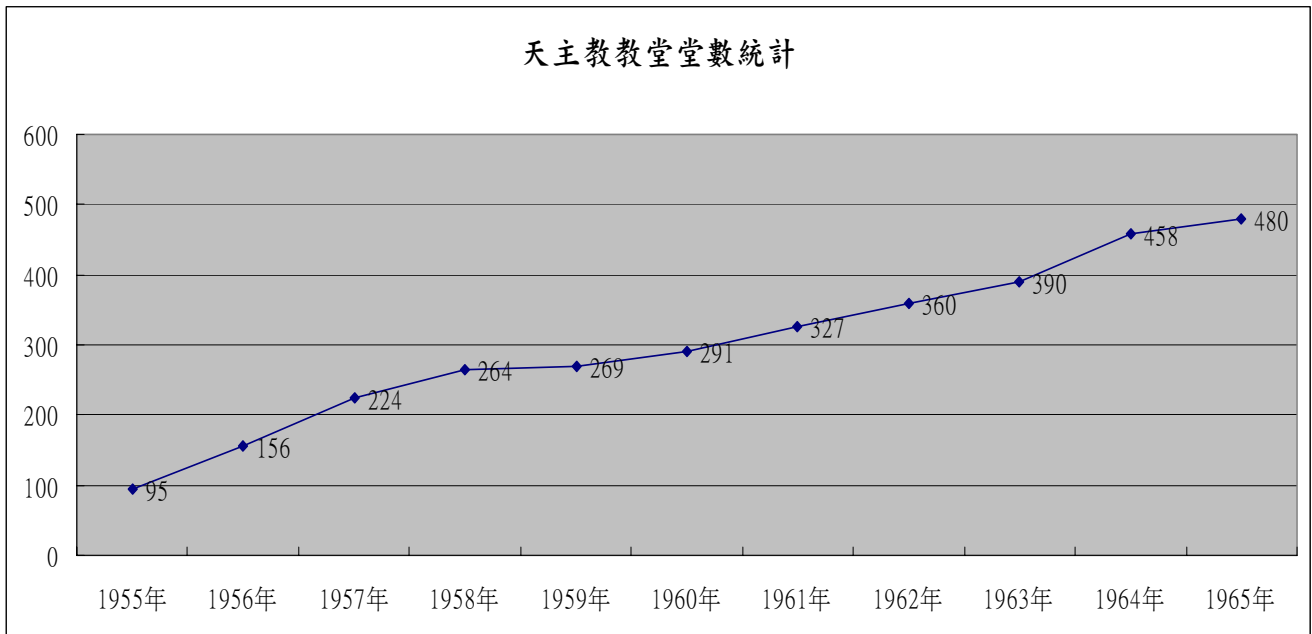
53 Hollington K. Tong, *Christianity in Taiwan: A History*, (Taipei: China Post, 1961), p.218。

54 費聲遠著，董增順譯，前揭書，頁 94。

55 費聲遠著，董增順譯，前揭書，頁 94。

56 數據及依當年《台灣天主教通訊錄》的記載。

資料來源：《臺灣天主教通訊錄》，民國 44 年到 54 年



同樣屬於佈道事業的，還包括傳道學校和修道院的建立。不論是當下需求甚般的本地傳教師，或者是未來的本地神職，對於天主教融入社群、紮根生長都是

各教區教堂數目也顯著增加，從原來的 1955 年不到一百間，到 1965 年的四百八十座，而且各教區的分佈除了嘉南增加九倍，花蓮增加七倍，其他教區平均也增加有四倍之多。

同樣屬於佈道事業的，還包括傳道學校和修道院的建立。不論是當下需求甚般的本地傳教師，或者是未來的本地神職，對於天主教融入社群、紮根生長都是重要的關鍵。從〈附錄二：天主教教務年度統計資料（1954—1965）〉中，可以發現，到 1965 年時，台灣全島的傳道學校共有 7 所，分別在台北教區、新竹教區和高雄教區各 1 間，台中教區和花蓮教區則有 2 間，傳道員數量是 1,291 人。至於修道院的數目，由於只記載至 1963 年，依據當年的資料，全台共有 5 間，分別是戰後最早成立，位於高雄教區的若瑟小修院；⁵⁷接著是位於台北教區，1951 年創辦，原名為主心修院，後來改名的若瑟修院；⁵⁸在 1961 年若瑟修院的奠基典禮時，田耕莘樞機主教的演講中透露出他對於修道院的期望：

回憶我為了完成這個修院，近幾年來，在歐美各國，到處奔波，勸捐基金。這個志願今天幸能實現，所以我感覺的非常慰快！我今鎮重的告訴大家，這個修院不但是台北教區的修院，且亦是中國大陸的修院，因在這裡不但為本教區栽培聖召，同時亦要替其他個教區栽培聖召。

57 若瑟小修院自 1946 年建院，至 1976 年為止，30 年間培成鐸品者，計有林天助、潘瓊輝、吳明堂、陳主憐、陳兆望、黃懌憬、白正龍、蘇達義、葉勝男、楊紹揚、林吉男、李武志、侯倉龍、林吉基、徐清富等 15 位神父。江傳德，前揭書，頁 697。

58 江傳德，前揭書，頁 894-895。

就近而言，現在台灣省的教友日日增多，十年來已增到了二十萬教友，但聖召卻寥寥無幾，這正如聖經所說的：「莊稼多而收割的工人少。」所以即以台灣來說，栽培聖召，可說是當務之急。

在就遠處著想，為復興中華聖教，栽培聖召，可說是最要緊的事。請看大陸教會，在共產匪黨壓迫之下，既不能隨便栽培聖召，若我們在台灣再不栽培聖召，可以說聖召很難繼續，這是多麼可怕的事呢！

何況我們不知道共匪在大陸究竟要橫行多時，假使再繼續幾十年的話，那還了得，則大陸上的神職，老的死了，年輕的老了，青年全被毒化了，若再把他們改造，是非常困難的，這麼說來，我們不知要到何年何日才能看見新司鐸了，言念及此，不禁令人寒心，所以我們在台若能栽培好聖召，將來我們一旦光復大陸，則水到渠成，不需預慮了。⁵⁹

再來是1960年2月20日，在台中教區設院的聖神小修院，由聖母聖心會管理；⁶⁰1963年8月22日，台南教區成立聖碧岳神哲學院，首任院長為楊成斌，是台灣第一座大修院，1965年3月時，台南教區又成立聖達義修院，以培養小修生為目的。⁶¹關於聖碧岳神哲學院及聖達義修院的建校緣由和經過，當時的台南教區主教羅光曾經留下記錄：

大陸淪陷中共手中時，有許多小修院解散，有幾處大修院也關門，修士奔散各處，有些投入軍隊。在到台灣的軍隊中有大陸修生，我想可以再把他們召回，給他們晉職司鐸的機會，民國五十一年二月二日，我上書傳信部長雅靜安樞機，建立台南神哲成人修院。九月二日，聖庇護第十節，六個青年壯丁，由楊成斌神父引導，來到台南主教公署小聖堂，參與彌撒。我為他們行祭，彌撒中我向他們講道，說明他們是成人修院第一批修生……。

次年在台南開元路十三巷裡面，我買了旱田四仟坪，建築修院。民國五十二年五月三十一日祝聖基石，次年建築樓房四棟，修生於二月二日搬入。八月二十二日聖母聖心節，院內聖堂落成。是年冬第二宿舍啟用，民國五十四年，建築禮堂，全部宿舍完工。

聖碧岳神哲學院的建築圖樣由成大教授衡陽同鄉賀陳詞先生所繪，採用中國舊式書院現代化，圖本上有樓房九棟，最左兩棟為中學生小修院修生用，但因壯年和青年不便同院，於是在成人修院外左角，興建兩樓，自成獨立小修院，取名聖達義修院。⁶²

由上可知聖碧岳神哲學院最初的成立目的，是希望能讓軍隊中的大陸修生還有晉鐸的機會。再配合前述田耕莘的演講詞，其實可以看出這個時代，自大陸遷台的天主教神職人員，他們試圖在台灣收拾大陸殘局，挽救以往教務，為回去大陸而等候準備的努力和心情。1962-1963年之間，花蓮教區也成立了一間修道院。

59 〈台北教區若瑟修院舉行奠基典禮 田樞機高公使先後演講 強調修院為復興中華聖教的重要性 今神職教友共同玉成聖召〉《恆毅月刊》第十卷第八期，1961.3，頁1。

60 參考〈聖母聖心會在台福傳五十年大事紀〉網站
(<http://www.catholic.org.tw/fatimads/cicm2.htm>)。

61 參考〈天主教台南教區〉網站 (<http://www.catholic.org.tw/tainan/>)。

62 羅光，《生活自述》(台北：輔仁大學，1997)，頁30-31。

1965年9月，田耕莘一手規劃的聖多瑪斯神哲學院在新莊祝聖啟用，教區神父劉德宗為院長說：「這所神學院一直是田樞機主教最珍視的。因為他覺得透過這所神學院，他看到了台灣及海外中國人的精神中心已經實現了。」⁶³所以到1965年為止，台灣至少已經有7間修道院，而且大小修院成立出現，天主教在台灣終於具備了完整的神學教育系統。

傳教事業中還有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是原住民的皈依。台灣原住民中約有三分之一是信仰天主教的，而其基礎如前期所言，日本殖民統治奠定其基礎，尤其是在組織及管理方面，藉著高壓統治，原住民部落大致已安定下來，然而由於尚未開發，猶有純樸的風氣，接受酋長或部落長老的領導，加上天主教會對於原住民傳統禮儀及風俗的寬容，原住民對於至高者神明的不確定形象，傳教士與之同甘共苦，犧牲奮鬥的精神以及福利物資的發放與慈善事業的開展，在在均使原住民比較容易改變成對基督宗教的信仰。江傳德描述了在屏東第一座原住民堂區成立的經過：

首先是在一九四九年，教務在平地日趨呈現活躍之時，屏東縣山地各鄉亦呈現教務進展之希望。鄰近山地部落之萬金教會本堂道明會神父包德良(Rev. Faustino Saez, O.P.)，獲得陳若瑟監牧主教之全力支持，開始向當時稱作「山地山胞」的原住民傳教。……，曾經受過教會私立靜修女中教育之潘林環涼女士，亦即萬金傳教員潘伏求之夫人以及後來潘瓊輝神父之母親，透過數位略諳山地話之教友之協助，始開始向排灣族(Paiwans)山胞部落佳平社(Kapian Tribe)，進行傳教工作。幸運地得到當時該社大頭目(酋長)馬欄綠女酋長(Queen Malluvlluv 劉春美)及其丈夫晡腊露養(Puraruyan 劉文吉)之虔誠信心與合作，得到意外的好成績。⁶⁴在一九五三年夏秋之際，教會在屏東縣太武鄉佳平村，開始興建一座為山胞之法蒂瑪聖母堂，該堂是台灣山地第一座聖堂。……並於當年十二月八日，亦即每年屏東萬金聖母堂的主保瞻禮日，恭請教廷駐華公使黎培理總主教(The Most Rev. Anthony Riberi, Apostolic Inter-Nuncio to China)蒞臨，主持落成典禮。當日領受聖洗之山胞，除了佳平社之大頭目，女酋長劉春美(Queen Maliuvliuv Maria Rosa)，其丈夫劉文吉(Puraruyang Pedro)及其家族外，同時還有同社的二四七人。主教同時任命道明會蘇士朗神父(Rev. Castor Osorno, O.P.)為台灣山地堂區，第一位本堂神父，駐在該堂。⁶⁵

教務在山地原鄉自此有了基礎，教會也培養原住民擔任傳道員，配合神父傳教，皈依者日多。

然而這並非最早的原住民堂區。最早的是1951花蓮田埔堂成立台灣第一個非平埔族的原住民堂區。這是由主徒會的神父前來開教的結果，受到該地原住民的歡迎而成立的。值得注意的是原住民中的皈依者有四分之一來自基督教長老會，⁶⁶這是由於長老會有些地方規定過於嚴苛，例如不准喝酒，必須奉獻十分之

63 方若翰 (P.J.Fleckner) 著、聖言會中國省會譯，《田耕莘樞機傳》(台北：輔仁大學，1990)，頁 130-131。

64 江傳德，前揭書，頁 329。

65 江傳德，前揭書，頁 335-336。

66 丁立偉、詹嫦慧、孫大川合著，《活力教會，天主教在台灣原住民世界的過去、現在、未來》(台北光啟出版社，2004)，頁 38。

一的收入等等。

其他修會也努力向原住民傳教，大致而言，瑪利諾會在中部南投台中，聖言會在嘉義，耶穌會在新竹、南澳，主徒會、奧斯丁會及巴黎外方傳教會在花蓮，白冷會在台東，都分別各自展開傳教活動，與之配合的，有的是研究原住民語言文化，有的是設立醫療機構，有的是建立學校培養有一技之長的原住民青年，藉此親近原住民，得到原住民的認同與參與。此外，為了達到有備無患守望相助的精神，天主教會推行一種通行全台的互助會機構，由每個堂區的神父主持，教友們定期定額交入互助會中，需要時則提用，不需時，則有利息可享，再加上有代表財力及公信力的神父主持，成為凝聚教徒，吸引外人的一個很重要的機構，在山地部落也成了養成良好儲蓄習慣，累積投資資本的重要教會附屬機構，對當時尚未經濟起飛的人民來說是很有意義的。

教會進入原住民部落還有一種意義，亦即此舉賦予日本殖民統治以來傳統部落社會瓦解、社會力低落的部落重振的契機。而有些原住民喜歡天主教莊嚴禮儀及音樂，這些可以取代已遭破壞之原有儀式，而且也更符合原住民愛好音樂之天性。⁶⁷

最晚開教的原住民地區是在嘉義縣阿里山鄉，這是鄒族的地方。該地原來在1950年代有長老教會及真耶穌教會進入，但由於其對鄒族的傳統儀式之排斥，鄒族特富野社頭目世家的汪家對此不能接受，1958年12月大頭目汪光洋(Voju-Peonsi)的長女浦汪寶蘭，次女浦汪寶秀

到南投縣信義鄉久美部落探訪親人，有機會參與羅娜天主堂隆重的聖誕節禮儀。兩位女士非常欣賞禮儀的莊嚴氣氛，並被神父的道理感動。回到特富野後，她們要求自己的丈夫浦照好、浦一世兄弟，到平地邀請天主教傳教士來山上開教。1959年初，負責嘉義縣東部的聖言會，派遣曾在大陸山東省傳教的傅禮士神父(Rudolph Frisch)到阿里山開教，他在很短的時間內吸引許多居民皈依，包括特富野、達邦兩大社頭目。⁶⁸

學者綜合原住民皈依的原因有下列幾點：靈修的需要、本地傳道員的培育、傳教士的犧牲奉獻、長老對下一輩的影響、天主教的社會服務與青少年培育工作、禮儀的莊嚴美麗、本地文化的尊重及弱勢家庭的包容諒解。⁶⁹

原住民的皈依潮延續到1960末期，台灣原住民約有百分之八十成為基督徒，而其中約有三分之一為天主教徒。⁷⁰

社會事業發展

如此眾多的大陸修會和神職人員來到台灣，其對台灣天主教傳教工作的幫助之大，不言可喻。各個修會有自己完善的組織、豐沛的人脈、支援的財力，以及過去在大陸的老道經驗，他們將以前傳教的模式搬到台灣，在台灣形成了新的傳教方式，教會事業的蓬勃出現、大幅成長，就是最好的證明。

所謂的教會事業，指的也就是教會事工，王治心的研究曾將基督教的教會事

67丁立偉等，前揭書，頁40-41。

68丁立偉等，前揭書，頁37-38。

69簡鴻模，《祖靈與天主—眉溪天主堂傳教史初探》，新莊輔仁大學，2002；丁立偉等，前揭書，頁39。

70丁立偉等，前揭書，頁38。

工分成五大類：佈道、文字、教育、醫療和社會。⁷¹在此借用其分類方法，來探討戰後台灣天主教的事工成就。

文字事業方面，天主教發行的報紙刊物，根據教務統計，到1965年時，共有14種。最先是主徒會於1951年7月底所創辦的「恆毅」月刊，由趙賓實主編。⁷²1953年，牛若望由港來台，與成世光與歐陽敬仔創「教友生活」週刊。⁷³1955年8月，「善導」週刊在高雄監牧區創刊，負責人是遣使會美國西省會士司密斯(Thomas J. Smith)。⁷⁴1957年，「聖心報」月刊在台復刊。⁷⁵1961年，牛若望與趙雅博、李貴良合辦「現代學人」月刊，又與黃友蘭辦「家庭教育」月刊。⁷⁶1962年新竹教區「佳音週刊」創刊。⁷⁷同樣也是1962年，「鐸聲」月刊在台南教區復刊，負責人李震神父。1963年，台北教區「見證」月刊創刊，由聖母聖心會會士袁士林(Albert Geussens)主辦。⁷⁸台南教區復於1964年4月創辦「現代學苑」月刊，負責人項退結。⁷⁹另外，還有台中教區的「世光」週刊；⁸⁰以及「慈音」月刊、「聖體軍」月刊等。⁸¹天主教的出版社也在同時期出現，像1952年慈幼會成立的華明書局、⁸²1956年的光啟出版社及1960年聖保祿孝女會所創的保祿書局等，⁸³台南教區的羅光也大約是在1964年成立了徵祥出版社，陸續出版了《天主教史》(譯本，1965)，及《天主教在華傳教史論集》(1967)等書。

教育事業的部分，是這個時期大多數修會頗為致力的一環，下至幼稚園，上至大學，辦學成果格外斐然，也為本島人民提供了不少入學的機會。一直到1965年6月底的統計資料，天主教在台灣一共有492間幼稚園、6間小學、17間中學、5間技術學校、1間專科學校及1間大學。就讀的學生人數，幼稚園有35,270人、小學有2,116人、中學有14,154人、技術學校有705人、語言學校有1,286人、專科學校有1,500人、大學有1,083人。⁸⁴幼稚園方面，許多由女修會設立，她們通常將幼稚園附設於該修女會會院，或是前往堂區經營該堂所經辦之幼稚園，像高雄教區裡，在高雄市前金區有「聖母榮召升天修女院」的聖道明傳教修女會，⁸⁵在台南和屏東都有會院的聖玫瑰道明傳教修女會，⁸⁶在麻豆和鳳山有會院的聖母

71 王治心，《中國基督教史綱》(上海：青年協會書局，1948)，頁275。

72 江傳德，前揭書，頁929。在「恆毅」月刊之前，曾有「台光」月刊，創刊於1948年1月，1949年2月停刊。

73 江傳德，前揭書，頁755。

74 江傳德，前揭書，頁467。

75 顧保鵠，前揭書，頁100。

76 牛若望，〈我與文化事業〉，收入於《牛若望論文選集》(台北：牛若望遺著委員會，1984)，頁937。

77 參考〈天主教新竹教區〉網站(<http://www.catholic.org.tw/hsinchu/>)。

78 江傳德，前揭書，頁761，但此乃專為傳道員的刊物，與1970年後為一般信眾而辦的，由台北教區支持的同名刊物不同。

79 江傳德，前揭書，頁931。

80 〈台中監牧區升格為聖統教區 蔡監牧文興晉升為首任主教〉，《恆毅月刊》第十一卷第十期，台北：恆毅月刊社，1962.5，頁18。

81 譚尚志，〈新竹費濟時主教視察關西磊質傳教學校主講台灣教會動態〉，《恆毅月刊》第十卷第十一期，1962.6，頁19。

82 1956年，華明書局由聖母聖心會接辦。江傳德，前揭書，頁927。

83 江傳德，前揭書，頁928。

84 資料參考自〈附錄二：天主教教務年度統計資料(1954—1965)〉。

85 江傳德，前揭書，頁450。

86 江傳德，前揭書，頁451。

無原罪方濟傳教修女會，⁸⁷在高雄市聖母堂、露德聖母堂、五塊厝天主堂服務的聖家獻女傳教修會；⁸⁸台北教區裡，開設培德幼稚園和方濟幼稚園的耶穌聖嬰方濟各修女會，⁸⁹在基隆市有會院的聖神會，⁹⁰在台北和宜蘭頭成創辦幼稚園的仁愛修女會，⁹¹在宜蘭管理聖后幼稚園的救主修女會，⁹²在竹東服務的耶穌孝女會等。

93

小學的出現，相對於幼稚園和中學，時間上比較晚，最先是台北教區的道明小學，該所學校是1959年由道明傳教修女會，為協助美軍在台眷屬，及教育教友子女為目的所創辦。⁹⁴同年還有花蓮教區，位於花蓮縣新城鄉的聖若瑟小學，由聖女瑪爾大修會管理。⁹⁵接下來是1960年台北教區的光仁小學，創辦人是聖母聖心會的范普厚主教(Mgr. Alfons Van Bouggenhout CICM)。⁹⁶再來是1961年新竹教區的曙光小學和由耶穌孝女會成立的上智小學。⁹⁷最後是高雄教區，由道明傳教修女會創辦的升天小學。⁹⁸

中學的部分，除了日據時期就有的靜修女中之外，戰後第一間中學，是1955年8月，衛道會在台中創立的衛道中學，⁹⁹其前身是中國遼北省四平路的曉東中學，首任校長初鳳桐神父。¹⁰⁰1958年7月，道明會在高雄創設道明中學；8月，主徒會在台北復校恆毅中學，¹⁰¹首任校長范文忠神父。¹⁰²1959年9月，吳甦樂羅馬聯合會在花蓮創立海星女中。¹⁰³1960年8月聖心會修女在台北縣八里創辦聖心女中，首任校長孫知微修女；¹⁰⁴9月，聖神會在新竹市創設曙光女中，¹⁰⁵首任校長姚景如修女。¹⁰⁶1961年7月，台南教區在雲林土庫創辦永年中學，創辦人是游宣德神父，「永年」之名是紀念大陸永年教區；¹⁰⁷8月，斗六開設正心中學。¹⁰⁸1962年9月，聖言會在嘉義市復辦輔仁中學，¹⁰⁹原為中國北平輔仁大學附設中學，首任校長朱秉文神父。¹¹⁰1963年7月，聖母聖心修女會在台中創設曉明女中，聖家

87 江傳德，前揭書，頁455。

88 江傳德，前揭書，頁456。

89 江傳德，前揭書，頁874。

90 江傳德，前揭書，頁875。

91 江傳德，前揭書，頁878。

92 江傳德，前揭書，頁881。

93 江傳德，前揭書，頁885。

94 江傳德，前揭書，頁917。

95 資料參考自〈附錄二：天主教教務年度統計資料(1954—1965)〉。

96 江傳德，前揭書，頁917。

97 資料參考自〈附錄二：天主教教務年度統計資料(1954—1965)〉。

98 資料參考自〈附錄二：天主教教務年度統計資料(1954—1965)〉。

99 顧保鵠，前揭書，頁97。

100 參考〈衛道中學全球資訊網〉網站 (<http://www.vtsh.tc.edu.tw/>)。

101 顧保鵠，前揭書，頁102。

102 參考〈天主教恆毅中學〉網站 (<http://www.hchs.tpc.edu.tw/>)。

103 顧保鵠，前揭書，頁105。

104 參考〈天主教聖心女子高級中學〉網站 (<http://www.shgsh.tpc.edu.tw/>)。

105 顧保鵠，前揭書，頁109。

106 參考〈曙光女中〉網站 (<http://www.sggs.hc.edu.tw/>)。

107 參考〈天主教永年高級中學全球資訊網〉網站 (<http://www.ynhs.ylc.edu.tw/>)。

108 顧保鵠，前揭書，頁112-113。

109 顧保鵠，前揭書，頁115。

110 參考〈嘉義市天主教輔仁中學〉網站 (<http://www.fjsh.cy.edu.tw/>)。

獻女傳道會在台南市創立德光女中，首任校長李震神父，¹¹¹方濟各會在台南麻豆設立黎明中學，首任校長高世英神父；¹¹²8月，耶穌會徐匯中學在台北蘆洲復校；9月，慈幼會在台南市創設慈幼中學，¹¹³首任校長是馬永定神父。¹¹⁴1964年8月，新竹教區創立磐石中學，該校乃由新竹教區主教杜寶晉一手策劃，首任校長為李平和神父；¹¹⁵9月，聖母無原罪傳教修女會在台南設立聖功女中。¹¹⁶另外，1965年9月中，又另有4所中學增設，分別是聖母昆仲會在高雄市復校的明誠中學，首任校長王溪泉修士，¹¹⁷方濟各會在台北內湖創設的方濟中學，首任校長申培謙神父，¹¹⁸遣使會在雲林四湖開辦的文生中學，以及大陸河北獻縣教區神父耿文良、范景才等人在桃園市設立的振聲中學，¹¹⁹首任校長劉獻堂神父，取名「振聲」是為了紀念中國籍首任主教趙振聲。¹²⁰所以，到1965年底，全台總共有21間天主教中學。

技術學校方面，則有1958年正式立案的內思中級工業補習學校，該校最早是耶穌會倪永祥神父等人在1954年時，先於新竹新埔天主堂設立的夜間補習班，1958年正式立案，首任校長為陳燠堂，1965年8月，又升格為五年制高工，設電工、機工兩科。¹²¹1960年9月，瑞士白冷外方傳教會在台東市設立的公東工職。¹²²1962年8月，屏東東港創設聖德女子初級補習校。¹²³1963年9月，屏東東港又創立聖家高級家事職業學校，¹²⁴上述二校，都是道明會德鐸省林德明神父（Francis Spaeth），在擔任東港天主堂本堂司鐸時期所籌備促成¹²⁵，聖德補校是夜間部，與聖家家職使用同一校舍，後於1970年，二校合併成為新基高中。¹²⁶最後是1964年9月，靈醫會在羅東建立的聖母高級護理職業學校¹²⁷。

唯一一間專科學校，是主顧修女會在1953年創辦的靜宜英專，¹²⁸1963年9月奉准改制為靜宜文理學院。¹²⁹唯一一間大學，就是在台復校的輔仁大學。1956年，輔大校友會在台正式成立，積極推動輔仁大學在台復校事宜，于斌四處奔走

111 參考〈天主教德光女子高級中學〉網站（<http://www.tkgsh.tn.edu.tw/>）。

112 參考〈台南縣私立黎明高級中學〉網站（<http://www.lmsh.tnc.edu.tw/>）。

113 顧保鵬，前揭書，頁118-119。

114 參考〈台南市天主教慈幼工商〉網站（<http://www.ssvs.tn.edu.tw/>）。

115 參考〈天主教磐石高級中學〉網站（<http://www.sphs.hc.edu.tw/>）。

116 顧保鵬，前揭書，頁122。

117 參考〈高雄市天主教明誠中學全球資訊網〉網站（<http://www.mcsk.kh.edu.tw/default.asp>）。

118 江傳德，前揭書，頁906。

119 顧保鵬，前揭書，頁126。

120 參考〈天主教振聲高級中學〉網站（<http://www.fxsh.tyc.edu.tw/>）。

121 參考〈內思高工〉網站（<http://mail.savs.hcc.edu.tw/~cc/savs/>）。

122 顧保鵬，前揭書，頁109。

123 顧保鵬，前揭書，頁113。

124 顧保鵬，前揭書，頁119。

125 「林神父為灌輸一般婦女的知識，於民國五十一年又開辦了聖德女子中級補習學校，招收適齡及逾齡失學的女子，使之有再受教育的機會，……林神父又認為一個家庭的好壞，要視婦女的教育水準如何，故為提高家庭管理，提倡婦女職業，又於民國五十二年成立聖家高級家事職業學校。」參見牛川海，〈公教的奇蹟 一個成功者的事實〉《恆毅月刊》第十一卷第十期，台北：恆毅月刊社，1964.5，頁39。

126 江傳德，前揭書，頁704-705。

127 顧保鵬，前揭書，頁122。

128 顧保鵬，前揭書，頁92。

129 顧保鵬，前揭書，頁119。

籌畫。¹³⁰1960年12月，輔仁大學復校籌備處成立，籌備處主任牛若望、副主任龔士榮。¹³¹1961年8月，先就籌備處開始辦起哲學研究所，以口試方式錄取了8名新生，9月20日開學，復校後的輔仁大學就以這一天開始計算。¹³²完整的大學部則等到1963年2月，簽約新莊校地之後，¹³³11月正式開學，有三個學院：文學院、法學院和理學院，分別由中國神職單位、耶穌會和聖言會負責，共收了11班400多名學生。¹³⁴

醫療事業，如同教育事業，也是另一條與民眾生活息息相關，能夠直接接觸一般百姓的管道。天主教會長久以來的競爭對手—長老教會，在晚清的傳教過程時，已經北以馬偕，南以宋牧師娘為代表性人物，進行宗教與醫療的結合。天主教直至戰後，方有許多修會都投身其中，他們的成績到1965年6月底，是總共台灣建立19間醫院及135間診療所。茲列舉幾間較為有名的醫院，如1949年，聖母無原罪方濟傳教修女會在高雄建立的樂仁醫院，是天主教在台灣第一所教會醫院，¹³⁵主治醫師方懷仁修女（Hilda Meier）：「是一位精力充沛的醫生，從喬治華盛頓大學訓練出來，接生超過3,000名嬰兒。她說：『常常同時接生2到3名嬰兒，嬰兒的母親通常會表現出成為天主教徒的興趣。』」¹³⁶1955年7月，靈醫會在羅東鎮開設的聖母醫院，主治醫師是曾於1963年當選好人好事代表的范鳳龍。¹³⁷1960年，靈醫會在澎湖馬公竣工的惠民醫院，該醫院是當地第一所設備完整的醫院。¹³⁸1964年5月，聖道明傳教修女會在屏東縣三地鄉三地門成立的聖若瑟醫院，目的在為當地原住民提供醫療服務等。¹³⁹

社會事業的範圍，包羅萬象，舉凡教會為社會提供服務的項目，應該都可以稱為教會的社會事工。像1949年來台的本篤修女會，1960年3月在台北市廈門街設立的「聖本篤育嬰所」，除了收容無家可歸的孩子之外「華修女的原則是常常收容至少一個其他育幼院不收容的殘疾幼兒。華修女相信：『他們為育嬰所帶來特別的祝福』因此她們收容過腦水腫、腦麻痺、智能不足的孩子們。」¹⁴⁰還有仁愛會修女於1963年，在台北天母創辦的「露德孤兒院」。¹⁴¹除了慈善性質的社會事業之外，還有類似社區服務的活動，比方說東港天主堂的縫紉班：「林神父又鑑於東港漁民生活清苦，婦女沒有家庭副業，所以又購置縫紉機卅台，在聖家堂成立了一個裁縫班，招收婦女於夜間學習縫製衣物，使婦女們學得了專門技術，得以補助家庭用度，且又適應社會需要。」¹⁴²還有像拯望修女會在台北市通化街的會院，附設女生宿舍及愛民中心，輔導家境清寒失學女生，學得一技之長等。¹⁴³

130 陳方中編著，《于斌樞機傳》（台北：台灣商務，2001），頁212。

131 陳方中編著，前揭書，頁231。

132 陳方中編著，前揭書，頁231-232。

133 陳方中編著，前揭書，頁229。

134 陳方中編著，前揭書，頁232。

135 江傳德，前揭書，頁469。

136 Hollington K.Tong, op.cit., p.238。

137 江傳德，前揭書，頁932-933。

138 江傳德，前揭書，頁471-472。

139 江傳德，前揭書，頁716-717。

140 本篤會修女，《曙光前導》（台北：Ou Yü Publications，1980），頁57。

141 江傳德，前揭書，頁878。

142 牛川海，前引文，頁39。

143 江傳德，前揭書，頁884。

總而言之，這個時期教會事業的成長迅速，種類繁多，以上五種分類中所述事業，都還只是大要性質。從各項教會事業的發展，可以清楚看出從大陸來台的修會和修女會，對於戰後台灣天主教的貢獻，他們運用己所擅長的工作方式，自行招募解決經費問題，或出版刊物，或義診醫療，或辦學興教，或社會服務，在短短不到二十年的時間裡，讓天主教的事工遍佈台灣本島甚至離島，他們為台灣天主教帶來新的傳教方式，注入新的活力，也打造出一種新的天主教形象，一種更普及民眾、更貼近生活、也更使人印象深刻的新形象。

美援物資的發放

教會事業的成長，作為傳教方式的新模式，絕對會影響天主教會在戰後的新形象，然而，另外一種不可忽視的、深具戰後特色的教會工作—美援物資的發放，同樣地也深深的影響了那個世代的台灣人對於天主教會的觀感和看法，即使後來天主教會中的有些人士在回顧此段歷史時，對此時期的福利品發放過程也有不同的看法。

美援物資發放的背景，是指在韓戰爆發之後，美國對於台灣的軍援和經援，從 1951 年到 1965 年，十五年間，台灣接受美援的總額達 41.5 億美元。民生物資的發放，也是屬於美援的一環：「美國國外業務署負責督導分發是項美國人民捐助全世界貧苦人民之食物，共計約六百萬包。上述之美天主教福利會及基督教門諾救濟會係美國兩私人救濟機構，在台灣對自由中國人民貢獻甚大。一年之內發放近三百五十萬磅之食物，衣著及藥品予台灣及台灣外圍各界人民。」¹⁴⁴台灣天主教會負責美援物資發放的單位是天主教福利會，自 1950 年起在台北承辦美援物資之協調與發放等業務，首任主持人是美籍齊見賢神父 (Gaspard Gerardy)，從 1952 年起，主持人改為美國瑪利諾會高方濟神父 (Francis J. O'Neill)。該會服務項目為分發救濟物資，包括美國政府所贈剩餘農產品，美國主教團紐約福利總會所收集之人民所捐贈衣物、藥品、醫療器材。¹⁴⁵隨著美援從 1965 年之後逐年減少，最後在 1971 年停止，該會關於美援物資發放的事務也逐漸停止，後來轉型成為慈善性質的財團法人。¹⁴⁶

美援物資發放的對象、種類和細節等，可以從 1956 年 2 月 6 日聯合報的一篇報導裡，獲得詳細的瞭解：

美國教會(包括天主教和基督教)去年捐贈給中國人民的剩餘農產品及衣物，共值美金四百四十萬二千九百九十二元一角三分，今年捐贈的比較去年更多，估計可值美金七百九十二萬九千五百九十元。

這是免費贈給中國人民的，和美國政府撥給中國政府的剩餘農產品，完全是兩件不相關的事。中國政府曾要求美國政府，在今年內撥給價值美金三千四百萬元的剩餘農產品，此事目前尚在商談中。美國教會捐助的剩餘農產品，完全是救濟性的，據說，它的來源中的一部份，也是由美國政府撥贈給美國教會的。

美國教會去年捐給中國人民的剩餘農產品和衣物，包括牛油五萬三千四百五十二箱，棉子油五萬五千七百七十二箱，奶粉十五萬三千三百五十二

144 〈美贈我貧民食物以運抵基隆充作聖誕禮物〉《聯合報》(1954.12.21, 03 版)。

145 江傳德，前揭書，頁 939。

146 參考自〈財團法人天主教福利會〉網站(http://cathwel.womenweb.org.tw/AboutUs_Show.asp)。

箱，另有一批奶粉七千八百三十二箱，衣服六千三百零二包，鞋子一千五百二十九包，各種食品三百七十一箱，聖誕花十五萬支。

上述物品，大部份已於去年分發，還有一小部份目前仍在繼續分發中。據有關方面說，分發的對象，包括台灣山地同胞二萬人，漁民三萬三千人，大陳義民一萬八千人，礦工四十六百人，鹽工一萬八千五百人，及經由全省一百五十個天主教分發站分發給一般貧民十五萬人。

美國教會今年捐贈給中國人民的剩餘物資種類及數量，目前已有一個大致的估計數字如下：小麥一萬七千八百二十三噸，黃豆一萬一千八百六十六點四噸，穀粉六千五百二十點四六噸，棉子油九千一百七十五點九噸，奶粉六千七百七十九點三噸，棉花千六百六十八點二三噸，估計共價美金七百九十二萬九千五百九十元。

該報導又繼續說明對這些福利品分發的對象及方式：

此間教會正和美國國際合作總署中國分署及中國政府機關，對於上述物質運來台灣所需運貨和在台灣分發所需費用如何負擔的問題，以及如何分發的方式，會商具體辦法。這些物資，日前也還未運到台灣。據中央社所悉，這些物資將來分發的對象大致如下：

(一)大陳義胞五千一百〇七戶一萬九千人，每人每天發給小麥二盎司半，黃豆二盎司，棉子油一盎司，奶粉一盎司，每戶每年發給穀粉二十五磅，棉花十磅。

(二)外圍島嶼居民一萬〇七百〇五戶五萬一千四百人，每人每天發給小麥五盎司，黃豆二盎司，棉子油二盎司，奶粉一盎司，每人每年發給穀粉二十磅，每戶每年發給棉花十磅。

(三)台灣山地同胞一萬七千五百四十二戶九萬五千五百〇七人，每人每天發給小麥二盎司半，黃豆二盎司，棉子油二盎司，奶粉一盎司，每戶每年發給穀粉二十五磅，棉花十磅。

(四)台灣一般人民四十七萬五千人，每人每年發給小麥二十磅，黃豆十五磅，穀粉十五磅，棉子油十磅，奶粉十磅，棉花三磅。

(五)公務人員，軍眷及孤兒院(由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分發)六萬人，每人每年發給小麥二十磅，黃豆十五磅，穀粉十五磅，棉子油十磅，奶粉十磅，棉花三磅。

(六)收入稍低的工人四萬人(包括漁民、港工、礦工，及鹽工)每人每年發給小麥二十磅，黃豆十五磅，穀粉十五磅，棉子油十磅，奶粉十磅，棉花三磅。

(七)還有小麥一千噸，黃豆七百五十噸，穀粉七百五十噸，棉子油五百噸，奶粉五百噸，及棉花五百噸，保留供作緊急及災禍救濟之用。¹⁴⁷

由 1956 年的這篇報導，可以看到當時美援物資發放的數量之高，物資種類之多，對象之廣，根據董顯光的說法，直到 1961 年，台灣有五分之一的人得到過救濟物資。¹⁴⁸戰後經濟凋蔽，人民普遍窮困，美援物資的吸引力格外強大，各地教會—包含天主教和基督新教—身為發放物資的最小單位，第一次感受到這麼多教外人民願意主動走入教堂、接近傳教士，對於以增加教徒人數、推廣基督信仰為最終目的的教會而言，這確實是千載難逢的好時機，而救濟品也的確是引人入教的強烈媒介，不少地區的開教都是以發放救濟品先打頭陣，在原住民地區效果似乎更顯著，如同南投眉溪部落和蘭嶼的開教：

那時賈神父（賈振東，Armand Jacques）到埔里後，聽說山區還有很多部落，有很多人住，而山區物資極為缺乏，大家都很窮，因此賈神父便開著吉普車來發救濟品，和部落的人交朋友，「Dame Toreh 來送東西」的消息很快的傳遍 Tongang 及 Sipo 部落，從此，每次賈神父送救濟物資來，部落的人就會被通知道路邊領救濟物資，賈神父藉此開始了他山地傳教的第一步—吸引百姓。¹⁴⁹

由於救濟品的發放所建立起的友誼，當賈神父開始開道理班的時候，部落的人都會去聽。Iwan Pawan 回憶說：「那時候全村都去聽，我媽媽也去，想說哪有那麼好的，有麵粉、有奶粉、有 Vitamin……。」¹⁵⁰

si-sasagazo（敬仰天主）是本地達悟族人給紀神父（紀守常，Alfred Giger）起的名字。當時，蘭嶼地區食糧嚴重短缺，紀神父每次帶來大批的救濟物資，神父發放的立場是不分教派，按每戶的人口數，包括剛出生的嬰孩，都是發放乙份。此時，改信天主教的人口最多，大都是為了救濟品，對天主的信仰卻是很小。

紀神父帶來救濟物資，都會用日語說：「mizoko（牛奶）tabizo（吃下）sasagazo（敬仰天主）ano lingkiyo（有精神）」。意思是「喝下牛奶會有精神敬仰天主。」所以每次紀神父來蘭嶼時，達悟族人就說 si-sasagazo 來了。¹⁵¹

不管是瑪利諾會的賈振東神父，或是白冷外方傳教會的紀守常神父，他們在進入一個新地區準備傳教之初，都不約而同運用美援物資來跟當地居民「交朋友」，而且他們都很聰明地在一開始就以全部落或全村作為發放對象，而不以是天主教徒或是基督新教徒而有所分別，這樣的作法成功地吸引了許多外教徒甚至原本的基督新教徒加入天主教會。原住民因救濟物資而產生一窩蜂的皈依現象，當時甚至在新竹議會引發討論：

147 〈美教會將繼續贈我大量農產品及衣物 估計約可值八百萬美元 去年贈我物品多已分發〉《聯合報》（1956.02.06，03 版）。

148 Hollington K. Tong, op.cit., p.235。

149 簡鴻謨等，《當達悟遇上基督》，頁 44。

150 簡鴻謨等，前揭書，頁 47。

151 Syapen-sorong（謝加仁）口述，謝永泉騰錄，〈天主教蘭嶼傳教史〉，收入於簡鴻謨等著，《當達悟遇上基督》，頁 44。

一個值得我們研討的宗教信仰的問題，於十三日上午在新竹縣議會大會席上，由山地出身議員張文星，朱新喜兩人提出討論。

他們指出近來天主教、基督教教會，均利用尖石、五峰兩鄉山胞生活困苦機會，一再配給牛奶粉，牛油及衣服等，同時又爭相在該地新設教會吸收新信徒，使一般民眾及學童均放棄原有生活方式只知信仰，例如十一日天主教教宗庇護十二世八十壽誕，新竹市舉辦紀念大會時，尖石、五峰山胞均不避路途遙遠，趕往參加，致使鄉公所當局發動的義務勞動無法進行。朱新喜、張文星兩議員呼籲政府當局採取一個「適可而止」方法，以避免山胞荒廢事業。¹⁵²

其實不只是在原住民地區引起爭議，外界也出現了異樣的眼光，天主教內部人士亦知悉：「信教的動機，真可以說形形色色，各樣都有。……對一般知識較低的人士，說起來更難聽了，他們說我們教友信教是信奶粉教。」¹⁵³「奶粉教」也好，「麵粉教」也好，這些名稱通通都凸顯出了在這個時候，天主教在一般人民心中最深刻的一個特色—救濟物資，成為那一代人的歷史記憶。

更弔詭又有意思的是，基督宗教在剛傳入中國和台灣時，一般人也多視信教者為「食教仔」，意思就是指稱教徒依附教會權勢，貪圖教會好處，而非純然的接受信仰。歷經改朝換代，天主教在台灣傳教了百年後，原先被視為可以依恃外國身份，提供教徒政治保護的角色消退，取而代之的是被認為提供教徒物質上的誘因。然而，美援物資的救濟性質畢竟截然不同於晚清的洋人保護傘身份，而物資的施放對象也並不止於教徒自身，對天主教會而言，或許教徒信教的動機起先可議，但是入教之後可以慢慢導正「我們不能承認每一個教友信教的動機都是那麼不正，但我們也不能否認有些人他最初來信教的動機，或許不太正確；但這種教友，最初信教動機雖不太崇高，可是等待他對於教義認識清楚以後自然會修正。」¹⁵⁴或許外界視天主教在利用物資傳教，但是其實並非領救濟物資就得被迫入教「我們傳教斷不可以不擇手段，如果為了想救人靈魂，當然不妨幫助一點物質的利益，可以送給他一些東西，或者介紹他們到教會學校讀書、或者介紹到教會醫院治病，藉著這個機會，給他講些道理。用一些救濟物品贈送給需要的窮人，這是正大光明的，猶如辦慈善事業、教育事業，都是有益於人類社會的，但是不能利用物質利益為奉教的交換條件，更不能以教育機會強迫別人奉教。應該一再聲明，救濟是一件事，奉教又是另一件事，就是需要救濟的窮人，奉教也給他，不奉教也給他。」¹⁵⁵方豪神父的這兩段話，或者可以作為天主教面對發放美援物資，和因其而吸引信徒入教所抱持的態度註腳。

肆、結束語

本文以 1945—1948 年的恢復時期和 1949—1965 年的巨變時期，作為討論的

152 〈信教可獲實物 山胞趨之若鶩 新竹議員提出討論〉《聯合報》(1956.03.14, 05 版)。

153 方豪演講，張孝昭等記錄，〈我們為什麼信教〉《恆毅月刊》第十卷第三期，台北：恆毅月刊社，1960.10，頁 19。

154 方豪演講，張孝昭等記錄，〈我們為什麼信教〉《恆毅月刊》第十卷第三期，台北：恆毅月刊社，1960.10，頁 19。

155 方豪演講，張孝昭等記錄，〈我們為什麼信教〉《恆毅月刊》第十卷第三期，台北：恆毅月刊社，1960.10，頁 20。

分期架構，以便於看出 1949 年大陸教區神職人員和各個修會遷台之後，對於台灣天主教所造成的衝擊影響。在巨變時期中，則以遷入台灣的天主教人與教會組織的建立、傳教工作、社會事業發展、美援物資的發放等層面，來敘述觀察戰後天主教的改變與特色，希望能夠在各項統計數字之外，補充些許這段時期的歷史現象。

此期的台灣天主教會與前兩期大不相同，主要的改變是大量的神職人員以及教友從大陸來台，使得原來只有十多人在傳教的地區一下子擠進一千多位神父修女會士的專職工作者，這恐怕是連世界教會史上都少見到的在一個土地上有如此多的宗教人士，甚至連許多主教也流亡到這塊土地上。雖然，有些團體及個人不被允許前來，但是當時確已是頗為眾多，教會雖然很快增設監牧區，又成立聖統制，但各區監牧及主教仍然很難接納及消化這些修會及教區的神職。無論如何，這些人士總是有助於福傳，因此我們看到從 1950 年代起，教友人數的激增，從萬把人到 1965 年的接近三十萬人。

這三十萬人中，其中除原住民外，皈依最多的恐怕還是外省族群。歷來的研究探討漢人皈依的因素，如瞿海源教授以為可從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變遷及教會本身的狀況來分析。作為流亡來台的人，心中渴望有宗教的撫慰；經濟上福利物質的發放也提供不少人的基本需要，但後來因為經濟生活的改善及人口外移，減低了宗教的需求而教友人數漸減。¹⁵⁶ 但是宋光宇教授卻不認為經濟好轉降低宗教需求，因為他注意到有些人放棄天主教後很快就蓋了廟宇。換言之，人們還是有其宗教需求，而當時皈依的主要原因是為了麵粉等福利物品。¹⁵⁷ 然而，在當時全台灣不論何種族群也接受福利品的救濟，如果說人們接受福利品才信天主教，那麼何以構成台灣大部分居民的閩南客家族群，在當時也一體均霑福利救濟品，接受天主教信仰的卻那麼少。因此，整體而言，當時天主教所提供的教會生活，賦予「流亡」的大陸人「定著下來」的各項生活所需，也符合「歷史社會條件」。有一項研究指出了當時的現象：¹⁵⁸

在田野中，普遍的現象是同為中國流亡者的眷村居民別主動親近天主教聖職人員，並進而加入教會；共同可供分享的流亡經驗與歷史記憶、文化和語言的同質性在此展現了強大的「拉力」(pull)；不單是中國籍神父，連外國神父都跨過了這道邊界，能夠同「講國語」的流亡者建立起直接關係。

外籍神父、聖誕節、同樂會、福利品、英文補習班……，「平常不信教的也湊合看來」，天主教聖職人員在 1950 年代的台灣展現了輕易地向外跨越邊界的能力，鄰近眷村的天主教堂扮演了差異群體的中國流亡者彼此間重建社會關係的功能已經不單只是個結點(link)，她更像是個社會的中心(center)；相較於台灣民間的社會中心「廟宇」，中國流亡者眷村「間」則出現了「教堂」。

156 瞿海源，〈台灣地區天主教發展趨勢之研究〉，《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第 51 期 (1981)，129-154。

157 宋光宇，〈試析四十年來台灣宗教發展情形〉，《台灣經驗(二)——社會文化篇》，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4，頁 175-224。

158 張傳聖，《1950-60 年代台灣天主教聖職人員的日常生活經驗研究》，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頁 62-63。

這段文字生動地說明了當時皈依的大陸人與傳教士之間的緊密關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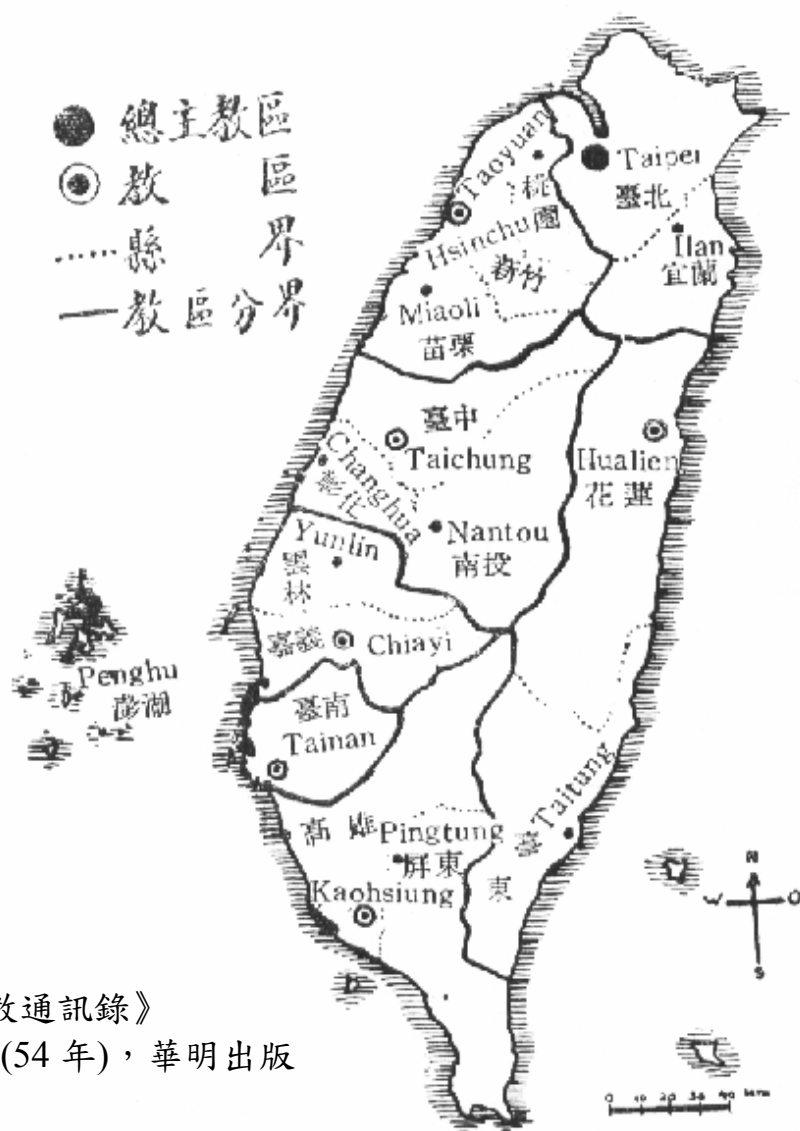
投入這麼多的人力物力與財力，所得的成果似乎並不相稱，尤其是從現在來看，許多早年的皈依者，不久又離開天主教了，當然其中的因素不是簡單可以一筆帶過的，然而其中有一點不可否認的是，從大陸來台的神職人員，除了福建南部少數道明會外，絕大多數都是使用北京話的國語來傳教，自然而然，傳教的對象是外省族群及原住民，也因此將主要的資源也使用在這些人身上，而其效果自然不會呈現在台灣的閩客人士上。

截至 1965 年為止，台灣天主教會大致形成今日的面貌。教友數目為 283,074 人；根據 1964 年的統計，男傳道員有 895 人，女傳道員有 476 人，共計 1,371 人，是台灣教會史上傳道員最多的一年¹⁵⁹。1965 年的統計，全台總計有 731 位神父，792 位修女，而全省七個教區的主教，除了花蓮的費聲遠及台中的蔡文興，其餘都是國籍神職。地方教會的色彩愈來愈明顯。

經過這數十年的發展及演變，以及國際局勢的變化，特別是在 1960 年代舉行的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之後，以至於今日全球「去基督化」(de-Christianized) 的風潮下，台灣的天主教逐漸邁向一個真正的地方教會。雖然人數不是很多，但也不會像以往的暴起暴落，接受信仰的多為單純的尋求人生意義的人，未來的理想應是不但要求量的增加，更講求質的提昇；不但尋求更進一步的本地化，也要在普世教會中佔有不可忽視的角色。而一百五十年來三個階段的台灣天主教會史，是為這個目標從各方面奠定其基礎。

159林淑理，〈台灣天主教傳道員之福傳生涯與培育〉，臺北：天主教輔仁大學宗教學系碩士論文，2005，頁 134。

附圖一，天主教在台分佈圖：七教區



資料來源：

《臺灣天主教通訊錄》

1965(54年)，華明出版

附錄一：神職人員與教友數目（1952-1965）

年度	Priests	Brothers	Sisters	Catholics
1952	—	—	—	20,112
1953	164	14	157	25,075
1954	296	28	214	32,310
1955	374	49 (33) ¹⁶⁰	222	48,517
1956	440	41	258	81,712
1957	508	39	312	114,779
1958	538	47	349	144,731
1959	591	55	392	163,453
1960	648	67	479	182,450
1961	652	65	577	202,240
1962	628	75	549	220,501
1963	700	95	656	244,814
1964	712	73	716	265,564
1965	731	82	792	283,074

160 1956 年的《台灣天主教教士通訊錄》（台北：華明書局，1956）中，1956 年在台修士的人數是 49 人，不過 1957 年的《台灣天主教教士通訊錄》（台北：華明書局，1957）中，1956 年在台的修士變成 33 人。

附錄二：天主教教務各項統計資料（1954-1965）

Statistics-from 1 July 1954 up to 30 June 1955

Dioceses (教區)	台北	台中	嘉義	高雄	花蓮	總計
Population	2,858,418	1,800,000	1,137,526	2,589,700	300,347	8,685,991
Catholics	13,301	8,212	4,203	16,811	5,621	48,148
% of Catholics						
Priests (神父)	181 ¹	75 ²	36 ³	60 ⁴	28 ⁵	380
Sisters (修女)	84	63 ⁶	18 ⁷	68 ⁸	15 ⁹	248
Seminaries (神學院)	1 ¹⁰			1 ¹¹		2
Major Seminarians (大修生)						
Minor Seminarians (小修生)						

1 Chinese 57;Foreign 124。

2 Maryknoll Priests 36;Jesuit 25 ;Chinese 11;Viatorian 3

3 Bishop 1;Chinese Priests 26;S.J. 6;S.V.D. 2;S.A.M. 1

4 Dominican 33;Franciscan 8;Lazarist 5;Camillan 2;S.V.D 1;Chinese 11

5 Bishop 1;Missionaries 23;Chinese Priests 4

6 Providence Sisters 7;Maryknoll 4;Sisters of Mercy 4;S.H.of Mary's Sisters 48

7 Chinese Sisters

8 Dominican Sisters Foreign 14、Chinese 11;Franciscan Sisters Foreign 14、Chinese 19;Imm.H.of Mary's Sisters 3。

9 Chinese Sisters 11;Foreign 4

10 Minor Seminary.

11 Minor Seminary 聖若瑟修院。

Catechists (傳道員)			19 ¹²	89 ¹³		108
Kindergartens (幼稚園)	45	3 ¹⁴	2	10	4 ¹⁵	64
Orphanage (孤兒院)		1				1
Middle Schools (中學)		2				2
Students in Middle Schools		710				710
Technical Schools (技術學校)						
Students in Technical Schools						
Schools for Catechists(傳道學校)		2 ¹⁶		1	7	10
Students Catechists		43			115	158
Colleges						
Students in Colleges						
Hospitals (醫院)	1 ¹⁷	1 ¹⁸		1		3
Dispensaries (診所、藥房)	12	3	1	1	5	22
Cemeteries (聖山)	1	2		2		5

12 Male 12;Female 7

13 Male 62;Female 27

14 Students 540

15 Students 340

16 1M1F

17 聖母醫院，位於宜蘭縣羅東鎮，由靈醫會管理。

18 惠華醫院，位在台中市市府路。

附錄二：天主教教務年度統計資料（1954-1965）

Statistics-from 1 July 1955 up to 30 June 1956

Dioceses (教區)	台北	台中	嘉義	高雄	花蓮	總計
Population	2,858,418	1,800,000	1,200,980	2,698,000	358,994	8,916,392
Catholics	24,141	12,707	5,559	25,415	13,890	82,712
% of Catholics	0.84%	0.7%	0.46%	0.94%	3.86%	0.92%
Priests (神父)						
Sisters (修女)						
Minor Seminaries (神學院)	1			1	1	3
Major Seminarians (大修生)				2		
Minor Seminarians (小修生)	9 ¹⁹			23		
Catechists (傳道員)			34	164	226	424
Kindergartens (幼稚園)	84	3	3	10	8	108
pupils		540		1,099	845	
Orphanage (孤兒院)		1				1
Middle Schools (中學)	1G	1B1G				3
Students in Middle Schools	1,300	546				1,856

¹⁹未說明是大修生或小修生。

Schools for Catechists(傳道學校)		1M1W	1M	1M	7M	11
Students Catechists		30		20	106	156
Students in Colleges						
Hospitals (醫院)	1	1	1	1		4
Dispensaries (診所、藥房)	16	3	2	10	4	35
Cemeteries (聖山)	1	2		2		5

Priests And Brothers

Dioceses (教區)	台北	台中	嘉義	高雄	花蓮	總計
Secular Clergy 會外神職班	47	10	25	11	3	96
CDD.主徒會	14					14
Pr.	4					4
Schol.	2					2
Nov.						
Br.	2					2
CICM.聖母聖心會	9					9
CM.遣使會	8			9		17
CR.聖奧斯丁會	2				2	4
CSJB.耀漢小兄弟會	4					4
Pr.	3	1				4
Br.						

CSV.衛道會 Pr. Br.		4				4
		5				5
MEP.外方傳教會					18	18
MI.靈醫會 Pr. Br.	5			2		7
	4			2		6
MM.瑪利諾會 Pr. Br.	16	41				57
		3				3
OFM.方濟各會 Pr. Br.	22			8		30
				1		1
OP. 聖道明會 Pr. Br.	2			39		41
	1					1
OSB.本篤會 Pr. Br.			1			1
			1			1
SAM.	4		2			6
SJ.耶穌會 Pr. Br.	96	22	6			124
	13	4	1			18
	12					12

Sch.						
SMB.白冷外方傳教會					15	15
SSC.聖葛隆巴會	1					1
SVD.聖言會			2	1		3
TOTALS						
Pr.						
Br.						
Sch.&Nov.						

Sisters

Dioceses (教區)	台北	台中	嘉義	高雄	花蓮	總計
CMRS.中華聖母會			12			12
CSC.聖十字架會					7	7
CSF.聖家獻女傳道會				2		2
CST.聖德來會	5					5
DC.仁愛會修女	10					10
DP.主顧修女會 ²⁰			5			5
主顧傳教修女會 ²¹		2				2
主顧修女會 ²²		9				9

20 Congr. Divinae Provid.

21 Providence Catechist Srs

22 Sisters of Providence

FI.耶穌孝女會	10					10
FMM.方濟各會	9					9
ICA.雷鳴遠女子服務團	4					4
MI.靈醫女修會	6					6
MIC.聖母無原罪女修會	14					14
MMB.仁慈聖母傳教會	8					8
OP.聖道明傳教修女會	10			6		16
OP.聖玫瑰道明傳教修女會				5		5
OP.聖若瑟道明修女會				12		12
OP.福寧道明修女會			7	9		16
OP. (MKS.)	6	7				13
OSB.本篤修女會	5					5
OSC.烏蘇拉聖心會						
OSF.聖家獻女傳道會						
Professed						
Novices						
Postulants						
OSF.耶穌聖嬰方濟各修女會						
OSU.吳蘇辣羅馬聯合會						
PSC.主顧傳教修女會						

RSCJ. 聖心修女會						
SDS. 救主修女會						
SMI. 聖女瑪爾大修女會						
SMIC. 聖母無原罪傳教修女會				27		27
SP. 主顧修女會						
SSH. 耶穌聖心修女會		5+1 (Novic.) +13 (Aspir.)				
SSpS. 聖神會	10					10
FCC. 仁慈傳教會		4				
TOTALS						

附錄二：天主教教務年度統計資料 (1954-1965)

Statistics-from 1 July 1956 up to 30 June 1957

Dioceses (教區)	台北	台中	嘉義	高雄	花蓮	總計
Population	3,208,979	1,935,622	1,234,111	2,800,000	358,994	9,537,705
Catholics	38,327	16,665	6,823	35,040	17,924	114,779
% of Catholics	1.2%	1.2%	0.5%	1.4%	4.6%	1.23%
Priests (神父)						

Sisters (修女)						
Minor Seminaries (神學院)	1 ²³			1		2
Major Seminararians (大修生)			1	2		3
Minor Seminararians (小修生)	9		2	17		28
Catechists (傳道員)	398	?	45	183	233	
Kindergartens (幼稚園)			4	14	18	36
Pupils			780	1,855	1,257	3,892
Orphanage (孤兒院)		1				1
Middle Schools (中學)	1G	1B1G				3
Students in Middle Schools	1,810	670				2,480
Schools for Catechists(傳道學校)						
Students Catechists						
Colleges		1 ²⁴				1
Students in Colleges		300				300
Hospitals (醫院)	1	1	1	2		5
Dispensaries (診所、藥房)	19	4	3	13	6	45
Cemeteries (聖山)	1	2		2	1	6

23 小修院 (Diocesan Seminary)，位於台北市中山北路四段八巷十七號，院長是崔瑞安。

24 靜宜英專 (Providence English Colledge)，位於台中市復興路三〇三號之一，由主顧修女會管理。

Priests And Brothers

Dioceses (教區)	台北	台中	嘉義	高雄	花蓮	總計
Secular Clergy 會外神職班	51	10	25	11	3	100
CDD.主徒會	11					11
Pr.	1					1
Br.	4					4
Sch.	2					2
Nov.						
CICM.聖母聖心會	16					16
CM.遣使會	8		4	10		22
CR.聖奧斯丁會	2				3	5
CSJB.耀漢小兄弟會	3	1				4
Pr.	3	1				4
Br.						
CSV.衛道會		3				3
Pr.		4				4
Br.						
MEP.外方傳教會					17	17
MI.靈醫會	6			2		8
Pr.	4			3		7
Br.						
MM.瑪利諾會	14	47				61

Pr. Br.		3				3
OFM. 方濟各會	20			7		27
Pr. Br.				1		1
OP.聖道明會	2			38		40
Pr. Br.	1					1
OSB.本篤會			1			1
Pr. Br.			1			1
SAM.	4		2			6
SJ.耶穌會	97	16	7			120
Pr.	14	4	2			20
Br. Sch.	14					14
SMB.白冷外方傳教會					20	20
SSC.聖葛隆巴會	1					1
SVD.聖言會			1	2		3
TOTALS	235	77	40	70	43	465
Pr. Br.	23	12	3	4		42

Sisters

Dioceses (教區)	台北	台中	嘉義	高雄	花蓮	總計
CMRS.中華聖母會	12					12
Professed						
Novices	5					5
Postulants	3					3
CSC.聖十字架會					7	7
CST.聖德來會	5					5
FCC.仁慈傳教會		3				3
FI.耶穌孝女會	11					11
FMM.方濟各會	9					9
ICA.雷鳴遠女子服務團	4					4
MI.靈醫女修會	5					5
MIC.聖母無原罪女修會	14					14
MMB.仁慈聖母傳教會	8					8
OCD.聖衣會	9					9
OP.聖道明傳教修女會	9					
Professed				7		16
Novices				5		5
Postulants				4		4
OP.聖玫瑰道明傳教修女會				16		16
OP.聖若瑟道明修女會				15		15

OP.福寧道明修女會			7			7
OP. (MKS.)	9	9				18
OSB.本篤修女會	5					5
OSF.聖家獻女傳道會 Professed Novices		2				2
		9				9
OSF. (HI.) 耶穌聖嬰方濟各修女會	4					4
PSC.主顧傳教修女會		8	6			14
SCM.聖母聖心修女會	9			3	10	22
SMIC.聖母無原罪傳教修女會 Professed Novices				30		30
				4		4
SP.主顧修女會		11				11
SSH.耶穌聖心修女會		6				6
SSpS.聖神會	8		2			10
TOTALS	109	81	27	71	17	305

附錄二：天主教教務年度統計資料 (1954-1965)

Statistics-from 1 July 1957 up to 30 June 1958

Dioceses (教區)	台北	台中	嘉義	高雄	花蓮	總計
---------------	----	----	----	----	----	----

Population (1956)	3,208,979	1,935,622	1,234,111	2,800,000	358,994	9,537,705
Catholics	48,836	21,630	8,062	41,137	25,086	114,751
% of Catholics	1.2%	1.2%	0.5%	1.4%	4.6%	1.23%
Priests (神父)						
Sisters (修女)						
Minor Seminaries (神學院)				1		1
Major Seminarians (大修生)			1	2		3
Minor Seminarians (小修生)	5	3	2	28	14	52
Catechists (傳道員)	400	134	60	198	209	1001
Kindergartens (幼稚園)	12		7	15	30	67
Orphanage (孤兒院)		1				1
Middle Schools (中學)	1B ²⁵ 1G	1B		1B		4
Students in Middle Schools	1,775	500		?		
Technical Schools (技術學校)	1					1
Schools for Catechists(傳道學校)	2	2			1	5
Colleges		1				
Students in Colleges		377				
Hospitals (醫院)	1	1	1	3		5

25 恆毅中學 (Heng Y Middle School)，位於台北縣新莊，校長是主徒會的范文忠。

Dispensaries (診所、藥房)	17	4	7	10	6	44
Cemeteries (聖山)	1	2		2	1	6

Priests And Brothers

Dioceses (教區)	台北	台中	嘉義	高雄	花蓮	總計
Secular Clergy 會外神職班	54	13	33	11	12	123
CDD.主徒會	12					12
Pr.	1					1
Br.						
Sch.	6					6
CICM.聖母聖心會	17					17
CM.遣使會	8		4	11		23
CR.聖奧斯丁會					6	6
CSJB.耀漢小兄弟會	2	1				3
Pr.	1	3				4
Br.						
CSV.衛道會		3				3
Pr.		4				4
Br.						
MEP.外方傳教會					18	18
MI.靈醫會	6			2		8

Pr. Br.	5			3		8
MM.瑪利諾會	20	48				68
Pr. Br.	1	3				4
OFM.方濟各會	24			8		32
Pr. Br.				2		2
OP.聖道明會	2			44		46
Pr. Br.	1			1		2
OSB.本篤會			1			1
Pr. Br.			1			1
SAM.	4		3			7
SJ.耶穌會						
Pr.	117	21	9			147
Br.	15	4	2			21
Sch.	8					8
Nov.	7					7
SMB.白冷外方傳教會					20	20
SSC.聖葛隆巴會	1					1
SVD.聖言會			1	2		3

TOTALS						
Pr.	267	86	51	78	56	538
Br.	24	14	3	6		47
Sch.&Nov.	21					21

Sisters

Dioceses (教區)	台北	台中	嘉義	高雄	花蓮	總計
CMRS. 中華聖母會			12			12
Professed			5			5
Novices			7			7
Postulants						
CSC. 聖十字架會					7	7
CST. 聖德來會	5					5
FCC. 仁慈傳教會		2				2
FI. 耶穌孝女會	10					10
FMM. 方濟各會	11					11
ICA. 雷鳴遠女子服務團	4					4
MI. 靈醫女修會	5					5
MIC. 聖母無原罪女修會	14					14
MMB. 仁慈聖母傳教會	8					8
OCD. 聖衣會	9					9

OP.聖道明傳教修女會	13			12		25
Professed				8		8
Novices				2		2
Postulants						
OP.聖玫瑰道明傳教修女會				14		14
OP.聖若瑟道明修女會				17		17
OP.福寧道明修女會			8			8
OP. (MKS.)	11	8				19
OSB.本篤修女會	8					8
OSC.烏蘇拉聖心會	2					2
OSF.聖家獻女傳道會						
Professed				14		14
Novices				15		15
Postulants				10		10
OSF.耶穌聖嬰方濟各修女會	4					4
OSU.吳蘇辣羅馬聯合會					5	5
PSC.主顧傳教修女會		12	5			17
SMIC.聖母無原罪傳教修女會						
Professed				33		33
Novices				7		7
Postulants				4		4
SP.主顧修女會		10				10

SSH.耶穌聖心修女會						
Professed		5				5
Novices		4				4
Postulants		7				7
SSpS.聖神會	10		2			12
TOTALS	123	86	27	93	20	349

附錄二：天主教教務年度統計資料（1954-1965）

Statistics-from 1 July 1958 up to 30 June 1959

Dioceses (教區)	台北	台中	嘉義	高雄	花蓮	總計
Population	3,809,580	1,970,523	1,360,000	2,990,000	358,994	10,389,097
Catholics	55,142	24,703	9,067	45,211	29,330	163,453
% of Catholics	1.4%	1.2%	0.7%	1.5%	8.5%	1.57%
Priests (神父)						
Sisters (修女)						
Minor Seminaries (神學院)	1 ²⁶			1 ²⁷		2
Major Seminarians (大修生)			1	2		3
Minor Seminarians (小修生)				30	14	44
Kindergartens (幼稚園)	12	7	10	15	48	

26 聖若瑟修院 (St. Joseph's Seminary)，位於台北縣新莊，院長是 SAM 的裴效遠 (Rev. Albert Palmers)。

27 聖若瑟小修院 (St. Joseph's Min. Seminary)，位於高雄市苓雅區五塊厝，院長是倪幼民。

Orphanage (孤兒院)		1 ²⁸				1
Middle Schools (中學)	1B1G	1B		1B	1G ²⁹	5
Students in Middle Schools	1,775	490		? ³⁰	?	
Technical Schools (技術學校)	1				1	2
Schools for Catechists(傳道學校)	2	1			3	5
Catechists (傳道員)	400	139	52	198	209	998
Colleges		1				1
Students in Colleges		365				365
Hospitals (醫院)	1	1	1	3		6
Dispensaries (診所、藥房)	17	10	7	10	9	53
Cemeteries (聖山)	1	1		2	1	5

Priests And Brothers

Dioceses (教區)	台北	台中	嘉義	高雄	花蓮	總計
Secular Clergy 會外神職班	56	14	37	13	15	135
CDD.主徒會	20					20
Pr.	1					1

28 天主教孤兒院 (Catholic Orphanage)，位在彰化縣埔心鄉羅厝天主堂，由聖母聖心修女會管理。

29 海星女子中學 (Stella Maris Middle School)，位於花蓮縣新城鄉嘉里村，由吳蘇辣羅馬聯合會管理。

30 教區中學的學生數未記錄。

Br.						
CICM. 聖母聖心會	15	2				17
CM. 遣使會	10		3	11		24
CR. 聖奧斯丁會					6	6
CSJB. 耀漢小兄弟會	2	1				3
Pr.	2	5				7
Br.						
CSV. 衛道會		2				2
Pr.		5				5
Br.						
MEP. 外方傳教會					19	19
MI. 靈醫會	10			2		12
Pr.	6			3		9
Br.						
MM. 瑪利諾會	17	53				70
Pr.	1	3				4
Br.						
OFM. 方濟各會	32			8		40
Pr.				2		2
Br.						
OP. 聖道明會	2			43		5
Pr.	1			2		3
Br.						
OSB. 本篤會						

Pr.			2			2
Br.			1			1
SAM.	4		2			6
SDS.救主會	2					2
SJ.耶穌會	134	18	9			161
Pr.	15	4	2			21
Br.						
Sch.	11					11
Nov.	2					2
SMB.白冷外方傳教會					19	19
SSC.聖葛隆巴會	1					1
SVD.聖言會			2	6		8
TOTALS						
Pr.	305	85	55	83	59	587
Br.	26	13	3	7		49
Sch.&Nov.	13	5				18

Sisters

Dioceses (教區)	台北	台中	嘉義	高雄	花蓮	總計
CMRS.中華聖母會			15			15
Professed			4			4
Novices			7			7
Postulants						

CSC.聖十字架會					10	10
CSCM.聖母聖心修女會	9	42		3	8	62
Professed		7				7
Novices						
CST.聖德來會	5					5
DC.仁愛會修女	4					4
FCC.仁慈傳教會		2				2
FI.耶穌孝女會	11					11
FMM.方濟各會	13					13
ICA.雷鳴遠女子服務團	3					3
MI.靈醫女修會	8					8
MIC.聖母無原罪女修會	13					13
MMB.仁慈聖母傳教會	9					9
MSSA.奧斯定傳教修女會	10					10
OCD.聖衣會	8					8
OP.聖道明傳教修女會	19			15		34
Professed				8		8
Novices				2		2
Postulants						
OP.聖玫瑰道明傳教修女會				13		13
OP.聖若瑟道明修女會				19		19

OP.福寧道明修女會			7			7
OP. (MKS.)	14	9				23
OSB.本篤修女會	6					6
OSC.烏蘇拉聖心會	3					3
OSF.聖家獻女傳道會 Professed Novices Postulants				15		15
				24		24
				6		6
OSF.耶穌聖嬰方濟各修女會	4					4
OSU.吳蘇辣羅馬聯合會					7	7
PSC.主顧傳教修女會	3	10	4			17
SMIC.聖母無原罪傳教修女會 Professed Novices Postulants				32		32
				10		10
				3		3
SP.主顧修女會		10				10
SSH.耶穌聖心修女會 Professed Novices Postulants		3				3
		10				10
		3				3
SSpS.聖神會	10		2			12
TOTALS	152	76	28	97	25	378

附錄二：天主教教務年度統計資料 (1954-1965)

Statistics-from 1 July 1959 up to 30 June 1960

Dioceses (教區)	台北	台中	嘉義	高雄	花蓮	總計
Population	3,400,000	2,123,000	1,260,000	2,990,000	360,000	10,500,000
Catholics	61,677	27,572	10,937	48,491	33,674	182,450
% of Catholics	1.8%	1.3%	1.1%	1.6%	9.4%	1.7%
Priests (神父)	330	95	63	94	66	648
Sisters (修女)	225	84	28	131	22	490
Seminaries (神學院)	1	1 ³¹			1	3
Major Seminarians (大修生)			3	3		6
Minor Seminarians (小修生)	14	11	2	35	14	76
Catechists (傳道員)	437	139		224	229	1,029
Kindergartens (幼稚園)	157	7	10	23	52	249
Primary Schools (小學)	1 ³²				1 ³³	2
Children in Primary Schools	220				60	280
Middle Schools (中學)	2(1G1B)	1(1B)		1(1B)	1(1G)	5
Students in Middle Schools	3,054	500		600	208	4,362

31 聖神小修院 (Holy Spirit Seminary), 位在台中市北區衛道路一八七號, 院長是聖母聖心會的栗鵬舉 (Rev. Albert Van Lierde)。

32 道明小學 (Dominican School), 位在台北市大直北安路一〇五巷, 會長兼院長是道明會的倪恭獻 (Mo. Presentacion Guerendiain)。

33 聖若瑟小學 (Saint Joseph Primary School), 位於花蓮縣新城鄉嘉里村, 管理者是聖女瑪爾大修女會。

Technical Schools (技術學校)	1				1	2
Students in Technical Schools	30				60	90
Schools for Catechists(傳道學校)		2		1	2	5
Colleges		1				1
Students in Colleges		365				365
Hospitals (醫院)	1	1	1	4		7
Dispensaries (診所、藥房)	12	10	6	16	9	53
Cemeteries (聖山)	1	1	1	3	2	8

Priests And Brothers

Dioceses (教區)	台北	台中	嘉義	高雄	花蓮	總計
Secular Clergy	65	9	38	16	21	149
CDD.主徒會	16					16
CICM.聖母聖心會	18	2				20
CM.遣使會	10		4	16		30
CR.聖奧斯丁會					6	6
CSJB.耀漢小兄弟會						
Pr.	3	1				4
Br.	3	8				11
Sch.						
CSV.衛道會						

Pr.	2	6				8
Br.	2	5				7
FMS.主母會						
MEP.外方傳教會					19	19
MI.靈醫會	10				2	12
Pr.	12				3	15
Br.						
MM.瑪利諾會	19	54				73
Pr.		3				3
Br.						
OFM.方濟各會	31			9		38
Pr.				2		2
Br.						
OP.聖道明會	2			48		50
Pr.	1			2		3
Br.						
ORSA.重整奧斯丁會						
OSB.本篤會	1		2			3
Pr.			1			1
Br.						
SAM.	5		3			8
SDB.慈幼會						
Pr.						
Br.						

SDS.救主會	10					10
Pr.	1					1
Br.						
SJ.耶穌會	132	22	15			169
Pr.	15					15
Br.						
SMB.白冷外方傳教會						
Pr.						
Br.						
SSC.聖葛隆巴會	1					1
SVD.聖言會	3		7	3		13
Totals	330	95	63	94	66	648
Pr.	34	16	1	7		58
Br.						

Sisters

Dioceses (教區)	台北	台中	嘉義	高雄	花蓮	總計
CMRS.中華聖母會			15			15
CSC.聖十字架會					11	11
CSCM.聖母聖心修女會	10	51		3	8	72
CST.聖德來會	4					4
DC.仁愛會修女	6					6

DSP.聖保祿孝女會	5			4		9
FCC.仁慈傳教會		6				6
FI.耶穌孝女會	16					16
FMM.方濟各會	14					14
FSP.聖保祿小女會	5			4		9
ICA.雷鳴遠女子服務團	4					4
MI.靈醫女修會	9					9
MIC.聖母無原罪女修會	18					18
MM.瑪利諾女修院						
MMB.仁慈聖母傳教會	11					11
MSSA.奧斯定傳教修女會	11					11
OCD.聖衣會	9					9
OP.聖道明傳教修女會	26			15		41
OP.聖玫瑰道明傳教修女會				9		9
OP.聖若瑟道明修女會				17		17
OP.福寧道明修女會	26		9			35
OP. (MKS.)	18	9				27
OSB.本篤修女會	8					8
OSC.烏蘇拉聖心會	3					3

OSF.聖家獻女傳道會	1			26		27
OSF.耶穌聖嬰方濟各修女會	4					4
OSU.吳蘇辣羅馬聯合會				11		11
PSC.主顧傳教修女會	5	6	4			15
SMIC.聖母無原罪傳教修女會				42		42
SP.主顧修女會		10			3	13
SSH.耶穌聖心修女會		2				2
SSpS.聖神會	15					15
TOTAL	225	84	28	22	311	670

附錄二：天主教教務年度統計資料（1954-1965）

Statistics-from 1 July 1960 up to 30 June 1961

Dioceses (教區)	台北	新竹	台中	嘉義	台南	高雄	花蓮	總計
Population	2,197,925	1,391,645	2,203,162	1,450,000	1,170,000	1,850,000	389,568	10,652,300
Catholics	32,982	34,667	30,021	12,069	18,191	36,751	37,559	202,240
% of Catholics	1.5%	1.8%	1.4%	0.8%	1.5%	1.9%	9.6%	2.7%
Priests (神父)	189	142	102	54	34	61	68	652
Sisters (修女)	132	129	96	34	40	108	38	577
Seminaries (神學院)	1		1			1		3

Major Seminarians (大修生)				3	2	3		8
Minor Seminarians (小修生)	29	4	7	4	8	35	18	105
Catechists (傳道員)	74	375	158	63	39	179	215	1103
Kindergartens (幼稚園)	27	112	28	10	6	19	56	258
Primary Schools (小學)	2 ³⁴	2 ³⁵					1	5
Children in Primary Schools	852	26					96	974
Middle Schools (中學)	3(1B2G)	1(1G)	1(1B)	2(2B) ³⁶		1(1B)	1(1G)	9
Students in Middle Schools	3241	138	778	680		600	343	5330
Technical Schools (技術學校)		1					1	2
Students in Technical Schools		99					133	232
Schools for Catechists(傳道學校)		2	2			2	2	8
Colleges			1					1
Students in Colleges			406					406
Universities (大學)								
Students in Univ.								
Hospitals (醫院)	2		1	1	3	2	1	10
Dispensaries (診所、藥房)	9	29	17	6	4	13	11	89

34 增加了私立光仁小學 (Kuang Jen Primary School)，位於台北市長泰街一六號。

35 新竹教區增設曙光小學和由耶穌孝女會管理的上智小學。

36 嘉義教區增設正心中學 (Sacred Heart High School)，位於雲林縣斗六鎮虎溪里。以及永年中學，位於雲林縣土庫鎮。

Cemeteries (聖山)	1	4	1	1	1	2	2	11
-----------------	---	---	---	---	---	---	---	----

Priests And Brothers

Dioceses (教區)	台北	新竹	台中	嘉義	台南	高雄	花蓮	總計
Secular Clergy	60	17	8	27	17	6	20	
CDD.主徒會								
Pr.	16							16
Br.	1							1
CICM.聖母聖心會	10	6	3					19
CM.遣使會	9			4	5	8		26
CR.聖奧斯丁會							6	6
CSJB.耀漢小兄弟會								
Pr.	1		2					3
Br.	3		8					11
CSV.衛道會								
Pr.			3					3
Br.			5					5
FMS.主母會								
MEP.外方傳教會							20	20
MI.靈醫會								
Pr.	6				3			9
Br.	13				1			14

MM.瑪利諾會								
Pr.	2	18	59					79
Br.			3					3
OFM.方濟各會								
Pr.	12	16			9			37
Br.					2			2
OP.聖道明會								
Pr.	1				3	44		48
Br.	1					2		3
ORSA.重整奧斯丁會								
OSB.本篤會	1			2				3
SDB.慈幼會								
Pr.								
Br.								
SDS.救主會								
Pr.	10							10
Br.	1							1
SJ.耶穌會								
Pr.	51	91	27	11				
Sch.	1	16	10					
Br.	3	14	6	2				
SMB.白冷外方傳教會				22				22
SSC.聖葛隆已會	1							1
SVD.聖言會	4			7		3		14

Sisters

Dioceses (教區)	台北	新竹	台中	嘉義	台南	高雄	花蓮	總計
CMRS 中華聖母會				19				19
CSC.聖十字架會							12	12
CSCM.聖母聖心修女會	9		52	2	3		8	74
CST.聖德來會	2	15						17
DC.仁愛會修女	6				4			10
DSP.聖保祿孝女會								
FC.十字架女兒會								
FCC.仁慈傳教會			2					2
FI.耶穌孝女會	8	7						15
FMM.方濟各會		14						14
FSP.聖保祿小女會	5					3		8
ICA.雷鳴遠女子服務團	6							6
ICM.								
ITT.德來會修女								
MI.靈醫女修會	9							9
MIC.聖母無原罪女修會	6	15						21
MMB.仁慈聖母傳教會	5	11						16

MMM.聖母醫療傳教會							2	2
MSC.耶穌肋傷至聖痛苦聖母傳教修女會		5						5
OCD.聖衣會		9						9
OP.聖道明傳教修女會	27				6	15		48
OP.聖玫瑰道明傳教修女會					5	12		17
OP.聖若瑟道明修女會						22		22
OP.福寧道明修女會				7				7
OP. (MKS.) 瑪利諾女修院	4	14	11					29
OSB.本篤修女會	11							11
OSC.烏蘇拉聖心會		4						4
OSF.聖家獻女傳道會					15	19		34
OSF.耶穌聖嬰方濟各修女會	3							3
OSU.吳蘇辣羅馬聯合會							13	13
PSC.主顧傳教修女會	3		8	6				17
RSCJ.聖心修女會	6							6
SA.拯亡會		5						5
SDS.救主修女會	6							6
SMI.聖女瑪爾大修女會								
SMIC.聖母無原罪傳教修女會					7	37		44

SP.主顧修女會			10					10
SPC.沙爾德聖保祿修女會		3					3	6
SS.CC.		4						4
SSH.耶穌聖心修女會			13					13
SSpS.聖神會		17						17
SSS.社會服務修女會								
Chinese Srs.of the Precious Blood 中華寶血女修會								
Fr.Srs.of Mercy of Luxemb 盧森堡 普慈方濟各修女會		6						6
Miss.Soc.Catech.B.Lucia 貞美傳 教團								
TOTAL	132	129	96	34	40	108	38	577

附錄二：天主教教務年度統計資料（1954-1965）

Statistics-from 1 July 1961 up to 30 June 1962

Dioceses (教區)	台北	新竹	台中	嘉義	台南	高雄	花蓮	總計
Population	2,197,925	1,461,612	2,203,162	1,446,000	1,100,000	1,850,000	390,000	10,648,699
Catholics	34,992	41,104	32,934	14,186	17,000	38,725	41,560	220,501
% of Catholics	1.5%	3.6%	1.5%	1.02%	1.5%	2%	10.7%	2%
Priests (神父)	162	130	91	73	38	67	67	628

Sisters (修女)	85	147	91	44	41	102	39	549
Seminaries (神學院)	1		1		1 ³⁷	1		4
Major Seminarians (大修生)				2	10	2	1	15
Minor Seminarians (小修生)	56	8	7	12	8	37	18	146
Catechists (傳道員)	105	399	162	94	52	183	257	1252
Kindergartens (幼稚園)	38	110	43	33	9	31	62	326
Primary Schools (小學)	2	2					1	5
Children in Primary Schools	874	119					88	1081
Middle Schools (中學)	3 (1B2G)	1(1G)	1(1B)	5(3B2G) ³⁸		2(1B1G ³⁹)	1(1G)	13
Students in Middle Schools	3,588	240	900	900		700	450	6,787
Technical Schools (技術學校)		1					1	2
Students in Technical Schools		139					145	284
Schools for Catechists(傳道學校)	1	2	1	2		2	2	10
Colleges			1 ⁴⁰					1
Students in Colleges			406					406
Hospitals (醫院)	1		1	2	3	4	1	12

37 聖庇護第十修院 (Seminarium St. Pii X)，位在台南市博愛路四五號，時院長為楊成斌。

38 嘉義教區多了輔仁中學 (Fujen Middle School)，位在嘉義市吳鳳路，由聖言會管理。另外，正心中學和永年中學則增設女生部。

39 聖德女子中級補習學校 (Sheng The Night School)，位在屏東縣東港鎮，管理者為胡淑華修女 (Sr.Aurelia)。

40 靜宜英專，位在台中市復興路三段一七〇號，由主顧修女會管理。

Dispensaries (診所、藥房)	13	29	25	3	12	13	14	109
Cemeteries (聖山)	1	4	1	1		2	4	13

Priests And Brothers

Dioceses (教區)	台北	新竹	台中	嘉義	台南	高雄	花蓮	總計
Secular Clergy	77	16	5	46	23	11	16	194
CDD.主徒會								
Pr.	17							17
Br.	2							2
CICM.聖母聖心會	13	3	3					19
CM.遣使會								
Pr.	13			4		8		30
Br.	1							1
CR.聖奧斯丁會							7	7
CSJB.耀漢小兄弟會								
Pr.	1		2					3
Br.	4		7					11
CSV.衛道會								
Pr.		1	3					4
Br.		1	5					6
FMS.主母會								
MEP.外方傳教會		1					19	20

MI.靈醫會								
Pr.	8				2			10
Br.	14				2			16
MM.瑪利諾會								
Pr.	2	17	55					74
Br.			2					2
OFM.方濟各會								
Pr.	13	21			10			44
Br.					2			2
OP.聖道明會								
Pr.	1	2	2	49				54
Br.			1	3				4
ORSA.重整奧斯丁會								
OSB.本篤會								
Pr.	1			1				2
SDB.慈幼會								
Pr.								
Br.								
SDS.救主會								
Pr.	11							11
Br.	1							1
SJ.耶穌會								
Pr.	52	96	24	11				183
Br.	3	15	7	2				27
Sch.		15	7					22

SMB.白冷外方傳教會							22	22
SSC.聖葛隆巴會	1							1
SVD.聖言會	5			12		3		20
Pr.		2						2
Br.								

Sisters

Dioceses (教區)	台北	新竹	台中	嘉義	台南	高雄	花蓮	總計
CMRS.中華聖母會		2		19				21
CSC.聖十字架會							12	12
CSCM.聖母聖心修女會	10		52	5	3		8	78
CST.聖德來會	2	4						6
DC.仁愛會修女	10				4			14
DSP.聖保祿孝女會	5					3		8
FC.十字架女兒會								
FCC.仁慈傳教會			2					2
FI.耶穌孝女會	8	8						16
FMM.方濟各會	7	13						20
ICA.雷鳴遠女子服務團	8							8
ICM.								

ITT.德來會修女								
MI.靈醫女修會	11							11
MIC.聖母無原罪女修會	14	10						24
MMB.仁慈聖母傳教會	7	9						16
MMM.聖母醫療傳教會							2	2
MSC.耶穌肋傷至聖痛苦聖母傳教修女會		8						8
MSSA.奧斯定傳教修女會	14							14
OCD.聖衣會		10						10
OP.聖道明傳教修女會	25	2			7	16		50
OP.聖玫瑰道明傳教修女會					5	12		17
OP.聖若瑟道明修女會		2				16		18
OP.福寧道明修女會				9				9
OP. (MKS.) 瑪利諾女修院	4	12	11					27
OSB.本篤修女會	10							10
OSC.烏蘇拉聖心會		6						6
OSF.聖家獻女傳道會	4			9	10	16		39
OSF.耶穌聖嬰方濟各修女會	4							4
OSU.吳蘇辣羅馬聯合會							12	12
OSU.聖女瑪爾大修女會							3	3

PSC.主顧傳教修女會	8		10	3				21
RSCJ.聖心修女會	11							11
SA.拯亡會	7	5						12
SDS.救主修女會	6							6
SMIC.聖母無原罪傳教修女會					13	36		49
SP.主顧修女會			12					12
SPC.沙爾德聖保祿修女會		3					4	7
SS.CC.		5						5
SSH.耶穌聖心修女會			16					16
SSpS.聖神會		12						12
SSPS		7						7
SSS.社會服務修女會								
Chinese Srs.of the Precious Blood 中華寶血女修會								
Fr.Srs.of Mercy of Luxemb 盧森堡 普慈方濟各修女會		6						6
Miss.Soc.Catech.B.Lucia 貞美傳 教團	3							3
TOTAL	178	124	103	45	43	99	41	633

附錄二：天主教教務年度統計資料（1954-1965）

Statistics-from 1 July 1962 up to 30 June 1963⁴¹

Dioceses (教區)	台北	新竹	台中	嘉義	台南	高雄	花蓮	總計
Population	2,257,274	1,503,589	2,419,156	1,452,306	1,150,000	1,888,233	500,607	11,171,165
Catholics	38,075	47,184	35,919	16,435	19,108	42,040	46,053	244,814
% of Catholics	1.70%	3.14%	1.5%	1.1%	1.6%	2.2%	11%	2.2%
Priests (神父)	215	126	93	70	53	73	70	700
Secular P.	68	14	7	45	29	14	64	241
Regular P.	147	112	86	25	24	59	6	459
Sisters (修女)	191	122	103	42	41	111	46	656
Seminaries (神學院)	1		1		1	1	1	5
Major Seminarians (大修生)				3	13		1	17
Minor Seminarians (小修生)	52	8	19	12	4	35	30	160
Catechists (傳道員)	112	509	162	107	68	173	240	1,371
Adult Baptisms (成人領洗人數)	2,792	4,846	2,425	1,509	1,688	2,355	2,885	18,500
Kindergartens (幼稚園)	54	157	27	40	12	45	65	400
Primary Schools (小學)	2	2					1	5

41以下表格資料均引自《台灣天主教通訊錄一九六四》(台北：華明書局，1964)。

Children in Primary Schools	1,048	173					132	1,353
Middle Schools ⁴² (中學)	4 (2B2G)	1 (1G)	1 (1B)	5 (3B2G)	2 (1B1G)	3 (1B2G)	1 (1G)	17
Students in Middle Schools	4,306	357	903	1,500	1,630	1,350	580	10,626
Technical Schools (技術學校)		1					1	2
Students in Technical Schools		135					138	273
Schools for Catechists(傳道學校)	1	1	2	2		1	1	8
Colleges			1					1
Students in Colleges			805					805
Universities (大學)	1							1
Students in Univ.								
Hospitals (醫院)	1		1	2	4	2	1	11
Dispensaries (診所、藥房)	16	29	29	8	13	15	19	129
Cemeteries (聖山)	1	1	1	1		2	5	11

Priests And Brothers

Dioceses (教區)	台北	新竹	台中	嘉義	台南	高雄	花蓮	總計
Secular Priests	68	14	7	45	29	14	64	241
CDD.主徒會	18							18

42 B : Boys Middle School , G : Girls Middle School .

Pr. Br.	1							1
CICM.聖母聖心會	14	4	4					22
CM.遣使會	15	2		4	5	8		34
CR.聖奧斯丁會		1					7	8
CSJB.耀漢小兄弟會	1		3					4
Pr.	5		6					11
Br.			2					2
Sch.								
CSV.衛道會		1	3					4
Pr.		1	5					6
Br.								
FMS.主母會						2		2
MEP.外方傳教會		1					20	21
MI.靈醫會	8	1			3			12
Pr.	17				2			19
Br.								
MM.瑪利諾會	3	19	54					76
Pr.			2					2
Br.								
OFM.方濟各會	14	27			12	1		54
Pr.					2			2
Br.								

OP.聖道明會	2	1			5	48		56
Pr.					1	3		4
Br.								
ORSA.重整奧斯丁會		2				4		6
OSB.本篤會	1			1				2
SDB.慈幼會		5						5
SDS.救主會	11							11
Pr.	3							3
Br.								
SJ.耶穌會	52	79	20	11	4			166
Pr.	4	12	9	2				27
Br.								
Sch.	1	16	6					23
SMB.白冷外方傳教會		5					21	26
Pr.		2						2
Br.								
SVD.聖言會	17			13		2		32
Pr.	2			1				3
Br.								

Sisters
.....

Dioceses (教區)	台北	新竹	台中	嘉義	台南	高雄	花蓮	總計
CICM.	18							18

CMRS.中華聖母會		2		17				19
CSC.聖十字架會							12	12
CSCM.聖母聖心修女會	10		53	4	3		8	78
CST.聖德來會	2	7						9
DC.仁愛會修女	10				4			14
DSP.聖保祿孝女會	5					4		9
FC.十字架女兒會								
FCC.仁慈傳教會			2					2
FI.耶穌孝女會	7	11						18
FMM.方濟各會	7	13						20
ICA.雷鳴遠女子服務團	8							8
ICM.								
ITT.德來會修女								
MI.靈醫女修會	15							15
MIC.聖母無原罪女修會	14	10						24
MMB.仁慈聖母傳教會	7	10						17
MMM.聖母醫療傳教會							3	3
MSC.耶穌肋傷至聖痛苦聖母傳教修女會		8						8
OCD.聖衣會		10						10

OP.聖道明傳教修女會	28				7	16		51
OP.聖玫瑰道明傳教修女會					7	11		18
OP.聖若瑟道明修女會		4				28		32
OP.福寧道明修女會				10				10
OP. (MKS.) 瑪利諾女修院	4	14	12					30
OSB.本篤修女會	11							11
OSC.烏蘇拉聖心會		6						6
OSF.聖家獻女傳道會	4	2		11	15	18		50
OSF.耶穌聖嬰方濟各修女會	4							4
OSU.吳蘇辣羅馬聯合會							18	18
PSC.主顧傳教修女會	9		10	3				22
RSCJ.聖心修女會	14							14
SA.拯亡會	7	5						12
SDS.救主修女會	6							6
SMI.聖女瑪爾大修女會							12	12
SMIC.聖母無原罪傳教修女會	4	4			12	38		58
SP.主顧修女會			12					12
SPC.沙爾德聖保祿修女會	2	3					4	9
SS.CC.		4						4

SSH.耶穌聖心修女會			16					16
SSpS.聖神會	4	20						24
SSS.社會服務修女會	5							5
Chinese Srs.of the Precious Blood 中華寶血女修會					4			4
Fr.Srs.of Mercy of Luxemb 盧森堡 普慈方濟各修女會		7						7
Miss.Soc.Catech.B.Lucia 貞美傳 教團	3							3
TOTAL	204	140	105	45	52	115	75	718

附錄二：天主教教務年度統計資料（1954-1965）

Statistics-from 1 July 1963 up to 30 June 1964⁴³

Dioceses (教區)	台北	新竹	台中	嘉義	台南	高雄	花蓮	總計
Population	2,740,248	1,517,604	2,378,237	1,484,399	1,321,712	1,919,453	521,810	11,883,523
Catholics	41,145	53,823	38,309	17,562	21,025	44,406	49,285	265,564
% of Catholics	1.5%	3.54%	1.65%	1.18%	1.58%	2.31%	9.45%	2.24%
Priests (神父)	205	145	90	70	62	78	62	712

43以下表格資料均引自《台灣天主教通訊錄一九六五》(台北：華明書局，1965)。

Secular P.	68	20	29	42	27	15	11	212
Regular P.	137	125	61	28	35	63	51	500
Sisters (修女)	187	164	111	42	55	111	46	716
Major Seminarians (大修生)	3			2	12	5	2	24
Minor Seminarians (小修生)	53	10	26	9	12	31	38	182
Catechists (傳道員)	107	382	168	138	66	164	231	1,256
Adult Baptisms (成人領洗人數)	1,830	5,898	2,014	1,345	1,637	2,032	2,212	16,968
Infant Baptisms (嬰兒領洗人數)	1,371	2,026	942	849	418	1,653	1,883	9,142
Kindergartens (幼稚園)	61	177	64	73	17	47	64	503
Children in Kindergartens	7,418	12,154	5,284	6,965	1,793	4,333	3,559	42,003
Primary Schools (小學)	2	2					1	5
Children in Primary Schools	1,230	255					165	1,650
Middle Schools (中學)	4	2	2	3	3	2	1	17
Students in Middle Schools	5,507	464	1,440	2,459	400	1,204	535	12,094
Technical Schools (技術學校)	1	1					1	3
Students in Technical Schools	50	107					99	205
Schools for Catechists(傳道學校)	1	1	2			1	2	6
Students Catechists	15	42	48			44	54	203
Colleges			1					1
Students in Colleges			997					997

Universities (大學)	1 ⁴⁴							1
Students in Univ.	447							447
Hospitals, Clinics & Dispensaries (醫院、診所、藥房)	19	33	43	10	17	9	21	170

Priests And Brothers

Dioceses (教區)	台北	新竹	台中	嘉義	台南	高雄	花蓮	總計
Secular Priests	68	20	29	42	27	15	11	212
CDD. 主徒會	17							17
Pr.	1							1
Br.								
CICM. 聖母聖心會	13	4	5					22
CM. 遣使會	16				5	7	9	37
Pr.	3							3
Br.								
CR. 聖奧斯丁會							7	7
CSJB. 耀漢小兄弟會								
Pr.			3					4
Br.	1		8					10
Sch.	2		3					3
CSV. 衛道會								

44 輔仁大學 (Fujen Catholic University)。

Pr.			4					4
Br.			8					8
FMS.主母會						3		3
MEP.外方傳教會							21	21
MI.靈醫會	10				3			13
Pr.	17				2			19
Br.								
MM.瑪利諾會	3	20	57					80
Pr.			2					2
Br.								
OFM.方濟各會	16	26			12			54
Pr.					1			1
Br.								
OP.聖道明會	1				5	47		53
Pr.					1	3		4
Br.								
ORSA.重整奧斯丁會						4		4
OSB.本篤會	4			1				5
SDB.慈幼會	4				6			10
Pr.					3			3
Br.								
SDS.救主會	12							12
Pr.	2							2
Br.								

SJ.耶穌會	57	88	24	13	5			187
Pr.	6	16	13	2				37
Br.		11						11
Sch.								
SMB.白冷外方傳教會		2					25	27
Pr.		1					2	3
Br.								
SVD.聖言會	16			12	1	1		30
Pr.	4							4
Br.								

Sisters

Dioceses (教區)	台北	新竹	台中	嘉義	台南	高雄	花蓮	總計
CSC.聖十字架會							11	11
CSCM.聖母聖心修女會	10		56	4	3		8	81
CST.聖德來會	2	13						15
DC.仁愛會修女	11				6			17
DSP.聖保祿孝女會	8					5		13
FC.十字架女兒會								
FCC.仁慈傳教會			2					2
FI.耶穌孝女會	8	16						24
FMM.方濟各會	8	13						21

ICA.雷鳴遠女子服務團	8							8
ICM.	19							19
ITT.德來會修女								
MI.靈醫女修會	19							19
MIC.聖母無原罪女修會	13	13						26
MM.								
MMB.仁慈聖母傳教會	7	13						20
MMM.聖母醫療傳教會							4	4
MSC.耶穌肋傷至聖痛苦聖母傳教修女會		11						11
OCD.聖衣會		9						9
OLC.中華聖母會		2		16				18
OP.聖道明傳教修女會	28				7	28		63
OP.聖玫瑰道明傳教修女會					6	11		17
OP.聖若瑟道明修女會						27		27
OP.福寧道明修女會				16				16
OP. (MKS.) 瑪利諾女修院	4	16	13					33
OSB.本篤修女會	11							11
OSC.烏蘇拉聖心會		5						5
OSF.聖家獻女傳道會	3	2		5	18	16		44

OSF.耶穌聖嬰方濟各修女會	4							4
OSU.吳蘇辣羅馬聯合會							20	20
PSC.主顧傳教修女會	9		11	2				22
RSCJ.聖心修女會	14							14
SA.拯亡會	8	5						13
SDS.救主修女會	9							9
SMI.聖女瑪爾大修女會							19	19
SMIC.聖母無原罪傳教修女會	3	6			20	30		59
SP.主顧修女會			10					10
SPC.沙爾德聖保祿修女會	5	6					4	13
SS.CC.		10						10
SSH.耶穌聖心修女會			39					39
SSpS.聖神會	15	15						30
SSS.社會服務修女會	5							5
Chinese Srs.of the Precious Blood 中華寶血女修會	3				3			6
Fr.Srs.of Mercy of Luxemb 盧森堡 普慈方濟各修女會		9						9
Miss.Soc.Catech.B.Lucia 貞美傳 教團	3							3

附錄二：天主教教務年度統計資料（1954-1965）

Statistics-from 1 July 1964 up to 30 June 1965⁴⁵

Dioceses (教區)	台北	新竹	台中	嘉義	台南	高雄	花蓮	總計
Population	2,933,366	1,857,388	2,633,392	1,512,585	1,336,504	2,016,963	555,729	12,845,937
Catholics	43,165	58,252	39,850	19,384	21,988	46,423	54,012	283,074
% of Catholics	1.45%	3.69%	1.6%	1.4%	1.64%	2.3%	9.72%	2.23%
Priests (神父)	228	128	96	74	67	76	62	731
Secular P.	68	21	60	46	32	15	6	298
Regular P.	160	107	36	28	35	61	56	433
Brothers& Scholastics	31	9	27	3	4	6	2	82
Sisters (修女)	251	152	116	35	60	118	60	792
Major Seminarians (大修生)		2	4	3	14	11	2	36
Minor Seminarians (小修生)	56	15	30	15	6	30	38	190
Catechists (傳道員)	109	380	174	134	59	171	234	1291
Adult Baptisms (成人領洗人數)	2,092	3,718	1,981	837	1,063	1,636	1,840	13,167
Infant Baptisms (嬰兒領洗人數)	1,383	1,697	948	672	411	1,927	2,294	9,332

45 以下表格資料均引自《台灣天主教通訊錄一九六六》(台北：華明書局，1966)。

Kindergartens (幼稚園)	67	179	21	87	23	54	61	492
Children in Kindergartens	8,359	12,145	1,547	6,641	2,584	5,559	3,435	35,270
Primary Schools (小學)	2	2				1 ⁴⁶	1	6
Children in Primary Schools	1,341	436				156	183	2,116
Middle Schools (中學)	4	2	2	3	4	1	1	17
Students in Middle Schools	6,335	536	1,458	2,638	1,452	1,180	535	14,154
Technical Schools (技術學校)	1	1				2	1	5
Students in Technical Schools	50	150				441	64	705
Schools for Catechists(傳道學校)	1	1	2			1	2	7
Students Catechists	21	30	37			46	48	182
Language Schools (語言學校) ⁴⁷	2 ⁴⁸	1 ⁴⁹	1			2 ⁵⁰		6
Students in Language Schools	986	90	10			200		1,286
Colleges			1					1
Students in Colleges			1,500					1,500
Universities (大學)	1							1

46 升天小學 (Assumption Primary School)，位在高雄市前金區自強一路，由聖道明傳教修女會管理。

47 從這一年起，天主教創辦的語言機構的數目、學生人數，被獨立出來記載。

48 一是中華聖母院外文補習班 (Our Lady of China Foreign Languages Institute)，位在台北縣永和鎮中興街六〇號，聖母聖心修女會辦理。另一不詳。

49 華語學院 (Chabanel Language Institue)，位於新竹市東山街四四號。

50 一是文藻女子外國語文專科學校 (Wen Tzao Ursuline Languages College)，位在高雄市覆鼎金民族路，由吳蘇辣羅馬聯合會管理。一是聖德蘭外語補習班 (St. Theresa Foreign Languages Institute)，位在高雄市左營部後街三號。

Students in Univ.	1,083							1,083
Hospitals (醫院)	3	3	1	2	3	4	3	19
Dispensaries (診所、藥房)	16	26	26	7	15	5	20	135
Cath.Papers &Publications (報紙、刊物)								14

Priests And Brothers

Dioceses (教區)	台北	新竹	台中	嘉義	台南	高雄	花蓮	總計
Secular Priests	68	21	61	46	32	15	6	249
CDD.主徒會								
Pr.	16							16
Br.	2							2
CICM.聖母聖心會	14	4	6					24
CM.遣使會								
Pr.	17	2		8	5	9		41
Br.	3							3
CR.聖奧斯丁會		1					6	7
CSJB.耀漢小兄弟會								
Pr.	1		3					4
Br.	2		6					8
Sch.			4					4
CSV.衛道會		1	4					5

Pr. Br.		2	6					8
FMS.主母會						4		4
MEP.外方傳教會		1					19	20
MI.靈醫會	9	2			3			14
Pr. Br.	20				2			22
MM.瑪利諾會	3	20	57					80
Pr. Br.			2					2
OFM.方濟各會	18	25			13			56
Pr. Br.		1			1			2
OP.聖道明會	3	5			4	46		58
Pr. Br.		1			1	2		4
ORSA.重整奧斯丁會		1				5		6
OSB.本篤會	3			3				6
SDB.慈幼會	5				6			11
Pr. Br.					3			3
SDS.救主會	11	1						12
Pr. Br.	2							2

SJ.耶穌會	68	83	22	13	4			190
Pr.	5	18	8	2				33
Br.	3	9	8					20
Sch.								
SMB.白冷外方傳教會		4					25	29
Pr.		1					4	5
Br.								
SVD.聖言會	19	2		13	1	2		37
Pr.	4							4
Br.								

Sisters

Dioceses (教區)	台北	新竹	台中	嘉義	台南	高雄	花蓮	總計
CSC.聖十字架會							21	21
CSCM.聖母聖心修女會	10		57	4	3		8	82
CST.聖德來會	2	14						16
DC.仁愛會修女	11				7			18
DSP.聖保祿孝女會	9	2				4		15
FC.十字架女兒會	2							2
FCC.仁慈傳教會			2					2
FI.耶穌孝女會	12	18						30
FMM.方濟各會	7	13						20

ICA.雷鳴遠女子服務團	10							10
ICM.	18							18
ITT.德來會修女		2			2			4
MI.靈醫女修會	21							21
MIC.聖母無原罪女修會	13	14						27
MM.瑪利諾女修院	4	16	14					34
MMB.仁慈聖母傳教會	8	14						22
MMM.聖母醫療傳教會							4	4
MSC.耶穌肋傷至聖痛苦聖母傳教修女會		10						10
OCD.聖衣會		13						13
OLC.中華聖母會		2		22				24
OP.聖道明傳教修女會	35				7	26		68
OP.聖玫瑰道明傳教修女會					11	11		22
OP.聖若瑟道明修女會						27		27
OP.福寧道明修女會				18				18
OSB.本篤修女會	12							12
OSC.烏蘇拉聖心會		5						5
OSF.聖家獻女傳道會	3	2		6	34	16		61
OSF.耶穌聖嬰方濟各修女會	4							4

OSU.吳蘇辣羅馬聯合會						5	17	22
PSC.主顧傳教修女會	13		11	2				26
RSCJ.聖心修女會	13							13
SA.拯亡會	7	5						12
SDS.救主修女會	9							9
SMI.聖女瑪爾大修女會							19	19
SMIC.聖母無原罪傳教修女會	3	6			20	34		63
SP.主顧修女會			16					16
SPC.沙爾德聖保祿修女會	3	7					4	14
SS.CC.		10						10
SSH.耶穌聖心修女會			45					45
SSpS.聖神會	14	21						35
SSS.社會服務修女會	6							6
Chinese Srs.of the Precious Blood 中華寶血女修會	3				4	3		10
Fr.Srs.of Mercy of Luxemb 盧森堡 普慈方濟各修女會		9						9
Miss.Soc.Catech.B.Lucia 貞美傳 教團	3							3
會數	27	19	6	5	8	8	6	44

人數	255	183	145	52	88	126	73	
----	-----	-----	-----	----	----	-----	----	--

附錄三：教友數目統計表（1953-1965）

年度教區	1953	1954	1955	1956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1962	1963	1964	1965
台北總教區	4,311	9,213	13,301	24,141	28,327	48,836	55,142	61,677	32,982	34,992	38,075	41,145	43,165
新竹教區									34,667	41,104	47,184	53,823	58,252
台中教區	5,654	6,553	8,581	12,707	16,665	21,630	24,703	27,752	30,021	32,934	35,919	38,309	39,850
嘉義教區	2,950	3,376	4,203	5,559	6,823	8,062	9,067	10,937	12,069	14,186	16,435	17,562	19,384
台南教區									15,000 ⁵¹	17,000	19,108	21,025	21,988
高雄教區	9,758	10,966	16,811	25,415	35,040	41,137	45,211	48,491	36,751	38,725	42,040	44,406	46,423
花蓮教區	906	2,422	5,621	12,839	17,924	25,086	29,330 ⁵²	33,674	37,559	41,560	46,053	49,285	54,012
全台灣	23,579	32,530	48,517	80,661	114,779	144,731	163,453	182,453	202,240	220,501	244,814	265,564	283,074

51 1961年台南教區的教友人數，在1965和1966年的《台灣天主教通訊錄》是15,000人，不過在1964、1963、1962年的紀錄是18,191人。

52 1959年花蓮教區的教友人數，在1960、1961、1962、1963年的《台灣天主教通訊錄》是29,330人，不過在1964、1965、1966年的紀錄是24,703人。

六、計畫成果自評：

三年來的對此問題之研究，由於分為三個很清楚的階段，因此可以相當均衡地進行研究。在此三年之中，對此主題進行較深入的探討，時時不忘此主題，因而也有不少心得。

除了在研究過程中，發現有些主題可以單獨成篇，因而發展成為獨立的論文，也發表於相關的國際或國內的學術會議中，其中有一些文章尚待修改後準備結集出版。結案報告的主要內容則是對於三階段各階段的台灣天主教會發展全面的討論及分析，而非專題式的取徑，然而對於此一百多年的台灣天主教可以有大致的輪廓及特色的掌握。

研究內容與原計畫所提出的大致相符，清末、日治及國府三階段的發展及特色也都清楚分析。當然，到底此報告之學術價值如何，有待行家評估。本人僅儘力將所想探討的書寫出來。由於這個主題尚未有較完整的學術性研究，許多史實有待發現，三年下來，雖然已確立了不少真實的情況，例如，有那些西班牙傳教士在台灣傳教、各地何時開教、幾次轉捩點時的傳教策略變化、甚至在二次大戰後那些修會來台，以及第三階段時的許多統計數字，如有多少教堂，多少教友以及神職人員數目等，都可供參考，然而，仍有一些史實迄今無法確定。

在繳交本報告前，從台大圖書館網站得知漢珍公司已將 1905 至 1911 年間的《臺灣日日新報》全文上網，因此有相當多的資訊可以補充，然而由於限期已到，無法吸收其中所有內容，而有遺憾。然而，這種資訊日漸增多的趨勢必然如此，可見到不久之後，所有該報至閉館前的內容皆將上網供人利用，屆時吾人對於許多史實更將清楚，也可補充本報告不足之處。總之，日後對此主題的了解必然更多，也可以再加修正。

例如，1923 年前來台灣的教廷特使到底是誰？現只知其名為 Giardini，但全名為何，不易找到。日文資料往往不附上西文原文，而只有片假名，即使有時附有西文，也多半只有姓或名，很不容易還原，仍是遺憾。而有關天主教會在台灣財政收支的細節也是很難找到資料的，這對教會政策有很大的影響，只待來日有機會研讀到時，加以補充了。當然，此報告並非定論，將來還是可以補充及修改後發表，以供學術界參考。又如，由於本人對西班牙文不熟，因此有些西文資料無法充分利用。雖然，有些資料也逕請懂得西班牙文的人士譯成英文，再譯成中文，然而在選文及吸收上，仍有不足的遺憾，期待來日補充。不過，本人相信大體上，這三階段的發展及變化，應該都敘述清楚，重要數據資料也儘量提供，甚至有些以圖表顯示，更便於讀者參照。

本報告較重要的地方是使用不少日文資料，本人曾赴日本東京、長崎等地蒐集與本主題相關的史料，並請人協助，將許多日文史料譯成中文，並在文章及報告中使用，使得本報告較為豐富。

此三階段研究的下限為 1965 年。此固然為一劃時代之年，因為從此年開始，

美援結束，台灣經濟型態轉變，而教會的向上發展也開始遭到瓶頸，直至今日。然而，有許多問題可以繼續分析探討，而無法一刀切割。因此日後將以本報告為基礎，繼續補充修正，將研究成果以專題論文，甚至是專書型式發表，以補充台灣宗教史上此一塊不足之處。

在1971年出版的《臺灣省通誌》及1992年的《重修臺灣省通志》中都有整體性的介紹及討論台灣天主教的歷史，其內容請參見本報告第一部分之「文獻探討」。本研究報告之不同二者之處在於儘量精確，不論是人名地名及時間，務求能有相當的學術性。在引用史料方面，也務求多元並避免全部原文照抄，更重要的是較多分析而較少平鋪直敘。對於前人的研究成果，也儘可能吸收，以達集思廣益之效，並且對於不同的論點也在適當時機，提出一些討論。

總之，十分感謝國科會的資助，使此研究報告得以完成。在此期間，我的兼任助理們也得到不少學習的經驗，以及相關的歷史知識，更重要的，是研究的方法及取徑。我們感覺到經過此研究後，對於台灣天主教有更深一層的了解。也期望閱讀本報告者能從中對於此主題有進一步的認識。

七、參考文獻

本參考文獻之內容分四部分，第一部分為研究過程中，發現可以論述的要點，而加以研究後發表的論文，部分文章已收錄在論文集，其他則仍有待修正補充後準備結集出版，在此先放於附錄中，以供參考。第二部分為西班牙文翻譯資料（英翻中），此資料由台灣大學圖書館特藏室裡找出，未收錄在黃德寬譯《天主教在台開教記》（Pablo Fernandez, ed., *One Hundred Years of Dominican Apostolate In Formosa*, translated by Felix B. Bautista and Lourdes-Bautista, Quezon City, Philippines, 1959）的著作裡，特請西班牙人士翻譯成英文後，再譯成中文資料，其內容主要用於第一階段。第三部分為日文參考資料，資料來源為日本天主教雜誌《聲》（こゑ），所刊出的教廷特使隨員日誌，內容主要敘述二〇年代時，台灣及台灣教會的情況，此報導很少見，故特別譯成中文，以供學者參考。第四部分則為中文的參考資料，雖然目前網站的資料豐富，但是仍有些較難取得，故在此收錄。至於此報告所引用之文獻，請參考第三部分之文獻探討。

（一） 發表論文： 〔研究討論〕

談儒耶交流的詮釋*

* 收錄於《臺灣東亞文明研究學刊》2004年12月，頁289-304

古偉瀛*

關鍵詞：

Keywords：

一、前言

以往談到儒耶交流，特別是基督宗教傳華史時，最常見到的是一種單向輸入的成就史，下面這段十分有趣的敘述即是一位對此現象頗有觀察力的學者：

基督新教的傳教士似乎最喜談統計數字了：他們使多少人皈依，多少人受洗，募了多少款，多少學生來上教會學校，多少人畢了業，多少人成了基督徒，多少病人來其醫院就醫，甚至多少人成了有名無實墮落了。這種統計在第二次大戰期間在進行賑濟時到達頂點，有人統計在各種不同的難民營中給多少難民洗澡。¹

的確，早期傳教史多由西方傳教士執筆，在當時的傳教學的取徑以及所留的資料上，很自然地就以統計數字作為最具體的，且具說服力的成就。所論及的人物不是很偉大就是很悲壯，這種重視主要歷史角色及上層人物的立場在這一二十年來陸續受到了批判。

另一方面，由於近五十年來中國共黨政府一直是以無神論作為其意識型態，加上強烈的民族主義使得在處理中西交流，特別是與天主教關係時，常見到以帝國主義侵略作為詮釋的架構，這要到近二十年，文化大革命結束後，才有了一些不同的聲音，不過，

*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教授。

¹ Kathleen L. Lodwick, *The Chinese Recorder Index, A Guide to Christian Missions in Asia, 1867-1941*, (Scholarly Resources Inc., Wilmington Delaware, 1986), p. XIII.

此種反帝的意識型態迄今仍不時可見，尤其是在分析「教案」的原因或較近代的交流史時，更是如此，或許用不同的名目，但基本內容上仍是帝國主義侵略的延伸。²

然而，今日應該可以說，學界普遍認為，只談成功及偉大，或是只從帝國主義侵略來看儒耶交流無法窺其全豹。對於中西文化交流史進行反思的學者們總結以往，特別是近三十年來的研究，提出了一些回顧及展望。

二、研究史的回顧

近年來，對於儒耶交流史進行反省的，在西方學者中，最全面而有系統的要以比利時魯汶大學的鍾鳴旦（Nicolas Standaert）最引人注目，他在近年來一連寫了好幾篇文章進行反思，其中較完備的有兩篇：一是馬琳譯，〈基督教在華傳播史研究的新趨勢〉，《國際漢學》第四輯，1999年，大象出版社，頁477-520；另一則是在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的Nicolas Standaert, *Methodology in View of Contact Between Cultures: The China Case in the 17th Century*《文化接觸時的方法問題，以十七世紀中國為例》（CSRCS Occasional Paper no. 11），Hong Kong, 2002, 64 pp. 另一位澳洲學者陸保祿（Paul Rule）的一篇“Growing on Holy Ground”（在神聖的土地上成長）³，對此題目也進行了反省，下面也將介紹。

中國學者方面，十多年前，台灣清華大學的黃一農曾討論十七世紀中西交流的研究史⁴，近年時有不少學者也進行此方面的反省，就手邊可見到的有大陸北京中國社科院的張先清，他的〈回顧與前瞻—二十世紀中國之明末清初天主傳華史研究〉⁵，清華大學的王曉朝，他曾寫過〈文化的互動和轉型〉⁶；最近的一篇則是上海復旦大學的李天綱，他的題目恰恰就是本次會議的主題：〈跨文化詮釋：經學與神學的相遇，《明末天主教論教文箋注》導言〉⁷ 在此就以這些文章為基礎，略談一些對儒耶交流的看法。

基本上，跨文化詮釋可以看成是一種剪裁的工作，亦即將兩種異文化之間的各個性質及其交流過程進行整理，使得人們能更清楚瞭解兩者及其間的關係。此種剪裁工作總需要一些依據或標準，從表面上看，似乎每種文化都有原來的樣子，按著原來的樣子

2 最近出版的一文即是一例，王立新：〈後殖民理論與基督教在華傳教史研究〉，《史學理論研究》，第一期（2003年），頁32-37。此文介紹了新理論在此領域中的可能發展，指出可以藉傳教士的話語（論述）分析、教會對傳統社會的崩解之衝擊及用傅柯（M. Foucault）的權力與知識理論來詮釋在華的殖民。

3 Paul Rule, “Growing on Holy Ground” The Keynote Presentation at the Eighteenth National Catholic Conference, Pacific Rim Report no. 17, Feb. 2001

4 黃一農：〈明末清初天主教傳華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新史學》7：1（1996年），頁137-169。

5 張先清：〈回顧與前瞻—二十世紀中國之明末清初天主傳華史研究〉，收入陳村富主編：《宗教文化3》（北京：東方出版社，1998年），頁107-141。

6 參見網站 <http://www.guxiang.com/xueshu/others/zhexue/20104/20010415015.htm>。

7 請參見：《中華文史論叢》（北京，2003年）。

加以整理即可，但實際上並非如此簡單，到底什麼是「原來」的，就可以爭論不休，甚至有沒有「原來」的樣子都是可以討論的問題。基本上，應該可以這麼說，文化並非固定不變鐵板一塊的，文化一直是在變動中，尤其在交流時期變動最大且快。過去雖然一去不回且無法改變，但過去對我們的意義以及我們對過去的理解卻沒有固定的樣式可以參照。因此在進行「剪裁」時，也必須衡量這些變化。

三、幾位西方學者的分析

鍾鳴旦在第一篇文章〈基督教在華傳播史研究的新趨勢〉中指出，近年來中西交流史的重要變化有下列數點：

1. 範式轉移：從「傳教學取向及歐洲中心論」轉向「漢學取向和中國中心論」。
2. 方法上：從「實証和文本」的方法，亦即中國及歐洲學者常用的方法，轉向「詮釋--敘事」的美國學者常用的方法。
3. 在研究課題上：包含了通史、地域史、群體社會網絡、歷史人類學（性別研究，傳統及風俗研究，超驗意識的研究）、科學史、經濟史及物質生活研究：傳教士的財政；生活方式，食物，交通工具等；以及文獻解釋史和分類方法史之研究。
4. 基督教在華傳播的歷史之幾種模式：
 - a. 文化交流：各種辭彙如調適，適應，衝撞，相遇，涵化，脈絡外，本土化等。
 - b. 中國現代化進程因素：李文遜，帝制中國因為儒家正統，排斥基督教為異端；現代中國擁抱科技，排斥基督教。李約瑟以為耶穌會引進文藝復興時的科學，但中國人很清楚宗教與科學之別。此模式之盲點在於輕視了耶穌會士入華之現代性之一面，且當時他們來時並未自覺是中國未來現代化之先驅。且視中國為停滯，只有西方才能帶來發展。
 - c. 邊緣宗教：楊慶堃視基督宗教為體制式宗教，進入中國的分散型宗教情境時，產生限制。基督宗教為在華生根，必須合於體制及環境氛圍，又得「變得」很正統，一方面將其信仰中心去人格化，一方面又得維持其啟示性質，乃成為一邊緣性宗教，因而有些中國信友在使此宗教「中國化」的程度上，反而比西方傳教士走得更遠。在這種看法下，中西交流之中挫，並非許多學者所主張的禮儀之爭或官員之敵視。
 - d. 開化方案：亦即將中國儒家，基督宗教及莫斯科蘇聯式視為近代中國的三大開化方案，每種方案均有其中心，核心觀念及社會群體。

由此而產生民族意識，我群與他群之分，各群均以為自己的方案為最佳模式。

e. 文化殖民與帝國主義侵略：從被征服者的角度來觀察近百年來的歷史變化即是殖民與侵略的過程。

f. 自我與他者：可分為三層面來掌握，亦即，價值論、人類行為學及認識論：轉換成行動即是，喜歡、征服及了解。例如，對「他者」的價值判斷是什麼？雙方是否存在重要的差異？這些差異如何體現出來？對他者的價值判斷與個人對他者的喜歡與否，以及對他者的了解與否之間的關係如何？其缺點是可能將兩者的身份認同固定下來，因此得持一開放心靈。例如，17世紀傳教史由西方（他者）非基督教（他者）學者來研究，也可能由中國（自我）基督教（自我）的學者來研究。當他們研究非基督教運動時，對自我與他者的身份認同是不一的。此為最新之挑戰

鍾鳴旦在最近的另一論著《文化接觸時的方法問題，以十七世紀中國為例》中，鍾氏則以利瑪竇的世界地圖為個案，來探討幾種不同的文化交流之詮釋模型。

他首先指出，有五大要素支配我們在進行跨文化交流反省時的思考：「傳送者」、「接受者」、「訊息內容」（文本）、「傳遞方式或媒介」，以及最後的「觀察者」。例如，在十七世紀時西方傳教士是傳送者；中國士大夫是接受者；天文地理或基督教義是訊息；製作地圖或天文儀器是媒介，而記載此事的是觀察者。當然，對於文化交流，能將這五要素加以全部處理是最理想的，但事實上資料有限，無法面面俱到，僅能就史料所及，進行研究。

鍾氏指出提出以此時期研究耶穌會士作為個案研究之三大理由：

1. 人數不多，在華耶穌會十六人，其中八人外籍，較易處理。
2. 當時中西文化水準差不多，印刷術也相當普及。
3. 受外在因素減至最低，且使用中文為主，不像十九世紀時中西之強弱懸殊。

他指出目前可以查知有四種交流框架來詮釋中西交流：

1. 傳送方模式，例如，利瑪竇的世界地圖。太強調傳送方及其所寫的文本。重視其成功或失敗之面，及其對接受方的影響。認為交流應是純粹而透明的
2. 接受方模式，太強調接受方，尤其是它所接收的訊息內容之變化，往往重視其拒絕面，因而認為兩種文化是不相容的，甚至是不可共量的。
3. 發明模式：對前二模式之預設加以解構，過於強調傳送者之建構及發明的層面，而且早已預設觀察者的全知立場，對研究對象早有充分之了解，

往往會將傳送與接受的兩方都固定化。會以西方主動而中方被動反應來看事情，且因對於訊息內容不仔細考証，易產生許多主觀臆斷，並易忽略接受方的積極參與之角色。

4. 互動及溝通框架：採取前三者之優點，但均有不同，與傳送框架相同之處在於仍以此傳送之對象為焦點，但可以是雙向式的；與接受方框架之相異處在於兩者均承認雖有不相容，也有共同點，不可以本質論來推辭，認為無法溝通及交流；此框架也與發明框架有所不同，其不同處乃在此框架是以接受方為他者，可以作為比較及矯正傳送方之主觀偏差。

鍾氏的分類有些過份理想化以及太整齊 (schematic)，其實他最後提出來的並非實際上的案例，而只是「應然」的理想情況。吾人當然應該重視自我與「他者」之間的關係，我們也應採取互動及溝通的框架來詮釋儒耶交流，但是由於題目、材料、語文及個人背景及環境的制約，我們所能達到的程度是有限的。

澳大利亞籍的陸保祿 (Paul A. Rule) 從較低層中國教徒的看法出發，其所得到的觀察則與其他西方學者不太相同，其文章大意如下：

17世紀末十八世紀初那些中國基督徒的內心世界中，由於是政權轉移時的關鍵時刻，一方面討厭前明政權的腐敗，但另一方面也對新主的無知、傲慢與莽撞感到失望，想尋求確定感及社會與心靈的平安。其中一現象即是向內心世界探求，因而天主教有其市場。例如在山東及福建，白蓮教與天主教並存，且同被鎮壓。

今日農村基督徒靈修是內向，但太自我中心，而非對公民社會之關懷；但明末清初之關懷則雖也是內向，卻積極從事慈善事業的，例如收留照顧棄嬰，訪病弱者，對上層女教友提供靈性支援。

荷蘭萊頓大學的許理和 (Erich Zucher) 教授提及當時中國基督徒之兩面性：一方面本身意識到自己屬於弱勢的邊緣宗教及另一方面卻又要呈現出儒家的面孔。不少人哀嘆中國基督徒的宗教熱心卻無法達成使其他國人皈依的目標，但其實這是兩件不同之事，並無矛盾及無法理解之處。對中國士紳而言，以儒家熟稔的概念來傳教固然可以補儒，但當時大多數信者為文盲或婦女，現存文獻有不少是有關一般教友的靈性需求，如禱文、玫瑰經、耶穌傳等。這些文獻中很少用儒家或民間信仰辭彙，可能是以這些文獻的新鮮氣息，以及其與傳統相異之處吸引平信徒。正如最近幾年西藏密宗之受西方歡迎的情況有些類似。但吾人需知，明末清初當時的中國人若要選擇信教乃是一嚴肅的承諾，因此不可能只因新奇有趣就信教，還必須放棄很多既得利益，甚至做許多犧牲。是故在康熙末年禮儀之爭開始後，仍維持信仰或進教的人士乃多在主流社會之外，因而這些信者多為有意識的抉擇，並無法以異國情調來解釋。

對當時中國人而言，信仰上較難被接受的是，天主竟然道成肉身，降生於中國春秋戰國之後的西漢哀帝時，更且被釘在十字架，遭到與重刑罪犯的待遇。但也有人接受

這樣的主張，其中士紳及平民均有，且這些人形成了另一種社會共同體，構成了對皇權之挑戰，因為有教宗在羅馬主持教會內部的一切事務，也是一種中央集權的機構，與中華帝國相對。而且這些基督徒在道德上也頗具顛覆性。例如，基督信仰對女子地位、婚姻觀、棄嬰、苛刑及社會不公等當時流行的風俗習慣之挑戰。這種顛覆性不是外在軍事侵略，但卻更從根本處挑戰儒家價值觀。十九世紀之反教事件頻傳，並非外在侵略或基督教之隨帝國主義而來，主因乃士紳對其特權被挑戰下所領導的運動，這是柯文(Paul A. Cohen)的主張，但西方學者多同意其看法。

外來事物雖然引起好奇，卻不可將中國信友解釋成外國帝國主義的走狗，在十九世紀時也不例外，人們犧牲生命並不是為了帝國主義的侵略，而是為其所信而捐軀。

總之，目前研究多轉向當時中國信者的內心世界，如對李九功，《慎思錄》的研究，以及對當時教會善會組織如，聖母會，天神會，聖水會，仁會，恤會之研究。學者也注意到當時婦女在教義上受到較好的教導。

今日我們可向中國學如何對抗全面控制性的政權，因為中國信眾在二十世紀後半葉對此頗有經驗；而對中國人而言，西方可提供如何生活在多元及民主時代，並以活潑的行動尋求社會的公平與正義。在教會事務上，明末清初的中國經驗還可以學習的是，司鐸神職界之對原則及教會紀律的內部爭吵導致教會內之互相不信任以及最後教會與社會之疏離，且教友有時選邊站更造成分裂，正如今日中國大陸之官方及非官方教會之分裂。這是對基督所提的愛的訓示之一大考驗。

四、幾位華裔學者的分析

黃一農的研究史回顧及展望，先介紹了民國初年的重要研究人士及其成就，如陳垣及陳受頤等人，從史料中爬梳出不少相關的內容，其後最突出的是方豪，尤其是在史料的考証及史實及人物的介紹。其次介紹目前台港及大陸的研究，從四五年截至九四年為止，這方面研究學者並不太多，所有出版的編譯撰寫的書籍台灣有二十九種，大陸三十種，西文較多，但這九年來，大陸學者增加許多，如李天綱、王曉朝、顧衛民、徐海松、張國剛、李向平、江文漢、吳伯埡、沈定平、張西平、許明龍、吳莉葦...等人的著作，可見其近年之勃興。黃氏特重中國方面的研究，尤其是為清初曆獄中的國人說話，他指出不少研究者揚教心態所造成的限制，例如誤認非教徒為教徒，或為教徒隱惡揚善等。黃文稱許西方學者的問題意識及研究成果，最後並呼籲要走出對個別人物的研究，並加強各國語言的學習以及盡量擴充研究的史料。

黃氏多年的研究可以看出他也往他所呼籲的方向努力，使我們對於當時中國的教徒如孫元化、韓霖及王徵等人有了進一步的認識，更重要的是對於在天文曆法之爭中，持

反西法立場的國人之看法，有了較持平的瞭解，而不再是以現在的角度譏諷當時的愚昧及可笑。

張先清在〈回顧與前瞻—二十世紀中國之明末清初天主傳華史研究〉一文中比較完整地回顧了上一世紀明末清初的天主教在華的傳播的學術研究情況，主要討論國人的研究，從早期的陳垣、馮承鈞到近期的黃一農、孫尚揚等人；從大陸台灣再論及歐美如比利時的魯汶大學的倡導等。

三十年代成果豐碩，但中共建政後的三十年，十七世紀來華的西方耶穌會士被定性為：「西方殖民者配合其軍事、政治、經濟侵略的一隻先遣隊」，傳教士的活動是「依殖民國家統治者命令進行的有組織、有計劃的侵略活動」。⁸但在 1978 年後，由於大陸政治、社會趨向開放，研究乃蓬勃發展，尤其以對耶穌會士的評價問題；來華會士及奉教士大夫的個案研究；中西思想文化的交流與沖擊，如教案、禮儀之爭等；耶穌會士科技活動之研究以及澳門與早期來華教士之關係等五方面，並列舉了不少實例。最後並期待文獻之蒐集整理翻譯及出版，擴大視野及深度，呼籲各機構科際合作，並積極參與國際交流。

此文對大陸此領域的研究現況進行相當完整的描述，除了提出研究的大趨勢外，並表列了自 1930-1949、1978 迄 1996 二十年來的相關著作論文集及譯著，頗有參考價值。作者指出，以往國內研究仍有相當部分「停留在低淺層次和通俗介紹的範圍內」，內容上，太重耶穌會，應對其他修會及下層社會奉教者多注意，尤其是其「虔誠程度令人吃驚」。此外，教民與家族關係，教民與中國秘密社會、傳教中的性別區分等等，都值得進一步探討。⁹

王曉朝則在〈文化的互動和轉型〉中有如下的結論：

1. 跨文化的文化傳播具有雙向性，而非單向性的輸出和輸入。
2. 文化衝突和對抗是一種必然，但不能用來證明異質文化不可能融合。
3. 文化融合是可能的，消除一切差異的文化整合是不可能的。
4. 文化適應與外來文化的本土化是文化融合的有效途徑。

這也是與有些西方的看法頗不相同，但較符合吾人對中西交流的理解。然而，雖然我們可以承認文化傳播有其雙方性，但很顯然的有強勢及弱勢的區別，因而在交流時就有向強勢一方傾斜的現象。不可諱言，縱然學者提倡以中國為中心的中國學研究，但近五百年來的中外交流特色是前期較對等，但十九世紀後則是強勢的西方對中國的衝擊遠較中國對西方的影響來得大。換言之，再怎麼中國中心論，也不能改變過去所發生的一切。

李天綱(1997)〈天儒同異：明末清初中西文化學說評述〉《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

8 張先清，頁 114。

9 張先清，頁 134。

1997年第3期，頁29-34。此篇文章指出，西方傳教士主張中學西源；而中國士大夫卻認為西學中源；只有一些接受西學的士人能較平心靜氣地截長補短，平等對待西學，不卑不亢，是值得鼓勵的態度。

李天綱，〈跨文化詮釋：經學與神學的相遇〉，《明末天主教論教文箋注》導言，《中華文史論叢》，總第72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6月，第252-309頁。此文他討論明末清初耶穌會士如利瑪竇的經學，以及三大柱石，徐光啟，李之藻及楊廷筠的經學與神學之會通，主要的看法有下列兩點：

「三柱石」和利瑪竇等耶穌會士，融合神學與經學，在東西方兩種詮釋傳統中汲取資源，為他們的天主教信仰建立學問依據。他們的經驗至少告訴我們兩點：一、「神經學」——西方神學與中國經學的「會通」是可能的；二、「考據學」決不是豆釘小儒們的雕蟲小技，而是關係「天道」的大詮釋。

最後他認為：我們終於看到，天主教最重要的一項神學詮釋，最初是在儒家經學裏面建立起來的。我們也因此看到，天主教神學向儒家經學領域的侵入，並不總是敵意的，相互之間的詮釋和發明是可能的。另一方面，清儒的反應實際上也並不總是表面的排斥，對於神學家的合理解釋，儒者也是能夠容納的。

也就是說基督宗教的一神論思想，在儒耶會通中也能建立起來，基本上，交流是可能的，而且符合人文主義的精神，並可以有正面結果的。這種看法與西方學者如謝和耐(Jarques Gernet)是很不相同的。

五、此領域研究的新趨勢

或許我們可以從一個書目的統計來看研究的情況及趨勢：近來大陸的學者徐海松曾經製作一個從1980到1999二十年來大陸對十七世紀與耶穌會有關的論著及文章的書目，我們加以統計列表，可以得到下列的資訊：¹⁰

耶穌會士與中西文化交流論著目錄各類統計

		1980-1	1990-1	小計	
		989	999		
著作 部分		53	100	153	

¹⁰ 請參閱浙江大學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中心網站 (www.zju.edu.cn/depart/chcc/chccpaper.htm)上徐氏的文章：〈耶穌會士與中西文化交流論著目錄1980-1999〉。

論文 部分	總論	27	78	105	215 937	
	宗教	54	66	120		
	思想	24	28	52		
	學術	8	39	47		
	制度、風俗	1	9	10		
	科技	綜合	20	23		43
		天文曆算	35	29		64
		地理	19	24		43
		物理	17	10		27
		火器	7	12		19
		生物、醫學	4	4		8
		其它	5	6		11
	藝術	美術	35	20		55
		音樂	8	10		18
	事件	16	27	43		
	人物	64	80	144		
文獻	33	33	66			
信息	29	33	62			
總計		459	631	1090		

由上可見在一千多種有關著作中，宗教及思想屬於較多的，其餘則分散於人物，科學，文獻及藝術之中，應該是涵蓋各方面的，若以十年為一界限，則明顯可見，在後十年當中所寫的作品，在書籍方面多了一倍；在論文也多了近四成。至於在內容性質上的

變化，則有待更詳細的整理分析，但大致可以說，雖然對器物如科技產品的興趣維持不變，但在總論以及學術思想之綜合及反省上，後來的十年有較多的成果。

若再探討較新近的著作，吾人從其題目中即可反映出來新的切入點及關懷面：

Nicolas Standaert, "Xu Guangqi's Conversion as a Multifaceted Process", in *Statecraft and intellectual renewal in late Ming China : the cross-cultural synthesis of Xu Guangxi [i.e. Guangqi], 1562-1633 / edited by Catherine Jami, Peter Engelfriet and Gregory Blue*. Leiden ; Boston : Brill, 2001, Chap. V. pp. 170-185.

作者認為徐在上海長大，企求從科舉中出頭。他指出幾乎無人使用徐氏入教前之史料，來研究徐氏的思想，尤其是對中國經典的作品之看法。由於徐氏不滿宋人解經的方法，於是想要找更早的學者的經驗，在他心中早就想找東西來補儒。徐之皈依主要歸因於他自己這位信者所扮演的主動角色。其他使他皈依信教的因素尚包括有徐氏當時所遭遇到的文化或個人危機、生活中發生的事件之累積沉澱的結果，他想尋求確定感，且正好天時地利人和，以及徐氏有些「被嵌入」(encapsulation)及「禮儀上的投入」(ritual commitments)情境都使他有皈依的傾向。鍾氏從徐與耶穌會士的互動來看，他認為徐氏之皈依是一種「知性」的(intellectual)行為。

總的看來，徐氏之信教其背後因素有多層次及多面向的，正如後現代主義者所主張的。

中國學者方面，最近的一部論文集：卓新平主編：《相遇與對話：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國際學術研討會文集》，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642頁。這部由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長所編的鉅著，從名稱上來看也可以看出其受到新思潮及趨勢的影響，從互相尊重及平等對待的基礎上來處理跨文化交流及詮釋的問題。

總結上述的討論，我們或許可以體察到如下的一些新趨勢：

1. 探討個人或團體接受新宗教的機制，更深入，不只是表面，如以往認為明末士人受到西方科技之吸引，如徐光啟，李之藻而入教，現在從其本身原有的思想傾向或時代風氣產生了一種歡迎的環境，進而接受。團體之進教可能是歷史性危機促成的，也可能是利益上的選擇，不見得都是為了信仰。
2. 教案之發生，不像以前僅從民教衝突，士紳與教士利害抵觸或是教士包攬訴訟所引發，而是爆發在原先就有的宗族或族群裂痕上，宗教因素只是誘發其爆出的外因而已。或者是民間原有的祭祀圈遭到外來宗教的破壞或威脅而產生的。
3. 中西交流史，不再強調調適或衝突，而是探討交流理論，本地化或情境化的層次。也不再以上層人物及團體為研究對象，而想從受傳者大眾或弱勢信者的信仰過程及內容來探討。

促成新趨勢之因素：

1. 對西方中心論的批判：以中國人為中心，並尋求地域上的差異。
2. 意識型態的淡化：改革開放後，對外人態度的轉變以及市場經濟的衝擊下，不再全以帝國主義及殖民政策來詮釋儒耶交流。
3. 對現代性的質疑，對以前權威之解構，重弱勢族群及日常生活；對事實感到懷疑，認為許多現在的既有認識都是想像出來或是發明的，從權力關係來解釋行為及現象。

六、小結：朝向一個後現代主義視野下的中西跨文化詮釋

由於前述的種種此領域中的研究趨勢，有許多均為有效的取徑，但也因為目前這些研究我們可以觀察到有下列的幾項特質：

1. 無法歸類。
2. 無特定中心。
3. 非直線性的進步觀。
4. 題材多元，從器物到形上學；從地圓說到教會大學。
5. 多維度取徑，從論述分析到教案衝突。
6. 重視弱勢、下層及婦女。

因此，我們不妨將此種性質稱為「後現代主義」的角度，當然此處並非指極端形式的「後現代主義」，亦即不是認為一切都是相對的，虛無主義式的；或是由意識型態或權力關係來解讀分析相關的議題，而是一種較溫和而公開的態度。或問，此取徑與「多元」的角度有何不同？當然，「後現代」包括「多元」在內，然而「後現代」也意謂著對「現代主義」範式下所產生的流弊的一種矯正，以及也意識到「主體性」的變遷，對於追求一固定的結論，也不像「多元論」那麼的執著。¹¹ 換言之，不論在研究議題及結果方面，都是開放的。

總之，此領域的研究愈來愈細密，也愈來愈多元，昔日的泛泛之論，或是意識型態的概括解釋已不受重視。史料之尋求也愈來愈全面。因此觀察的角度也儘可能跳脫以一方為中心的立場。中西之間交流，不再是單向的，而是互動的；在交流中，雙方均有變化。其影響也是互相的，但是從明末清初較平等地交流到清末一面倒地西方力量對東方的宰制及衝擊，不能因為力求矯正西方中心論並力求中國中心主義，就認為雙方的影響是相當的。明朝劉氏的那首充滿感情的詩〈寄衣〉：「長短只依元式樣，不知肥瘦近如何」，固然是無可奈何，但以中西耶儒交流而論，多少要知道近來的變化，以免造成剪裁的不合，這是進步的基礎。

11 Keith Jenkins, *Refiguring History*, (Routledge:London & New York, 2003), p.3.

《四字經文》、本地化與台灣天主教*

古偉瀛*

提 要

中國古典中如《詩經》喜用有韻的四個字為一句，來呈現欲表達的訊息，由於琅琅上口，易於打動人心。天主教自明末清初再入中華以來，為了傳教，在福建多年的艾儒略(G. Aleni)曾將天主教史及其基本教義以《四字經文》出版，此書經過兩百多年，至二十世紀中葉仍為台灣教會傳教員所使用。本文擬比較台灣版與當初艾氏的經文之異同，並嘗試分析此書的本地化色彩及其在台灣天主教會史中之角色。

關鍵詞：四字經文，台灣天主教，艾儒略，道明會

The Four Character Classic and the Taiwan Catholic Church

Wei-ying Ku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and interview with old Taiwanese Catholics, the Four Character Classic(Sizi jing wen) has been very important in the missionary history in Taiwan. The Dominican missionaries and their Chinese catechist used this Classic to initiate and preach the prospect converts. This Classic was modeled after the Classic of Odes and also the Four Character Classic of the Ming Times. It was constituted by the sentences of four characters, with rhymed ending, and consequently was easily to memorize. This paper is to compare the 《Gungjiao Sizi Jing Wen》 published in 1935 in Taiwan with the one published in 1642 by Giulio Aleni S.J. in Beijing. It is hoped to see the changes and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versions would reveal the different situ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knowledge and theology of the ages.

* 本文初稿曾在 2000 年 9 月南懷仁文化協會與輔仁大學天主教史料中心舉辦之第七屆中國天主教史國際學術會議中發表，經修改後即將在比利時出版。

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本文之完成，感謝香港聖神中心柯毅霖(Gianni Criveller)博士及台灣彰化羅厝天主堂黃清富神父所提供的《四字經文》等資料。

一、前言

中國古典中如《詩經》喜用有韻的四個字為一句，來呈現欲表達的訊息，由於琅琅上口，易於打動人心。以諸橋轍次的《大漢和辭典》為基礎編成的《中文大辭典》中，有「四字句」一條目，內文如下：「四字一句，詩經多其例，後世頌體詩多用之。〈文心雕龍，頌讚〉，所以古來篇體，促而不曠，必結言於四字之句，盤桓乎數韻之辭，約舉以盡情，昭灼以迷文，此其體也。」¹也就是說這種體裁作為頌辭最適和，短卻很充實，押韻上口，朗誦起來最易文情並茂，將讚頌之情發揮得淋漓盡致。事實上明代也流行《四字經》，同書該條目項下如此記載：「書名，一卷，明蕭良有撰，以四字句韻文敘古今史事。如三字經之類，為童蒙所用之課本。」²其全文一開頭即說明全經大要：「粗刪故事，誨爾童蒙，經書暇日，子史須通」，結語則為：「五湖范蠡，三徑陶潛，古人億萬，此不盡言。」此書乃為兒童所寫，為在讀經書之餘，以諸子及歷史之知識貫輸幼兒心靈，而最後則說值得一提的人太多，此書無法一一列舉，值得一提的是書中最開始所提到的人是：「重華大孝，武穆精忠」，亦即從忠孝兩字講起，讚美虞舜的孝順以及岳飛的盡忠；最後所提到的人，則是從商致富的陶朱公以及歸隱田園的陶淵明，不同的生涯及心態，頗有意義。

天主教自明末清初再入中華以來，為了傳教，在福建多年的艾儒略(G. Aleni)於一六四二年曾將天主教史、降生救贖及聖事等基本教義以《天主聖教四字經文》出版，其主要內容即為「救恩史」，將聖經新舊約中的主要人物及歷史納入其中，基本上模仿明朝的《四字經文》。此書經過近三百年，至二十世紀中葉仍以大同小異的方式，出版《公教四字經文》，為台灣教會傳教員所普遍使用。在形式上，此書之吸引人並能維持這麼多年，其中原因之一即因為此書不論是明末或是二十世紀日本治台初期，都是以袖珍本(pocket size)形式出版，不但便於攜帶，而且可以常常在不同場合及時間閱讀，以加深自己的信仰及對教會的認識。

本文擬比較台灣版與當初艾氏的經文之異同，並嘗試分析此書在台灣天主教會史中之角色。

二、台灣教會史上之《公教四字經文》

作者所看到的台灣天主教會所使用的《公教四字經文》，出版於昭和十年(1935)

1 張其昀主編，《中文大辭典》，華崗出版社，1987，2811。

2 同上註，以下之引文亦出同源，不另註。

七月，發行者為台中州員林郡田中庄，卓乃潭一八八番地，卓乃潭天主教會。此處乃台灣天主教會當時的唯一的具有印刷能力的教會。1905年在彰化縣員林羅厝庄的馬守仁神父(Manuel Prat, 1898/9/20-1914/6/12 在台傳教)從菲律賓的馬尼拉獲得一部羅馬字的印刷機器，出版了不少教會書籍，如《要理問答》、《古史略》等，後來此印刷機器遷移到田中，繼續出版書籍，最早的本地教會雜誌《良牧》(Liong-Bok)月刊即是在此出版。³因此《四字經文》於1935年在田中天主教會出版，成為台灣天主教信者的常用參考書。

此書在外觀上為袖珍本，便於攜帶，而且全文附有閩南語拼音在漢字旁邊，便於不識字的下層民眾閱讀了解。

為了便於比較及了解，此處將其全文整理如下：

四字經文

天主降生一九三五年

《公教四字經文》臺灣教區長楊多默准

袖珍本，共七十七頁

正學警言

造物之恩 不可忘

降生之恩 不可忘

受難之恩 不可忘

赦罪之恩 不可忘

死候之來 免不得

審判之嚴 免不得

地獄之苦 免不得

天堂之福 比不得

都門建堂碑記

自昔西漢時有宗徒聖多默之門弟，初入中國，傳天主教，次則唐貞觀以後有大秦國西士數人入中國傳教又次明嘉靖時聖方濟各至中國海濱傳教至萬曆時西士利瑪竇等先後接踵入中國傳教譯有經典著有書籍傳衍至今

蒙荷 清朝特用西法定造時憲新曆頒行曆務告竣謹於都城宣武門內虔建

天主新堂昌明正教時 天主降生一千六百五十年為大清 順治七年歲次庚寅云

修正歷法湯若望記

全能天主 萬有真原 無始無終 常生常王

無所不在 無所不知 無所不能 萬物之始

無形無聲 靈性妙用 萬萬榮福 萬萬美善

3 天主教台中教區編，《羅厝耶穌聖名堂開教125週年紀念專刊，1875-2000》，彰化羅厝，33。

唯一至尊 無以加尚 未有天地 先有天主
一天主父 二天主子 三曰聖神 三位一體
生天生地 生神生物 生我初人 為人類祖
萬品從生 真大父母 造化神工 六日迺備

第一日生 絕頂高天 無數天神 混沌水地
地經地緯 俱九萬里 神學所論 有四大處
一曰永苦 二曰煉獄 三曰孩所 四曰靈薄
第二日生 九重諸天 上下相包 併火與氣
土接乎水 水接乎氣 氣接乎火 火接乎天
火氣水土 名四元行 氣盈周密 不露天體
人雖仰天 所見是氣 天包乎地 四面可居
第三日生 高者為山 低者為海 草木五穀
第四日生 日月星辰 第五日生 五族眾禽
第六日生 百獸已備 然後將土 化成人祖

男名亞當 女名厄穢 配為夫婦 生我人類
命以性教 為善避惡 上愛天主 下愛世人
七日瞻禮 謝恩伊始 天神之屬 內有傲抗
罰魔永獄 怨主害人 故誘我祖 逆命犯罪
逐出地堂 是以有死 因有原罪 延及子孫
人之內身 父母所生 人之靈魂 天主賦界
魂御身善 身輔魂善 身從靈魂 喜於行善
魂殉肉身 喜於行惡 魂在身生 魂出身死
靈魂不滅 有始無終 善魂升天 惡魂墮地
微疵未贖 死入煉獄 諸聖通功 為死祈禱
煉至滿期 許登天域

一千六百 五十六載 人多作惡 犯主義怒
主命諾厄 預製一櫝 上下三層 置爾及妻
三子三婦 並諸物種 還發洪水 殄滅人物
四十日後 降罰已畢 諾厄父子 復居陸地
長子名生 次子名岡 其第三子 名雅佛德
其後子孫 分居各方 亞細亞國 皆生之後
利未亞民 乃岡之嗣 歐羅巴人 雅佛德後
洪水之後 天下人稀 經二百年 方及中土

東西南北 俱事上主

溯自天主 開天以後 二千五百 一十二年
世忘性教 無行善心 主發慈悲 從天降諭
令聖每瑟 解釋經旨 出示普世 使復為善
一勸事主 二訓愛人 三者教人 善政治國
復一千四 九十二年 世違書教 皆相從惡
天主憫世 第二位者 名曰聖子 因聖神能
奇功變化 降孕聖母 當漢研帝 元壽二年
歲次庚申 生如德亞 親身救世 名號耶穌
是真天主 亦真人者 降生奇蹟 先載古經
後來符合 一一不爽 母瑪利亞 卒世童貞
未有天地 主簡其母 聖德精粹 滿被聖寵
天神聖人 概不能及 六十三歲 連身升天
耶穌生時 眾星發光 天神環衛 如同白晝
空中奏樂 贊頌慶賀 守夜牧童 神命拜主
驢牛伏地 認主奇異 聖誕八日 行古割禮
十有三日 三王來朝 異星顯示 直至其處
四旬獻堂 母行取潔 有聖西默 聖婦亞納
見徵古經 贊頌真主 王黑落德 如德亞君
因三王朝 心生疑忌 欲殺耶穌 不知何在
令下白稜 管轄界內 二歲嬰兒 盡行殲死
天神預告 避厄日多 潛居七年 黑落德卒
神告令回 納雜勒居 厄日多國 人俗盡迷
彼時魔像 不下千萬 迨耶穌至 盡自傾毀
維昔先知 有一聖人 日勒彌亞 嘗旅此國
是時預言 可驗日後 童女抱子 忽來至此
千萬魔像 盡成粉 人雖習邪 亦因此語
畫女抱子 供奉拜禮

主十二齡 登堂講道 說明經旨 罔不稱異
幼奉聖母 伏聽其命 年三十一 出世敷教
若而當河 受洗若翰 天光閃爍 聖神現頂
空中聞言 快我意子 嚴齋四旬 不許魔知
魔來誘試 退其三攻 但出一言 撒但驚去
次日若翰 見主經過 語門弟子 基利斯督

天主羊羔	除免世罪	其二宗徒	名諳德肋
初聞往拜	同留一日	歸告其弟	日西滿氏
西滿見主	改伯多祿	弟子眾集	從此漸始
初行靈蹟	變水為酒	瞽者復明	聾者能聽
啞者能言	屈者能伸	病者命愈	死者復生
步海止浪	命風停息	鬼魔畏伏	蠢物聽命
當時順從	各國眾多	群從選擇	十二宗徒
從之聖德	大智大能	諸國語言	自能通諳
行教三年	無數聖蹟	年三十三	要贖人罪
知期已到	自願受難	難末到時	預言來事
受難前夕	巴斯卦禮	濯足宗徒	定聖體儀
園中祈禱	血汗流地	恐人不悔	辜負主恩
天神下降	獻爵恭慰	如答賣王	引惡黨來
夙願樂為	主聽仇執	連解四司	受辱萬般
初縛石柱	鞭撻五千	身無全膚	羔羊一般
苦痛血流	不出一語	繼做茨冠	箍在其頭
槌擊其上	復繫其後	聖血通流	甘忍其苦
十字聖架	迫主肩荷	一路壓跌	到山受死
將主聖身	釘在架上	身旁手足	傷有五處
釘計三時	聖軀方死		
此日慘異	天昏地震	月西遂東	乃掩日輪
古堂帳裂	殿頂石墮	互相擊碎	墳開聖現
人人悲痛	萬物研傷	聖屍入墓	魂降靈薄
安慰古聖	釋脫升天	死至三日	魂回合身
復活出墓	身光異常	五傷痕在	初見聖母
次見聖女	屢見宗徒	及諸聖人	併諸聖女
在世四旬	講論天國	視昔所言	倍為明妙
聖教政治	神國法度	爰立教皇	為眾神長
授權主教	併授鐸德	皆行教事	代天主位
定有七規	奇妙聖事	一曰領洗	二曰堅振
三曰聖體	四曰痛解	五曰終傅	六曰品級
七曰婚配	經言禮節	彌撒儀旨	一一備祥
將欲升天	種種垂訓	囑咐宗徒	與眾弟子
分行天下	訓誨萬民	與領聖洗	滌罪入教
囑咐已畢	率諸聖徒	同行出郭	到阿裏山

舉手降福 聖體升天 天神群擁 古聖群從
聖徒忻稅 送以心目 仰穹瞻戀 依依不捨
時有慶雲 藉主足下 天神下接 歌樂贊頌
耶穌聖軀 光透諸天 坐天主父 右尊之位
後眾不見 或跪或立 尚在彼山 瞻望不去
有二天神 衣白如雪 降現於前 明言諭眾
胡為瞻望 不能舍去 主在爾輩 升天而去
日後耶穌 從彼天國 依然下來 審判生死
眾聖得諭 遂歸祈禱 升天十日 百二十人
誦經祈主 聖神降臨 眾人頭上 火形如舌
光耀不燒 賜大聖寵 通萬國言 傳授聖教
耶穌在世 預言審判 世界前兆 有一惡徒
出身母腹 魔附其身 冒假天主 以誑世人
雖有賢智 不免被惑 民與民亂 國與國爭
隨地大震 瘟疫饑饉 天變可驚 怪異可畏
人向爾云 基利斯督 在此在彼 慎勿信從
古聖二人 復現於世 一厄諾格 生洪水前
天地造後 六百卅年 一厄里亞 生洪水後
天地以來 三千餘年 異世同居 出扶道難
關邪證主 因賴主功 多作靈蹟 多施神恩
如此三年 復遭魔屯 加以酷刑 二聖致命
惡殘肉軀 棄之於市 眾聞天聲 命二聖升
眾見二聖 殘軀復活 乘彼彩雲 漸登向天
即時四方 地遍大震 房樓頽壞 壓死萬人
奸徒亂黨 窘難信輩 多竭心計 以陷世人
欲表己能 定約一日 憑藉魔力 於眾人前
假稱升天 為原本堂 從是普降 萬福於人
然至其時 僅得登空 主遣使神 敗散魔計
魔如失翼 隕落下地 地裂巨口 生吞奸徒
即禁魔獄 加刑永苦 審判切近 諸天失序
日晦月冥 星辰墜落 天德動變 諸異畢集
黑雲布滿 雷電蟲烈 火焰燦飛 衝隕下地
暴風四作 毒染諸生 海湧濤洶 四周泛濫
江河川溪 殆如血流 水溢淹地 諸畜死滅
地之全體 極大震動 山丘崩裂 都吧圯履
天主降火 人民焚燼 十字聖架 現於中天

耶穌威嚴 駕雲而降 聖母宗徒 擁與審判
在如德亞 塞法山谷 遣大天神 吹其號器
從天四方 死者復活 善惡靈魂 俱合肉軀
善者在空 惡者伏地 天神進簿 俱聽審判
指出善惡 人人驚危 將一人罪 與眾共知
將眾人罪 使人人知 幽微暗昧 一一顯露
億兆人前 真可羞惡 天神奉命 陟降善惡
地裂獄開 震懼危恐 邪魔惡人 墜受永殃
審判已畢 主與諸聖 榮升天堂 永享真福
善人神光 七倍於日 主賜大能 穿堅透石
屈所欲至 萬里一息 天地再新 星光如月
月光如日 日光七倍 天主經典 載有詳悉

我勗世人 須奉天主 天主大恩 勝我父母
生天覆我 生地載我 生日月星 照我臨我
草木五穀 魚鱉六畜 養我食我 經典教我
降生救我 釘死贖我 何等恩功 我何以報
主將升天 恐失教我 立教化皇 命爾主教
授爾鐸德 數萬風波 救我靈魂 永保真福
人為物靈 何不奉教 人有原罪 伴有本罪
苟能痛悔 改過遷善 領受洗禮 特赦前罪
靈魂光潔 心地清明 謹遵主訓 無忽無怠
思救贖恩 熱心感法 以愛還愛 以死還死
既勤解罪 兼領聖體 日看彌撒 頻聽講道
精修無玷 立功為善 以思言行 合天主旨
求主為父 在天為歸 欽崇為事 愛主愛人
日除其礙 日勉其進 朝夕功課 行神哀矜
克七罪宗 守十誠命 生為聖人 所獲平安
死同天神 永享真福 萬世常生 豈不大樂
若不奉教 忘天主恩 生是惡人 死墮地獄

道之大原 實出於主 讀了神書 明了經旨
得大根本 斯真學問 一非不問 萬德全渾
人勉之哉 人勉之哉

天主聖三 聖神七恩

敬畏 欣順 智識 剛毅 計策 明達 上智
以上所講 領堅振者 該當明白

全書起句：「全能天主，萬有真原，無始無終，常生常王，無所不在，無所不知，無所不能...」，最後幾句是：「道之大原，實出於主，讀了神書，明了經旨，得大根本，斯真學問，一非不問，萬德全渾，人勉之哉，人勉之哉。」可以說將重要要理都包含入內，而且前八字開宗明義，並與清朝康熙帝的「萬有真原」四字匾相同，頗有力量。而文句典雅可誦，時而對稱，常有押韻，易入人心。為了呈現此小冊子的重要意義，我們可以與 1642 年出版的《天主聖教四字經文》加以比較，並從幾個角度來加以分析。

三、艾氏的《四字經文》及兩版本之異同

艾儒略，字思及，1582 年出生於意大利的布里西亞(Brescia)，⁴ 1600 年入耶穌會，進入有名的羅馬公學就讀，1609 年被派往中國，先抵澳門學中文，翌年入廣州，為嚮導所賣，被捕，仍回澳門。1613 年方得正式進入中國內地，奉命至北京，未幾同徐公光啟赴上海，奉命至揚州為某大員講解西學，勸其感化，皈依公教，洗名伯多祿。此員返陝西，任要職，邀公同往，不久，此員調為福建總督，公往山西，為韓氏兄弟全家付洗，未幾，即於 1620 年左右赴杭州，為李之藻之母行終傳禮，1623 年，瞿太素子瑪竇邀公往常熟開教，瑪竇從兄式耜亦受洗焉。1624 年，閣老葉向高罷歸，道經杭州，延艾公入閩，翌年抵福州，從此年直至 1649 年均在福建，實為閩省開教之第一人。「公居閩八月，與官紳交往際，盛譽風生，稱為「西來孔子」，學者因而歸化甚多...不數年而閩中八府，各建一聖堂，次要之各縣，亦建經堂，教化大行。一六三八年教難突起，教士被逐，聖堂被毀，公一時退避，而終又潛入焉。武夷山有廟三，公感化而改二廟為聖堂，其三廟之住僧，嚴齋含素，不為所動，公勸其持齋如故，去偶像而奉主像，詩僧成為信友矣。1649 年公卒於延平，葬於福州。1641 年至 1648 年，公曾任中國省區會長者七年。」⁵ 在福建的二十五年中，一反過去在各地傳教及出版科學著作的方向，寫出了不少宗教靈修的作品，《四字經文》即其中之一。

1638 年的教難原因之一乃出於本篤會士的手拿十字架的高姿態宣教的態度。⁶

4 有關艾儒略的生平，請參見柯毅霖(Gianni Criveller)著，王志成等譯，《晚明基督論》，(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159-173。

5 徐宗澤編著，明清間耶穌會士譯著提要，中華書局，1946,363-4。

6 柯毅霖，前揭書，169-170。

泰西學士艾儒略謹述，刻於一六四二年；是書大意，是言天主造天地神人萬物，降生救贖，聖事及四末等。⁷

聖教四字經文一卷(1642年北京初版, 1650年, 1798年北京再版。⁸

兩種版本之比較：

1642年艾氏版	1935年台灣版
《天主聖教四字經文》	《公教四字經文》
P3 地之中心 有四大穴	P10 神學所論 有四大處
P6 二千二百 四十五載	P18 一千六百 五十六載
(全文漫漶不清, 辨識不易)	P21 東西南北 俱事上主
P7 三千四百 五十餘年	P21 二千五百 一十二年
P8 一教事主 二教愛人	P22 一勸事主 二訓愛人
P8 復至一千 五百餘年	P23 復一千四 九十二年
P8 名曰費略	P23 名曰聖子
P9 眾星交光	P26 眾星發光
	P28 有聖西默
P10 王黑落得 心生猜忌	P28 王黑落德 心生疑忌
P11 黑落得卒	P29 黑落德卒
P12 天光閃樂	P33 天光閃爍
P12 娑殫警去	P33 撒但驚去
P12 契利斯督	P34 基利斯督
P13 鬼魔畏服	P36 鬼魔畏伏
P14 難未到時	P38 難未到時
P14 山中祈禱 血汗滴地	P38 園中祈禱 血汗流地
P15 如達賣主	P39 如答賣主

7 同上註, 169。

8 同上註, 366。

P15 苦痛流血	P40 苦痛血流
P15 籜在頭上	P40 籜在其頭
P15 復繳其后	P40 復繫其後
P16 釋天升天	P43 釋脫升天
P17 授比斯玻	P45 授權主教
P17 格辣虛多	P45 奇妙聖事
P18 與領聖水 洗罪入教	P47 與領聖洗 滌罪入教
P18 囑付已畢 到阿裡山	P47 囑咐已畢 到阿裏山
P19 坐罷德肋	P49 坐天主父
P21 契利斯督	P54 基利斯督
P21 出自地堂	P54 復現於世
P21 三千卅年	P55 三千餘年
P22 二聖命終 棄之于市	P56 二聖致命 棄之于市
P22 奸徒作亂 維時困難	P57 奸徒亂黨 窘難信輩
P22 欲表己能	P58 欲表己能
P23 主遣宗神	P59 主遣使神
P23 即錮魔獄	P59 即禁魔獄
P23 星辰失光	P60 星辰墜落
P25 從天四風	P36 從天四方
P26 七倍于日	P66 七倍於日
P27 命比斯玻	P69 命爾主教
P28 領受聖水 大赦前罪	P70 領受洗禮 特赦前罪
P28 心室清明 謹遵主教	P70 心地清明 謹遵主訓
P30 行十四矜	P72 行神哀矜
P30 道之大原 實出于天	P74 道之大原 實出於主
P30 讀了天學	P74 讀了神書

兩本四字經文相隔兩百多年，全書主文內容相異之處僅四十餘，而其中所異不多，可說大同小異。大致而言，內容上全書僅有少數地方是為便於中國人閱讀而進行了一些增補。例如在敘及天主創世時說：「生我初人，為人類祖；萬品從生，真大父母」；耶穌聖誕：「當漢哀帝，元壽二年」。

深入探討，兩者可以從下面幾方面來比較：

1. 時空環境之不同：明末的中國與日治中期的台灣為兩種不同的時空情境，因而有必要的修正，例如，艾氏的第七頁之原文為：「溯自天主，開天以後，二千四百，五十餘年」；台灣本則改為：「溯自天主，開天以後，二千五百，一十二年」。(頁21) 又艾氏本第二十一頁，「天地以來，三千卅年」，台灣本則改為「天地以來，三千餘年。」(頁55) 這是因為兩書出版時間的差異，有必要加以調整之故。另外，由於艾書出版於北京，通用官話，該書並無注音；而台灣版則在所有漢字左邊，加注羅馬字廈門音拼音，便於台灣不識漢字的下層民眾閱讀。

艾氏本有「二聖命終，棄之于市」；「奸徒作亂 維時困難」(頁22)；台灣版則改為「二聖致命，棄之于市」(頁56) 「奸徒亂黨，窘難信輩」(頁57)。這兩句中的名辭：「致命」與「亂黨」則應屬清朝晚期才有之字彙。由於官方對教會的壓制及迫害，傳教士及中國信眾被殺，教會歷來尊稱為「致命」；而亂黨則常指涉清末反清的革命黨人，而在此處則具體指出信者遭到有組織的反教者之迫害。

2. 神學觀念之變化：天主教神學在二十世紀有很大的變化，在此之前的變化並不太明顯，這些變化並沒有太影響到兩種版本的內容，但仍有一些值得注意的修改。艾氏版「地之中心 有四大穴」(頁3)，台灣版則改為「神學所論 有四大處」(頁10)；艾氏版本「出自地堂」(頁21)；台灣版則改為「復現於世」(頁54)。對於地心的實際樣貌愈來愈清楚之際，昔日的四大洞穴則已改成了只是神學家的意見，而且四大「處」，較具彈性；同理，「地堂」也隨著地理學的演進而逐漸沒落，改用其他的說法，可以有多種解釋而不會造成日後當真相更精確時的困窘。

3. 文字表達之精確：明末清初天主教東傳之際，對於天主教神學之書以及耶穌會傳教士所引介進來的天文曆算，一概都泛稱「天學」，容易造成誤會，兩百年

來，漸漸用字精準，不將天主教神學之書再以「天學」相稱，因此艾氏本的「讀了天學」(頁30)，在台灣版，成了「讀了神書」(頁74)；艾氏版「一教事主，二教愛人」(頁8)；台灣版則改成「一勸事主，二訓愛人」(頁22)，此則顯出用字的豐富性，以增加其多樣化及趣味，而不是用「教」，因為「教」字一來與宗教容易混淆，且重覆使用令人感覺單調。P12「娑殫警去」P33「撒但驚去」P12「契利斯督」P34「基利斯督」P28「領受聖水 大赦前罪」P70「領受洗禮 特赦前罪」P8「名曰費略」P23「名曰聖子」P17「格辣虛多」P45「奇妙聖事」P19「坐罷德肋」P49「坐天主父」

4. 教會規定之演進：教會在1661年成立了傳信部，想要從葡萄牙手中取得對中國傳教工作的主導權，原來葡萄牙在中國成立了南北兩個主教區；傳信部則欲成立「宗座代牧區」(Vicar Apostolic)來取代。換言之，在傳教區(missionary field)成立此種制度；而在已成立「聖統制」(hierarchy)的地區，則任命「主教」(bishop)。此中文詞彙「主教」確定後，原來按照發音轉成的「比斯坡」(艾氏版頁17, 27)，就改成了「主教」(台灣版，頁69)。在明末清初之時，為了方便稱呼天主教，也有時使用「主教」來指稱教會，因此與後來的教區「主教」名稱易於混淆，艾氏版的「心室清明 謹遵主教」(頁28)，在台灣版就改成了「心地清明 謹遵主訓」(頁70)。

另外，由於清初的禮儀之爭，使得在中國天主教中，不能單獨使用「天」這一個字，以與「天主」有所區隔，於是在艾氏版本中的「道之大原，實出于天」(頁30)，在台灣版中成了：「道之大原，實出於主」(頁74)。此處之文辭表達方式也很合乎中國傳統。

不過其中的經文內容有些已過時，雖然從中可看出百年以前的神學及宗教觀，但顯然無法再繼續使用，若今日要重編，必須大幅修改。例如，經中所言從舊約到新約間的大事時，所附加的歷史年代(創世後1656年諾厄建方舟；2512年梅瑟出現)；以及世界末日來臨前所描述的兩位古先知重返人世救眾人等都不是今日的教會傳播的道理。

另一現代人會很感興趣的問題是此書中有否將教義信理調和在中國文化的脈絡中。這類問題在成書時撰者恐怕還未認真考慮過。他們擔心的應該是在使用中文的過程中是否有違基本信理而使得所傳的宗教不夠正統。

五、結束語

《四字經文》從清初在福建的艾儒略神父編纂下流傳至今已三百多年，歷久不衰，其中必有其道理，其中之一當然是其文類易於上口，而其表達的方式，更有一種「本位化」(inculturation)的重要意義。

如學者所言，兩種文化之接觸及交流，首先是採取「適應」(adaptation)、「調適」(accommodation)，亦即在比較表面的層次，例如使用對方易懂的語言、禮儀、服飾和生活方式，來引進或介紹自己的思想及文化或神學；⁹ 此種層次，或許也與中國學者提到的「擬同」，亦即在接受異質的宗教思想、教義時，不改變接受主體已有的概念格局，以現有的概念來擬配外來的思想；¹⁰ 其次，則是以對方傳統中與新文化較易接軌之處加以整合，而新的內容則會漸漸也影響原有之文化，兩者將搏合成一體，這就是一種「本位化」的過程。以基督宗教的本位化而言，「是將福音的訊息落實到一個既定的文化當中，使基督信仰的經驗不單藉著這文化的因素表現出來，還成爲一股力量，去鼓動、指引、和革新這種文化。一方面，它在這文化之中產生一種新的合一與共融；另一方面，它也豐富了普世教會。」¹¹

《四字經文》，不但使用中文，而且其文體使用古代經典，已不只是語言的借用而已，更有相當程度的「本位化」內容。學者指出，「本位化的觀念可以分成很多種，有等級上的差別；...通常，人們經過選擇之後接納一種觀念，便會對此觀念的原意有不同的強調。每一個理論都能被安置在新的脈絡中。...最普遍的是混合的概念：在舊概念上加上新的概念或兩種文化的概念的混合。西方的父成了中國的大父母...」¹² 這原本是明末基督徒儒者楊廷筠(1562-1627)的重要的「本位化」成就，也完全吸收在清初艾儒略的著作中，在1642年初版的《天主聖教四字經文》中，就有天主「生天生地，生神生物，生我初人，爲人類祖，萬品從生，真大父母」。

9 鐘鳴旦，《楊廷筠，明末天主教儒者》，魯汶大學中歐研究中心及香港聖神中心，1987, 263。

10 參見孫尚揚在本次會議中的論文，〈王徵論愛〉。

11 鐘鳴旦，前揭書，263。

12 鐘鳴旦，前揭書，266。

學者也指出，「當兩種文化相交合時，外來傳統有時會超過本地文化，使本地文化退居幕後。...西方之四行取代了中國之五行。」¹³ 艾氏經文中也有類似記載：「土接乎水，水接乎氣，氣接乎火，火接乎天，火氣水土，名四元行。」¹⁴

更有學者認為在「調適」及「本位化」之外，更有一種「情境化」(contextualization)，亦即置身於特定的時空脈絡中，針對現時存在的問題及困局，從自己的信仰觀點提出安身立命之道。在基督新教的辭彙中，此字的中譯是「本色化」。換言之，此字與「本位化」之間界限並不明顯。不論如何，《天主聖教四字經文》，從書名到體例，押韻到內容的呈現，可以說是「情境化」的一種過程，不管在現在看來，有許多可以改進之處。

總而言之，「調適」、「本位化」及「情境化」的過程是相當複雜且具有很強烈的選擇性的，影響棄保的因素有很多，有些是大環境，有些是家庭背景，也有些是個人的特殊情境所致，但無論如何，外來的成份必須與本地的傳統某些部份進行有機的整合，而非胡亂湊合拼裝而成的。¹⁵

也有一些中外學者，並認為基督宗教與中國傳統之間有不可跨越的鴻溝，即使是在初期接觸有一段友善時期，或者有著嚐試讓中國社會接受的努力，但終究無法融合。¹⁶無論同意與否，此證明兩點：一點是基督宗教仍未為華人社會主流所接受；另一點則是兩種文化之融合有極大的困難。

本人以為，由於兩種文化系統都很複雜，所傳的對象也有高低階層的不同，更何況同屬一階層的人也有行業及氣質的不同，例如農人及工人；理性及感性，因此很難找到一種一致看法及統一的傳教策略。但能否說中西方人心靈永遠無法溝通？或是以前的方法都是有問題的？本人以為人性總有共通之處，生理心靈所需，也大同小異，醫學上共識相當高，在心靈上雖因文化之影響，對基督宗教的接受態度頗不一致，並不表示中國文化無法接受基督信仰。

13 同上註, 267。

14 《天主聖教四字經文》, 3。

15 鐘鳴旦, 前揭書, 268。

16 西方學者如謝和耐 (Jacques Gernet) 著：《中國和基督教》(China and Christianity [1982][法])，收在耿昇譯，王化元主編：《海外漢學叢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中國學者如楊慧琳在本次討論會上的主要論點。

平心而論，若要人們接受宗教，不論何時何地，總要能觸動人心，讓人體會到宗教與現世的相關性，解決人生的重要問題，才有可能。中國中古時期的從佛教來詮釋來華的景教；明末清初以儒家思想來引入天主教；這也都是想要使新來的宗教讓當時的人民能感受到宗教與其人生的「相關性」，並進而為其所吸引而入教。換言之，無論是唐朝或明末，雖然從現今分類總結的觀點看來，或屬於調適，或屬於本土化，或援佛老釋耶，或引儒家證耶，其實若回到當時的脈絡來看，俱屬於「情境化」之努力。

《四字經文》從明末以來，三百年在傳教工作上一直擔任入門的角色，有如傳統社會中的《三字經》及《千字文》，從開天闢地以來，講到世界末日，除了介紹歷史，並將重要的教義信條以及倫理要求均放入其中，其對象應該是給下層社會的慕道者，否則不必使用羅馬字拼音。艾氏版本較簡單，台灣版本中前最先有〈正學警言〉七句，前四句以「不可忘」終結；後三句則以「免不得」結束，全為否定口氣，頗具警世氣味；其次則為清初負責欽天監的湯若望神父(Adam Schall von Bell, 15 -167)所撰寫的〈都門建堂碑記〉，此文撰於1650年，在清朝僱用西人編修曆法完工後，在北京建了天主堂，並作文刻碑記之，此乃加強天主教在華之合法性。書後則加了為領「堅振」(Confirmation)所需知道的聖神七恩。顯然，此書不只是為慕道者，也為領洗後的進階聖事入準備的。

今日來看，書中有許多已不成為教會當信的道理，例如有關地堂以及最後審判及世界末日的詳盡描述，全書將救恩史相當精簡地整理出來，特別注意舊約與新約之間的呼應，由古及今，具有連貫性，便於記誦，其目的自是希望閱讀之人，將其內容內化成為人生命思想中的一部分，在生活中流露出來，成為指導行為的內在參考資源。

從明末以來的天主教《四字經文》，在型式上以及體例上，遵從原來明代的《四字經》，其中的用字遣辭，如使用「萬有真原」、「大父母」、「道之大原」及「當漢哀帝，元壽二年」，也有其「調適」、「本土化」及「情境化」的內容。此書雖稱為艾儒略所編，但實際上應該是艾氏及其中國協助者共同完成的，不太可能代表某一個人的思想。換言之，區隔此書屬於「調適」階段或是「本土化」就不容易，也並無太大的意義。每個時代的人都想使自己傳揚的信仰能契合社會脈動，打

動人心，亦即中外傳道人都想將教理「情境化」，只是後代的人有不同的標準及觀點，將以前的時代加以特殊的稱號。其實歷史是連續的，說只有中國人能將基督要理「本土化」，外籍人士永遠只能進行表面的「調適」，這種說法是有問題的。隨著時間，初期的外籍傳教士誠然多在進行「調適」，連本籍新皈依的人士也可能從事類似的工作，很難說本籍的一定是進行「本土化」；但後來的中外教會人士，利用前人既有的「調適」成果為基礎，均有可能進行「本土化」或「情境化」的工作。《天主聖教四字經文》這本書在資訊發達，電腦網路流行的年代，當然不論內容及形式都已不再適用，然而在當時，以其成本之低，內容之精簡連貫，傳播方式之易達，的確是一種傳播教會要理的有效工具。

在近期的《教友生活》中同時刊出兩篇文章，一為廣告，一為很重視本土化神學的張春申神父的想法。前者為一本地老教友為了要重振本地福傳工作而刊載徵文啟事，其內容強調使用本地語言傳教之重要性：

台灣天主教會與大學、中學、小學、幼稚園等各級學校及醫院、安老院、殘障兒童教養院等，對教育、醫療、社福方面之貢獻，有目共睹，值得得社會大眾肯定。但對本身最重要之福傳工作，卻因受光復後政府推行國語教育之影響，忽視以本地語言傳教，紮根基層的重要性，可說是在福傳本地化方面之一大失策，以致除了原住民外，教友人數一直沒有增加，反而流失減少。這種衰退現象，身為教友實難坐視不顧，如何挽救危機應為每一教友所關心爰發起徵文，誠懇希望教內賢達，就福傳本地化之具體可行策略提供高見，惠賜鴻文，以便建議新世紀新福傳大會作研議改進之參考。徵文題目：「台灣天主教會本地化福傳之推行策略」。¹⁷

第二篇文章中，張春申神父一開始指出宗教有三種類型，即：神秘型，智慧型與先知型。神秘型的宗教：其修行在於達到與絕對、與神明及宇宙合而為一進入所謂神秘境界，印度教及佛教屬於此一類型。智慧型的宗教，其修行在於存天理去人慾，教人修身達人，獲得智慧，中國的傳統宗教屬此一類型。先知型的宗教，以聖經宗教為代表，向貧窮人傳報福音，另一方面則頻頻發言糾正時代的罪惡與不義。¹⁸

17 〈劉路加文教基金會徵文啟事〉，《教友生活周刊》，2001/8/05，二版。

18 張春申〈台灣宗教的類型與教會本土化〉《教友生活周刊》，2001/8/05，第五版。

台灣宗教兼具神秘與智慧結合的類型。台灣天主教，在梵二大公會議之後，仍在進行先知類型的福傳思考；或許我們太像先知那樣「站」著宣講，而不會如同智慧導師那樣談論生命，我們也缺少一些宗教的神秘。¹⁹

不論我們是否同意使用本地方言是否造成福傳之失敗，或是到底教友人數不增反減是否事實，或是站著傳教的先知無法像坐而論道的法師受人歡迎，這兩篇文章都說明了兩個訊息，一為教會本地化之必要性，一為目前我們的教會尚未契合社會脈動，觸動人心。其實不論西方以前福傳多成功，或是福音在中華地區如何一直無法被接納，教會目前在各地都面臨危機，也都面臨如何使福音的訊息「本土化」及「情境化」的問題，而這種問題隨著時間，永遠不斷地在挑戰我們，《天主聖教四字經文》是三百年來對此挑戰的有效回應之一，現在則是我們總結歷史，針對新的問題，動員新舊各種資源，再提出回應的時機了。

19 同上註。

台灣天主教史上的里脇淺次郎與涂敏正*

古偉瀛

天主教會自公元 1626 年從菲律賓入台以來，由西班牙道明會玫瑰省傳教士擔任主要的傳教力量，傳教地區在基隆淡水一帶，1642 年西國勢力為荷蘭人驅逐後，傳教工作停止了 217 年，一直要到 1859 年在中英天津條約之後，才二度入台傳教，直到二十世紀之前，約有十多名傳教士在台灣照顧約四千多名教徒。二十世紀日本統治全島，在前半世紀中，除了道明會士以外，對於台灣天主教的發展最具關鍵影響的兩位人士是里脇淺次郎(Satowaki Asajiro)及涂敏正蒙席，前者是日本戰時體制形成後派來台灣取代西班牙道明會士的教區長，使台灣天主教會逐漸邁向地方教會；而本省首位司鐸涂敏正的承續該職，更為此目標奠基，然而由於大陸局勢的轉變，使得整個歷史的發展轉向，天主教地方教會的建立及成熟有了不同的面貌，然而這兩位神職人員的歷史意義值得重視及探討，本文即是此二人的生平及歷史角色進行討論。*

一、前言

天主教會自公元 1626 年從菲律賓入台以來，由西班牙道明會玫瑰省傳教士擔任主要的傳教力量，傳教地區在基隆淡水一帶，1642 年西國勢力為荷蘭人驅除後，教工作停止了 217 年，一直要到 1859 年在中英天津條約之後，才二度入台傳教，直到二十世紀之前，約有十多名傳教士在台灣照顧約四千多名教徒。二十世紀日本統治全島，在前半世紀中，對於台灣天主教的發展最具關鍵影響的兩位人士是里脇淺次郎(Satowaki Asajiro)及涂敏正蒙席，前者是日本戰時體制形成後派來台灣取代西班牙道明會士的教區長，使台灣天主教會逐漸邁向地方教會，而本省首位司鐸涂敏正的承續該職，更為此目標奠基，然而由於大陸局勢的轉變，使得整個歷史的發展轉向，天主教地方教會的建立及成熟有了不同的面貌，然而這兩位神職人員的歷史意義值得重視及探討，本文即是對此二人的生平及歷史角色進行討論。

* 本文收錄於《20 世紀台灣歷史與人物—第六屆中華民國史專題論文一》，頁 185-208

* 本文之作承日台交流協會協助及彰化員林羅厝天主堂黃清富神父提供資料，特此致謝。

二、二十世紀中葉前的台灣教會

十七世紀及十九世紀的台灣天主教近年來已漸漸有人研究，¹基本上在日本領台之前，台灣教會的主導力量一直是西班牙道明會的玫瑰省，以菲律賓為中心，來台傳教，且因地緣關係，與福建南部的傳統道明會傳教區有相當多的人事交流及相同的教務政策。1883年12月3日台教務劃歸福建廈門教區管轄，首任台灣教區長為楊真崇(Andres Chinchon);1884年由黎克勉(Isidoro Clemente)繼任，1900年黎氏升任廈門主教，繼任第三任教區長為馬守仁(Manuel Prat)，1916年馬氏又升任廈門主教。另外，1889年(光緒十五年)有教務統計，教堂計有七座，從南到北，依序是前金、萬金、山腳、臺南、沙崙仔、羅厝以及和尚洲，另外屏東有溝仔漈及老埤傳教所，台北市區有一大稻埕傳教所。換言之，台中以北，只有一教堂以及一傳教所；教友人數方面，萬金、溝仔漈及老埤共有570人；前金及山腳有280人；台南3人；沙崙仔68人；羅厝164人；和尚洲15人。全台灣教友有一千一百人。²

日本領台之際，台灣天主教是在廈門代牧區的管轄之下，當時有十座教堂及數個傳道所。全島約有十來位西班牙傳教士，一兩千位左右的本地信徒，多半集中在高屏，台南、雲嘉、彰化員林及台北一帶，新竹桃園苗栗及花東並無教友，而在明治28年(1896)九月間，斗六與嘉義發生抗日事件，日軍進入之際據說有傳教士作為先導，引起對教會的襲擊，直到明治29年局勢才安定下來。

由於傳教事業需要女性助手，尤其是在高雄的孤兒院需要有更稱職的人員照顧，自從1903年起，首批道明會修女來台，一位是西班牙籍的若瑟芬修女(Sr. Josepha, O.P.)，另一位是菲律賓籍的羅撒修女(Sr. Rosa Remedias, O.P.)。³

截至明治末期(1911)為止，台灣天主教會共有十二個堂口，有三、四十個傳道所，當時在台的道明會士有白若瑟(Jose M. Alvarez)，良加略(Leon Gallo)，鐘利默(Tomas Masoliver)，馬守仁(Manuel Prat)，多瑪斯(Tomas Pascual)，洪羅烈(Angel Rodrigues)，陶神父(Toribio Toval)，良伯鐸(Pedro Prat) 吳達查(Bonaventura Gordaliza)，明義德(Juan Beobide)，楊多默(Tomas de la Hoz)，林茂才(Clemente Fernandez) 白斐理(Felipe Villarrubia)，閃佑道(Justo Sasian)，包神父(Faustino Rodriguez)等十五位。

台灣教務方面，馬守仁神父於1903年由淡水調至羅厝為本堂神父，推行教務不遺餘力，1905年4月在教堂內創辦一所傳道學校，招收十四名學生，1907年白斐理神父被調來協助辦理傳教學校，並自菲律賓馬尼拉聖多瑪斯大學取得西文打字印刷機，除了訓練，也出版不少教義書及祈禱書。此學校在1915年隨著馬神父遷移到台北蓬萊町。⁴

由於本地的教友方面由於數目日多，台北林茂才(1903/12/13-1920/9/16)在台，

1 請參見古偉瀛，〈台灣天主教史的回顧與前瞻〉，收入輔仁大學歷史系主編，《七十年來中西交通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以輔仁大學為中心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2000)，頁265-287。

2 大國督編，《台灣カトリック小史》，(杉田書店，昭和16年)，頁258-263；江傳德《天主教在台灣》，(高雄，善導週刊社，1980)，頁158。

3 江傳德，前揭書，頁278。

4 江傳德，前揭書，頁188。

或稱林啟明)神父於1906年完成台北市第一所教堂，地點在蓬萊町(大稻埕)。但完成後卻因市區改正抵觸都市計劃道路因而在1908年被拆，1911年在舊堂附近，亦即新店尾地段蓬萊町29號空地上，花費了三萬餘圓興建歌德式蓬萊町大堂，是北市當時最雄偉的建築之一。日本領台後，所進行的主要政策為使台灣儘快「去中國化」。由於台灣已脫離中國大陸管轄，成為日本殖民地，乃於大正二年(1913)七月十九日台灣正式脫離廈門「代牧區」(Vicar Apostolic)，獨立成為「監牧區」(Prefecture)，由林茂才受任為首任監牧，同時也引進印刷機器，以台灣監牧的名義發行要理書及各種教會資料，也在此期前後1917年創建第一所正式的女子中學---靜修女中。⁵

大正三年十月一日調查當時全台教務情況如下：教友中台灣人有三四五二人，日本有六五人，外國人有十五位，總計三五三二人；道明會中有會院長一人，傳教士九人，傳教員三十一人，小教區九處(高雄、萬金、台南、埔姜崙、樹仔腳、田中、羅厝、大稻埕、淡水)，教堂三十四座，小聖堂或臨時聖堂十所，祈禱廳二十處，傳教學校一座，學生十六人；道明會修女三人，小學九所，學生三二〇人，孤兒院二座，其中有七十七名兒童。⁶大正七年(1918)十月一日時的教務情況則為：教友中台灣人有四一二二人，日本有一二〇人，外國人有十位，總計四二五二人；道明會中有會院長一人，傳教士則有十人，傳教員三十六人。⁷

而在教務關係上也由福建逐漸轉移到日本的四國教區，因為該區也是道明會玫瑰省的托管地。大正九年九月十六日台灣教區長林茂才調回馬尼拉，十二月八日四國教區長楊多默(Tomas de la Hoz)兼任台灣教區長而返台。但其實在此調動之後面最主要的原因是在前一年的八月，日本政府代表信次郎海軍大佐向羅馬教廷交涉在南洋群島的德國籍傳教士遣送的問題，同時也暗示台灣監牧區應該脫離廈門主教而獨立。⁸楊多默上任後，自西班牙購入印刷機，於是出版了《善牧》及《公教要理》以及其他的漢字出版品。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由於國際聯盟委任日本管理南洋群島，而要建立軍事基地，台灣成了日本帝國防衛的最前線，尤其是美國針對菲律賓的防衛在太平洋強化其海軍基地後，台灣在軍事上的重要性日益增強。因此有好幾道法令公布施行，希望漸漸地使台灣與日本內地相同的情況。⁹

此期間，台灣教會史上有一件較特殊的事件是羅馬教廷派 Gardini 樞機主教於1923年一月時，前來屬地台灣視察¹⁰；日本在1919年首次有教廷派遣使節駐紮，¹¹三年後來台也是很自然的。使節由一位日本神父陪伴，一月十日自東京出發，二月一日自基隆返回，先到台北，參觀大稻埕教會及靜修女中，並受到總督府高規格的接待；再轉往台中，參觀佈道大會；再往南部高雄，有樂隊歡迎，參觀孤兒院，又到

5 江傳德，前揭書，頁164-；267-269。

6 高木一雄，《大正・昭和天主教會史4》(東京，聖母騎士社，昭和60年)，頁20。《聲》，no.471(1915/02)，頁46。

7 《聲》，no.517(1918/12)，頁46。

8 高本一雄，前揭書，頁25。

9 以上資訊，均請參見：高木一雄，《大正・昭和天主教會史4》，頁13-19。

10 大國督，前揭書，頁374，但年代似乎是1923而非1924。

11 首任使節為Fumasoni Biondi總主教，《日本カトリック年鑑》，(カトリック中央協議會，1985)，〈年表〉，頁26-27。

萬金，訪問原住民教友，再回高雄，北上台南，再參加台語佈道會；訪畢由台南前往埔姜崙教會，途中順便經過斗南教會，接受台糖公司接待，再到斗六教會，再赴田中教會，從田中到員林教會，再到附近極具田園風光的羅厝庄，最後才取道員林返回台北，教廷使節對道明會在台灣的傳教工作印象深刻。¹²

教會發展至大正十二年(1923)八月，其教友總數有五千一百四十五人，外國傳教士十一位，男傳教員二十三位，女傳教員十四；而道明會修女也有八人，聖嬰會女三名。¹³大正十三年八月，其教友總數有五千二百六十四人，有七十三位成人受洗，外國傳教士十位，男傳教員二十八位，女傳教員十四；而道明會修女也有七人，聖嬰會女三名。¹⁴十四年(1925)，其教友總數有五千三百六十二人，外國傳教士十一位，男傳教員二十七位，女傳教員十四；而道明會修女也有七人，聖嬰會女二名；十一所教會，十二所聖堂。¹⁵

昭和繼位後，台灣教會繼續發展，由於日本本土也有天主教會，也有一些日本人隨著殖民政府前來台灣定居，這些人的宗教生活需要照顧，因此逐漸發展成在台北建築一座專為日本教友使用的樺山天主堂，於昭和四年(1929)七月一日完工。在此時期台灣全島人口約有四百五十萬，本島人四百萬，原住民十四萬，日本來台的有二十二萬，中國內地來的有四萬人，歐洲人大約一百，其中台灣教友數為六千一百一十四名，日本教友雖僅二百七十人，但有不少善會組織，如青年部及女子部等，相當活躍。¹⁶

此年也是羅馬教宗比約十一世與意大利獨裁者墨索里尼締結拉特朗協定(Lateran Pact)，教廷得以城市國家之身份派遣外交官到各國，¹⁷而日本要在1942年三月才正式派遣日本駐法國參事原田健氏擔任首任全權駐教廷公使，這是日本外交上的一次勝利，因為在重慶的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早在兩年前申請派遣使節赴教廷，一直沒有結果。¹⁸

據統計，昭和七年全島教友本地人有六千六百六十九人，日本人有兩百九十三人；歐洲人五名，合計六九六七人，從事教育之修女有六名外國人，一名日本人；聖嬰會女有三名外國人，一名日本人，傳教員男性有二十七人，女性有二十二名。¹⁹昭和九年(1934)時甚至還有一位日本籍的傳教員高井，在高雄教會協助傳教。²⁰截至昭和十五年(1940)四月為止，全台教友計有九七三七名，亦即在里脇接任前，全台的教友人數近萬人，十四所教會，近二十位神職人員以及五十位的傳教員，其中男

12 早坂善奈明，〈臺灣メグリ，使節ニ隨行シテ〉，上中下，《聲》，no.568；569；570(1923/03；04；05)；頁20-28；39-45；26-32。

13 《聲》，no.578(1924/03)；頁54。

14 《聲》，no.588(1925/01)；頁60。

15 《聲》，no.611(1926/12)；頁68-69。

16 同註5，頁26-27。

17 結城了悟，《方濟各·沙勿略到今日之日本與梵蒂岡》(東京，女子保祿會，1989)，頁170。

18 《聲》，no.794(1942/05)，頁4-6。

19 同註5，頁29。

20 《聲》，昭和九年十二月號(1934/12)，封面內頁照片，刊登高雄教會四十八名教友領洗之紀念照。

性二十一位，女性二十九位。²¹

三、戰時體制下的里脇與教會策略

昭和十二年七七事變發生，台灣島民情況不穩，日本政府乃加強皇民化教育，廢除報紙上的漢字，以推動日語，廢止農曆新年並強制參拜神社。由於台灣成為國防第一線，總督再由文人改為軍人擔任，由於基隆成為要塞，教堂被迫遷移。

²²

昭和十六年(1941)日美關係惡化，日本期望台灣成為軍事上將來南進的基地。為了要使全島武裝化，實行志願兵制度動員全島人的戰力，為了推進皇民化，為了對應「大政翼贊會」，成立了「皇民奉公會」，組織鄰居成立「奉公班」。²³

另一方面，隨著日本政府施行「宗教團體法」，日本原本由外國人擔任教區長的地區，就由日本神職人員擔任，台灣教區原來是由道明會西班牙籍的楊多默擔任教區長，與日本相處不錯，昭和十五年(1940)時，仍赴日本東京參加全日本教區領袖會議。²⁴昭和十六年三月二十日發佈台灣教區長由長崎出身的日本神父里脇淺次郎(1904-1996)擔任。

里脇淺次郎於明治三十七年(1904)一月三十一日在長崎縣西彼杵郡外海町出津村出生，長崎教區出現過許多神父及修女之處，也出現了許多熱心的天主教友，例如永井隆博士，這位醫師出身，原子彈在長崎爆炸時，太太遇難，自己也因核爆後遺症，四十初頭即病故，但其抱病救人，協助原爆傷患事蹟頗受稱讚。

在1960及1970年代出津村所產生的神父及修女約有兩百人左右，實在驚人，而且教宗在1981年訪問長崎時特別指出，該地也出現了兩位日本的樞機主教，一位是田口芳五郎，另一位就是里脇淺次郎，這是歷史上少見的。里脇的哥哥也是一位天主教的修士，目前仍健在。

里脇在該村唸完小學後，到鄰村黑崎讀初中，走路約三公里，但海邊風景奇美。由於里脇家就在出津天主堂斜對面，當時出津的神父是由法國來的多羅神父，里脇的祖先原來就是秘密的切支丹，亦即兩三百年來為了逃避日本江戶幕府的宗教迫害，東藏西躲，在這海天之間和其他基督徒隱居多年，直到日本開港後，多羅神父在出津從事許多慈善事業及傳教工作，教友才公開活動。里脇的父親是地方政府的小職員，為了信仰也忍氣吞聲吃過不少苦頭，小時候父母常帶他到對面的教堂，多羅常摸著他的頭，要他父母鼓勵他將來當神父，他父母並不反對，他自己在大正七年(1918)回應聖召，前往長崎的拉丁神學校入學。

昭和四年(1929)里脇前往羅馬烏爾班諾大學留學，翌年在羅馬見到柯魯貝神父，鼓勵他前來日本傳教。昭和六年(1931)晉鐸，昭和十年(1935)從羅馬回來，擔任

21 大國督，前揭書，頁410；442-444。

22 同註5，頁31。

23 這些相關史事請參考《日本カトリック年鑑》，(カトリック中央協議會，1985)，〈年表〉，頁25-6。

24 《聲》，no.772(1940/06)，照片攝於1940年4月18日在東京召開的司教會議全體合照。

長崎市大浦天主堂主任神父，同時兼任教區會計，及該地天主教教報之編輯工作，昭和十六年(1941)一月出任長崎市中町教會主任，但當時日本軍國主義當權，對日本天主教會中西方人角色過重不甚滿意，乃有將各地教區長一職由日本神職擔任的舉動，台灣也不例外，該年三月里脇即被任命為台灣天主教教區長，年方三十七歲。

里脇之所以被任命，除了時空環境，身為日本非修會的教區神職人員，加上長崎離台灣較近，更且他在羅馬受過完整訓練，較有國際觀，且熟習教廷情況及拉丁文，當為主要因素。

另一方面原來的教區長楊多默實在是被迫讓出位置來的，依據道明會台灣教務報告的記載：「1941年，良善而有才幹的楊多默監牧發現必須放棄職位，而移交給別人。因為日本當局已積極備戰，視台灣為戰線上的一環，且堅持必須由日本人出任教區首長。為此，來自長崎教區的日本神父里脇淺次郎被任命為台灣署理監牧，直到1945年戰爭結束，才交卸職務回國。」²⁵

1941年七月二日里脇抵達基隆，七月六日為星期日，里脇正式在台北樺山町就職。對於就職情形，日本報紙有詳細的記載，其新聞標題為〈里脇台灣教區長 劃時代的就職儀式，內地及台灣教友熱烈參與〉²⁶。

這則新聞報導有幾點值得注意，首先，指出此為劃時代之大事；其次，將此次事件描寫得十分莊嚴盛大，新舊教區長交接也顯得雍容有度，一團和氣；最後，記者更具日本民族主義色彩的角度下，引以為傲地指出，在里脇教區就職彌撒時，共祭的兩位，一位是隨里脇從日本來此的秘書；一為是台灣土生土長的涂敏正神父，兩位在當時都屬於「邦人」，意謂著台灣天主教的領導核心由外國傳教士轉為自己人。

里脇教區長就職後不在台北定居，反而隨即在高雄落腳，道明會的記載如下：

接任後，里脇監牧即南下視察教務，經過台中，最後抵達高雄，這裡的一切讓他深具信心。他看到為數約二千人的教友大團體，看到一座漂亮又莊嚴的聖堂—這是李安斯神父的傑作—，里脇監牧決定留在高雄。因此高雄成為監牧辦事處，以前是在台北。但促使監牧遷移的主要因素是，高雄已對外國傳教士關閉，故需要一位能被日本當局接受的人駐留該地，以照顧教友。²⁷

里脇在來台後的第二年，亦即1942年的八月台灣基督教及天主教會各界，隨著日本國內的發展，成立戰時體制²⁸，里脇在台北參加了日本基督教奉公會的成立以及事前的教師研習活動，並代表天主教會發表演講。

在擔任教區長的期間，還有一個教務上的問題，就是要處理外籍傳教士與本地神職及教徒之間的糾紛。我們可從涂敏正神父的日記中略知一二，他在1944年4月20號的日記中如此記載：

25 黃德寬譯，《天主教在台開教史，道明會士的百年耕耘》(Pablo Fernandez, One Hundred Years of Dominican Apostolate In Formosa, translated by Felix B. Bautista and Lourdes-Bautista, Quezon City, Philippines, 1959.)，(光啟出版社，台北，1991)，頁209。

26 昭和十六年(1941)八月三日，《日本カトリック新聞》，821，二版，

27 同註5，頁201。

28 《日本カトリック新聞》，昭和十七年(1942)八月九日，第872號

台南若瑟神父被迷唆使楊多默前教區抗告里脇教區長要棄絕劉決治全家，並假冒書信，誣余及劉為 Spy 等。(台南事件)1944年4月21日同里脇教區長一同到台南與楊多默及若瑟神父理論對訊，結局他們理屈，承認錯誤，被迷誣告之責任，向余等道歉息事。²⁹

文中的若瑟神父應該是 Jose Villaverde，在台期間為 1930/5/30-1945/12，楊多默則在里脇來台時即與涂神父之間有些不愉快，至於劉決治的身份仍待考，可能是一重要的台南教友家庭，如今遭到被控間諜之罪名，屬於相當嚴重之事件，然而經過里脇親自調停，並要求外籍傳教士道歉才結束爭執，這也呈現出台灣教會的一些問題以及教區長還是有解決如此重大問題的能力。

在台灣不久因太平洋戰爭爆發，里脇自己常駐高雄苓雅區的教堂，在昭和十九年(1944)十二月還應徵入伍，到琉求作戰，次年戰爭結束返回高雄，昭和二十一年(1946)三月將台灣教務交由台籍神父涂敏正署理後返回日本。

里脇在五十年後回憶在台灣服務的歲月，雖然著墨不多，但頗有意思³⁰：

日美關係惡化之後，外國傳教士的行動開始不自由，必須依賴日本傳教士之支援，由於台灣與長崎教區最近，本人就被派遣到那兒去了。

一九四一年五月渡台，立刻，總督府由於有三位傳教士有間諜嫌疑，要我們接受將他們驅逐。不久戰爭爆發了，傳教士被安置在兩個收容所，我致力於傳教士的間諜嫌疑加以洗清，以及傳教士可以從收容所中出來自由行動等，我逐漸了解我被派遣來的意義了。由於台灣南部成為軍事要塞，外國人不能進入此地，因此我不得不照顧三個小堂區。不過在終戰前一年，大約十個月左右的時間，我也被徵召入伍染上戰塵，但在主日可以回教會施行聖事。

然而，由於日本戰敗，日本人開始離開台灣，台灣教友向中國政府請願將我留在台灣，而外交部長簽署的許可書也送到了。不過，在台灣的教會日本人神職的角色結束，我乃歸國。

或許是事隔五十年，里脇樞機的記憶有所遺忘或錯誤，例如，他來台赴任及七月，回國則是在四月，這些事件在報紙雜誌上都有記載。有趣的一點是戰後台灣教友要求里脇繼續領導台灣天主教會，此事應屬可能，因為在聖統制尚未成立的中國或台灣天主教徒都習慣於接受外國主教的領導，並不會堅持由自己國人擔任主教，而更重要的是里脇自己具有遠見的想法：日本神職人員在台灣天主教會內所扮演的角色業已結束，不需要日本籍的主教來保護整個教會在台灣的利益，例如保障教產不受侵佔或擔保外籍傳教士的人身安全等，毅然放棄教區長職位而返回日本。由於時局動盪不安，日本方面要到一個多月後才有相關的訊息：

《日本カトリック新聞》，昭和二十一年(1946)五月十九日，第 981 期，有一則報導，「里脇教區長、小松師等歸來」，其內容如下：

29 《涂敏正神父日記》未刊稿(以下簡稱「涂神父日記」)，此乃施麗蘭修女提供，而藏於涂神父的親姪子黃清富神父處，謹此誌謝。

30 〈里脇淺次郎樞機卿屏聞應〉，頁 9。

久無音訊、生死不明的台灣教區長里脇淺次郎神父，平安無事，在四月五日最後從高雄港出發，四月十三日在宇品上陸，在四月十四日聖枝主日回到長崎，落腳於大浦的主教住所。

里脇歸國之時，在四月三日任命台灣人的涂敏正神父為代理教區長，而其向羅馬的辭職手續尚未完成，仍具有教區長的資格。

里脇神父在昭和十九年(1944)十二月受到教育召集令徵召，次年一月應召入伍，擔任高雄航空隊特別警備工兵隊附衛生下士的身份，在五月移駐松山航空隊附，該隊參加了琉球的作戰。在八月十五日從收音機中知道戰爭已結束，九月二十五日除役，回到高雄，致力於教會修院的修理。

台灣教會在戰爭中受到的破壞，台北蓬萊町的教區長座堂被炸毀；高雄、台南及基隆的三教堂及其附屬設施受到損壞。

全島的聖堂教有二十七座，臨時小堂有十三座，神父數目有日本籍的教區長以及古川禎三神父，台灣島籍三名神父，西班牙道明會神父十四名。

里脇神父在昭和十六年(1941)年七月三日就職，在一個星期後開始巡迴全島，由於時局緊迫，乃在高雄停留下來，以苓雅寮教堂作為臨時教區長的公署，管理六個地區的教堂以及三千位的教友。當時外國人的神父則移往台南及台北。

里脇返國後，定居大浦天主堂，並任長崎教區總代理，後擔任長崎神學院院長，1949年留學美國天主教大學，修習社會學，兩年後回國，再任長崎教區總代理，並兼任天主教中心主任，1955年二月二十五日被任命為鹿兒島主教，五月三日舉行晉牧大典，在該地任職十五年，促進了教會的發達。

1962至1965年間第二次梵蒂岡大公會議開會期間，他在天主教中央協議會中擔任教理主教委員會委員長、典禮主教委員、教會法制主教委員、教育主教委員，相當活躍。1969年二月一日教皇保祿六世接受長崎總主教保祿山口愛次郎的辭職，任命里脇繼任為長崎總主教，里脇時為六十五歲。里脇為長崎第七任教區長，為長崎升格為總主教區以來第二任總主教。1978年5月被選為日本主教團團長，成為日本天主教地位最高的人；次年5月教宗任命為樞機主教，為日本有史以來第三位樞機卿；1981年2月23-26日首位教宗若望保祿二世訪問日本，由里脇樞機全力促成並全程接待；1990年2月退休，定居於大浦天主堂，仍關心教會事務，常常對神職及修女演講，1996年8月8日因腦瘤以92高齡去世。³¹

四、涂敏正神父的承先啟後

據一般記載1875年春季，有一位羅厝居民名叫涂心(1833-1910)，他經常往南部經商。有一次，他在打狗了神父講述天主教之教義，非常感動，因之，極希望羅厝

31 《カトリック教報》，1996年9月1日，長崎出版，第四版。

莊之居民亦能聽到此奧妙之道理。於是，回羅厝莊之後，便約同幾位親朋好友，後壁厝劉江，崙頭黃過枝，新厝劉鎮等，與莊中比較有名望之人士商量，並至打狗邀請神父來羅厝莊開教。³² 然而從一些當時西班牙傳教士的回憶來看，這些員林羅厝的教友很可能是當時的一批定期從中部到高雄來回運送貨物商品的勞動人口，在高雄在偶然的機會中，與前金教會傳教士及本地傳教員接觸，在對方盛情招待下，逐漸成為中部羅厝同鄉臨時休息及聚會之所，而這些人在接觸教會之後，才有日後請傳教士北上傳教之舉。³³ 在接到要求後，在台灣的道明會玫瑰省副區會長楊真崇在1875年五月就派老埤本堂吳萬福神父帶傳教員林水龍至羅厝莊後，並選定後壁厝，租一以竹柱蓋茅草之民屋作為傳教所兼神父之住宅，開始向近鄰佈教。

涂心的太太是劉快(1836-1916)，他們的兒子是涂宰，涂宰的夫人是羅厝第一代教友黃過枝之女兒黃治，換言之，這些第一代信徒，有互相聯姻的傾向，結成教友家庭，作為弱勢團體的保障，同時也是當時教會的要求，教友結婚必須對象是教友。涂宰生於明治元年(1868)，死於明治四十四年(1911)，育有四男一女，長男涂通，長女涂昭，次男涂明智，三男涂明正，四男涂明珠。涂明正就是後來的涂敏正神父，出生於1906年8月30日，於台中廳武西堡羅厝庄百五十八番地。³⁴

他出生後即領洗，由馬守仁(Manuel Prat)神父施洗，聖名雷蒙(Raymond)，四歲喪祖，五歲失怙，由於祖父改宗，在族譜上被除名，可以想像，在此孤立情況下，其家人與神父相當接近，教會也成為涂敏正少年時常去之處。他母親也在他十一歲時(1911)去世，此年他在舊館公學校畢業，幼年常在天主堂協助神父，當時擔任羅厝天主堂本堂神父的是山捷師(又名山濟慈，Felix Sanches, 1917/10/27-1951)，山神父有時以金錢考驗，涂氏誠實奉還，均不起貪念，1923年先被道明會士送往台南傳道學校讀書，1924年適逢原來在羅厝的老本堂神父當時擔任廈門主教的馬守仁神父來訪，因此就將他送往新成立的廈門白水營小修院修道，畢業後1931年又送到香港的香港仔之華南總修院唸書，其中身體不適，1933年先赴港尾調養，1934年還返台休養過一段時期，並到北部一帶傳教。有一段相關的記載：

在祝聖神父之前，曾受到劇烈的誘惑，魔鬼常以狐狸精的形式來騷擾他，甚至傷害他，打得他出血，要他背叛天主，隔鄰修士都聽到吵鬧聲，院長的玻璃也被打破等。他靠著天主的力量與恩寵，堅持不違反信德。³⁵

不管真相如何，這或許意味著人性與靈性之交戰及掙扎，1935年回到廈門考試，該年6月8日的日記有不知是悲是喜的記載。³⁶1936年4月11日晉升五品執事，12月19日在廈門鼓浪嶼主教座堂，由馬守仁主教主禮，晉升天主教司鐸，且看涂神父自己寫的晉鐸初期數日的日記：

1936/12/19 十二月十九日又在鼓島主教堂榮登鐸品之慶。

32 江傳德，前揭書，頁119。

33 天主教台中教區編《羅厝耶穌聖名堂開教125週年紀念專刊，1875-2000》，彰化羅厝，頁56。

34 此乃依據彰化縣埔心戶政事務所戶籍謄本，埔心鄉戶字第002891，002892號所載。

35 〈涂敏正蒙席〉收入天主教台中教區編《羅厝耶穌聖名堂開教125週年紀念專刊，1875-2000》，彰化羅厝，56。

36 涂神父日記。

事前承諾位修士修女並諸位親友協力籌備一切，聖堂內外裝飾一新，九時由馬公主禮祝聖，台灣教區長並十四位中西司鐸助之，禮極隆重，經二時許即完結，後齊攝數影，並承諾位親友筵會致賀！實空前絕後未曾有的一回事呀！廿二日由廈返台。³⁷

典禮完成後兩天就從廈門返回台灣，真是歸心似箭。由於一月一日是涂的故鄉羅厝天主堂的主保瞻禮(亦即每一位新受洗的人或新建的教堂，教會都會為其找一位「主保聖人」(patron saints)，借以紀念並祈求該聖人的特別助祐，該聖人之紀念慶日即稱為「主保瞻禮」。)，原來在日本學習語文的本堂神父陳若瑟(Jose Ma. Arregui)特地趕回來，籌備這教會史上首次本籍司鐸的首祭。³⁸

1937/1/1 昭和十二年一月元旦，往回故鄉羅厝庄舉行首祭記念日，事前承良會長主催籌備一切，並全台十五、六位司祭及全島教友各派代表到處參加祝賀，一共約有二千餘人，歡迎人員由員林驛至羅厝，沿途的歡呼聲音樂聲汽車數十台，並攝一卷電影。

首祭日人山人海，各堂幾無立錫之餘地。助祭主教、白公、高公、帝、包等，下午開慶祝大會，會中全台代表為台灣教務起見，要求主教改革傳教方針，幾起衝突，後經余數語，即暫為和平解決，因主教意見不解之故…。

首祭前特與台島老功臣李翁振鵬夫妻及其他六人付洗記念…

總一句，這番熱鬧，實全島未曾有的一段光榮史呀！³⁹

1937年元旦的首祭可以說是台灣天主教會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標誌著道明會士來台傳教的具體成果，因此全島神父幾乎都參與此盛會，而且也就因為此難得機會，使得教友神父及主教間有彼此交換傳教看法之機會。但沒想到竟然會造成意見不合之衝突。台灣天主教徒素來尊敬神父，稱之為「叔公」，一般在每個地區教堂內雖然也有協助神父傳教的本地傳教員以及為婦女小孩傳教的單身「姑婆」，但教會大事及傳教方針仍是由本堂神父決定，從來沒有像此次，教友神父齊聚一堂討論教務的習慣及機會，剛好藉著此次涂敏正神父首祭，全台神職人員以及教友重要代表齊聚一堂，教友乃趁此場合，將傳教方針的意見加以表達，但顯然主教有不同看法，幸而經過新神父的調停，才化解此事。衝突之內容，如今不得而知，可以確定的是，教友對於教務有意見，對於傳教政策也有不同看法，這對於涂神父來說，應該是印象深刻之事，也應對涂之未來教務觀念，有所影響。然而在當時，涂神父心情很好，也吟誦一首他自己所撰的詩：

略感一首

開窗一望已員林，略點行裝又整襟，
想自隨人下車去，豈知親友已先臨。

(破天荒一段空前絕後的光榮史，記之不忘也。)

1937/1/4 正月四日，回員林受諸友祝賀，並舉行大禮彌撒…

37 涂神父日記。

38 黃竹榻《台中教區天主教羅厝教會開教一百週年簡史》，1975，7。

39 涂神父日記。

1937/1/6 同六日，同白公往高雄與男女兒童六十餘人初次告領聖體大禮，由我主祭一切，並受歡迎，熱鬧非異，是夜領受諸位的歡筵…

1937/1/7 正月七日，到台南又受諸位故交好友一番熱烈誌慶，宴會於銀座樓上…。⁴⁰

涂神父的獨特身份意識，亦即作為台灣第一位本地的，地位崇高的，且受教徒尊敬的羅馬天主教神父也強烈浮現於自己記載的日記中，在該年的復活節到達高峰，我們且看當天的日記：

1937/3/28

御復活大祝日，大禮由我登台舉行，一切羅馬式隆重彌撒儀式，島都信友，實初次參與，並全島未曾有本島第一司鐸獻祭，諸位信友的心中，莫不悲喜交集，表示台民信友信仰的精神也。並去八十餘年的恥辱呢！⁴¹

在涂氏心中，全台灣諸位信友看到他作為全台首鐸，一方面是高興，但卻也覺得有些悲哀，更是認為有了本地司鐸才不覺得可恥，至少此處可以見到涂氏以及其他教友的台灣意識。

從此時起直到 1941 年五月間，涂神父作為台灣的一位教區神父，首先被派在蓬萊町天主堂助理教務，然後又調往石碇，擔任本堂神父，直到 1940 年 9 月 20 號被調往樹仔腳，而其間的主要活動可以從他的日記手稿中略知一二：

1938/10/9 受了不折不撓的精神，並諸位姐妹青年等的援助，得產生了全台灣未曾有的台北姐妹會，並定主保德蘭，是日適主保祝日，故大禮彌撒歡感不盡也。

1938/12/22 敬愛的老師白公榮轉于埔羌崙，實一生別離的悲傷事也。

1939/3/14 教長楊多默往南部視察教務，命余代理其本堂樺山町教會並舉行主日彌撒，初次與日本教友交際，意見一致，並受他們的歡迎，感激不已也。

1939/3/21 二位道明會司祭由香港修院卒業，奉命來台，一位在台北慶祝大禮彌撒，事前經余籌備一切，提倡歡迎，感激底熱鬧非常也。

1939/11/14 石門乃是五年前余親身開教設佈教所之地，此次受了諸位求道者雅意，于百忙中抽一時與方傳道前往鼓勵一番也。

1939/12/8 在洲仔(蘆洲?)舉行彌撒，後見到司鐸的住所破壞不堪，感慨而流淚。

1940/1/4 往新竹湖口講演佈教三日後回北堂。

1940/2/11 夜八時在北堂舉行日本紀元節，以宗教禮節舉行，多默教區長演說；當時一日本信者以無禮言詞輕視台灣讀者，被余嚴重抗議而駁斥之。

1940/9/20 承多默教區長之命來斗六樹仔腳為本堂，因高公有病到台北，並因樹仔腳教友教會前皮德神父及林漢衝突後，教友四散冷淡，無法維持，

40 涂神父日記。

41 涂神父日記；底線為本文作者所加，以示重要性。

西鐸亦怕其杖持日本警官之威力壓迫，皆不欲前往，故多默特與我商量，委任我到該堂維持一切殘局。

1940/12/8 是夜遵照教區長之托囑在樹堂舉行盛大祝賀會，並邀當地警官八位保正茶話會等以資感情之聯絡。⁴²

可見一方面涂神父忙著傳教，另一方面也在協助外籍傳教士在傳教過程中與當地的人士發生的衝突；並以身為台灣人的較有利的身份，奉教會長上之命，代表教會與日本殖民當局週旋，以爭取教會之利益。

涂神父對於新任教區長里脇的來台，有下列的日記記載：⁴³

1941/5/23 余應陳司鐸之邀，到台中參加聖心祝日並迎聖體彌撒前余講道。中餐時接到新教區長里脇淺次郎要到台之消息。

1941/6/29 余到台北準備歡迎新主教，是日被舊主教多默及戴神父氣壞，無理說語，不欲歡迎新主教之意，本想夜行車回到南部，迨後被洪公溫情勸慰挽留參加歡迎。

1941/7/2 星期三，下午一時同五位司鐸到基隆碼頭歡迎新主教專車到樺山教會休息。

1941/7/6 主日在蓬萊町大堂舉行就職禮，中午開了盛大歡迎會。

1941/7/8 承新教區長之誠意，慰勞到草山閒遊一天，同車有岩永神父、竹田秘書等。⁴⁴

兩份資料可以證明其來台及就職之日期，以及初來時的情況。里脇教區長來台時有兩位隨行，一位為竹田秘書，一位為岩永神父，而且，里脇之來台，西班牙道明會傳教士並不很樂意，涂本人相當高興，從雲林北上要來迎接，但受到楊多默教區長及戴神父的反對，不過，涂卻受到區會長洪羅烈神父(Angel Rodrigues)⁴⁵的支持，而新教區長就職後，立刻到附近的草山效遊一天，以慰涂神父的辛勞，並有隨員陪同，也可能就近瞭解台灣教會的情況。

里脇就職後，前文提過，他很快就到全省各教會視察，當然我們目前除了涂神父的日記外，並沒有太多詳細的資料。涂神父有下列的記載：⁴⁶

1941/7/10 同新教區長到台中。

1941/7/11 到台南(余暫時在斗六下再往)。

1941/7/12 到高雄，惟是多默等不能下，留在台南，因警局禁止。

1941/7/14 警局命令洋鐸等不能居留高雄要塞地帶。

1941/7/15 余被命到萬金教會接任。

42 涂神父日記。

43 涂神父日記。

44 涂神父日記。

45 洪神父為道明會玫瑰省在台灣之區會長，在台期間為,1898/9/20-1936/3;1939/12/2-1945/10；前後兩次擔任會長，管理所有在台道明會士的修道生活，年高德韶，居住在田中。

46 同上註。

1941/7/17 洋人司鐸修女等一共十餘人奉命撤退高雄要塞地帶。⁴⁷

從上述記載中，可以知道里脇相當重視涂神父，要他隨時陪伴，就任四天後就到台中，但未久留，次日到台南，而涂在斗六下車，可能是因為他要回自己的本堂處理私事，但次日又立刻跟上團隊，此時西班牙傳教士不能到高雄，警察局不准他們來，只能滯留在台南。多默在此處應是指卸任的前教區長楊多默，在日本新教區長赴任後十天，所有洋人司鐸都不准居留在高雄，前文提過，里脇於是留在高雄，以苓雅寮教堂作為臨時教區長的公署，管理六個地區的教堂。並將涂神父由雲林的樹仔腳調到高雄鄰近的萬金天主堂，這顯然有其用意，因為涂神父在樹仔腳擔任本堂不到一年，新官上任，就近可以商量；況且涂神父的在地出身，為日本當局所接受。⁴⁸

在萬金安定下來後，涂神父的日記中有下列數條值得注意的記載，也可看出教區中的情況以及新教區長上任後，與涂之間的互動：

1942/10/20 日 教區長向我說明，古川神父推選張素娥為基隆女傳道。

1942/11/20 日 戴剛德撤任到台中，Arregui 上任台北。

1943/9/22 日 由羅[馬]傳信部批准台灣設立一本籍女修院姐妹會。

1943/12/25 日(原稿寫十月，應屬筆誤) 全島修道女集合萬金一週間的訓練。⁴⁹

可見教區長十分重視涂，基隆教務也參考其意見；而此期間與道明會戴神父發生一些衝突，涂氏深以為辱，⁵⁰後經洪會長調停，將戴調往台中了事。1943 年教廷批准成立一在地的本籍修女團體，這是教會地方化重要的一步，因為修女有其一定的崇高地位，且有利於婦女及兒童之傳教，可以深入社會，散播信仰的種子。

昭和十九年 1944 發生過前節提到的西班牙道明會士控告涂為間諜事件。事平後，戰事吃緊，但台灣教會由於一位新神父的加入而振奮。

1944/10/25 日 萬金教會聖堂，神父宿舍，男女兩座講道所全部均被日軍強制進住，不遺一所。神父、修女、傳道亦同時疏開教友家借住，占禮主日均在露天廣場舉行彌撒聖祭。

1944/11 月初 李天一神父晉鐸回台。

1944/11/19 日 主日往樹子腳準備歡迎李天一新鐸始祭慶祝典禮。(後因時間迫，再改日)為此余過于勞動準備之故，不幸在西螺染病臥床，隔日負病回萬金庄本堂治療。

1944/12/1 日 里脇教區長應召入營當兵長。

1944/12/16 日 古川、天一兩神父到潮州來慰問余之病。

1944/12/20 日 里脇出營，特到潮州探視慰問余之病體。

47 涂神父日記。

48 同註 5，頁 200。

49 涂神父日記。

50 涂神父日記中記有衝突之情形，見 1942 年 9 月 14，21 日及 11 月 2 日之記載。

1944/12/25 日 是夜萬金教友筵會，歡迎天一新司鐸，極一時之盛，可惜那時余尚在臥病，不能參加。

1945 正月中 美飛機不斷日夜不停炸射高雄等處。

1945 二月中旬 高雄、嘉義被爆彈炸得慘重，房屋倒壞不堪，以後至八月中一直美機群來空炸台島。

1945 八月初 美機以原子彈投下日本廣島。

1945/8/13 又投下原子彈第二棵於日本長崎，死傷慘重。⁵¹

從此時起到抗戰勝利為止，涂氏多在南部協助里脇監牧，這期間有三年左右的時間，兩人的關係從上述之事件及互動情況來看，應有互相更進一步的認識，而且在當時日本全國動員投入戰爭的情況看來，在面對歐美等國，同為東方人的兩位，相對之下，應有比較親切的感覺，這種在戰爭中互相支援及依賴的經驗，也應是構成日後里脇將職務交給涂敏正而非西班牙道明會士的原因之一。

在前面提到，報紙文獻記載，里脇教區長是在四月三日將職務移交給涂神父，不過，依據涂神父的日記，「1946/4/5 日 里脇教區長被遣送回國(日本)五塊厝作味增德占禮。夜間教友給里脇教區長餞別會。隔日台灣教務正式委任余代辦統治。」⁵²。

五、餘論

教廷的報紙曾對里脇在台灣的教區長任內有如下的評述：

馬關條約的結果，日本領有台灣，1913年7月13日台灣成為獨立的監牧區。該地之宣教原為在馬尼拉的道明會玫瑰省所受委託傳教，委託期限到1941年3月20日，此時由教廷臨時管轄的同監牧區之管轄轉移到日本的神職人員手中。其最初的教區長即是由里脇淺次郎蒙席擔任。

台灣的職責一直要到戰爭結束才停止。在此期間，台灣被視為日本政府的重要據點。當時的情況對於臨時管理者而言在佈教上十分困難。里脇儘全力避免捲入日本本國的軍部權力及民族主義的壓力之中。除了監牧職責，又擔任台北及高雄兩小教區的工作，盡心盡力服務，作為一個司牧的評價頗高。⁵³

此項報導的標題即是：「台灣教區長の”試練”」，而這是在里脇於1979年昇任樞機主教時所寫的，由此可見里脇的台灣經驗對其日後教會事功的表現奠定了基礎。

里脇的台灣生活經驗可能也是他將職務交給涂神父的另一重要原因。里脇來台後一週就將大部分時間放在高雄。這是因為外籍神父無法到高雄傳教之故。而且里脇或許為了立刻進入情況，來台後立刻就重用涂神父，我們可以在前文看到涂神父從南部北上要歡迎教區長從日本抵台時就遇到一些不愉快，差一點就來不了。歡迎

51 見涂神父日記。

52 參見涂神父當年日記。

53 《日本カトリック新聞》，1979年7月29日。

會結束後，里脇招待涂神父及日本隨員前往草山（陽明山）休閒一天，之後就南下，並要求涂神父離開才上任不到半年的樹仔腳本堂，轉任屏東的萬金本堂，因為萬金為台灣重要的最早及最大的本堂之一，又是教友村的所在，更重要的是，萬金離高雄很近，很多事情可以就近商量，因此，涂神父很早就參與了里脇的決策團隊，對台灣教務也相當熟悉。

涂神父還是日本教會新聞所稱的台灣第一位「邦人司祭」⁵⁴，況且，教區長在面對力量龐大的外籍修會時，為了教區的運作，有必要重視教區神父的職責，再加上涂神父在當時與道明會一些會士之間有些不太愉快的情況，甚至被控有間諜之嫌，里脇臨走時，在修會會士及教區神職之間，選擇了教區神父，這種安排也不令人意外。

最後尚有一個相當重要的因素，即是由於涂神父為中國人，對於日漸興盛的新興民族主義而言，尤其是在對日戰後的中國，里脇更有理由將台灣教區長之職務交給一位本地的神父。我們從涂神父在接任代理教區長職務前後的日記中可以看到此決定的重大意義。

1945/8/15 日 日本皇帝敗戰投降中美等國，第二大戰就此停止。

1945/9/20 日 日軍退出萬金教會。余等搬回聖堂，余並向敗戰日軍交涉，償還一切損壞，後由日軍部運來櫥、棹、椅，傢俱什物很多。

1945/9 月中 在潮州郡下到處受各界人士歡迎講演，屢次博得官衙學校等諸人士的好感，萬金教友亦不再受人輕視而提高身份也。（光復後到處受歡迎講演）

1945/10 月雙十節被邀到萬巒參加政治會議，並向五萬多民眾講演，博得拍掌歡呼聲不已。中午與政軍教諸界人士一同筵會，被列為首席。

1945/12/8 日 乃是萬金本堂主保占禮，順此舉行一盛大感謝大祭禮。日本主教及教區神父全体蒞臨參加，社會人士亦多有到堂占禮，是夜教會中全体教友開一盛筵，歡迎來賓。⁵⁵

日本戰敗投降後，教會情勢有了很大的變動，首先是日本軍隊退出教堂，又補償了許多傢俱。更有意思的是天主教會的地位也提高了，似乎西方盟國勝利意謂著其背後所代表的基督宗教力量也高漲不少。最值得注意的是在該年的十二月八日萬金主保慶日，里脇教區長率領所有教區神父參加由涂神父所主持的禮儀，此行動已在相當程度上顯示出里脇對於未來的接班安排，也多少表示了里脇本人對於涂氏的尊重及支持。

二月初里脇開始進行回日本的各項行動了：

1946/2/6 日 奉教區長里脇淺次郎之命，轉任來高雄為本堂，是日萬金教[友]依依不捨，歡送至高雄者有全村教內外諸領袖二十餘人，隔日即回萬金。

1946/2/7 日 夜間承高雄教友之歡迎會，又李惟添神父到萬金接任。

54 《日本カトリク新聞》，昭和十二年(1937)二月七日，第 590 期

55 涂神父日記。

1946/3 月初 李天一神父調任台南教會。⁵⁶

如前文提及，四月五日里脇被遣返日本，六日即由涂敏正神父接任代理教區長。由於教區財政困難，涂神父向南京的于斌總主教求助，于斌撥款支持，可說是頗有意義的行動。戰後台灣所面臨的問題很多，其中接收是一大事，幸好是涂神父為代理教區長，有中國國民的身份，許多教會財產才免於被中國國民政府接收的命運。1946年八月二十日涂神父日記有下列一段：「台灣教區財產前為外國人及日本人的名義，幾為政府沒收，後經余等極力交涉抗議，才收回變更余之名義。」⁵⁷ 次年七月初更有教友捐獻土地給教會，也是以涂神父名義：「承羅厝、員林、三家春三處教會之青年團贈獻白山坑山地七甲餘以作紀念，均登記余之名義。」⁵⁸ 這些都可以看到里脇將職務交給涂神父代理之遠見，因為若是由外籍傳教修會會士擔任教區長，戰後的各種問題恐怕不容易解決。

涂神父代理教區長時，並非只有孤軍奮鬥，尚有兩位教區神父協助他。前文提到一位李天一神父，另一位是李惟添神父。李天一神父則為雲林崙背鄉水尾人；李惟添出身高雄市前金玫瑰堂教友家庭，一位姐姐為道明會修女；這兩位本籍的年輕神父不像涂敏正被送到廈門修道，而是在日本的大修院畢業，在1944年9月29日同時在東京晉鐸，這也反應出來時代的變遷。⁵⁹涂神父代理教區長後，先請李惟添神父擔任附近萬金的本堂；另一位李天一神父則照顧台北地區的教友，由於位於蓬萊町的教堂遭美機炸毀，他就擔任樺山堂的本堂，兼管基隆、石碇、蘆洲、淡水等地。⁶⁰ 除此，涂又成立台灣首屆的公教進行會、擔任新設立的修道院長並接受政府任命為救濟署的常務委員，並到各地視察教務，並於1947年5月10日在台中召開主教會議，6月集合全島修女，並討論傳教方針。⁶¹ 總之，涂敏正神父相當稱職地執行代理教區長的職務，為戰後的台灣天主教會達成了承先啟後的階段性任務。1948年5月6日他向羅馬辭職，由道明會玫瑰省的陳若瑟接任監牧一職。台灣天主教會又進入了另一階段。

雖然西班牙道明會玫瑰省的傳教士終於重新領導台灣天主教，擔任教區長，然而里脇淺次郎教區長與涂敏正代理教區長兩位神職前後領導台灣天主教七年之久，對外面對日本軍國體制之猜疑及戰後政局之動盪，對內則有修會與教區之間的緊張，但兩位均能發揮勇氣及智慧，且任勞任怨，保護台灣天主教會的利益，不致在戰爭中以及戰後政權轉移中受到太大的傷害，而且還能有所發展，其所作所為，可以說為台灣天主教地方教會的建立，作了開創性的起步。里脇教區長在離台之際，將職務交給教區神父涂敏正代理，而不是修會會士，這個動作代表了台灣地方教會朝向本土化之發展，雖然後來因為局勢之變化，使得此趨勢無法進一步落實，但五十年後的現在來看，當時的動作的確是很有遠見的一步。今日天主教會在1960年代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之後所大力倡導的教會本地化及建立真正有活力有特色的地方教會之際，更令人緬懷這兩位台灣天主教史上的人物。

56 涂神父日記。

57 同上註。

58 同上註。

59 山人，〈懷念李惟添神父及四十年前的教會〉，《善導週刊》，1992年5月10日。

60 同上註。

61 參見涂神父1947年4、5、6月間日記。

台灣天主教中的多國色彩*

古偉瀛*

一、一段故事

近代中國的基督宗教在五四運動以後頗受打擊，尤其是在全國展開非基督教運動以及聯俄容共之後，反基督宗教思潮瀰漫全國。民國十六年北伐開始，首當其衝的福建，基督宗教的機構，特別是學校，受到許多攻擊及騷擾，這種革命浪潮很快就進入南京，教會受到的批判及攻擊自是不在話下。然而本文並非要處理此事，只是想藉一段敘述點出當時中國基督教會在此衝擊下也受到了蘇聯式的作風之影響。換言之，教會很快地受到他國因素之衝擊。

依據當時在上海的 A. R. Kepler 在 1927 年 12 月 1 日所提其視察福建及南京的報告，這位任職於中華基督教會總會（The General Assembly, The Church of Christ in China，位於上海圓明園路 23 號 409 室）的工作人員在參加了福建中部的教區監督會議後，描述在會議中的印象：¹

我很有興趣地注意到在會場四週張貼有許多短的基督宗教的口號標語。事實上國民革命運動在過程中發現口號標語極有效地在全國鼓動起群眾之情緒及認同，這也顯示中國的基督教會很可以對這類方法善加利用。

在教堂前部在講道台後面掛有一幅巨大的耶穌基督畫像，在畫像下方寫有基督在十字架上所講的最後幾句話：「基督的最後話語」，其下更有「基督遺囑」：「你們當到普天下去，使萬民成為我的門徒……等等」。這根本就是國民政府的慣例，將孫中山的遺像，他的遺言以及遺囑放在每間學校的集會場及大禮堂的講台上。

二、天主教會入台

（一）1626-1642

眾所週知，天主教初入台灣是在明朝末年，比荷蘭人稍晚，由西班牙道明會的玫瑰省會士從馬尼拉隨軍來台。依據道明會士楊多默（Thomas de la Hoz）口述，大國督所編之書的記載，²再加上中村孝誌及方豪的進一步補充，³其大致經

* 本文收錄於《東西交流史的新局：以基督宗教為中心》，台大出版中心，即將出版。

* 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1 參見藏於哈佛大學圖書館的《美國外方傳教會檔案》（The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 簡稱 ABCFM），140 之 2。

2 陳嘉陸譯，大國督編：《台灣カドリック小史》，杉田書店，昭和 16 年，《天主教來台傳教壹百年簡史》，高雄教區出版，1959。

3 中村孝誌：〈十七世紀西班牙人在台灣的佈教〉，收入賴永祥，《台灣史研究初集》，（台北三民書局，1970），pp. 107-120, 136-142。方豪：《台灣早期史綱》，台北學生書局，1994，第十一篇，〈西班牙人的佔據台灣北部〉。

過如下：

十五世紀末十六世紀初西班牙歷代君主如女王伊撒伯爾（Isabel, reign 1474-1504），菲利普二世（Philip II, reign 1556-98）及菲利普三世（Philip III, reign 1598-1621）等人，無一不想使亞洲人（一律稱印度人）皈依天主教，但其成效並不如在中南美洲理想。西班牙人十六世紀來台的最主要目的，仍在圖能赴日本與中國傳揚宗教，台灣僅視同跳板而已。西班牙人曾佔領台灣北部十六年，其中來台的傳教士約在三十人以上。1624年，菲律賓的西班牙道明會派馬地內士（Bartolomeus Martinez）到台灣，但為風吹至廈門，次年再至，乃在基隆登陸，調查後返菲報告當時擔任總督的 Fernando de Silva。次年總督派遣了十二條舢舨，三艘西班牙遠征軍大帆船隊來台，隨船而來的共有五神父及一輔理修士。除馬地內士外，還有莫拉（Francisco Mola）、莫萊爾（Jeronimo Morel）、愛古達（Juan Elgueta）及日本人西六左衛門等五位神父。

這些人在 1626 年二月八日出發，五月四日登陸今台北宜蘭之間的貢寮一帶，西人稱之三貂角（Santiago）。一行人從該地北上，先至大雞籠嶼，建造聖救主城（西 San Salvador，日人稱社寮島，今稱和平島），五月十二日上陸定居。不久即築一小聖堂，奉獻給「諸聖」即全体聖人（Todos los Santos）。當時島上已有一千五百居民，族人散布於金山淡水附近的台北平原及桃園地區。再至基隆，稱「聖三位一體」（Santissima Trinidad），當時沿海街道稱巴利安街（Parian），亦將此名移用於雞籠。《東西洋考》稱之為「澗內」，方豪疑為西班牙文稱中國人 Chino 之譯音。西班牙人始建炮台。當地有原住民稱凱達格蘭（Kai-t'a-ko-lan）族。有漢人及日本商人住在該處。西班牙人上陸後鳴放大炮表示所有權，原住民因而受到驚嚇，躲入深山中……

荷蘭人不願見到西班牙人佔領北部，兩年後曾派軍攻打，但為西班牙軍所擊退，因此在這十六年當中，台灣的天主教乃全由西班牙教士在軍隊保護之下在台灣北部逐漸發展，當然是具有西國色彩的，吾人可從教堂的名稱上即可看出。

由於西班牙國家政策改變，不願再在台灣駐守，撤軍之後教會也無法存在，有人如此感慨：

關於這段歷史，庫滋神父曾悲傷的說：

「最令人遺憾的是，十六年來戍守台灣以寡敵眾的西班牙軍隊，卻收到了有益於荷蘭人的命令，馬尼拉的新總督柯拉下令，將駐守台灣的四個連隊撤回三連，以協助在民答那峨的激烈戰鬥。留下一連部隊，是由兒童合殘弱者所組成……荷蘭人得到這消息，立刻武裝部隊，於一六四二年向我們發動攻擊。經過一週的猛烈戰鬥後，我軍投降，但都是光榮投降。」

但是，不管光榮與否，西班牙人戰敗，總是有損聲望丟面子的事情。截至當時為止，西班牙人尚無佔領土地，而無法防守的記錄。但更重要的是，西班牙傳教士已喪失了到中國傳教的機會。

西班牙守軍在一六四二年八月二十四日投降，和士兵一起被俘虜的還有五位道明會神父，一位在俗會士和一位聖薩爾瓦多方濟會修院的修士，他們都被送到雅加達，準備遣返馬尼拉。⁴

4 黃德寬：《天主教在臺開教記——道明會士的百年耕耘》，台北，光啟，1991，頁 40。

學者或謂，荷蘭改革宗（亦即長老會）的傳教士來台灣後協助荷蘭政府擔任殖民地官員；但西班牙天主教士則以傳教為主。⁵雖然如此，西班牙傳教士仍是以其國家為榮，1860年代當西班牙傳教士再度入台，仍懷念當年在北部的遺澤：「兩百年前，道明會士曾在這裡留下腳印。這些居民的祖先曾是基督徒，如今他們還保留若干傳統。這裡曾一度飄揚西班牙著的國旗，傳教士還能找到當年蓋了聖堂的村莊。」⁶事實上，縱使西班牙傳教士想要像在中南美洲一樣，建立大型集體農場 (reducion) 也不太可能，因為台灣的地形無法成就大型的農場。是故，地方上的限制也多少型塑了教會發展的方向。

(二) 1859-1895

當時二次入台，北京條約尚未締結，嚴格而論，來台雖非犯法，但在內地傳教應屬不準行，直到同治元年（1861），才正式由清廷發給傳教士「諭單」，准予西方傳教士赴通商口岸以外的內地傳教，此諭單格式如下：⁷



此諭單明白顯示出法國的保教權，由法國出面與中國商

如何對待中國的教徒以及在迎神賽會攤派公費時的豁免等。當時在台灣代理西方各國利益的是英國駐安平鎮的領事，他也是代理西班牙、法國、德國等的副領事，因此道明會神父一有問題，就請英國領事代為出面協助。1868年發生的鳳山教案，最後使法國副領事亦即英國代理領事吉必勳 (John Gibson) 及清廷地方官去職，⁸英國領事卯和 (Robert Swinhoe) 回任。在英方外交官跟總理衙門往返交涉多次後，清廷答應保障傳教士安全，傳教士得以在台南定居下來，天主教會

5 方豪，前揭書，頁 205。

6 黃德寬，前揭書，頁 63。

7 蔡乃煌總纂：《約章分類輯要》卷六中下，〈傳教門·傳教類章程·通行傳教諭單並禁止攤派教民迎神賽會等附諭單式〉，式列卷末，列入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12 輯，台北文海出版社。

8 《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 65，頁 8-9。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 op. cit., pp. 52-53.

並得到兩千兩的賠償，⁹以重建被焚的教堂，並分別在台灣縣及鳳山縣處罰了十名肇事的前軍人及百姓。¹⁰西方在台的影響力顯然增加了。的確，英國領事也在幾次小型衝突中，出面向中國地方官抗議後，得到較圓滿的解決。例如，傳教士被搶，在 1868 年之後，常能找回失物，而且都是敲鑼打鼓送回來的。¹¹

然而，並非每次英國領事都是站在西班牙道明會，或天主教立場來處理糾紛的，例如 1885 年在屏東老埤發生的衝突，就是一例。¹²據英國檔案記載，在萬金數里外，西班牙神父建立有老埤庄小教堂。有潘姓熟蕃（Civilized savages）十五或二十家入教。入教者與不入教者構隙，雙方均想以小事如偷竊來激怒對方，這在當時半開化的團體中是常有的事，不久就爆發了衝突。當地信教領袖潘海瑞、潘添才、潘官山與非教徒的另一方潘幼、潘宗貴在十月二十四日打架，中國官員稱此事之因乃因非教徒偷了蕃薯；神父則說起因於非教徒的一方拒絕配合繳納仲裁的費用。在爭吵中動用了火力。潘海瑞等殺死潘宗貴之兩個兒子潘興及潘福地，也傷了別人。林克勉（I. Clement）神父立刻報案，向西班牙副領事控訴。該國副領事 Mr. Hausser 立刻處理本案，成功地使鳳山知縣恢復老埤庄秩序。十一月三日知縣來，知道二號仍繼續有爭鬥，且有人受傷，潘海瑞等退回萬金庄堂內，武裝拒降。林神父答應勸三人投降，他們被以謀殺前二人之罪起訴。縣長走後卻不交出。林神父當時尚不太會中文，中國官員說若能交出就不會有更多爭鬥。數日後潘海瑞投降，另二人則由教堂交出。

但林神父開始之立場造成後來談判之壞影響。潘海瑞被訴以謀殺罪，其他兩人則被控輕微協助犯罪。十二月二十三日潘幼及潘宗貴被送回老埤。而在此時 Spence 接替 Gregory 之職。Gregory 要求 Spence 當作教案迫害教民之案子處理，但 Spence 覺得不能成立。Spence 認為爭奪蕃薯田比基督宗教跟百姓間的衝突來得嚴重得多。二十四號潘幼及宗貴回去，但二十五日兩人又號召友人來燒毀教友之房子及教堂。Spence 要求知縣抓此二人，但不太容易。四月抓到這兩人，但立刻放人，因為道台在法國對中國封鎖解除後大赦小罪犯。可能他堅持，因為破壞西班牙條約及中國法律，七月抓人，但監禁很短。除了傷人命外對半開化的原住民，官員採放任政策。官員同情潘宗貴因其子被害。而且潘幼及潘宗貴受到中國政府的信賴，因這兩人對理蕃事務的處理頗受政府倚重。抓到此二人後才談賠償問題，到九月初才談成。非教徒保證不傷教民，並重建其屋。二人賠 126 元，分給 15-17 家，並蓋草屋神父本不收，但後來才由良方濟神父（Fr. Herce）接受。十月二十日後復原其屋，並發放賠款，二人保證不再犯。作為西班牙副領事向廈門西班牙總領事報告，由良方濟神父及知縣代表見証。

但是依據道明會方面的記載則有很大的不同：

內埤鄉老埤村自 1870 年即有自萬金神父來此傳道，因有二十多家望教，乃以 62 元買土地建道理廳。1874 年吳萬福（Gomar）神父來此地

9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 op. cit., p. 141.

10 Rev. Van Hecken, C.I.C.M.（賀歌南神父），Missiologie van Taiwan, partly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by Rev. A. Van Lierde, C.I.C.M.（粟鵬舉神父），“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atholic Church on Taiwan”，出版於《懷義通訊》（Verbist Study Notes），no.7（1986），p. 9；又賴永祥，前揭書，頁 270。

11 黃德寬，前揭書，頁 91。

12 以下的敘述，參見 Public Record Office, FO.228, 1885, Taiwan to and from, p.432, 1885/11/20, no.43 William Donald Spence Esq. to O’Conor 代辦，至頁 441；以及 p. 33, no. 20, 1885 年 12 月 8 日北京 O’conor 致台灣英國官員之信。

常駐，擔任本堂神父，并新蓋間之教堂，建築期間受到當地人士之反對，但未有官吏反對而能成功。¹³

但是次年（1875）吳神父調至羅厝，此地無神父常駐，有一信者新屋落成，而次日鄰居小兒因天花死亡，以教友新居犯沖觸犯惡神，信徒被控判監，教友們向保正抗議，反而被判十日拘留及 26 元罰款。萬金揚真崇神父向知縣抗議，不得要領。因此民教之間早有積怨。12 年後 1884 年，一外教人向此地其信教之親戚募款進行蘭盂賽會，被拒後，掠去信徒家中之水牛，並欲聯合鄰眾驅離此信友，但諸信眾已馳赴教堂應敵。「於十月二十一日，以異教方陣內發槍聲為開端，雙方開始激戰，終則異教中死亡兩人，我教友中一人受槍傷，而該村陷入一大混亂。為雙方旗鼓相當對峙不讓，為萬全計老羽婦孺之教友，皆用夜蔭遁出萬金報信……。」¹⁴

光緒 13 年（1887）5 月 28 日台灣巡撫劉銘傳函稱：

台北自通商以來，即有耶穌教堂。初亦相安無事。自上年法人肆擾之後，民教齟齬，連毀教堂七處。旋於法事平後議賠洋一萬元。幸無天主教堂。本年閏四月據紳民等稟稱，大稻埕地方創設天主堂。民情惶惑，洵洵思逞。懇求飭縣驅逐，以消患萌等情。當經批飭查辦去後，旋據駐台英領事翟理斯，以日（即指西班牙而非指日本）國教士何鐸德來此傳教，並無違約，被地方官阻止等詞。專函詰問。經將台地民教萬難相安情形，並鈔黏稟案函覆，促令迅速出境。查天主教士法人甚多。民間亦但知為法人之教。台民與法積忿已久，豈有隱忍不發之理？一經聚眾法令不能禁止。該教淫亂諸弊，雖無確據，而民間傳說，深信不疑。近年各省教堂之案，往往因此而起。且天主與耶穌，勢不兩立。台北耶穌教民已多。將來不獨民教不能相安，即兩教亦不相安。台灣民情囂悍，動輒聚眾滋事。況與法人有難解之公憤。與其日後釀成事端，何如目前早為杜絕。此次該教士忽來傳教，並未先將護照呈驗。亦未稟由領事先行照會地方官。租地方官租地建屋一切自擅。紳民駭詫。幸未決裂。以後勢必砌詞投訴該國領事，轉達駐京公使咨請貴署查辦，務求查照前情，禁止來台，以免唇舌，而省案牘。地方幸甚。」¹⁵

文中可知，國人對法國，及天主教並不瞭解，毀去耶穌教堂，也是一種誤會。值得注意的是，南部天主教堂多的地區並未傳出這類問題，可見其地緣關係，查中法戰時，法軍登陸及與清軍交戰之處是在北邊，為基隆到淡水之間。因此受波及的即在這些地區的教堂。因而南部無事。另外，也可看出清朝在台灣最高官員劉銘傳對基督宗教的敵意。所謂「該教淫亂諸弊，雖無確據，而民間傳說，深信不疑。」作為一地方官，明知這種傳說有很大的煽動力，卻不積極加以澄清，以杜後患，反而用一些不太確定的詞語陳述。雖無鼓動，也可說是未曾積極地消弭。難怪淡水知縣汪興禕要向天主教的傳教士表示「天主教堂乃係法國之教。劉爵帥以及百姓均不願意」¹⁶在當時的中國，下屬官員揣摩上意行事實屬必然，該知縣

13 楊多默著：天主教高雄教區譯，《天主教來台傳教壹百年簡史》（高雄，1959），頁 56。

14 同上註，頁 57。

15 《教務教案案檔》，台北，中央研究院近史所，第五輯第四冊，（1977，以下簡稱《教案檔》），頁 2073。

16 《教案檔》，頁 2076。

不會無緣無故提到劉的態度。其實劉也頗知當時基督宗教之間的矛盾異同，所以前文有天主教與耶穌教勢不兩立的句子，也在回復英領事的函中提到「本爵部院遇事持平，既無厚民薄教之心，亦豈有強民從教之理？且難保無民教戕殺之事。上年貴（英）國耶穌教堂連毀七處，有案可稽，是其明證。耶穌教民最稱安分，尚且如此；天主教向來多事，斷不相安。

另一方面，西班牙駐華領事心中的天主教的形像又是如何呢？我們可從下列文中可見一斑：

查敝國天主教，自赴中華至今，傳教經近二百年之久。原係為善之道，其所以能久在各處傳教者皆由教士克己待人。以故到處官長鄉人，方肯優為保護。此次阿教士實係敝國教士，由敝國赴台傳教七年，並非突如其來者。貴爵部院既稱毋庸再行在台傳教，似屬有乖和約。未諗所干之咎，伊誰擔理，殊所不解。若以阿教士為法國教士，即使法國教士亦應一体保護。況非法人而被指為法人，尤屬支吾。若此則日（西班牙）、法二國受侮匪輕……該耶穌與天主二教，其間道雖稍別，其行善之理則一。在福建一省，二教併行，因何台地獨耶穌可以行傳，而天主教則欲行屏逐，無乃厚彼薄此，誠恐於理未順。¹⁷

西國外交官要清廷遵行和約，申明阿教士乃西班牙人而非法人，且該教士在台傳教七年。「台地人民無不週知」。此次該紳民「膽敢混聳官長，遞稟生畔，尤加狡詐，應請提懲，以循和約。」西國領事更提一句隱含威脅之言：「第該教士之師長為敝國聖教王，且案係違約逐教，關係匪輕。」¹⁸

劉銘傳指出何氏不法之處有三：（1）無執照，也無傳教諭單；（2）租房開教堂應先將租約交地方官蓋印，要「查所租之處與民居方向無礙，方准驗租」，何氏未遵，在「有礙民居大街內擅設教堂」；（3）教士赴訴中國地方官衙門，應用稟呈，而何用文移。

在天主教文獻之中何德鐸之名為何安慈（Celedonio Arranz），在中方文獻中則為何鐸德，又有稱阿鐸德¹⁹教士或鴉蘭噓²⁰台北商人決定三條件：一。何鐸德開堂設教，必須照約擇僻靜之所，不得在大街通衢，有礙民居地方；一。所傳之教，務須同耶穌（教）一樣，勸人為善；教士須立品待人，堂內不得收養婦女，及包庇匪類，恃教不受尊長約束；一凡遇教民家中婚喪之事，教士不得前往干豫，以避嫌疑，俾彼此輯睦，而免滋事。²¹

1895 中日馬關條約簽訂後，清廷割讓台灣，日本派員接收，但台民不服，引起各地的反日運動。日軍以精銳武器及軍隊，在一些留台外人以及台民的協助下，從北到南逐漸控制全台。日軍在控制彰化後，在斗六附近受到抵抗，之後，在台南又有一些戰事，但在三個月內就大致控制了全島，雖然在未來四五年中仍有零星抗日活動，但日本已開始其在台的有效統治。在日軍南下的過程中，台灣天主教徒先是被抗日軍指稱有傳教士像林茂德（Nemesio Clemente 1866-1895）隨軍南下，或是有傳教員為日軍嚮導，事後又被人向日軍指控天主教中人為抗日

17 上段引文以及此段話均見《教案檔》，頁 2078。

18 《教案檔》，頁 2078。

19 《教案檔》，頁 2084。

20 《教案檔》，頁 2083。

21 《教案檔》，頁 2086。

勢力中之一員。兩邊不討好之餘，在雲林一帶的教會受到不少損失。²²事實上，的確有一位彰化地區出身的傳道員協助日軍有功，後來被日本殖民政府獎勵，得到敘勳，只是名字有些出入，教會資料中所記的是陳沛然，²³但其他記載則為張德潤。²⁴

(三) 1896-1945

1909年明治四十二年四月七日道明會台灣區會長馬守仁(Manuel Prat)，由菅沼寬藏擔任代理人，向日本殖民政府申請成立財團法人「聖道明會玫瑰支會臺灣宣教部」，自備二十萬圓為資本作為傳教所用，但在次年九月二十七日遭到日本殖民當局拒絕。²⁵不過在1917年四月一日的靜修女中開學的典禮上，記有「財團法人台灣教區天主教會」的字樣，顯然日本已批准設立財團法人，但很可能是在1913年台灣脫離廈門代牧區後才成立的，而且原來的道明會玫瑰支會的名目也消失了。²⁶1919年日本宣布除了幼稚園之外，不准再設立私立學校；²⁷1922年日本當局廢止私立學校規則，發佈改正台灣教育令，將原來以專收台灣本島人的高等普通學校與專收日本人的高等女學校的兩種系統加以統合，靜修女中也隨之廢掉，但同年十一月八日又以新設立的私立靜修女學校，將原來學生以相當新規則的班級編入上課，並迎接第二任的校長，亦即楊多默監牧(Thomas de la Hos)，但學校是由州知事或廳長以及台灣總督來監督的。此後的學校宗旨是「遵守大日本帝國政策，奉戴天皇勅諭，教養成帝國最具人格之美善婦女，實施精神的國民教育」，1936年日本要求將學校經營與財團法人天主教會分離，並要校長自動退職，改由日本人擔任，內定的是自創校以來即在學校擔任顧問的小宮元之助。²⁸

另外，原來在1905年建成之大稻埕天主堂，1906年五月，日本由於要鋪設下水道，要求遷移，幾經交涉，才在1911年七月六日決定，以四萬元為補償定案。²⁹

1941年十二月八日珍珠港事變爆發後，日本殖民當局突然大舉搜索台北蓬萊町的天主教堂，西班牙神父被軟禁調查，並不准與外界通訊；台中台南的教會也同步被搜查，台南傳教士受到的待遇稍好，可以在主日舉行彌撒，但台中的陳若瑟神父受到日本較差的待遇，被關至二十六日；員林的兩位神父則被囚，與小偷同住；不論如何，他們都有被視為是西方間諜的嫌疑，僅有日本籍的山內修女可以自由活動。十二月十六日義大利領事Arundel de Re探訪神父，受到日本警察的阻止，義國領事回答說：「如果佛朗哥(將軍)知道你們如何對待西班牙人，他將會生氣。」³⁰

22 William. J. Richardson, "Christianity in Taiwan under Japanese Rule", unpublished PhD Dissertation, St. John's University, 1971, pp. 54,59.

23 大國督，前揭書，頁266-267。

24 楊永彬：《台灣紳商與早期日本殖民政權的關係——1895~1905年》，台大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頁85，頁137。

25 台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四五卷之六一，指令第四七四四號，收於《臺灣史料稿本》。

26 山本禮子：《植民地台灣の高等女學校研究》(東京：多賀出版社，1999)，頁238。

27 Richardson, op.cit., p. 143.

28 山本禮子，前揭書，頁239。小宮為長崎人，乃教友，且為律師，參見台灣名人傳網站。

29 台灣總督府《公文類纂》追加一五卷之二，收於《臺灣史料稿本》。

30 Richardson, op. cit. pp.192-193。

1944年對日戰爭正慘烈之際，台灣教會內的非日本人士人人自危，第一位本土神父涂敏正神父被道明會神父誣指為間諜：

1944/4/20 日台南若瑟神父被迷唆使楊多默前教區抗告里脇教區長要棄絕劉決治全家，並假冒書信，誣余及劉為 Spy 等。(台南事件)

1944/4/21 日同里脇教區長一同到台南與楊多默及若瑟神父理論對訊，結局他們理屈，承認錯誤，被迷誣告之責任，向余等道歉息事。³¹

總之戰爭容易挑洞起敏感的神經，就有的傷疤再度被撕裂，原有的緊張關係會惡化，現在新的矛盾可能會產生，在此案例中，台灣天主教在此情況中就是一個例子。

(四) 1946-1990

第二次世界大戰於 1945 年結束，日本殖民政府落幕，台灣天主教的日本影響漸減，而原來擔任教區長的日本長崎教區的神父里脇淺次郎也將職務交由台灣的教區神父，也是他在 1942 年入台後早就安排的重要助手，一方面為培養台灣的地方教會領袖，另一方面當然也有凝聚教會內非西班牙道明會的力量。³²日本離開之際，道明會勢力曾想接手，據當時當事人涂敏正神父日記之記載：

1947/2/24 接到台北前教區長楊多默假冒羅馬委他為教區長的恐嚇信，並預定三月十日在田教[中?]教會要開教區會議等，被了有先見之神父抗拒取笑不已，余亦上書抗告。

.....

1947/3/28 楊多默與陰謀並鬼計多端之羅鐸一同到高雄要接收教區長之職權，並無真憑實據，假冒而來，實犯教律 316 條之罪責，後被余一一抗責，才敗興而歸，此亦是台區之一笑史也。因以前一年多(由[於?]日本主教回去)，經濟困難，他不想做教區長，此時有羅馬之匯，由他轉之救濟金，他就見利忘義，假冒他是當教區長之笑話也。³³

但一直要到三年後才由陳若瑟 (Jose Arregui) 擔任台灣監牧。

1948 年台灣天主教務統計，全台有十四位西班牙道明會士，四位台灣教區神父，十位修女以及一萬三千多名教友；到了 1950 年，由於中國大陸政局動盪，首先由國籍修會「主徒會」(“Discipuli Domini”) 來台，全台已有四十五名神父及一百位修女。³⁴

五零年代初期，中共閉鎖的外交政策迫使教廷的使館輾轉經香港後到台灣，大批原來要在中國大陸傳教的外國傳教士在香港短期觀望後，紛紛來台，使得台灣的神職人員大增，各修會來台有了據點之後，陸續也有年輕的會士將原本要去大陸傳教的目標改為來台傳教。也因此在台灣的外國天主教傳教士，特別是西方

31 《涂敏正神父日記》未刊稿。

32 請參考古偉瀛：〈台灣天主教史上的里脇淺次郎與涂敏正〉，收入在《20 世紀台灣歷史與人物——第六屆中華民國史專題論文》，民 91/12，頁 185-208。

33 《涂敏正日記》，未刊稿。

34 Rev. Van Hecken, C.I.C.M. (賀歌南神父), Missiologie van Taiwan, partly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by Rev. A. Van Lierde, C.I.C.M. (栗鵬舉神父),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atholic Church on Taiwan”, 出版於《懷義通訊》(Verbist Study Notes), no. 6, 7, 9 (1985, 1986, 1988)。

色彩特濃。1953年有296位神父，教友25,0575人；次年神父有374人，教友32,310人；十年之後，亦即1965年，神父有731人，教友有283,074人。³⁵在神父中外籍比國籍稍多一些，亦即有數百位外國神父在台傳教。在修會方面，1965年的統計男國際修會有17個，女國際修會有15個。³⁶

有趣的是有的雖然是屬於同一修會，但是仍有不同國籍的區別，例如耶穌會這個大修會中就可分為法國耶穌會，匈牙利耶穌會；方濟會就有德國方濟會及比利時方濟會；道明會也有西班牙及德國、中華道明會之別，而他們有些在台灣的傳教有其各自的地盤，甚至不受當地會省之管轄，較有名的例子是匈牙利耶穌會士，原先在河北傳教，在來台後，他們不願分散，而集中在台灣南部嘉義縣朴子的小鎮上傳教，迄今五十年，但也因人物凋零而此團體逐漸消失。³⁷

五零年代之後台灣教會開始逐漸分化成不同的教區，首先在1949年十二月三十日成立台北監牧區，轄臺北、桃園、新竹、苗栗、宜蘭、花蓮六縣，臺北、基隆二市及陽明山管理局，其餘屬高雄監牧區，由原來的西班牙道明會陳若瑟監牧管轄。北部由剛恒毅總主教(Mgr. Costantini)創立的國籍修會主徒會管理，並在1950年一月以主徒會郭若石神父為台北監牧，其意當然希望發展出國籍領導的地方教會。1950年十月六日，教廷傳信部再自高雄監牧區劃出臺中、彰化、南投三縣及臺中市為臺中監牧區；並於1952年一月二十六日，由教廷委任美國籍瑪利諾會的蔡文興(William F. Kupfer)，為首任臺中監牧，自此臺灣有三個教區。

1952年八月七日，教廷再成立嘉義和花蓮兩個監牧區：嘉義區轄嘉義、雲林兩縣，均自高雄區分出；花蓮區轄花蓮、臺東兩縣；花蓮自臺北區劃出，臺東自高雄區劃出，以原山東省陽穀主教牛會卿兼任嘉義代理監牧，以原遼寧營口主教法籍巴黎外方傳教會的費聲遠(A. J. Verineux)，兼任花蓮代理監牧。自此臺灣已有5個監牧區，但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外國籍主教佔三位。

就在同一天，臺灣聖統制成立，成為中國第二十一個教省。臺北監牧區升格為總主教區，由郭若石昇任總主教，在十月二十六日祝聖。

1959年十二月十九日，教廷應原北平總主教田耕莘樞機來臺的要求，委為臺北總教區代理總主教，取代郭若石總主教。

1961年三月二十一日，同時成立新竹和臺南兩個教區：新竹教區所轄新竹、桃園、苗栗三縣都從臺北總教區分出，以國人杜寶晉為新竹主教；臺南教區所轄臺南市，臺南縣和澎湖縣，都從高雄區分出，以國人羅光為臺南主教。從此，臺灣已有七個教區。

隨著聖統制的落實，此年四月一日，教廷升高雄監牧區為教區，並改委國人鄭天祥為高雄主教。1962年四月十一日，嘉義、臺中兩監牧區升格為教區，陽穀牛會卿主教為嘉義教區代理主教，蔡文興為臺中主教。1963年七月十五日，

35 參見 Catholic Directory of Taiwan (1955)；《台灣天主教教士通訊錄》(1957, 華明書局，後改稱《台灣天主教通訊錄》)；1970年開始由天主教教務協進委員會編的《台灣天主教手冊》等。

36 參見1966年的《台灣天主教教士通訊錄》。

37 Peter Vamous, "With the Chinese, for the Chinese: The Hungarian Jesuit Mission in Putze, Taiwan", paper presented in the 2004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China Church History sponsored by Verbiest Foundation of Leuven.

花蓮監牧區升格為教區，營口費聲遠主教仍為花蓮教區代理主教。³⁸

以 1986 年的台北總主教區為例，該區所轄的男修會就有主徒會、方濟會、慈幼會、道明會、耶穌會、瑪利諾會、遣使會、聖母聖心會、耀漢小兄弟會、聖言會、本篤會、救主會、靈醫會、仁愛傳教兄弟會及巴黎外方傳教會等十五個，其中純國籍的只有主徒及耀漢小兄弟會兩種，其他十三個全是國際修會。女修會更是有三十多個。³⁹

在 1950 年以後的數十年間，由於在台灣的外籍教士有數百位，國籍也有數十種，因此除了美國，沒有一個國家的神職能夠對外界有較大的影響。美國一方面是台灣最主要的支持國，也是世界強權之一，因此其所屬的外方傳教會——瑪利諾會就較有力量。瑪利諾會倡導以當地方言傳教，因此會士們或學河洛話，或練客家語，以爭取傳教的優勢，他們與台灣的基督教長老會一樣，使用白話羅馬字來向當地民眾傳教，並且也展現美國自由民主的價值，因而在當時威權體制之下，與黨外人士有較多的往來，與國民黨當局也時有衝撞。不過因為該會在台中為基地，遠離台北，其影響究屬有限。其他的修會則在教育、醫療、慈善事業、社會服務等方面有所貢獻，例如以義大利人為主的靈醫會在宜蘭及澎湖的施醫，以教育工作為旨趣的耶穌會士在輔仁大學及台灣大學的服務；以及一些歐美神職對原住民文化語言的保存等都可見到身為異國人士的敏銳及才能。

總之，本期台灣天主教會內的多國因素在相當程度上，提供並補充了社會力的不足，並使台灣增添不少多姿多彩的容顏。

三、教會中的諸國特色

若按時期的先後，倒是可以觀察到有些較具主導性的國家特色。例如在十七世紀的十六年當中，來台傳教的道明會玫瑰省中西班牙的色彩即很明顯，事實上他們根本是隨著軍艦來台的，雖然沒有替西班牙軍隊統治台灣北部，但其所傳教之區也在軍隊力量能及之處，而且也依靠西班牙軍隊之保護。傳教士們也提及西班牙國旗飄揚在台灣北部之事。但是其在北部傳教的色彩是具西班牙色彩的，此可從教堂的名稱看出。不過因為當時台灣南部有充滿敵意的荷蘭，虎視眈眈，基隆淡水附近又不太可能如在南美洲一樣的大塊土地進行「集體農場」(plantation)的開創，因此早期台灣天主教的西班牙成分可能只在語言及教堂的硬體建設上。

1859 年天主教再次由西班牙道明會玫瑰省傳入，其西班牙成份仍在，只是此次不是由軍艦護送而來，而是歷經險阻而落腳今日之高雄屏東。當然，縱然西班牙政府想要扮演更重要角色，恐怕也心有餘力不足，因為西班牙在世界各國中已不再有從前的國力，原先殖民地紛紛獨立，而其本國工業化速度也落後，沒有能力扮演西方列強的角色。他們來台的動機是因為中法訂約，天主教也已合法化。由於法國願意代表教會利益，因此從 1861 年台灣開埠以後，台灣的西班牙天主教傳教士所持的是法國護照，接受英國駐安平領事的保護。

到了日本領台後，日本對台灣的政策是去中國化，對於在台灣西班牙傳教士，看成是西方勢力的延伸，除了成立台灣監牧區之外，對於西班牙道明會玫瑰省要成立財團法人的要求加以拒絕。隨著日本在亞洲侵略的深化，除了去中國化

38 以上資料取材自光啟宗教資訊中心編：《民國七十五年 台灣天主教手冊》光啟出版社，台北，1986 初版，頁 7-9。

39 同上註，頁 114-159。

以外，也去西班牙化，所辦的學校要以日人為校長，所傳教的地區要以日人作為教區長，更不時限制西班牙人的自由，甚至懷疑西班牙傳教士為英美的間諜，加以搜索。換言之，在日本時代，台灣天主教有相當程度的日本色彩，但在其中仍可見到西班牙力量之角力，甚至連義大利也多少扮演了一定的角色，台灣本地教會的勢力也開始萌芽。

1949 年中共建政後，天主教會沒有發展的空間，許多外國傳教士紛紛來台，一時之間有數十個國際男女修會在台傳教，修會中的各國特色並不見得很明顯，這是因為國際的修會其成員來自不同國家，因此除了同質性較高的修會外，其他修會的國家特色並不明顯。最多時期神父達到 1968 年的 844 人，其中外籍有 482 人，國籍有 352 人。外籍和國籍神職人員的比率要到 1985 至 1987 年才開始呈顯減少：從 368/366 到 352/376。⁴⁰

這些外籍神職多屬於修會會士，不下數十個不同的國籍，而且自從 1946 年「聖統制」(Hierarchy) 在中華大地建立之後，法國再也無法維持其保教權，而教廷對各地方教會的控制也逐漸落實。換言之，台灣天主教會已是很多樣化了。不過這種現象並非多元，講諸國的影響力並不精確，因為這些多國因子除了美國在局部地區的一定時期外，並未在台灣地方教會中呈現其影響力。倒是在中數個國際修會 (religious order) 中，每個修會所具有的特色及工作目標，恐怕在二十世紀末二十一世紀初更明顯且值得注意及理解，也對台灣教會的形貌有一定的影響。

吾人可以看到在台灣天主教會中所具有的除了中華文化以外的其他文化成份可以有西班牙、菲律賓、馬來亞、英、法以及日本的因子在內，1946 年之後，由於大陸傳教士紛紛轉進來台，教會所具有的外國因子更多，這些國家對台灣的興趣大小各有不同，其中更不乏矛盾及政治及利益的衝突，很難用「帝國主義侵略」的模式來解釋台灣的天主教會史。在十六到十九世紀雖然西班牙道明會的確是主導的力量，但西班牙正處於沒落之中，在亞洲很難說得上是侵略者；二十世紀上半葉日本的影響力漸增，儼然要取代西班牙，但日本政府對天主教會防範甚嚴，而日本天主教會在台灣又力量甚微，開始培養地方教會，然尚未成熟就又因二戰結束而終止統治。二十世紀後半葉以來的則是各修會中的不同國籍教士來台傳教，隨著各地方教區的成立，不同修會進駐而有其面貌，比較突出的是美國的瑪利諾會 (Maryknolls)，他們從中國大陸的兩廣及東北地區撤出後，就在台灣中部地區傳教，推行方言傳教及美國自由民主價值，在 1960-1980 年代的二三十年當中，與當時的威權體制時有衝撞。但隨著台灣民主化，緊張關係已消失，台灣教會在教育及社會慈善事業上有其貢獻，也反應出多樣的形象。隨著蘇聯的崩潰及西方主流世界去基督教化的效應，台灣天主教會中將可預見有愈來愈多的東歐、中南美洲、東南亞、韓國以及非洲的神職人員的到來，沒有一個大國將主導台灣教會的發展，多國因子仍在，但已換成截然不同的另外一批人，台灣的地方教會將會成為一個真正具有兼容並包的「大公精神」(Catholic) 的信仰團體。

40 參見 1968 年《台灣天主教通訊錄》及 1988 年的《台灣天主教手冊》。

(二) 西班牙文資料：

(資料來源：El Correo Sino-Anamita 月刊，國立台灣大學圖書館特藏室有若干本，為日本帝大時收集的史料，但並不全，計有 1862-64 年 12 封信，1886 年、1887 年、1902 年、1907 年、1908 年、1910 年、1911 年及 1913 年度的由台灣寄出的信件，未收錄於黃德寬譯著中。)

Missions of Formosa

From Fr. Giner to Fr. General Vicar.

寄自埔姜崙

Po-Kiu-lun, 29 March, 1900.

<p>Most venerable P.N.: I received your most affectionate letter of 21 February, and I thank you for the medicine you prescribed me against the evils that afflict us. I have convinced myself that poverty is the greatest remedy in certain circumstances, above all, if these do not depend on our will. We have reached hard times, in which we have seen with pain our churches and houses destroyed; the roads before were so busy, filled with wild vegetation that penetrates everything: everywhere, nothing else but ruins are in sight. Towns, in other times very populated, are now without dwellers: some have disappeared by a violent death, and others have no possibility of remaining there. Today no other law is known but egoism: sacrificing oneself for the common good or for the neighbour is considered the most complete stupidity; this is why the one who works only for goodness sake is considered insane. For this reason most of the rebels are no more than a small band of thieves and coward assassins that, although they are numerous, they have never been known to hold a single battle against the Japanese. Only in the mountains have they pretended some resistance, and also there they have been defeated.</p>	<p>最崇敬的神父：我在二月 21 日已收到你寄來充滿關懷的信，很感謝你告訴我們對抗這困境的方法。首先，假如我們的意志無法克服當前的狀況，我想放棄將是解決這個問題的最好方式。目前是我們最艱困的時期，教堂及房子被破壞殆盡，過去熙熙攘攘的道路也早已雜草叢生，眼見所及除了斷垣殘壁外，只剩空蕩蕩的一片。過去車水馬龍的城鎮如今空無一人：有的居民慘遭屠殺，而其它的人則逃之夭夭。現在沒有什麼法律可言，剩下只有自私的人性。為大眾福祉或鄰居而犧牲自己的人被認為是個笨蛋，這也就是為什麼人們現在視只做對大家有益事情的人是瘋子的原因。因此，大多數的抗日份子僅只是一小群的盜賊及膽小的刺客，即便是人數不少，但他們卻從來沒有對日本人發動過戰爭。只有聽說在山區發生一些抗日暴動，但是也終歸失敗。</p>
<p>And today, the Japanese are striving to search for the rebels; although these rebels live in the same towns as the people, nobody dares to denounce them. Half a dozen of these rebels do whatever pleases them in the town: they steal, kidnap and murder. The villagers themselves call them and indicate them who are the ones that have money; and after the robbery is consummated, they simulate as peaceful neighbours and even</p>	<p>現在日本人正積極地搜索抗日份子，雖然他們和一般人住在相同的城鎮，但沒有人敢指認他們。六名抗日份子在城裡胡做非為，他們偷竊、綁架還有殺人。村民會通報並告訴他們誰是有錢人，搶劫之後，村民還會假裝好人，甚至還介入做調人。人們不喜歡他們是事實，但若想要利用他們來完成一己之私，村民則很歡迎這些強盜來他們家，招待他們吃甚至提供他們所需的一</p>

<p>intervene as mediators. It is true that the people do not like them, but, taken by their terror, they welcome these bandits into their homes, inviting them to eat and providing them whatever they wish. If they are ever discovered by justice, the same town's authority covers them, reporting they are peaceful and honourable citizens. A big part of the blame falls on the Japanese themselves, for their notorious despotism, for their scarcely satisfactory conduct, for their lack of formality in their speech, and for the excessive imposition of contributions, which are only demanded from the good villagers. They take away and collect the weapons they disposed of for their natural defence, while the most rascal folks are permitted to possess whatever amount of armoury they wanted.</p>	<p>切。如果他們被警察發現，鎮上的地方官還會包庇他們，說他們是平和又老實的人。大部分的指責主要還是落在日本人身上，因為他們蠻橫的統治手段、無法為大眾接受的行為、無理的說話方式以及對善良的老百姓收取苛捐雜稅。抗日份子為了防禦日本人拿走並收集武器，而且大多數當地的流氓也允許擁有任何他們想要的武器。</p>
<p>But, what has contributed most to this state of affairs is the shameful peace they have agreed with the insurgents, because the latter acquired fame and money. Formerly, the robberies were executed with weapons in hand; afterwards they are executed in all imaginable ways. Before this peace, the rebels tried to do their mischief behind the Japanese back, and they did not enter a town where a garrison was; but afterwards they have camped in all the towns, even in the most important ones. And who dares to deny the pretensions of these rebels, when the Japanese themselves distinguished them so much, saluting them with military greetings, and honouring them with banquets and music? I myself had to render them vassalage, submitting \$1 for the contribution they were requesting me. What would they not be able to collect from the wealthy who have more resources to dispose than me? This proceeding discredited the Japanese tremendously, and so it was frequent to hear among the villagers that it was preferable to go on with life in the mountains, since in the village life was impossible. However, the Japanese took charge of this state of affairs, and some of them came to tell me that by that time they could not remedy the situation; but when the occasion arrives and according to law, they would present the case to the General Governor, so he could apply a remedy. Since the agreements between the rebels and the Japanese were never accomplished, the rebels lost their respect for the Japanese and the Japanese did not object. It is true that in a certain occasion they did</p>	<p>然而這個件事最終的結局卻是可恥的和平，日本人與抗日份子妥協，因為抗日份子居然名利兼得。之前強盜手持武器犯案，後來他們會用各種可以想見的方法為非作歹。在這與日本人談判之前，抗日份子只敢在暗地裡做壞事，而且他們不進入有駐軍的城鎮；但後來他們進駐各城鎮，甚至是最重要的城鎮。連日本人自己很尊敬他們，以軍禮向他們致意，還用宴會及音樂招待他們，那誰膽敢拒絕這些抗日份子的要求呢？我自己也得聽屈從他們，並給他們一元。那他們怎麼不能從有錢人那兒要更多的錢呢？這些事情嚴重地破壞了日本人的名聲，所以就常常聽村民說，既然在村裡的日子不好受，那倒還不如去山裡生活。</p> <p>雖說日本人負責維持情勢平穩，然而他們中有人跑來告訴我，現在日本人其實還無法掌控局勢；但若是情況持續惡化，他們就會向總督說明，他有法子處理。因為抗日份子與日本人從未達成協議，他們不再尊敬日本人，而日本人倒也處之泰然。在某些狀況下，其實日本人還是關了一些流氓頭子，但充其量只是些三、四等的小角色，他們從不敢去驚動真正的帶頭者。日本人這些舉動，只不過是用一些引人注目的政策去宣示他們擁有主權。他們開始不再要求</p>

<p>imprison some of the ringleaders, but these were those whom we would call of the third or fourth order, whereas they never even tried to bother the top ones. This procedure of the Japanese was not anything but a certain attractive policy so they could establish a definite sovereignty. They started by suppressing pension that they formerly supplied, although this measure did not soften the hostilities. Gradually, the rebels were losing territory and the Japanese were extending their dominion; however, it is true that the Japanese are not very solicitous in the vigilance, because instead of going out now and then to the suspicious trails and places, they spend all day resting in their headquarters. Because of these our situation is becoming more difficult every day, not only in religious matters but also in the material ones. Everything has incredibly become more expensive. The petroleum that was formerly priced at \$1 per can is now sold at \$2; the oil and salt that the Governor declared tax-free by a decree are now worth four times their original value, and everything else follows the same pattern. On the other hand, since robberies are so frequent, many have lost their working animals, and others do not dare to live in the undefended villages: this is why anyone can see immense fields without crops, and the irrigation dams that assured the harvest of the cultivated lands are now destroyed. The sugar cane, a basic necessity, is almost impossible to plant: whereas it is prohibited to do so near the paths that may be used by the bandits as dens, besides the fact that sugar mills are abandoned for lack of water buffaloes. So, V. R. (Venerable Reverend), it is up to you to judge how we will spend our life with so scarce resources. For this reason, offering a pair of eggs on the table is a disordered luxury and an extravagance never seen before. May everything be for God Our Lord who has made us worthy and deserving of His Glory. However this does not grieve us but increases our joy; what truly makes us sorrowful is not being able to go everywhere to exert our evangelic charity for lack of security; because there is no security in the paths, nor in the towns and, in many occasions, even in our house we live in frights when shots or dog barks are heard. We are not the only ones who fear, but also —and with a bigger reason to do so— the catechists, because these ones not only fear the</p>	<p>之前的規費，雖然這無法和緩人民的敵意。</p> <p>漸漸地抗日份子失去地盤，日本人逐漸擴張他們的管轄區域。然而日本人沒有非常認真地警戒，因為他們所有時間都待在總部，而沒有外出去盤查可疑的地點。因此，我們的情況變得更加艱困，不但在傳教上，而且在物質方面也是。所有的東西都變得很快，石油原本一桶一元，現在要賣兩元；油和鹽總督雖然宣佈免稅，但現在要比原來還貴四倍，其他的東西都是這樣。換句話說，由於強盜案很頻繁，很多人耕作的牲畜都沒了，其他人也不敢住在沒有防禦的村子：這是為什麼放眼望什麼農作物也沒有，確保耕地作物收成的灌溉用水堤也被壞殆盡原因。作為民生必需品的甘蔗無法種植：政府禁止在小路附近栽種甘蔗，因為盜匪可能會利用蔗田做為藏匿之處，此外製糖廠也因為沒有水牛而無法運轉。所以可敬的神父，請你判斷我們將如何在這樣缺乏物資的狀況下生活。因此到現在我們都還不曾享用過一頓豐盛的食物。願上主垂聽一切，讓我們能與祂同享榮耀。</p> <p>然而這不會讓我們感到痛苦反而增加我們的喜樂。真正讓我們感到傷心的是不能到各地去傳播福音給缺乏安全感的人，因為不但連路上不安全，連城鎮及很多地方也都不安全。即使是在我們居住的地方，當一聽到槍聲或狗叫，我們也會受到驚嚇。不單是我們害怕，連傳教師也是(他們甚至比我們更加驚慌)，因為他們不但害怕抗日份子，也害怕日本人。除此之外，他們非常膽小，我們寧可親自到危險的地方也不會派遣傳道師去，因為他們不會做他們該做的工作，要不然就只是虛應故事。</p>
--	---

<p>rebels but also the Japanese. Since on the other hand they are extremely coward, we prefer going to the dangerous place more than sending the catechists, because they would not do what had been ordered or they would poorly do it.</p>	
<p>So that V.R. may have an idea of how credulous these folks are, I will refer to an interesting episode. Some time ago a charlatan, whose trade was quackery, presented himself, saying he was the King and Lord of Formosa, and through this way he swindled some people, whom he made them believe that in a brief time the Japanese would not be able to cope with them; the Japanese rifles would break when they were fired, and the bullets would not reach them with force. It has to be noticed that the rifles they disposed were made up of cane, resembling mausers; they were very similar to those rifles we used in my homeland when I was a boy, when we were playing soldiers.</p>	<p>可敬的神父或許已經知道這兒的老百姓有多麼容易受騙，讓我告訴你一件有趣的事。之前有個愛吹牛的人，他的職業就是個騙子，他宣稱是台灣的國王及神，用這些謊言他欺騙了一些人，並讓他們相信在短時間內日本人將無法對付他們。當日本人開槍時，不但槍會自動壞掉，而且他們還刀槍不入。他們用來表演的槍是用藤做的，長得還有點像毛瑟槍；這些槍就像是我小時候在家鄉玩官兵抓強盜的玩具。</p>
<p>This charlatan had enlisted numerous people, many servants and even his corresponding harem, which I don't know how many women it has. By chance the Japanese got to know the plot. Some cops were passing through the town and, seeing many people gathered in one of the houses, decided to go up to find out what was happening; at that moment, the dwellers shouted open fire and they attacked the Japanese, who ran away because they were few, but only to come back with reinforcements. When they came back, only one of the enemies caught sight of them because they were confident with their cane-rifles and they had not retreated; the Japanese attacked so vigorously that a few moments later they had slain the prime minister, captured others, and the rest had the sufficient luck to escape, after holding some resistance and injured a Japanese.</p>	<p>這個騙子募集了很多人，他有很多僕人甚至還有不少妻子，我不知道他有多少女人。日本人意外地察覺他的陰謀。警察經過城鎮時，因為看到很多人聚集在一間屋裡，所以就決定上前查看發生什麼事情。就在那一刻，居民突然大叫並且開槍攻擊日本人，日本警察因為人手不足而逃跑，但隨後即馬上增派人手回來。當他們回來時，沒什麼人正眼瞧日本人一眼，因為居民相信他們自己手上的藤槍，用不著撤退。日本人勢如破竹，沒幾下就殺了主謀並且抓住其他人。在稍作反抗並打傷一個日本人後，其餘的人也都逃跑了。</p>
<p>This year, the Aguinaldo (leader) of these rebels died. He was nothing more than a poor labourer, who after having heard the news that the Japanese had killed some of his relatives, grabbed some ammunitions, forming well-armed squadrons against the Japanese. He encamped in the summit of a mountain where the Japanese attacked and had many casualties, but were not able to take over it, for which the mountain was named "Tih Koksan", a phrase whose meaning is "Iron Kingdom", which derives from the</p>	<p>今年，抗日份子的首領死了。他原本只不過是一個窮工人，當聽到日本人殺害他的親友後，他憤而搶劫軍火，並組織一隻抗日武裝軍隊。他駐紮在山頂上，日本人雖曾發動攻勢，然而非但沒能攻打下來，反而還折損不少兵力。這座山叫做「Tih Koksan」，意思是鐵國，是源自 Tih(鐵)這首領。雖然首領之死暫時解決了日本人的心頭大患，然而造反者還是會在其中臨時推選出領導人，繼續讓日本人無法高枕無憂。</p>

<p>ringleader Tih. Although the death of this first ringleader has favoured the Japanese, nevertheless, as the kings and emperor are improvised among the insurgents, these insurgents continue to give the Japanese something to do. It is so that in the present time the Japanese forces have gone out towards the mountains in search of them. It is desired that the Japanese employ the fair means of pacification, because if the pretended goals were twisted, then the use of force will not be favourable to them, in view of the general discontent visible in the towns.</p> <p>P.N., this is the present situation, though progress seems to appear, but in a slow way.</p>	<p>基於上述原因，日軍目前已到山裡去尋找他們。城鎮中充斥著不滿，所有的人都期望日方能以公正的方法平亂，因為如果扭曲目標，那麼民眾將不接受日本人使用武力。神父，這便是現在的狀況，儘管情勢持續改善，但步調緩慢。</p>
<p>Since there is no freedom nor safety, our relationships are shrinking more and more, our friends and acquaintances hide from us and, due to the antipathy this people have for any European matter, it is very difficult to do any good among them. It is the same way when the Japanese vaccinate, free of charge to whoever wants to, but nevertheless they ran away and hide so as not to be vaccinated; and it is nothing more but a superstition that the vaccinations were meant to exterminate them; a belief that nobody is able to take away from their heads. On other matters, P.N., I remember that in one of your letters you asked if I were still living in the hut seen by V.R.. I have told you why, since I do not know where will the railway pass. Besides, I asked V.R. for permission to build a chapel in Pokinlun, and since a priest will be needed there, I beg you to grant me the concession to raise two small bedrooms so I can rest after work.</p>	<p>現在既不自由又不安全，不但當地人漸漸與我們疏遠，連朋友舊識都躲了起來。因為居民對歐洲的任何事物都不抱好感，所以很難對居民做些事情。同樣的，當日本人要免費為任何想要接種疫苗的人打針時，居民為了不想接種全都跑掉並且躲起來。不為別的，只因迷信。他們認為接種疫苗就是要消滅他們，這是深植於人們心中普遍的想法。</p> <p>另外，神父，我記得在你的一封信中曾經問我，是否我還住在被閣下看到的那間小屋裡。我已經告訴你為什麼我不離開的原因，因為我不知道那裡將設置鐵路。此外，我請你同意在埔羌崙蓋一座教堂，當地需要一位神父，我請求你同意蓋二間小臥室，以便於在工作之餘我可以在那裡休息。</p>
<p>I have to advise that Pokinlun's bedroom is smaller than the one in Talibu and besides, since it has a tiled roof, it is uninhabitable from eleven in the morning until after four o'clock in the afternoon; in addition, the soil is very humid and so black, as you V.R. saw in Na.</p> <p>By showing your V.R. this petition, my intention has not been to bother you with many details, but to express myself with the greatest clearness possible so as to achieve my petition.</p> <p>In this way everyone of us will be grateful, particularly your humblest subject, who entrusts himself to the prayers of V.R. and B.S.M.</p>	<p>我建議在埔羌崙的臥室可以蓋得比在他里霧(斗南)小些，因為屋頂是瓦製的，所以早上十一點到下午四點都不適合在屋裡。另外，土壤又潮濕又黑，就像閣下在員林看到的一樣。</p> <p>想你報告這些事，並不是想找些雞毛蒜皮的事情打擾你，但是為了達成我的請求，我必須以不厭其詳的方式來陳述我的想法。</p> <p>如果你可以同意這樣的請求，我們每個人的心中都會充滿感激，特別是將自己交付在你手中謙遜的僕人。</p>

Fr. Francisco Giner

O.P.

Missions of Formosa

伍、I.

From Vicar Father to Provincial Father.

寄自打狗 Takau, 20 September 1886

<p>Your most appreciated and venerated P.N.: Some ten days ago I received the most favoured letter of Your Reverence, dated 14 August, which, by an unknown and surprising mistake made by the administrations of the post mail, ended up in the northern part of China. Since on this letter Your Reverence does not say he has received another letter, —which I wrote a few days after the one dated 20 July, to rectify and broaden the news written in that one—, it makes suspect is has been lost.</p>	<p>我最崇敬的神父： 十天前我收到閣下的來信，上面的日期是八月十四日，因為郵局不明究理的疏失，信寄到了中國北方。在這封信中神父並沒有提及你收到我寫的另一封信--爲了要修改並增加些新的消息，我在七月二十日幾天寫後所寫的--很奇怪它被弄丟了。</p>
<p>I understand very well the afflictions and haste Your Reverence will have to go through in his effort to attend and provide for all the needs of our most beloved province, which day by day are more numerous. For this same reason, I resign myself completely to what was meant by Your Reverence in your very appreciated letter, asking the Lord 'ut mittat operarios', increasing day by day the vocations in Spain.</p>	<p>我非常了解神父的苦惱與匆忙，你必須盡心竭力參與並提供與日俱增教省所有的需要。同樣道理，我則完全聽從你信上的指示。請求上主親自檢選使徒，讓宣教的使命在西班牙天天成長。</p>
<p>Because of this last letter, we continue in peace (Deo gratias), each one of us working in his post, without being bothered by the people or the authorities; on the contrary, the authorities are extraordinarily solicitous and nice by giving us total protection, and willing to offer us all kinds of securities, as Your Reverence will see in the annexed documents I received from the English consulate.</p>	<p>因爲在前封信中你對我們的祝福，大家都平安（感謝神）。沒有人民或當權者的打擾，我們每個人都在各自的崗位上努力工作。不但沒有受到打壓，相反地，當權者異常熱心地保護我們，並還願意提供各種安全措施。閣下可以在附加文件中看到，這是我從英國領事館收到的。</p>

(1) In the provinces of Chick-kan and Su-choang.

<p>I suspect some of this situation is happening due to superior orders, driven by the serious events occurred two months ago in northern China (1); the crowds, excited by the learned and the writers, destroyed and burned the Protestants' chapel, the Catholic cathedral and the house of the Bishop, mistreated the English consul, pursued and robbed the Christians.</p>	<p>我懷疑有些情況是統治者高層所下達的命令，因為在二個月前中國北方曾發生嚴重的民眾暴動事件。受到學者及作家的煽動，群眾破壞並且燒毀新教教堂、天主教教堂、主教及英國領事的家，追殺及搶劫基督徒。</p>
<p>Since the great feasts of the Most Holy Rosary are approaching, I beg Your Reverence not to forget to ask Our Glorious Mother for this poor mission and missionaries, especially for this last subject, most affectionate server, and lowest brother Q.B.S.M.</p>	<p>因著偉大的玫瑰聖母紀念日慶典即將到來，我請求神父別忘了為這些可憐的傳教團及教士向聖母禱告，特別是為了兩個月前的暴動事件。最順服的侍者及最謙卑的弟兄僅上。</p>

Fr. Francisco B. Hecce
Order of the Preachers

1) V.R.: probably stands for 'Vuestra Reverencia': Your Reverence. In this letter, V.R. is a reference to the Provincial Father.

2) 'Ut mittat operarios': Latin expression: "So He may send labourers." It is a phrase taken from the Gospels, from the moment in which Jesus Christ is comparing the task of evangelisation to the job performed in a field during the harvest season. "So He may send labourers" is a call of Our Lord for petition for vocations.

Matthew 9, 35-38: "And Jesus went about all the cities and villages, teaching in their synagogues and preaching the gospel of the kingdom, and healing every disease and every infirmity. When he saw the crowds, he had compassion for them, because they were harassed and helpless, like sheep without a shepherd. Then he said to his disciples: 'the harvest is plentiful, but the labourers are few; pray therefore the Lord of the harvest to send out labourers into his harvest.'"

3) 'Deo gratias': Latin expression. "Thanks be to God." "感謝天主".

4) 'R.I.P.': Latin expression. "Requiescat in pace." "May he rest in peace." "願他安息".

Translation of the official communication remitted to me by the English vice-consul 英國副領事交給我的正式照會之譯文

陸、English consulate 英國領事館

打狗 Takau, 8 September 1886

Dear Sir: The consul of Your Majesty wishes me to inform you that Tao-tai has requested him in the Consulate's office, that all the missionaries who travel the countryside shall give a previous announcement to the authorities on the places they want to visit, so these same authorities may provide complete protection for the missionaries.	您好： 領事陛下希望我通知你一聲，道台在領事辦公室中要求他，所有的傳教士下鄉旅行，都必須事先知會要去拜訪地點的長官，這樣的話，當地長官就可以對傳教士提供完善的保護。
The consul has responded, saying he is giving instructions to the several mission groups, so when the missionaries travel in the country, they may give news of their arrival to the district officers, so as to provide them an escort and to assure the most convenient measures to keep them out of danger. I am from V..."	領事回應說，他正將這個消息傳達給宣教團。所以當傳教士下鄉旅行時，傳教士會告知當地官員他們到達的消息。如此一來當地官員就可以提供他們護衛，確保以最適當的方式，避免傳教士發生危險。我從...

M.T.R. Frater

Reverend Father Herce

Spanish mission

Ignoring the reach of the previous communication and the reasons that should have appeared so as the authorities may have taken these dispositions, on the next day I presented myself to the vice-consul, who with a high deference and attention told me that Rev. N. (superior of the English Presbyterian ministers) has caused such big measures because he went everywhere without giving any announcement; and he added that, some months ago, this same Rev. N. had crossed over to the Pescadores Islands without passport; the uncomforted authorities took him, and he was sent to Amoy in a Chinese gunboat. Finally he had the kindness to show me a copy of the official communication of Tao-tai to the Consul, and he even offered me a copy of it, so as to understand better what was it all about.	暫且先不看之前的消息，以及政府當局採取這些措施的理由，隔天我親自拜見了副領事，他以非常尊重及關心的態度告訴我，是 Rev. N. (英國長老教會院長) 引起了這樣的軒然大波，因為他到任何地方都不會事先知會當地政府。副領事提到，幾個月前，Rev. N. 在沒有護照的情況下跑到澎湖群島，當地的官員很不高興並且逮捕了他，他坐上了中國軍艇，被遣送到廈門。最後副領事還好心地給我看道台給領事的官方文件，甚至還給我一份複本，以便讓我對這些事能有更深入的了解。
On the copy he gave me, the vice-consul decided for good to suppress the name of Rev. N., that could be read on the one he showed in the consulate, and	在他給我的複本中，副領事決定隱藏所有 Rev. N. 的名字，另外也消去了直接與引發這些事件的相關消

apparently caused those communications. Also the cause of this suppression is very comprehensible. Translated with all due fidelity the copy says as follows:	息。這麼做的原因我可以理解。下面，我將誠實地翻譯這些文件：
---	-------------------------------

«Communication of Tao-tao-Chen to Consul Narren, dated on day 6 of the 8th moon of the year XII of Kwang-Sü (3 September, 1886).

Sir: I have the honor to inform you that I have received the following narrative from magistrate Tsai of Chang-Hoa.	您好： 榮幸地告訴您，我已經收到彰化蔡姓知縣的通知。
Up to the present time some places in the countryside are constantly visited by missionaries of foreign countries that travel there; and it is highly necessary that the local officers provide due protection in every occasion so as to prevent any displeasing circumstance that may occur; therefore it is also necessary that, in every case, the missionaries may let those officers know their trips, so the missionaries may enable the officers to procure security for themselves (missionaries), because if this is not done, it is completely impossible to know their comings and goings.	到目前為止，外國傳教士仍不斷地到鄉間參觀旅行。為了避免任何可能令人不快的情況發生，傳教士必須接受當地官員提供的保護。傳教士必須要讓這些官員知道他們的行程，官員才能保護傳教士的安全，因為如果不這樣做，官員很難掌握傳教士的行蹤。
A missionary... has made an excursion to this district, and has rented a house of the town without, since the beginning to the end of his stay, giving the slightest report of his arrival to the authorities; and from there he has extended his trip up to Hu-lu-Tün, also without any report. If (as it is possible) any tumult may have occurred, either by suspicion, or by alarm of the ignorants, it would have been very harsh (hard) to charge the magistrate of the District with the responsibility, under those circumstances.	一個傳教士...已在這個區域旅行，並在村裡租了房子。在他停留的期間內，到達後只簡單地向地方官員報告兩句，後來他的行程還擴及胡蘆墩，但卻沒有任何報告。假使發生了什麼突發狀況，造成無知人民的懷疑或驚慌，在這樣的情形之下，負責的轄區官員就會遭到嚴厲的指責。
Therefore with all due respect I ask you to communicate with the several foreign consuls and explain them the need for the missionaries to previously inform the authorities, when they want to	基於應有的尊重，我請你與幾位外國領事溝通，並跟他們解釋，希望未來傳教士如果要到鄉下旅行時，必須事先告知有關單位，如此一來

travel the country in the future, so these authorities may be able to protect them in the different stages of their trip, avoiding any disturbance in this way.	當地政府就能提供傳教士所需的保護，避免類似的情況發生。
I have given orders to the officers that with full swiftness they shall depart to Hu-lu-tùn, where the Reverend... has gone in this instant, so as to accompany and protect him.»	我已下令官員們要儘速起程前往葫蘆墩那牧師所到的地方…以便陪伴並保護他。

Reply of the consul(回復領事)

«Referring to the narrative written above, I ask that it may be observed, with the aim to assure a careful and complete protection to the missionaries that travel in the country. It is undoubtly a concern of the missionaries themselves to give a previous announcement to the local officers, so they can post people to accompany and protect them. In many offices where sealed passports are returned, I have called the attention on this issue ¹ , and I have requested instructions for the missionaries, so they can work according to them.	關於上面所提到的問題，我覺得非常重要。這項措施的目的，是爲了要確保傳教士在鄉下旅行時，能得到細心及完整的保護。無庸置疑地傳教士必須在旅行前向地方政府提出通知，以便有關單位派人陪伴並保護傳教士的安全。機關批准的護照已經送回，而我也要求注意這些問題。我已對傳教士們下達指令，所以他們可以憑著已核准的護照繼續工作。
I have the honour etc.»	
Until here I will rewrite this document, which was caused, as I said above, by the audacity and imprud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nisters that go over every place, at times exciting the wraths of the ignorant and superstitious crowds; and it is very clear that their procedure has engaged us all, and sometimes their miracles are hung on us.	到此，我將重新謄寫這份文件，內容就是關於上述所引發的那個事件，膽大妄爲並到處遊走的新教牧師，有時會引起無知及迷信群眾的憤怒。新教已與我們達成協議是非常清楚的，有時他們完成的工作還必須透過我們的協助。
I have written to Father Colomer and Father Arranz, who are in the north, and near the place of the complaint, so they proceed with caution and according to the order of English Consul, who is also the Spanish Vice-consul.	我已寫信給李嘉祿神父與何安慈神父，他們正身處於北部地區，就在引起民怨地方的附近。所以他們小心地繼續工作，並遵照英國領事同時也是西班牙副領事的命令。

Fr. F. Hecce

¹ Neither on this or other affair that may be furtherly recalled, the Catholic missionaries have been warned, nor this communication was originally for them: but it was convenient to let it be known to everyone.

II.

From Vicar Father to Provincial Father.

Takau, 4 April 1887

<p>Very venerable P.N.: I have in my sight the two most favourite letters written by Your Reverence, of 17 January and 1 February, by which I see you were continuing the visit to the northern provinces without any unforeseen events, thanks be to God.</p>	<p>最崇敬的神父：我已收到閣下於一月十七日與二月一日所寫的兩封來信，在信中得知你仍繼續訪問北方各省，而且沒有發生任何預料之外的事，感謝主。</p>
<p>I suppose that Your Reverence will receive this letter in Manila on the return from the canonical visit, and I wish you had carried out your visit with the most absolute healthfulness and satisfaction of Your Reverence, for the good of the Province.</p>	<p>我猜想閣下將在結束北方教會訪問後回到馬尼拉時收到這封信，期盼到時閣下已經完成圓滿的訪問行程，不負教省的託付。</p>
<p>Over here we are still in peace, Deo gratias; but the old Fr. Tunquino has gone worse in this chronic ailments, and I am afraid he may live for a short time. Fr. Pitarch continues improving.</p>	<p>在這兒我們一切都安好，感謝主。但韓若翰老神父的慢性病每下愈況，我很擔心他不久人世。畢大錫神父正努力的照顧他。</p>
<p>I have the pleasure to let know to Your Reverence the news that the mission in the north of the island has been inaugurated on the day of the glorious Patriarch Saint Joseph, under whose patronage the mission has been fixed. This is what Fr. Arranz tell from Tamshui (淡水):</p>	<p>我非常興奮地告訴閣下，在這個島嶼北部的宣教任務已在聖若瑟主保日正式開始，在在聖若瑟的帶領下宣教任務已經安排妥當。這些消息是在淡水的何安慈神父說的：</p>
<p>“Our modest house has been more frequented than the Protestant church, which nobody attends except on Sundays; meanwhile our house is daily visited by individuals from many places, and by many Protestants, even catechists. The comparison, made by the Chinese, between the conduct of the heretics and the conduct of the Catholic catechists, has produced such an excellent impression in the people who understand something about religion, that we enjoy an enviable fame, and everybody turns to us all their praises. May God want them no to reach up to this</p>	<p>「我們不算太大的房子裡已比新教教堂更常有人進來走動，除了周日外，新教教堂空無一人。我們的房子每天都有許多人從各地方來拜訪，其中還包括很多新教徒，甚至是傳道師。中國人對異教徒及天主教傳道師的行為做了一個比較，這樣的比較使對那些解宗教的人產生了莫大的影響。我們高興得到令人羨慕的名聲，而且每個人都對我們讚揚有加。願上帝幫助他們不只做</p>

<p>point only, since we really need God to do a miracle of grace to counteract the pecuniary¹ potential of these enemies of Jesus, with which, at the same time they blind many persons, they damage the true idea, and the main goal the gentiles shall assume when they take up a religion, which is conviction rather than seduction. By this method, which is very appropriate for the Chinese heart, they think our religion will follow the same way, either on the way the proselytes are admitted, or in the teaching of the catechist, paying the young students 4 pesos every month. Therefore, everybody is expecting to see who has a greatest hope in the future.</p>	<p>到這點，我們也懇求上帝降下奇蹟，幫助這些慕道者能對抗金錢的誘惑。金錢讓人迷惑方向、使他們背棄真理。當異教徒開始接受信仰時，求上帝能堅定他們的信念，幫助他們遠離誘惑。用金錢吸引老百姓加入教會，這樣的方式對中國人來說是非常適合的。老百姓認為我們的宗教將會採用跟新教相同的方式來傳教，不僅讓改變信仰者受到承認，而且傳教師每個月還給年輕的學生四個披索。因此每個人都在期待，看看我們與新教之間，到底將來誰才是最有希望能完成宣教的使命。</p>
<p>As for now, I want to display all my forces to see if several tens of real neophytes² can be found, and to build a modest house with a chapel in some place... There is a young Protestant boy that may be useful for us as a catechist.”</p>	<p>至於現在，我將盡自己最大的力量，看看是否能找到幾十個真正改變信仰的人，並找個地方建立一間適合的房子還有小教堂…這兒有一位年輕的新教徒男孩，或許能成爲一位不錯的傳道師。」</p>
<p>Up to here is what Fr. Arranz has to say, from whose narrative Your Reverence can infer the obstacles to be defeated so the kingdom of Jesus Christ may continue propagating with the due purity among these unfortunate pagans, cheated by the Protestant gold.</p>	<p>上述即爲何安慈神父所說的一切，從他的談論中，閣下可以推斷出宣教的障礙已被克服，耶穌基督的王國在將在這些不幸的異教徒中持續成長，即使新教使用黃金來欺騙老百姓。</p>
<p>All my best regards for Your Reverence, and may you not stop praying to the Lord, through the intercession of the Most Holy Virgin of the Rosary, and her glorious Spouse Saint Joseph, for this small mission and its missionaries, especially for the one who need it the most; your lowest and affectionate son S.S.Q.B.S.M.</p>	<p>向閣下致上我最高的敬意，願你不停歇地向上主禱告、對玫瑰聖母及她榮耀聖若瑟的祈求，幫助傳教士能完成這樣使命，以及那些特別需要祝福的人。你最謙卑的子民僅上。</p>

Fr. Francisco B. Herce
Order of the Preachers

1 Pecuniary: related to or connected with money.

2 Neophyte: a recent convert to a belief; a proselyte.

P.S.: Fr. Giner delivers an enclosed letter for Your Reverence.

III.

From Fr. Giner to the Provincial Father.

打狗 Takau, 2 April 1887

Beloved and venerated P.N.: Having Bishop Chinchon carried out his pastoral visit to the southern region of Formosa, I do not fear it will be relegated to the regions of forgetfulness due to the big modest of this gentleman.	最崇敬的神父：楊真崇主教完成參訪南台灣地區的行程。因著這位謙虛的紳士，我不怕這裡將被歸為不重要的地區。
May it be all for greater glory of God and of His Most Holy Mother, increase of our religion, and for the honour of the province of the Most Holy Rosary.	願上帝與聖母瑪利亞的榮光，激勵我們大發熱心，為聖玫瑰省的宣教使命不斷努力。
Without any doubt, there are missionaries that could act better than me; yet in whatever regards me, I do not want to cease carrying may grain of sand to the pile, letting Your Reverence know all what I have been acquainted to, knowing that Your Reverence wishes so. At the beginning of January, our Reverend Father Vicar a letter from the Bishop, by which he was communicating that in the next mail ship he would start his way to Formosa. Since it was not known when the steamboat arrives, the Reverend Father Vicar went to Tainan-tu some days before to receive him, and we were waiting him everyday.	無疑地，許多的傳教士都做的比我更好。然而不論如何，我是持續不斷地努力工作，讓閣下能夠知道一切我所了解的事情。在一月初，我們教區的神父接到主教來信，信上說他將會搭下班船到福爾摩沙來。因為不知道輪船何時抵達，神父幾天前就到台南府去接他。我們每天都在等候他。
It was the 12 th day of the mentioned month, and we went, as usually, to do our prayer. Ten minutes had not yet gone by when voices calling the boy where heard, and he may had walked half a dozen of steps when once again they shouted, with a greater strength. Since we did not understand, we remained still, but the two catechists started to walk away; and when we were told about the arrival of the Bishop, we went to prepare the little things that were there. The candles of the altar were enlightened, the doors of the church were opened, and surrounded by the explosion of the cannon, the thunderous noise of the fireworks, the noise of the	一月十二日，我們一如往常地禱告。還不到十分鐘，我們就聽見有人正在呼喊男孩，男孩走沒幾步，他們又再次大聲喊叫。因為我們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所以我們只好留在原地，但二位傳道師卻已自行離開。當得知主教抵達的消息時，我們便開始進行準備迎接主教的工作。點亮聖壇的蠟燭，打開教堂的大門；鞭炮聲此起彼落，煙火轟隆作響。人群的喧鬧聲，加上小鑼鈸歡欣刺耳的樂聲，餘音嫋嫋，直達

<p>crowd, and the joyful and penetrating voices of the tiny cymbals that quickly turn around, sending its echoes to the wind, as wanting to say: “this is the way the envoys of the Lord are received;” and, with a cross and wax candles preceding him, the Bishop entered the church, where he lied down and prayed for some instants.</p>	<p>霄漢，熱鬧的聲音就好像在訴說：「這是神的使者。」十字架蠟燭在前，引導主教的道路，當他一進入教堂，立刻蒲伏在地，向神祈禱。</p>
<p>Here the Bishop had some days of participation in the pities and joys of the missionary, while the Christians were striving to give him gifts; although they are poor in fortune’s goods—which are frequently lost because of the fact of being Christians—, they are rich in faith and virtues.</p>	<p>主教花了幾天的時間與當地的傳教士分享憐憫與喜悅的見證，教友也致贈給他一些禮物。雖然他們十分貧窮，無法購買昂貴商品，但他們卻充滿的信心與美德。</p>
<p>On the 23, he conferred the sacrament of Confirmation to forty of them, amongst whom were several adults; the ceremony was celebrated with the solemnity possible, and at the end a ‘Confirma’ antiphon was sung.</p>	<p>二十三日，主教為四十個人授與堅信禮，其中有幾位是成年人。慶祝儀式莊嚴而慎重，最後則唱堅信讚美詩，畫下了完美的句點。</p>
<p>During all the time Bishop Chinchon stayed here, he cared for his sheep, grazing them with the pasture of the divine word, without distinguishing himself from the simple missionary in any affair, but, if it can be said this, he carries a bigger cross; his life, as the one of any missionary, is a continuous series of heroic sacrifices, and a constant self-denial, under which, without the balm of the divine promise that makes life look like a fading shadow, man would hesitate; whereon it would be a rudeness for the missionary that, after having endured such a lot of fatigues and efforts so as to win for God and for civilization a group of men, whom until lately were wrapped in the darkness of gentleness, and after being their tutelary angel down from the cradle up to the sepulchral, in the end to find his hands empty, and the sweat of his brow to be in vain.</p>	<p>楊崇真主教花所有的時間待在這兒，照顧他的羊群。和所有的傳教士一樣，他用神的話語來餵養他們。但他卻背負更大的十字架。他的人生和其他傳教士相比，除了持續無私的奉獻外，更是不斷地超越自我。無法超越自我的人，若是沒有神的應許，生命將喪失熱情，人也會變得猶豫不決；但若是過了頭，傳教士將變得莽撞。為了贏得神的喜悅並教化人群，他們當然也忍受諸多勞苦。但回顧一生，他卻驚覺兩手空空，眉頭低下的汗水盡是惘然。</p>
<p>On the 25, he started his way to Banquin-chen, and truly I say that, if we did not have work here, the trail itself would be capable to tire even the most spirited.</p>	<p>二十五日，他起程到萬金莊。老實說，如果我們沒有在此工作，我們壓根兒不會想走這條累死的人小</p>

<p>Here there are no roads, everything is a trail for goats, one may never be careless, one has to stay in alert continuously, jumping over puddles, hopping ditches, and crossing rivers, looking where to put one's foot so as not to sink oneself up to the neck in a mudhole: it is enough to say the trail's way takes seven hours, and we spent eleven.</p>	<p>路。這裡沒有大馬路，只有羊腸小徑，走的時候必須很小心，並且不時要停下來查勘地形。不但要跳過水坑、溝渠，還要穿越河川，經過沼澤區時還要留意不要陷入泥淖之中。聽說這條路足足要走上七個小時，可是我們卻花了十一小時。</p>
<p>When we arrived to a town called Cauaqui, the villagers told us there was a sick Christian, and it does not seem anything but that God inspired the idea of beginning the trip on that day to aid that soul, and in fact it was, whereon maybe we have not yet finished our trip when he already had died (R.I.P.).</p>	<p>當我們到達一個叫 Cauaqui 的城鎮，村民告訴我們有位基督徒生病了。這件事好像沒什麼特別，但是那天上主卻感動我們去幫助這個靈魂。他終於嚥下人生最後一口氣，可是我們卻還沒到達目的地。</p>
<p>At around three o'clock in the afternoon Fr. Vicar went ahead (I was having a conversation with the Bishop); and an hour had not passed since Fr. Vicar had departed, when the conveyors of a chair begged Bishop Chinchon to sit on it; I was also invited to do so; however, because I am too young, I wanted to go riding the horse of Saint Francis. But it is known it must not be a custom in the Chinese etiquette to enter a town in this way, because they supplicated the Bishop to ask me to sit on the chair too, so I pleased them. Maybe I had sit down for half an hour, when I saw a crowd of youngsters jumping and hopping as small goats, and behind them many people with flags, musical instruments, firearms and fireworks, forming such a clatter that it seemed judgement day had arrived; this is the way we entered the town, and when we arrived to the church's yard, the crowds composed of people of every class were grouped together, so we could finally enter our house at five o'clock in the afternoon.</p>	<p>大約下午三點左右，區會長神父走在前面（當時我正與主教談話）。從區會長神父離開後不到一小時，一位轎夫請求楊崇真主教坐上轎子，我也被邀請坐轎子。因為我還年輕，所以我想要騎馬。但眾所周知，在中國騎馬進城並不符合當地習俗，所以他們請求主教要我也坐上轎子，而我也就同意了。大概過了半個小時，我看到前方一群小孩子像小羊一樣跳來跳去，而且在這群孩子後頭還有很多人拿著旗子、樂器、槍枝及煙火，如同審判日一樣，以發出巨響來歡迎我們。這是我們進城的方式。當我們到達教堂的庭院，各階層的人群都聚集在那兒。終於，下午五時，我們進到屋子裡。</p>
<p>When we were having dinner, they sang serenade to the Bishop; the instruments were: a violin whose box must have been the rind of a coconut with two strings, a kind of bagpipe, some cymbals, and another instrument, whom by its sound seemed a mortar.</p>	<p>吃晚餐時，村民對著主教唱歌，樂器包括了由椰子殼做成的二絃小提琴、風笛、一些鈸及一種聽起來像研鉢發出聲音的樂器。</p>

<p>On the 30 he confirmed in the church that may be called the cathedral of Formosa: among the 60 persons he confirmed, there should have been seven or eight adults.</p>	<p>三十日主教在被稱為福爾摩沙的大教堂中舉行堅信禮。他所施堅信禮的六十個人中，七八位是成年人。</p>
<p>On the 31 we came back to this residence, without any mishaps on our way.</p>	<p>三十一日我們回到住所，一路上都很平安。</p>
<p>On the day of the Purification a performance was improvised, with the Bishop officiating and Fr. Pitarch serving him while wearing a raincoat: Reverend Father Vicar and I sang the Mass: the ceremony itself was very simple, but for us it was the most solemn, and for the Christians a new experience, because any European music calls their attention, as it seems very silly to them; and everything that is not playing “by the dint of a canary” —as the Reverend Father Vicar calls Chinese music— is wasted time.</p>	<p>齋戒日那天，我們舉辦了場即興演出，由主教主持，畢大錫神父協助他，同時還穿上雨衣，區會長神父及我則唱彌撒。儀式簡單而莊嚴，對當地的基督教徒來說這是個全新的體驗，因為歐洲的音樂引起他們的注意，雖然說這樣的音樂對他們來說很無趣。儀式的一切並非如黃鶯叫聲般的喧鬧不休，只是在浪費時間—區會長神父論及中國音樂如是說。</p>
<p>On 3 February, everything was prepared for the trip, because on the 4, the same day of the saint of Bishop Chinchon, the steamboat departed to the capital. Effectively on the next day they woke up early, but rain fell all night long, and the little trail that was left to go and take the sampan¹ (舢板) was completely untransitable; but the Bishop, although he was half-blinded and the night was very dark, did not step back. It did not look like anything except that all the elements were being conspired against him, and even the wind was opposing him; however, as for visiting his sheep, he undertook everything with joy. Two Christians had to carry him, otherwise he would have fallen, and even by this way he spent half an hour to reach the wharf, although only 300 steps were necessary.</p>	<p>二月三日，旅程的所有準備工作都已就緒，因為四號，楊崇真神父將搭乘輪船到首府。隔天他們雖然早早起床，但雨下了一整晚，使得登上舢板船的小路無法通行。即使夜色漆黑一片，主教猶如半盲，但他並沒有退縮。</p> <p>一切的一切都像在阻止他的旅程，甚至連風也是。但為了他的羊群，他買滿懷欣喜地做每件事。二個基督徒護送他，擔心他不慎失足。雖然距離只是短短三百步，他仍花了半小時才抵達碼頭。</p>
<p>Still it was necessary to go to the steamboat, which already had blown up the third signal, and that is when the hurries occurred; they hoisted an umbrella with a handkerchief tied up at the end, and they waved it in</p>	<p>他們必須坐上輪船。此時輪船已發出第三次的信號，鳴聲急促。一行人舉起一支繫著手帕的雨傘，在空中揮舞。輪船尚未出發，他們以為</p>

1 Sampan: A flat-bottom Asian skiff usually propelled by two oars.

<p>the air: as the steamboat did not depart, they thought they were sighted and ceased to make signals, but they were given a disappointment; when the steamboat was already very close, it started its way and they were fooled; however they followed it for a while, but they had to come back. It would have been nine o'clock when the Father Vicar was telling me that they might already near Tainanfu, when the boys started shouting: the Bishop! Father Vicar did not want to believe, and took out his eyeglasses to be convinced. Effectively he came, grabbed to Fr. Pitarch, who was the one accompanying him to the north, arriving filled with mud and wet, without having clothes and shoes available for Your Excellence to change up, which on Father Vicar had to give him socks, shoes, and a monk's cassock. So I met the great virtue of this gentleman, as I did not hear even one complain, always being resigned, and as a joyful as the days before.</p>	<p>船上瞧見他們，於是停止打信號。但他們大失所望。好不容易走到輪船邊，輪船卻逕自啓航。他們被愚弄了。就這樣跟著船走了好一陣子，實在跟不上，只好決定回頭。上午九點左右，區會長神父告訴我他們應該已快到台南府，但此時卻聽來男孩們大叫：主教！區會長神父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還拿下眼鏡確認。楊崇真主教走了過來，抓著陪伴他到北方的畢大錫神父，全身溼透，滿是泥濘。主教沒有可以更換的衣服及鞋子，於是區會長神父便將他的襪子、鞋子及修道士服脫下來給主教換上。他真是位品德高尚的紳士。從以前到現在，大家總是甘之如飴，沒有人發牢騷，只是服從。</p>
<p>On the 7, which dawned beautifully, they left home by five o'clock, as the last time, and maybe they would have to wait for about an hour or more in the steamboat.</p>	<p>七日，黎明時分美不勝收，他們約五點鐘出發。大概又會像上次一樣，他們要等上一小時或更久的輪船。</p>
<p>This is what I can say to Your Reverence about the visit of the Bishop; please excuse the innumerable mistakes you will find, but the writing pen runs faster than what I should desire it to.</p>	<p>我已將所知關於主教來訪的一切告訴閣下。請原諒我不夠精確的紀錄，但我的文思泉湧，無法遏抑。</p>
<p>This place is filled with thieves, especially in the countryside, and the mandarin doesn't move, although he could not cope with them, unless he delivers a great effort, because entire towns are dedicated to pillage; from which it can be seen that they still have not forgotten the bad customs of their ancestors.</p>	<p>這個地方到處都是小偷，鄉下尤甚。因為所有的城鎮都被搶過，加上滿清的官吏不太管事。即使清廷官吏全力以赴，但他還是無法找到對策。從這點可以看到當地居的劣根性根深蒂固。</p>
<p>The bullies are now able to go down into the towns; and what the Chinese were not able to obtain through war, is obtained through gifts; by proceeding this way, they save blood, since on one occasion the bullies killed 400 men and a general; and with the expenses</p>	<p>現在惡霸能正大光明地進到城裡。在戰爭中得不到的東西，他們現在透過餽贈得到。這樣的方式可以避免血腥衝突，因為曾有一段時期，惡霸殺了四百個人及一位將軍。現</p>

that a war would cause, they weave clothes for them, give them opium and wine, so it is possible that in a short time they may become the owners of everything.	在惡霸不僅能得到經由戰爭所獲得的戰利品，老百姓還為他們織衣服，提供他們鴉片與酒。所以在短時間內，這些惡霸將佔有一切。
May God bless this mission, and may the Most Holy Virgin and Saint Joseph protect it.	願主祝福在這裡的宣教工作，也願聖母及聖約瑟親自保守這項使命。
Your lowest servant commends himself to the fervourous prayers of Your Reverence.	你最謙卑的僕人僅上。

Q.S.M.B.
Fr. Francisco B. Herce
Order of the Preachers

(前金)Chen-Kin, 9 May 1862

My venerated Father: On 25 January 1859 I departed from Manila, as Our Provincial Father ordered me, and after presenting myself to my superiors of the mission of Fogan, they agreed that Fr. Angel may accompany me to the beaches of Formosa.	我最崇敬的神父：在省會長神父的指示下，我在一八五九年一月二十五日離開了馬尼拉。在向福建的上級長官報告後，他們同意洪保律神父和我一起到台灣。
When we went over the obstacles that appeared on the way—which did not stop to multiply themselves until May, when we left Amoy on the way to the mentioned island—, God Our Lord allowed us to touch land in the port called Ta-kao on the 18 th day of the mentioned month at around four o'clock in the afternoon. As soon as we hitted the sea bottom, I went to see and spy the mode and way to take possession of it; however, without having a step on it, I had to return to the arch.	我們越過了重重險阻一直到五月，我們準備離開廈門去台灣時，仍是困難重重，五月十八日下午四點左右，我們抵達叫作打狗的港口。船一靠岸，我就立刻動身，看看該如何傳教。然而事與願違，我回到了船上。
On the 19 th we could rent a room or cane ward of about 5 steps, or 12 feet wide and 16 feet long; here, although with a very big load of work and hardship, we could have lived for at least one month; but it did not seem convenient to Fr. Angel, so we rented a small house with three rooms in a town called Saika, where we arrived, welcomed by night and darkness, on the 22 nd , at around 9 or 10 o'clock. Although our arrival was very much hidden, the 23 rd could not pass by without having people of every class discomfoting us in every way: I pretended being sick, but this could not disable the Chinese rascals to speak and spread	十九日，我們租了一間房間，約十二呎寬、十六呎長。在這裡，我們雖然肩負許多的工作及挑戰，但至少可以先住一個月。但這裡對洪保律神父來說似乎不太方便，所以我們在一個叫獅甲的村莊，租了一個有三個房間的小屋。二十二日晚上約九點或十點左右，我們終於抵達那兒，只有深夜及漆黑迎接我們。雖然我們非常

<p>thousands and thousands of lies, so as we could fall in the nets of the mandarins. The mandarin, having heard the alarming voices saying that two Europeans had entered Formosa to take over it, had continuously sent bailiffs², decrees and prohibitions, to make us leave the land we were stepping on; these acts did not show, in our opinion, a definite evil character; so then we decided to visit the mandarin on the mentioned day 31: a visit which, if it turned out good, would shut the mouth of an innumerable crowd.</p>	<p>低調，但在二十三日，所有的居民卻讓我們覺得非常不安。我假裝生病，但這卻不能讓當地的流氓不再捏造並散佈各種謠言，好讓清吏來抓我們。清吏聽到傳言說，有二個歐洲人跑來台灣，而且還要佔領這裡。於是就不斷地派遣捕役來發佈命令，要我們離開這裡。在我們看來，這些舉動的本意不壞，所以我們決定三十一日去見清吏。如果跟他們會面能讓情勢好轉，群眾就會閉嘴。</p>
<p>Therefore we woke up early on the 31; but the mandarins had woken up earlier, since on the way by seven or eight o'clock in the morning, we were caught by a company of soldiers that were sent directly to take us and our luggage to the capital of the province called Pitao. “Stop!! Stop!!”, and I observed my bunk had stopped. I leaned toward one of the windows, and saw the crowd of soldiers with their armed officer; from my chair I stood up and walked a bit towards him to greet him; when I saw him made a thin and gaunt due to the opium, with a little moustache of three hairs and at the same time a bit shy, I returned very disappointingly to my chair, sat down and “let’s go on!”, whose voice, repeated by Fr. Angel who was coming from behind, made our carriers obey swiftly, leaving our companions fixed as they were, without knowing what to do and exclaiming “we have lost our prey!”, this is, our miserable luggage, which was the <i>tu autem</i>³ of the mandarins and soldiers. However they decided to go to our rented house; the officer assigned a soldier to keep watch on our track and to be our conductor and jailer, depending on our circumstances before the mandarin.</p>	<p>三十一日，我們很早起床，但清吏起得更早。上午七、八點左右，在前往衙門的路上，我們被一群士兵抓住，並直接把我們及我們的行李帶到叫埤頭的縣城。「停下來！停下來！」，轎子停了。我的身子前傾，靠在窗邊，看到一群士兵和他們的武裝長官。我從椅子上站起來，並走向軍官。因為吸食鴉片，所以他看起來既枯瘦又憔悴，還留著稀鬆的八字鬍，對我則有點提防。我很失望地坐回轎內，「繼續走！」命令從我後面洪神父的旁邊發出，轎夫立刻執行。不知到發生什麼事，只聽到他們大叫「獵物沒啦！」指的是我們的行李，官吏及士兵都很清楚這一點。但是他們還是決定到我們租的房子瞧一瞧。長官派了一個士兵調查我們的行蹤，同時也身兼我們的管理者，監視我們的一舉一動。</p>
<p>When the soldiers arrived to our house, they did not dare to do anything, since if we came out bad from our visit—as it was an easy assumption they could infer—the mandarin would demand</p>	<p>當士兵們抵達我們租的房子時，他們什麼也不敢做。因為如果我們在訪台的過程發生</p>

2 bailiff: a law officer whose job is to take the possessions and property of people who cannot pay their debts.

3 tu autem: Latin phrase; literally it means “you too”.

our entire luggage. If we came out good, they were risking their heads for a trifle. However, it can be inferred that the first motif refrained them more than what the second did, since it is quite known that the Chinese do not care even about their lives, daring to exchange their lives so as to obtain more banalities.

什麼問題一對他們而言這是個簡單的推斷——，清吏會沒收我們所有的行李。要是我們沒什麼問題而他們擅自亂來，他們可是拿自己的人頭開玩笑。我猜想他們腦袋裡想的都是前面的狀況，因為很明顯地，中國人不太在乎自己的性命，他們敢用性命換取更多報酬。

We arrived to the tribunal by nine or nine thirty in the morning, a time when adults and kids, kids and adults were alarmed; voices, bells ringing, drumbeats, running people; anything that can frighten a prisoner. They made us wait for more than one and a half hours, maybe two; it was time spent by the mandarins to do some ascertainment⁴ and embellish⁵ themselves to inspire fear on us. During this interim, in which our state of affairs was presenting us a bad omen, the people of the capital were moved to see, admire, and curse two friars. When the mandarins were very embellished and dressed with a great uniform, the voices of two introducers or mace⁶-bearers were heard, which were ordering us to follow them; they led us to a big hall, and they made us pass between two lines of soldiers until we arrived to the stairs of three elevated seats where one civil and two military mandarins were sitting with majesty; their appearance was imposing; the circumstances, difficult; and the place, terrible; however, although we had not agreed beforehand, we did not draw back; we closed near the throne and we started our greeting with an inclination—deep, but not very deep—of our heads. The mandarins—as they observed our unthinkable and calm movement—thought we were going to kneel down to adore them as gods, but they were wrong. Then they separated us, ordering me to move to the left side, and Fr. Angel to the right, where the civil mandarin was. This was the mandarin who started the interrogatory, in such a haughty manner that we immediately saw he wanted to send us astray; he said with a demanding and cutting voice: Where are you from? We are, Fr. Angel answered, good men, men

大約在早上九點或九點半時，我們抵達法庭。百姓不論老少，都顯得侷促不安。鐘鼓齊鳴，眾人紛走。這樣的排場是爲了讓犯人心生恐懼。我們就這樣等了一兩個小時，清吏則利用這段時間調查我們，好讓我們害怕。這段時間內，我們覺得身處的情況不太樂觀。城裡的人都跑來看我們，他們既好奇又害怕。清吏終於穿上制服，二位引路人喊著，命令我們跟著他們。他們領我們到大廳，要我們穿過兩排士兵中間，一直走到上面有三個座位的台階前，其中坐著縣令與二位軍官，表情肅穆。情況不太妙，四周散發出恐怖的氣氛。雖然沒有獲得許可，但我們無畏地走向前去，輕輕地向清吏點了個頭。當官吏看到我們出乎意料之外的舉動時，他們以爲我們會屈膝向他們致敬，但他們錯了。之後清吏把我倆分開，要我站在左邊，洪神父則站在右側，也就是縣令坐的那邊。

4 to ascertain: to find out the true or correct information about something.

5 to embellish: to make something more beautiful by adding decorations to it.

6 mace: a decorative stick, carried as a sign of authority by an official.

of good customs. I am not asking this, but where are you from. We come from China. From what place? My companion, Fr. Angel said, comes from Focheu; I am from Amoy. I am also not asking where do you come from but where are you from? When he repeated this question, the mandarin got angry. The questions continued to lose their initial and simulated moderation and were acquiring a roughness that the translator increased so much that the questions resembled curses rather than anything else. On the left side I, which was persevering in my silence, could not stand the haughtiness used by the mandarin and his translator to deal with Fr. Angel; so I decided to speak out; but in what language, since I don't know even one Chinese word? So I spoke a bit harsh Spanish and as someone who is right, since those false men were like lions if they were feared, and like lambs if they were addressed strongly. My words —it is clear nobody was able to understand— produced the effect I had foreseen; on the hearing of them, the hall fell mute; the haughty mandarin, shocked and suspended without knowing what to do, ordered me to move to the right wing, next to Fr. Angel, and he asked me if I was a Christian, and if I stepped the Cross, and I don't know what, since in that confusion —and without understanding what I was told but through Fr. Angel, who at the same time had to rely on the translator to understand Mandarin—, it wasn't easy to know what was being said, but from what was being done. What I first did was to confess the faith, as it is obvious; but when I saw that our state of affairs was going from bad to worse —even more when I saw that haughty mandarin addressing the meekness of Fr. Angel, who told me we were astrayed, and that it was necessary to be taken as prisoners to the capital of the island—, I could not do anything but to rouse myself and protest loudly against what was being done and said. This protest was accompanied by the presentation of my hands to the three mandarins, so they might tie them together, if they wanted to see our sentence being executed; on the contrary I would not —I said— go to Taiyanfu. I brought out this kind of threat for what has been written before, and also because we were on a visit and we were treated as guests, as they said. The sight of this action and the dissipation of the smoke in those haughty heads was one same event. The

清吏開始問話，態度傲慢，立即就能看出他想趕我們走。他用苛薄又帶點尖銳的聲音說：「你們從哪來？」

洪神父回答：「我們是好人。」

「我不是問你這個，而是問你們是從哪來的？」

「我們從中國來的。」

「從哪個地方？」

洪神父說：「從福州」

「我從廈門。」

「我不是要問你們從哪裡來，而是問來自何方？」

他重覆詢問這問題，顯得不太高興。這個問題讓他們卸下沉穩的偽裝，變得很粗暴。翻譯員越說越多，似乎都在罵人。在左邊一直保持沈默的我，再也無法忍受清吏及翻譯員對洪神父傲慢的態度，所以我決定開口。但用什麼語言說呢？因為我連一個中文字也不認得。所以我決定義正嚴詞地用西班牙文，大聲說出我的想法。我猜想，這群可惡的人會因為心虛而強詞奪理，但若是碰到突發狀況，則會手足無措。正如我想的一樣，沒人知道我在說什麼。當我在說話時，大廳一片死寂。官吏震驚不已，不知該如何是好，所以只好叫我移到右邊，站在洪神父身旁。他問我是不是基督徒，是否信基督教。我不知道他在說什麼。因為溝通有問題—除非透過洪神父翻譯雙方的對話—，了解對方說的話已誠屬不易，更遑論知道對方下一步要做什麼。我首先表明自己的信仰，但後來一見苗頭不對—甚至看到傲慢的官吏對溫和的洪神父無理地說話。洪神父告訴我說因為我們在台灣迷路，所以我們將成為這島上首府的階下囚—，除了激動地大聲抗議他們所言所為外，我還能做些什麼？我用手勢向三位官吏抗議，假使他們要執行這樣的判決，他們可以把我的手綁起來。我說，我才不會去台

mandarins stood up, admired, saying: How can this be!!! Guests tied up and sent to the capital!!! No, not in any way. So I whispered to Fr. Angel: “Cheer up... they already fear us.” Effectively this stratagem was the one that saved us; although our luggage was embargoed, we were imprisoned and sentenced to start our way to the capital by the next day at eight o’clock, it was with a lot of reticence and with such dread and fear that they spent all that day together discussing our case.

南府哩。說這樣的話，是因為我們將成為囚犯。再者，如同他們所說，我們是正在進行訪問的客人。這些事情讓他們的腦袋逐漸清醒過來。官吏站起來，驚訝地說道：「怎麼會這樣？把客人綁起來並送到首府！不，不會的。」我小聲地對洪神父說：「別擔心... 他們怕我們。」這個策略救了我們。雖然我們的行李被沒收，而且我們被監禁，並宣布隔天八點要移送首府，但他們還是花了好一段時間討論我們的案子。會議一片沈寂，感他們覺起來既擔心又害怕。

As this bothering session was for us over—it lasted more than an hour—, we were left in the hands of the bailiffs, who did not dare to ask anything but about our nation; in other words, they asked whatever thing useful to get out of the labyrinth their pride had sent them in. We were not in our best dispositions to answer, since our tripes were demanding work; therefore we asked the mandarins permission to go out and eat with the strict obligation of returning after our necessity was satisfied. The mandarins granted permission to Fr. Angel to eat outside, escorted by a company of soldiers, bringing the embargoed luggage to the tribunal. So I had to resign to stay in jail and to fast; that was they way it was arranged by the mandarins’ order; but this rigor lasted just a while, since in the afternoon our judges came—however, dressed as civilians—to visit and console us in our tight abode. “Please take them,” said the political mandarin, as the military mandarin offered us some gifts. Sly men! How such a sudden change be explained? Have they revoked our sentence, or had they decided to save us? None of this: they clearly had in their minds the bad step they took; and to get out of it they chose a simple means, as well as a sure one. “These foreigners are Europeans”, they said; “so let’s invite the European that sell opium in Takao to join a diplomatic banquet, and during it we will be able to obtain without any risk whatever news that may help us decide to get rid or not of these two prisoners who are in our hands.” The banquet was held on the next day, and very early in the morning I got to know that the opium salesman was passing

大約一個多小時後，這煩人的會議終於結束，我們從詢問我們國籍的捕役那兒離開。換句話說，他們之所以東問西問，只是想為自己找個台階下。因為肚子很餓，我們沒有好好回答他們的問題。我們請求官吏准許我們外出吃飯，並保證吃完後就立即回來。官吏允許洪神父到外面吃東西，但派了一隊的士兵，把沒收的行李帶到法庭。於是我得留在牢裡但卻不讓我吃東西。官吏命令他們這樣對我。但這酷刑不長，因為下午縣官一穿得和老百姓沒兩樣一來牢裡探視並慰問我們。「請帶他們走」衙門捕頭說。軍方長官還給我們一些禮品。狡猾的人！突然這麼大的改變要怎麼解釋？他們已經撤回對我們的宣判？還是他們決定保護我們？沒這回事。他們已經決定採取惡劣的手段。他們選擇的方法很簡單，而且有一項很確定。「這些外國人都是歐洲人」他們說，「所以邀請在打狗賣鴉片的歐洲人來參加外交宴會，如此，我們能在沒有風險之下獲得任何消息。這能幫我們決定如何處理在這二

<p>through the streets of Pitao, armed up to his teeth and on his way to the banquet hall. Immediately I got out my diary, tore a sheet, and wrote with a pencil the following words: “We, the two missionaries, are imprisoned.”</p>	<p>個囚犯。」宴會在隔天舉行，一早我就得知鴉片商正要經過埤頭的街道，□□及在通往宴會大廳的路。很快地我拿出日記本，撕一頁下，用鉛筆寫下以下的字：「我們，二個傳教士，被囚禁了。」</p>
---	---

<p>Having heard this news the European sat carefully in his seat, and on the first question he was asked about the two foreigners that had arrived to Formosa from an unknown place, he answered in the most favourable way for us, as they said. The mandarins were requesting a bail, and he took out... a revolver, “because I am going to give you —and very willingly— a pair of bullets, so there will be no need for anything else,” he said. As the mandarins heard the compliments and the favourable words he had spoken about us, everything became courtesies, excuses, feigned joys, and whatever a friend can do for another friend. It is impossible to say all the humiliations those coward Chinese men did in that moment. If or anybody else would have said on the preceding day: tomorrow at ten o’clock you will receive me with a European greeting, you will give me your fan so I can use it, you will sit next to me as my servants, you will give me presents, etc., would you had, I don’t say believed but, accepted it as a truth? Well, they even did more; and everything was caused by a miserable sword and a pair of loaded guns the tradesman had brought along.</p>	<p>聽到這消息後，歐洲正襟危坐地坐在他的位置上，接下來第一個被問的問題，是關於二個從不知名的地方來到福爾摩莎的外國人。當他們在討論的時候，他以極度肯定我們的方式回答。官吏要求把保釋金，他則拿出…一把左輪手槍，「因為我將給你一樂意之至——一對子彈，所以其它的都不需要，」他說。當官吏聽到對於我們恭維及贊賞的話時，他們變得很有禮貌，諒解我們，並且假裝高興，就像任何人都會為他朋友所做的事。當時，這些中國人所做的一切羞辱的事是不可能說出口的。是否，或者任何其它人早些天會說：「明天十點，我會用歐洲的方式問候你；你將給我你的扇子，我可以用它搧風乘涼；你將坐在我的旁邊，如同我的僕人一般；你將送禮物給我。以及…」我一點也不相信，但是你能接受，這就是事實嗎？他們甚至做更多。每件事都只因商人帶著一把駭人的劍，及一把裝有火藥的槍。</p>
--	---

<p>When the mandarins’ humiliations towards us were over and the promises they had to do were accepted, although feignly, we headed towards the opium salesman’s ship, the one that had freed us, since my companion, who was really very sick due to the bad manners we suffered the previous day, had decided to</p>	<p>雖然不是出於真心，但當官吏結束對我們的羞辱，並接受他們應允的承諾後，我們前往那曾解救我們的鴉片商人的船。因為我的同伴先前遭到虐待而生重病，所以他決定返回廈門。1859年5月31日中午左</p>
--	---

<p>return to Emuy. On 31 May 1859, more or less by noon, we were walking up the stairs of the opium brigantine, and on 7 July Fr. Ángel was departing to Emuy, leaving me absolutely alone in Formosa.</p>	<p>右，我們上了鴉片商的船。6月7日洪神父抵達廈門，而我則獨自留在台灣。</p>
<p>Consequently I started to work again, searching for somebody to rent a house or hut or anything, which was a business filled with difficulties, since everybody feared —with a fair reason— the secret rage of the mandarins. However, on 9 July, well late into the night, I was told we could rest in two small bedrooms that were rented to some thieves; I believed it, and consequently I determined myself to take the first step, certainly risky but necessary; absolutely necessary if I wanted to start the mission. In this way I arrived to my bedroom, where I found two men seated, with a terrifying appearance, and with the gesture of not wanting to move from the place they were occupying. Where are, I said, the two rented rooms? They are these two, they answered. Well how is it that everywhere is filled with other people's belongings, since it should be clean so I could rest at least tonight?</p>	<p>結果我開始重新來過，向人租簡陋的小屋，其中充滿重重困難因為每個人都害怕官吏莫名的憤怒—這才是真正的�原因。7月9日深夜，我被告知我們可以在一個租給小偷、有二間小房間的地方落腳；我相信這個消息，於是我決定讓自己跨出第一步。這當然很危險，但是非得如此。假使我想開始宣教的任務，這絕對是有必要的。就這樣我到了我的房間，有兩個面目猙獰的男人坐在那兒，而且露出一副不願意離開他們佔有地方的態度。我說：「我租的二間房在哪？」他們回答：「就這兩間。」為什麼到處都是別人的東西，這裡不是應該是乾淨的，至少讓我今晚能休息嗎？</p>
<p>These two, who are the owners, don't want to take them out, nor they want to sleep anywhere else. This is impossible, since one can hardly close an eye on this humid and miserable ground. Is it true, I asked the two thieves, that you want to sleep with me? It is. So I went out and left them. Since it was late at night, and ships were so distant that I could not return, I headed towards the beach to rest a bit on the sand, where a fisherman found me and, having taken pity of my situation, talked to me about a cottage where I could sleep calmly without the dangers of sicknesses related to spending the night outdoors. I obeyed my benefactor, but I spent one of the most terrible nights in my life.</p>	<p>這兩個人其實就是房東，他們不想把東西清走，也不想到其它地方睡覺。真是令人難以想像，因為沒有人可以在這潮濕及髒亂的地方闔眼。這是真的，我問這二個賊：「你們想要跟我睡嗎？」「是。」所以我掉頭就走，離開他們。黑夜已深，而且船也離得很遠，我無法回頭，所以我往海邊走去，在沙灘上小憩片刻。一位漁夫發現了我，他很同情我的遭遇，於是告訴我有個小農舍，不需擔心可能在戶外過夜著涼，我可以安靜地休息。我聽了恩人的話，但這仍是我這輩子最糟的一夜。</p>
<p>On the next morning, seeing myself without a house and in the middle of danger (not due to money, since I</p>	<p>隔天早上，我想自己仍居無定所，而且身處危險之中（不是因為</p>

<p>was carrying only what is necessary to live: a frying pan, some chopsticks, and two or three stewpans; what I was fearing was the danger of falling in the hands of soldiers or robbers), I ordered to rent an uninhabited house for any price, whereon little by little our state of affairs would be fixed up with the favour of God. Without any doubt of it, this good Lord disposed everything with smoothness.</p>	<p>錢，因為我只帶生活用品：一個平底鍋、一些筷子及二三個燉鍋。我怕的危險是落入士兵或強盜的手裡)，我決定不惜代價，租一間無人居住的房子。在那房子中，因著上帝的恩惠，我們的處境將會慢慢改善。無疑地，上帝會平順地安排每件事。</p>
<p>In the circumstances I was on 10 July in the morning, if I had not found a robbers' leader that had less fear for a mandarin than love for the six pesos he was requesting monthly for his uninhabited and extremely bad house, probably the mission of Formosa would be 'in statu quo', and without even its first step taken.</p>	<p>7月10日早上，如果我沒有被那個不怕官吏，但非常在乎每月付他六披索租金的強盜頭子發現的話（房子雖說無人居住，但狀況很糟），或許在福爾摩沙宣教的任務仍毫無進展，甚至連第一步都踏不出去。</p>
<p>On the mentioned 10 July at four in the afternoon, I was already giving thanks to God for my new lodging, free at least of many worries and tasks, if not from every one of them. It is certain that nothing could be found in the house but walls gnawed by termites, but this could not impede the practise of two necessary functions: eating and sleeping; and although for the latter one there was no bed nor anything that could replace it, the sleep was sweeter and calmer than that of the greatest men in the world.</p>	<p>在7月10日下午四點，我感謝神賜給我新的住所。如果沒有別人的干擾，至少可以避免很多不必要的擔心及問題。房子內除了被白蟻蛀蝕的牆，空無一物，但這並不影響基本的生活機能：吃和睡。雖然晚來的人沒有床或其它東西，但他可以比世上任何偉大的人更香甜、安穩地入睡。</p>
<p>In this way I spent one month in this mentioned house, keeping myself quiet, suffering and observing, and at the end of this month I told the robbers' leader and my landlord to reduce the rent, since I had to go out, and it was unfair to pay six pesos for a block I was not going to occupy. He reduced the rent by two pesos if I had inhabited the house, and in three pesos if I had not.</p>	<p>就這樣我在這房子過了一個月，讓我自己安靜、體驗及觀察一切。月底時我告訴強盜頭子，希望他能降低租金，因為我時常在外，要我不在這裡還得付六披索是不公平的。若是我在時租金減少兩塊，如果我不在時則是三塊。</p>
<p>When the contract was agreed, I could depart freely in all directions and explore the most appropriate place to fix the main house of mission; with this aim in mind, I marched to the capital of the island, called 'Taiyanfu' by the Chinese, dressed as a loader or labourer; due to the costume I was wearing I could penetrate the</p>	<p>條件談妥後，我可以自由地啓程到任何地方，並尋找更適合做為傳教任務的據點。心裡這麼打算著，所以我到這島上被稱為「台南府」的首府，打扮成一個工人。這麼穿可以方便我進入人多的城市，而不必</p>

<p>populous city without an inquiry of any person.</p>	<p>受到質問。</p>
<p>I entered through the South gate; I walked along the West gate to see the sea and the bay; and without daring even to eat—in spite of how hungry I was—I went out through the East gate in search of the inhabitants called ‘pepo lang’, that, though they are locals, have a Chinese physical appearance. When I had left it might have been twelve in the morning, and by five in the afternoon I was exhausted, not due to walking but due to running, and I was starting to get anxious to find what I was looking for. I was already going back all the way I had walked, when I met a youngster dressed as a Chinese. Are there, in this town, local people from Formosa? Yes, sir; follow me if you want to see them. I followed him, though with a fearsome pace, since the sun, with the lack of daylight, was beginning to hide, and a bad break was to be expected, if night fell without a coat. In this way I arrived to a big Chinese yard, with superstitious objects that had the same Chinese style. You are in the house of the Prime of the locals, my guide said. Really? Yes, sir. Well, let’s rest, I said: Hot water to wash my face, the same for the feet, etc. By the end, I was commanding as if I were in my house, as if I were in one of the cells of the convent. What a joy, what a satisfaction to be amongst those people!! The fatigue and restless ness of the way seemed nothing to me in that moment. At once five or six very ugly women came to serve me, asking me: where are you from? =I am from Chen-kin, I said. =You must be very tired after the trip. A bit. Who are you? Here was a question that could get me into trouble. And are you locals? I said to avoid it. Yes, sir, they answered me. So there is nothing to fear. I thought they would be distrustful to admit a foreigner, but I was wrong, since they answered with a noisy laughter: who are we supposed to fear? It could be, I said, the Mandarin. ::::</p>	<p>我從南門進入。沿著西門走，我看到海及海灣。不論我有多餓，我不敢吃東西。我從東門走出來，尋找一位叫平埔人的居民。藉由當地人的幫忙，我才有辦法更像中國人。當我離開大灣時，大概已經是中午十二點。下午五點我累壞了，不是因為走路，而是因為我在跑步，我開始焦慮地尋找平埔人。當我遇到一個穿得像中國人的小孩之前，其實我已經打算再走一趟先前我所走過的路。「這城鎮裡的人是來自福爾摩沙嗎？」「是的，先生。如果你要看到他們的話，請跟我來。」我跟著他，竊生生地走著。太陽西沈，天光暗了下來，如果晚上溫度驟降而沒有外套，我想大概無法好好休息。我來到一個中式風格的大庭院。「你在居民做早課的房子裡」，我的嚮導說。「是嗎？」「是的，先生。休息吧。」我說：「我要熱水洗臉及洗腳。」後來，我像在我家一樣地指揮，好像我在修道院中。成為這些人的一員是多麼愉快及滿足的啊！當下，疲備及煩燥似乎消失無蹤。五六個醜陋的女人來服侍我，問我說：「你從哪來的？」「我來自前金。」我說。「經過長途旅程你一定很累了吧。」有一點。你們是誰？」這一個問題或許會讓我惹上麻煩。「你們是當地人嗎？」於是我婉轉地說。「是的，先生。」他們回答我。「所以沒有什麼好怕的。」我認為他們不會向一個外國人述說一切，但我錯了，因為他們帶著笑鬧聲回答：「我們</p>

By chance, they said, the owner of the house in which you are is the Mandarin. “Oh my God!” I thought scarily. “I am dead!”⁷ However no gesture from my part was noticed, and I responded with serenity: so we are all O.K. And, where is this mentioned Mandarin right now? In Tayuanfu. Why did he go there? To do the usual visit to the high Chinese officials. When will he come back? Today, tomorrow, or the day after tomorrow, as the latest. And does this mandarin have a good character? It cannot be better. Is he Chinese? No; he is a local of the island, as us. On the hearing of these words I began to breath, and told them: Well, I am decided to wait for him and meet him; but these Chinese objects, that are on the altar, are whose? They are the Mandarin’s, since, as a Mandarin, he needs to have a visitors’ hall decorated with these objects. I want to rest in other room, if there is another one available. Yes, sir; I will show you one. So I was taken, of course, to a bad bedroom, compared to the ones we are used to inhabit in the convent, but a very good one compared to all of those I had inhabited up to that point. During that night, I rested greatly, and ate and drank at the expense of the poor locals.

應該要怕誰嗎？」「可能喔。」我說，「清官啊。」令我訝異地，他們說：「你住的房子主人就是官吏。」「哇，我的天啊！」我的心裡害怕極了。「我死定了！」但是他們沒有發現我的反應，我鎮靜地說道：「所以我們都不會有事。那你們說的那位官吏現在在哪？」「在台南府。」「他為什麼要去那兒？」「他必須定期地拜訪長官。」「他什麼時候回來？」「今天、明天或後天，反正就是最近。」「那這位官吏品格好嗎？」「不能再好了。」「他是中國人嗎？」「不，他是島上的當地人，像我們一樣。」聽到此，我喘了口氣並告訴他們：「那麼，我決定等他，並且拜訪他。但這些放在神壇上的中式物品是誰的？」「這些是官吏的。因為做為一個官員，他必需要有一個用這些物品作裝飾的大廳來接見訪客。」「如果有其它屋子的話，我想在別間休息。」「是的，先生，我將帶你到另一間。」想當然爾，我被帶到另一個無法與此相比的房間，但還是比到這兒之前住的地方好很多。那晚，我獲得充分的休息，並在貧困的當地人招待下吃喝。

On the next day those good people were surrounding me, talking to me and asking thousands of questions. I did not miss any chance: I made good use of everything and tried to get the most of it, and kept asking them how they obtained those Chinese idols and superstitions. And some of them told me they had them because, if they didn’t, the Chinese would

隔天那些好人簇擁著我，跟我說話，並問我上千個問題。我沒有錯過任何機會。我試著獲得最多的機會，善加利用之，並持續問他們為何會認同中國的偶像及迷信。其中有些人告訴我，他們之所以相信，是因為如果他們不這樣做的話，中

7 “I am dead!”: what the author wants to express has the same meaning as the Chinese phrase “我一定死了”.

<p>mistreat them, but their heart was very distant of those objects. Some others were saying that, by then, they were beginning to give up voluntarily, but there was also somebody that had resisted for a span of ten years; however they had not accepted the wooden tablet⁸ —which for the Chinese is the <i>non plus ultra</i>⁹—.</p>	<p>國人會虐待他們。但他們心中是背離這些物品的。有的人說，之後他們會自動放棄，但早有人已反抗達十年之久。他們並未接受這木彫偶像。對中國人來說，偶像是最重要的。</p>
<p>I also asked them about the horn of a deer that was on a wall, 1,25meters¹⁰ above the pavement, and which was one of the main objects of their veneration. But I was very sparing, and it can be said that I conformed myself with telling them that their parents had been Christians —as I was telling them and I had already said—, and that those tiny palm leaves, that were covering and decorating the horn, were other traces that their parents had adored a Cross; however they had changed them into those small palm leaves with the course of time, though without knowing or noticing.</p>	<p>我也問他們關於掛在牆上的鹿角，高於路面 1.25 公尺，這也是他們崇敬的主要物品之一。但我對這點相當保留，我告訴他們，他們的親人曾是基督徒—正當告訴他們，如同我已說過的一，這些由鹿角所覆蓋及裝飾的小棕櫚樹葉，有他們親人過去崇拜十字架的痕跡。但他們以小棕櫚樹葉代替原來的痕跡，沒有人知道，也沒人注意到。</p>
<p>About their traditions, they told me they descended from very robust and tall men. “Do you have any of their monuments?” I asked them. “Yes sir.” They took me to an antique ark and I saw, with great admiration: a European glove in a good condition; writings of idiomatic characters; an embroidered tapestry similar to the one used by the Filipino Indians, with which they covered their body to let me see the way in which they dress it.</p>	<p>關於他們的傳統，他們告訴我他們源於健壯高大的人種。「你們有任何關於他們的紀念物嗎？」我問他們。「是的，先生。」他們帶我到一個古代的方舟旁，我看了非常吃驚：一個保存得很好的歐式手套；慣用的書寫特性；刺繡與菲律賓印地安風格非常相似，他們對我示範如何穿戴它。</p>
<p>I could observe that the language, which was still preserved only by the elders, had derived from the Malays, as our Tagalogs (Filipinos), according to the certain grammar voices and sentences I copied and sent so they may be collated.</p>	<p>我認得出這只有老人還保有的語言，是屬於馬來語系，就像我們的塔加拉族人(菲律賓人)，從我抄寫及傳達的文法及句子表達可以和他們相對照。</p>
<p>When the visit had concluded with a satisfactory</p>	<p>當這拜訪畫下完美的句點，我沿著</p>

8 Tablet: the Spanish word is ‘tablilla’. Tablet is a flat piece of stone that has words written on it, especially one that has been fixed to a wall in memory of an important person or event.

9 ‘Non plus ultra’: Latin expression that means ‘nothing else is better’. Something or somebody may be the ‘non plus ultra’, if they are the best.

10 1,25meters: the text says ‘una vara y media’. A ‘vara’ is a measure, equivalent to 33 inches or 83,82centimeters. So 1,5varas are 1,25meters.

<p>ending, I returned joyfully and happily, through the same way, to my rented hut, hoping in God that, with the course of time, we would not spoil such a ripen grain. The day has not yet dawned, since three missionaries can hardly attend such a vast field, given the actual circumstances.</p>	<p>相同的路，開心愉悅地回到我租的小屋，願主隨著時間的流動，讓我們不會糟蹋穀糧。我們的黎明還沒到來，因為三個傳教士很難照料這麼大的範圍。</p>
<p>On 18 July, I was arriving back to the walls of Tayuanfu, and without entering the city as in the first trip —since there was no need to do so—, going around the pit easily, I could get on my way. However I had a small task, as during the night I fell in hands of a quadrille of thieves —that only dared to consult themselves whether they would assault me or not—, but I could arrive to my poor town of Chen-Kin on the 19th.</p>	<p>7月18日，我抵達第一次來沒有進去的台南府城牆—因為當時沒必要—，我可以輕易地在城市中心四處走動。然而我碰上些小麻煩。晚上我落入一群歹徒的手裡—他們只敢自己商量是否要對我施暴—，但我在19日時到仍然回到前金那個貧窮的城鎮。</p>
<p>During this time a decree was emitted by the mandarins of Pitao —capital of this province— against me, due to the instigation of a malign tattletale. I was very unwary in my bedroom, completely ignoring the complot that had been planned to take me out of the way. Suddenly I heard voices and a great uproar near my door; I went out and found a “Chinese anthill”¹¹ with all the meaning of this phrase, carriers of the mentioned solemn decree that prohibited and threatened everyone who dared to “to sell a hand of land to the <i>barbarian</i> of the Relic of the Lord of Heaven” (these are its words). On the first move I made I snatched it from the hands of the perfidious¹² thief, assassin, and everything it may be said, who was savouring himself reading it in front of the crowded and curious multitude awaiting the end; folding it with precipitation I handed it to the mandarin’s soldiers that had brought it. They received it with a feign submission —since they remembered the time when I was in prison, when the mandarin did not dare to do anything because of fear to the sword of the English</p>	<p>這時埤頭（這省的首都）官吏，因為一個造謠者者的煽動，頒布了一道命令來反對我。我毫無防備地在我的房間，完全不知道他們將把我抓去。突然門外傳來聲音及騷動。我走出去，發現有一堆中國人，傳達嚴正的命令，禁止並恐嚇每個人，「誰敢將神明之物賣野蠻人」我首先搶走那賊手中東西，那賊在人群前看這命令，並好奇最後會怎樣；我衝上前去搶下官吏士兵帶來的命令。他們假裝歸順的接受—因為他們記得我被關時，清吏怕英國商人的武力而不敢對我做什麼事—但他們離開到另一個集會點，那裡長者聚集。情況有點棘手，對我及傳教團來說有點痛苦，我出現在集會中—讓他們看到我，我猜他們會詛咒我到滿意為止—用中國禮數來迎接我，其實帶有很多虛偽的成分。「命令在那</p>

11 ‘Chinese anthill’: the Spanish phrase is ‘un hormiguero de chinos’, which means ‘a countless crowd of Chinese’.

12 Perfidious:

<p>businessman— but they left to another meeting point where the town’s elders where. Since the case was a bit delicate and could have bitter consequences for me and the mission, I presented myself in the middle of the assembly, which —on seeing me and, as I suppose, after having cursed me up until satiety— greeted me courteously in the Chinese mode, but with a lot of feigning. “Where is the decree?” I asked. “Here.” I took it and folded it for the second time and I inserted it in my purse. “May somebody bring a paintbrush, paper, and ink.” Girding myself of courage, which was very necessary in that juncture, I addressed the soldiers, who seemed very disheartened and —in my opinion— did not want to know me: “What is the name of the mandarin that has written the decree?” “John Smith.” I wrote it down, feigning some mystery. “And what are your names?” “Tom, Dick.”¹³ “Good; tomorrow I will present myself to the tribunal of the province. I will take a leave. Good-bye.” I stood up and left, having turned down all their plans and dissolved the meeting.</p>	<p>裡？」我問。「在這兒」我拿了它然後把它摺起來放進我的包包裡。</p> <p>「拿些筆、紙及墨上來」在這樣的狀況下，我鼓起勇氣，對沮喪的士兵—在我看來—說「寫那命令的長官叫什麼名字？」「約翰史密斯」我假裝神祕地把它寫下來。「那你叫什麼名字？」「湯姆迪克」「很好，我明天將會親自到法庭，我先走了，再會。」我起身並離開，打斷了所有的計畫，並結束會議。</p>
<p>From that moment on, the entire town started to move, fearing baneful consequences if the guilty ones did not satisfy their crimes; so three of the chieftains that formed the mentioned complot came humbly to give me reparation, but —over there it would seem impossible, but here it is daily event—denying shamelessly everything that everybody already knew. They were begging me not to go to the mandarin, because everything would be cleared up; but if the decree were not to be revoked, how would it be possible? Based on the decree they would mortify me and make me move according to the profane will. Because of this, and to uproot the evil, I started my way to the tribunal on the next day, and at ten o’clock in the morning I was in. What occurred in the tribunal</p>	<p>從那時起，整個村子開始騷動，因為假使這些可惡的人若是無法稱心如意，將會遭致嚴重的後果。所以三個酋長謙遜地來此給我補償，但—在那這似乎是不可能的事，但這裡卻是家常便飯—厚臉皮地否認任何人都知道的每件事。他們求我不要去找長官，因為這樣每件事都會水落石出。但如果命令沒取消，這怎麼行呢？按照命令來看，他們以世俗的想法會羞辱我。因為上面的原因，並且必須打垮惡勢，隔天我出發去法庭，上午十點抵達。在法庭上所發生的事是被講的而不是被寫的；然而，我會說出</p>

13 The names listed don’t have any significance at all. The soldiers had told the priest their real names, but the priest —as he is writing this letter— writes some fake names, because the names of the soldiers are not important.

<p>is something to be related, not to be written; however, I will say their deer-like fear that overtook them was surprising. The mandarin, who I myself had seen before, hid so he could tell me he was out. I had to sit down and wait for him. Two men came a while later and presented themselves as the mandarin and the introducer.</p>	<p>他們害怕的事並超出他們的驚訝程度。我之前見過的官吏躲起來，所以他可以告訴我他不在那兒。我必須坐著等他。過一會兒，二個人走了過來，並介紹他們是官吏及介紹人。</p>
<p>He greeted me, and I merely corresponded his greeting, since he did not have any feature of a mandarin or any similar charge. So I asked if he was the announced mandarin, and they responded affirmatively. I did not believe it, since I knew who was the real mandarin, so I asked him directly: “Are you the mandarin?” This is a question that may make anyone hesitate, if he had any shame and were not Chinese; however he answered without any pause: “Yes, sir.” “On the last occasion I was in the tribunal, you were not here.” “Certainly, but this doesn’t change the fact that you have to say everything you have to say.” “Yes, but you are not the mandarin.” “I am not, but I am his commissioner, his interpreter.” “Well, that’s another thing; I want to talk to the mandarin himself.” “Do not hold yourself, since I am his brother.” “You are whoever you want, but I am determined not to talk about such a big affair but to the mandarin.” In a midst of darkness and mystery, I had let them glimpse that my big and important matter —although it was a fake deal— was to let them know the agreements of the emperor of China with the Europeans; therefore, my inquirer suggested anxiously: “Speak, since I am going to say everything to the mandarin.” But I did cease on my argument, since I knew it was the only way to come out triumphantly, to take away all the power of the decree —which was not discussed nor mentioned—, to calm down the inhabitants of my town, to shut up some mischievous folks, and to pacify the shy folk. So I concluded by exclaiming: “The mandarin doesn’t want to come out; I don’t want to talk about this big</p>	<p>他向我打招呼，我只是禮貌性的回應，因為他沒有任何官吏的特質或任何相似的特徵。所以我問他是否是正式的官吏，他們很肯定的回答。我不相信，因為我知道誰是真正的官吏，所以我直接問他「你是官吏嗎？！」這是會讓任何人有疑慮的問題，如果他有點羞恥心且不是中國人的話。但他毫無遲疑的回答：「是的，先生」「上次我來法庭時，你並不在」「的確，但這不會改變你必需說你該說每件事的事實」「是呀，但你不是官吏」「我不是，但我是他的長官，他的代言人」「那是另外一回事，我要跟官吏本人講」「你沒辦法掌控，因為我是他的兄弟」「你可說你是任何人，但我決定除了官吏以外，不會說這件大事」在黑暗和謎霧中，我已讓他們看到我的重大事情—雖然這是個假交易—是要讓他們知道中國皇帝對歐洲人的承諾。因此調查我的人焦急地建議：「說吧！我會告訴官吏每件事。」但我沒有停止爭論，因為我知道這是唯一可得到滿意答案的方式，取消所有沒被討論到及提及的命令的效力，我安撫我的城鎮居民，要吵鬧的民眾住嘴，讓害怕的民眾平靜下來。所以我大叫地說道：「官吏不想要出來，我不想講他非常有興趣的這件大事，所以我要回到鎮上。」他們</p>

<p>affair which interests him so much, so I will go back to my town.” When they heard this, they repeated the same previous lie: “The mandarin is not here.” Consequently I answered: “Great. Have a nice day. Bye.”</p>	<p>聽到這個消息，他們又重覆先前的謊言：「官吏不在這兒。」最後我回答：「好，祝你有個美好的一天，再見。」</p>
<p>Before I had arrived to my town, the result of the visit was already widespread, whereon many visited me with a certain joy and happiness that they were not able even to dissimulate: my joy was complete, since everything went on my way. Nobody was remembering now the decree when I was dealing the purchase of a land extension or my own pacific settling in the town, except my thievish landlord, since as he wanted to sell his portion of land—that he already had rented me—at a good price, was not very happy that all the rest of the people were talking about this theme; by this way he used the wrath of the Mandarin to scare any shy guy daring to have a deal with me. He said aloud—if the person did not mind the wrath of the Mandarin—that he fear nobody, which is very true, except for the loss of money; only one thought of it made him tremble.</p>	<p>在我抵達我的城鎮前，拜訪的結果已經被傳開了，許多來找我的人都難掩喜悅及興奮：我很高興，因為每件事都很如意。當我在買地，或擴建我在城裡的住所，沒有人記得那命令，除了我那慣竊的房東，當他想要用不錯的價錢賣他一部份的土地—已經租給我的那部份—，但不是很愉快，其它的人都在討論這議題。所以他利用官吏的憤怒來恐嚇任何敢跟我交易的人。他說—如果有人不在意官吏的憤怒—他不怕任何人，唯一讓他會害怕的就是損失錢。</p>
<p>By this time a 22-year-old boy came to me, saying he wanted to be a Christian; consequently he was instructed everything which is necessary to receive baptism; however our averse man appeared with darnel in his hands¹⁴, rising commotion in all the province of South Formosa.</p>	<p>那時，一個 22 歲的男生走向我，告訴我說他想成為基督徒。他接受受洗所該做的每件事。然而反對我們的人陷害他，讓南台灣都引起騷動。</p>
<p>It may have been 13 September, more or less, when the Chinese of my town and the ones from other five or six neighbouring towns assaulted—spear on their cuirass (chest protection)¹⁵— an unfortunate captain, whom a fierce spear cruelly crossed him through while he tried to defend his ship using his force against the</p>	<p>大約在 9 月 13 日前後，當我鎮上的中國人及附近的五六個城鎮暴動時—一個矛刺向統帥的盔甲—，統帥試著奮力抵抗要攻擊他的人，並保衛他的船。他的屍體被留在甲板上，船落到強盜的手中。</p>

14 The use of this phrase recalls a parable said by Jesus Christ, in which God gives a wheat field to the Christians, but the devil bursts in the field silently and unexpectedly sows darnel, so the harvest of God may be ruined.

15 The meaning of this phrase in the text is that these gangsters were very well prepared for the assault. The cuirass is the piece of iron in an armor of a soldier where the spear is set ready for battle.

force that was attacking him. His body was left on board and the ship in the hands of the bandits. Imbued in their stealing rage and without any compassion of the dead, they stole even the most insignificant pieces of iron, and would have taken everything, haven't the other three or four captains in the bay showed up. Although I knew something due to the rumour of the Chinese, I was not aware of the tragic death this man from Hamburg had suffered; so on the next day I went to the opium storehouse, without any fear, to get some six pesos to eat. I was going downstream in a small raft, made up of six canes and a tree trunk tied together, when I heard a rifle shot, and at its shot I saw a Chinese dive into the water; I sailed a little while more, and another rifle bullet passed near me; although it did not touch me, it produced such a shivering in my body that my knees were shaking without stop; and my legs —though I was really doing an effort, and was reprehending myself for being so coward— were trembling as a rattlesnake. I finally arrived, and did not find anybody except an American I knew. The rest of the people were firing their guns to defend the rear guard of seven or eight Europeans that had advanced orderly and well armed to a town near the sea call Yáintea, to take revenge for the Hamburg's captain and burn his body, after leaving other several dead bodies on the field. A pair of hours had not yet gone by when the fire took a horrible growth, and the worst of all was that it was impossible to extinguish, since if anyone wanted to do so he could count on the rifles lurking him to erase him from the number of living people. And to make matters unfortunately worse, among the houses that were burned was the one that had the Emperor's lime, whose burning effects were to be given importance by the villagers or inferior mandarins. Therefore the people were murmuring sadly as they were seeing their houses' smoke rising

四處充斥著掠奪的氛圍，對死者無任何憐憫。他們甚至連最無關緊要的鐵都拿走，並且拿走所有的東西，但卻沒有見到其它的三四位統帥出現。雖然我知道有些事是起因於中國人的傳言，我沒注意到這位從漢堡來的人死亡的慘劇；所以隔天我毫無懼懼的到鴉片倉庫拿了六披索買東西吃。我搭乘用六個罐子及樹幹結成的船筏來到下游。當我聽見來槍聲時，我看到一個中國人落入水中。我把船開得快些，而另一發子彈射過我身邊。雖然沒有打中我，但這也讓我身體直打顫，膝蓋也抖個不停。我的腳——雖然已經盡了全力，也自責自己的膽怯——就像響尾蛇般直發抖。我最後終於到了，除了我認識的一個美國人外，沒看到任何人。其它的人到一個叫 Yáintea(鹽埕?)靠海的城鎮，開槍來防衛七八個歐洲人的武裝後衛，為漢堡的統帥報仇並火化他的屍體，然後留下幾具屍體在那。

將近兩個小時，火勢持續蔓延，最糟的是沒有辦法熄滅，因為如果任何人想要這樣做，他就能數出來有多少來福槍在暗地裡伺機射擊他。情勢越演越烈，在被焚毀的房子中有皇帝的牌位，那對村民及下層官員的影響很大。因此當人們看到他們的房子煙霧四起時，他們傷心地抱怨。最狡滑的人——到處都有一責怪上帝的僕人。他們或許是鎮上唯一清白的人。

16 The meaning of this Latin phrase is "abundant in the world."

<p>up to the atmosphere; some the most knavish folks—who are <i>abundantes in saeculo</i>¹⁶— were blaming the master of the Religion of the God’s Lord; this is, they were probably blaming the only innocent man in town.</p>	
<p>When the time for talking my leave from the yet bloodstained Europeans, they quickly told me not to go out, since the Chinese that were humiliated and stabbed in the morning would take revenge on me in the afternoon. Since this event was probable, I asked two Chinese that were going with me—one of them is Christian, the other one is a gentile—: “Is it convenient to go home or not?” The Christian told me: “It is not convenient; in the town there is somebody that has talked and spoken terrible things about the missionary, and has decided to kill him.” “Who has talked that way?” “John Smith.” “I guess it might had been a joke or—at most—a useless talk, whereon I believe we can go on without risk.” “As you wish,” the Christian added, “though the danger is menacing.” “I don’t think it is as menacing as you are saying.” “What do you think?” I told the gentile one, and he answered “The same way as you.” “So let’s go to the raft and home,” God before everything. Good morning, I said to the English: I am going home. When I was arriving to my town, I contemplated a painful spectacle: oxen and other animals going through the creek besides their city blocks, and the town burned. What a pity! What a pain! It is necessary to see these things so as to comprehend them.</p>	<p>當我說起我要從尚未染血的歐洲人那兒離開時，他們告訴我不出去，因為中國人會因著早上被欺凌及刺殺的事，在下午對我採取報復動作。雖然這事是很可能發生的，我問和我同行的二個中國人—「現在回家方便嗎？」那基督徒告訴我「不方便，城裡面某人談到關於傳教士的事，而且已決定要殺了他。」「誰這樣說？」「約翰·史密斯」「我猜這最多是個玩笑話無意義的談話，我相信我們可以平安地走。」「希望是」基督徒補充說「但還是有威脅的危險。」「我不相信會有你說的危險」「那你認為呢？」我問一個外邦人，他回答道「跟你想的一樣。」「所以我們去搭船回家吧」上帝照看一切的事。「早安」，我用英文說：「我要回家。」當我抵達我的城鎮，我想像到一個痛苦的場面：牛群及其它動物跑到城外的溪旁，城鎮被焚毀。多慘多痛苦呀！看到這些事是必要的以便了解他們。</p>
<p>When I arrived to my bedroom I sat down, and nobody loosed his tongue even to call me “barbarian”. The Chinese were not in the mood for joking! The lime house of the Emperor was burned and this was making them cautious, since Mandarin and troops would not stop coming to take care of the events. Effectively, three or four days later a terrifying horn was heard,</p>	<p>當我回到我房間我坐下來，沒有人說話甚至叫我「野蠻人」。中國人沒有開玩笑的心情！皇帝的房子被燒了，這讓他們很謹慎，因為官吏及其軍隊將持續關注這件事。三四天後聽到可怕的號角聲響，發佈官吏及軍隊的到來。這些可怕的人</p>

<p>announcing the arrival of the Mandarin and his troops. This cruel “plague”¹⁷ extended to all the alleyways of the village, and fixed their headquarters some twenty steps away from my house, which the high officials had been notified about.</p>	<p>充斥在村莊的每個巷道，並設置他們的總部於離我房子 20 步的距離，而且高層已被知會這件事。</p>
<p>The town’s elders were shaking when they met together around me. Poor devils!! They were ignoring I was in a greater danger than anyone else! They begged and they supplicated me; they insistently asked me to free them from the iron’s yoke that was going to fall on their heads! “But how?” I told them with a surprised tone; how can a miserable foreigner free you, even if you hate him, even if you don’t want to listen to him, and feign to be his friends so as to let him go astray? They were annoying me unceasingly to make me go to the Mandarin’s presence, without mentioning the precise, terrible charges I would need to take in a judgement; they told me to advocate for them and to say that the villagers were innocent. Great innocence!! It was necessary to consent their wish and walk towards the Mandarin to tell him anything. On the way, a Christian told me: “if the visit goes on the right way, all the village will be converted.” I responded immediately: “May not even one be not converted,” simultaneously noticing the cleverness of the Chinese, and their feigned and perverse tricks, by which they only want to take advantage of everything so as to obtain only their own particular benefits.</p>	<p>當城裡的老人遇到我，他們很害怕。可憐的惡魔！他們完全不管我陷入比任何人都大的危險中！他們懇求我。他們堅持要我幫助他們解決當下的困難！「但怎麼做」我用很驚訝的聲調告訴他們，一個不幸的外國人要如何釋放你們，甚至你們還恨他及不想要聽他的話，還假裝做他的朋友讓他走向迷途？他們很煩惱，不斷地要我到官吏那而不說清楚，我得付一筆很高的審判費。他們要我幫他們辯護說他們是清白的。清白！我勢必要答應他們的請求，並到官吏那告訴他一切。在去的路上，一個基督徒跟我說：「如果這拜訪發生在對的時間，所有村民的信仰將會轉變」我馬上回答：「沒有一個人不會改變」同時地我注意到中國人的聰明，及他們的虛偽和邪惡的詭計。他們只想要在任何事上佔便宜，以得到他們覺得有利益的東西。</p>
<p>After I had arrived to the hall of the audience, the three main Mandarins of the province showed off—the same ones that recently had treated the missionaries so haughtily—and I proposed them—before taking any other step—to do an act of humiliation to the Europeans, if they wanted to solve their trouble. The act of humiliation would be to have the main Mandarin write his name, etc. as a sign of peace and friendliness, and I would take it onboard, so the</p>	<p>當我抵達大廳後，省的三位主要官員出現—就是最近對待傳教士態度很傲慢的那幾個—我向他們提議—在他們採取任何行動前—去完成一些羞辱歐洲人的法案，如果他們要解決他們的問題的話。那羞辱的法案會有主要的官吏署名，好像是個和平與友善的記號，讓歐洲人能停止抓人。但歐洲人或是說鴉</p>

17 He is referring to the Mandarin and his troops.

<p>Europeans would stop harassing and seizing people. But, the Europeans, or it would be better to say the opium salesman, did not want papers but money, and many money. So after he heard what I was telling him, he said that afterwards he was going to set another town on fire, and behead some seven or eight Mandarins he already had imprisoned in the ship.</p>	<p>片商，不要紙上的約定，他們只要錢，及很多的錢。所以當歐洲人聽了我告訴他的話，他說後來他將要在另一個城鎮開戰，並且砍下七八個清朝官吏的頭，他們早已囚禁在船上。</p>
<p>On the next day, while seeing that my visit was fruitless, I returned to my house, which I found filled with other people's dishes, food supplies, working tools, and even money, all piled up by the poor villagers, who thought —without any reasoning— they would escape the rapacity of the soldiers. I, who believed that not only my house but also I myself were in great danger, took what I had —this is, the basket where the chasuble and the chalice for the Mass— and left. However I went once again to see the Mandarin and counsel him to depart to another town, since the Europeans had loaded their cannons and were ready to open fire against whatever Chinese soldier may be in sight; at that time he believed me and invited me to accompany him to the town I had mentioned; but I don't know how this town's inhabitants received the news, and probably they handed a lot of money to paralyse the wheels of our carriage.</p>	<p>隔天，我知道握的拜會是沒用的，我回到家裡，我發現有很多其它人的盤、食物、工具甚至錢，所有東西都被貧窮的村民堆在一起。他們認為—沒有任何理由—他們可以躲避士兵的掠奪。我相信不論是我或我家都很危險，他們會拿走我所有的東西。放置用來做彌撒的服裝及酒杯的籃子不見了。我再次去見官員並和他商量請他到別的城鎮去，因為歐洲人已經裝了大砲並準備對見到的中國士兵開火；那時他相信我，並請我和他一起到我所說的城鎮；但我不知道為何居民已得知此消息，或許他們準備了一堆錢要來擋住我們乘坐的車子。</p>
<p>As this last option was frustrated, and on hearing that the state of affairs was gaining a more serious character —since two thousand soldiers arrived to fight—, I decided to leave for Emuy until the storm had stopped. The storm did not last much, since the soldiers, instead of preparing for battle, were enjoying themselves and smoking opium; in this way, instead of plundering the boat, they grabbed the money of the town and filled all the corners of the ship and the pockets of the ones who set the Emperor's house on fire. What a new way to fight: to enrich the enemy, instead of pressing and impoverishing him!</p>	<p>當最後的選擇受挫，並聽到這州的長官將變本加厲—因為有二千個士兵抵達作戰—，我決定離開到廈門去，直到風暴過去。這風暴沒有延續很久，因為士兵都享樂及抽鴉片，而不是準備作戰；如此一來，他們並沒有搶奪船，而是掠奪鎮上的錢財，並且充斥在所有有船的角落，及那些焚燒王室房屋的人的地盤。新的打仗新方法：滿足敵人而不是給他們壓力及讓他們貧窮。</p>

<p>When I knew about the peace, I moved to Formosa, and I had the satisfaction to add three persons to the Church, without counting the kids of the unfaithful that had passed away. After this, I judged it convenient to free myself of the tyranny of my thievish landlord, and I bought a lot of land for sixty two pesos, where I temporarily lifted a hay barrack, and I locked myself in it joyfully: “=I am already in my house, this is life!! Let them come to try to throw me out of Formosa!!” However I left the island due to plots warped by the devil, and I presented myself in Manila to Our Provincial Father to inform on the state of the mission. When the report was concluded, I boarded the French steamboat “Durance” and I managed to enter my poor hut on 25 April 1860. Upon arriving —since the rainy season was about to start— I laid down the foundations for a house of adobes, with a length of some 18 steps, about 5 steps wide, and with a height of some 4 Castilian varas¹⁸. It cost me six hundred pesos I had, and I was in need to leave for a second time to Emuy, after having pawned 46 pesos with some Chinese.</p>	<p>當我得知平和了，我搬回台灣，若是不算之前不誠實的孩子們的話，我又多了三位新教徒。之後，我迅速地下定決心讓自己離開那強盜地主的控制，用六十二塊買了很多的土地，在那我建了一個小茅屋，很快樂地在那：「我有我自己的房子，這就是生活！他們最好還能把我趕出台灣！」然而我離開這島是因為惡魔的陰謀，我去見我在馬尼拉的神父告知這狀況。當報告結束，我搭法國的輪船多蘭斯(Durance)於1860年4月25日回到我的陋室。就在抵達時—剛好雨季正要開始—我於是用磚頭做了房子的基礎，大概18步長、5步寬及4卡司提爾費若司(varas, 一個varas約33英吋)高。這花了我六百元，並且第二次動身到廈門，我在貧困時還當了盜器得到四十六元。</p>
<p>Back in Formosa for the fourth time, I went through a bunch of towns filled with Indians that had Chinese physical characteristics. I was well received everywhere, except where the mischievous live, who are the same here as in every part of the world.</p>	<p>第四次回到台灣，我經過很多充滿中國人特質的印第安人的城鎮。我到處都為人所接受，除了有要惡作劇的人所在的地方，和世界各地的情況一樣。</p>
<p>Writing details about these poor igorotes is losing time, since they can hardly be differentiated from those Indians, and probably what may be said about them can be also said as for the Indians. Besides, I wrote a scroll of four pages to the M.R.P. Rector about this particular matter, and I sent to Your Reverence a copy of the questions the English consul in Formosa asked me about this business.</p>	<p>詳細寫關於這些貧窮的住民很花時間，因為他們和從印第安人的差異不大，也或許可以說他們是印第安人。除此之外，關於這件特別的事，我寫了四頁的信給區會長神父，而且我還把關於在台英國領事問我這方面工作的信的副本寄給閣下。</p>
<p>I really regret the fact of not being already with them, but also the constant increase of the obstacles and</p>	<p>我對先前不但沒準備好面對他，而且還不斷地增加問題及困難而深</p>

18 Vara: a measure of about 33 inches.

<p>difficulties, since on 14 April —day on which we would take possession of a small house with two bedrooms, in the middle of these good people— I was let known that our desired trip was impossible due to a terrible uprising, in which by the day this letter is written some 17 subordinate Mandarins had been slain with a part of their troops; but, what kind of troops and Mandarins are these, who do not dare to fight a wretched and gnawed merchant ship?! Is it strange there are few casualties of their own on the battlefield, since they lack discipline? Is it strange that a brute force, without weapons and order, may stab to death another brute force with the same characteristics, but less numerous?</p>	<p>感抱歉，因為 4 月 14 日那天—我們本擁有一個有二間臥室的小房子，和這些好人—我讓他們知道我們希望的旅程是不可能實現了，因為可怕的起義發生了，就在寫這封信那天，17 位下級官吏和他們的部分軍隊被殺害；但到底是什麼樣的軍隊及官吏呢，不敢與不幸及受折磨的商人船艦搏鬥？！因為他們缺乏訓練但在戰場上他們的傷亡人數很少不是很奇怪嗎？靠著獸力不用武器及指揮，能刺死其它有同樣特性的禽獸但少很多，不也很奇怪？</p>
<p>So one is left surprised and without any reasonable explanation as how, being the Chinese of Formosa so few, so false, so coward and so anything that can be added, have the Europeans formed themselves the idea —which even today is very common— that in Formosa people are eaten! How could some boats leaving from Manila —that had the help of strong northbound winds to arrive to this coast without any danger and to finish the trip to Emuy in four or five days at most— could waste this opportunity and return to Cagayan or other ports in the Philippines? These are incomprehensible things, though they are seen daily.</p>	<p>所以每個人都很驚訝，也沒有任何合理的解釋為何會這樣，在台灣的中國人這麼少、不誠實、膽怯及任何可以被加上的，讓歐洲人有這樣的印象—即使在今日也一樣—在台灣的人被腐蝕了！為何有些船能離開馬尼拉—對沒有任何危險的北行抵達這海岸有幫助及最多四到五天完成廈門之行—會浪費這機會及回到卡加揚(Cagayan)或其它菲律賓港口？這些是不可思議的即使他們每天被看到。</p>
<p>While Your Reverence sends the explanation of these enigmas, I will keep on preparing the second part of this letter, to complete the history of this Mission until the day when this letter was dated, while I, lesser brother, am left with all due respect to you. Q.B.S.M.</p>	<p>當崇敬的閣下能解答這謎，我將會繼續準備這封信的第二部份，讓這段傳教史能完整。您最謙卑的僕人。</p>

Fr. Fernando Sainz
Dominican

(前金) Cheng-Kin, 15 July 1862

<p>On 2 July, after an extremely bad trip —a quite common thing in this canal— Fr. Chinchon and Fr. Limárquez were able to cast anchor in the port of</p>	<p>七月二日，在歷經最糟糕的旅程後—雖然只是運河上常見的事—楊真崇神父 及黎茂格神</p>
---	--

<p>Fa-Kao; and during the same day by six o'clock in the afternoon I hugged the latter one in this town of Cheng-Kin. Fr. Chinchon had to wait until 3 July, because the bar was imposing and did not let the guiding boat enter.</p>	<p>父在打狗港下錨；同一天下午六點，我緊跟著黎茂格神父造訪前金。楊真崇神父則要等到七月三日，因為沙洲太高，引導船無法駛入。</p>
<p>Fr. Chinchon's joy was big when he was finally at home and amongst us; but on seeing how the bedrooms were left by the many and constant tremors God sent us in His Kindness since 8 June by 9:30 at night until well into July, his joyful humour began to dim, so as he seemed an extinguishing candle.</p>	<p>當楊真崇神父終於到這兒並跟我們聚集在一起時，他真的非常高興；但看到臥室因為連續密集的地震而毀壞後，他愉悅的神情立刻變得沉重，心如殘燭。地震從六月八日晚上九點半左右直至七月，情況才逐漸好轉。</p>
<p>Therefore it is not strange—the same thing may happen to anyone—, if one could see with his own eyes the ruin of a terrifying tremor, and could hear how the casualties totaled, according to some, more than a thousand only in one city (Faicuanfú), and according to others, to a more reduced number.</p>	<p>這一點也不奇怪—同樣的事也發生在其他人身上一假使有人能親眼目睹這地震造成的災情，並得知傷亡總數的話。據某些人說，光台南府便有上千人傷亡；有的人則說，傷亡沒有那麼慘重。</p>
<p>Certainly 8 July's earthquake was very big, and it may be assured that only in Faicuanfú more than five hundred houses fell down, burying more than three hundred people under their ruins. They were left even without oil, since the oscillations of the quake emptied the jars; many had to go out their populated city, with their oilcan in their hand, to buy the necessary amount for lighting. The land broke away in different sites, the sea entered the northern part of Faicuanfú to leave space for the fish where men once inhabited, and sow salt where rice was planted and sown</p>	<p>無疑地，七月八日的地震非常嚴重。可以確定的是，光是在台南府就超過五百間房子倒塌，超過三百人被壓在斷垣殘壁中。他們沒有任何煤油，因為地震使得罐子都破了。很多人得離開他們居住的城市，拿著油罐，到其他地方購買足夠用來照明的量。土地碎裂，台南府的北邊海水倒灌，耕地變成了鹽場。</p>
<p>When the tremors were over, a hurricane¹ came to destroy what the tremors had forgiven, behind a great storm², and—to top off all the misfortunes— both of them came on the same day the rain stopped, announcing me that two leagues away from town five thousand revolutionists were ready to come over Cheng-Kin to clean it all through. On the first moment I was shaken a bit; but it took me a while to calm down, thinking the news were one of the many gossips that for a period of</p>	<p>地震結束後，颱風挾帶狂風驟雨，侵襲未被地震破壞的地方—雪上加霜的是一兩個不同的消息同時在雨停的那天傳到，其中一個說兩個民團將離開這城，另一個則說五千名造反者將到前金重整勢力。最初我嚇了一跳；但冷靜下來後，我就想到這是六個月前早已傳遍南北的流言之一。</p>

1 The word used is “vaguio.” The correct word is “baguio”, which a word used in Philippines that meant “hurricane.”

2 The word used is “colla.” It is a storm in the Philippines Sea that generally blows from the southwest with a variable strength, with some chances of hard showers, periods of calm weather and strong rain.

<p>six months go from north to south and back</p>	
<p>The two thousand pesos the mission had in Hong Kong have arrived; in fact, they couldn't have arrived in a better time, since we only had some four hundred left out the one thousand Fr. Limárquez had sent from Amoy, so as to finish a small house that had begun to be constructed when Fr. Mariano left Formosa. With these two thousand pesos we can build the camarín³, and God will provide for the other two missions. It may be heard that two thousand pesos is a lot for a camarín; and, effectively, it would really be a lot if we had pines here as the ones in Amoy, and the day's wages were as cheap as there; the ship transport of the wood and other materials is the most expensive cost, so it would be very good, when this mission is helped, to think what shall be done with these alms, and if it is a task for the missionary to think about the cost of the land, the room to say Mass, the kitchen, the bedroom, and the salaries and bedrooms of the catechist and the cook; whereas, should a missionary have less than five cubbyholes⁴? (I was going to write rooms, but they can only deserve this term).</p>	<p>宣教團在香港的兩千披索已經送到，援助來得時間剛剛好，因為我們只留下了黎茂格神父從廈門寄來的一千元中的四百元，為的是順利完成利安當神父離開台灣時就已經開始建的小房子。有了這兩千披索，我們可以建立神龕，而且上主還能支持另外兩個宣教團的工作。聽說花兩千披索來做神龕太多了，如果我們用跟廈門一樣的松木來做神龕，那真的就會多出不少錢，因為這邊的工資跟那邊一樣便宜；用船載運木材及其它材料花了最多的錢。當宣教團得到幫助時，思考如何運用這些救濟物資是件非常好的事，對傳教士來說，也是個讓他去構思如何規劃並運用金錢的考驗，包括土地、彌撒間、廚房、臥室、薪水及傳教師與廚師的臥室。有鑑於此，傳教士應該少於五個小房間嗎（我本來想用房間這個詞，但他們只能接受小房間）？</p>
<p>Amongst the Chinese there is always the same antipathy towards us, always the same indifference, always the same disdain. How many times have they called me “dog”, “pig”, etc.?! However, amongst these insulting jokes, the one I cannot handle is when they say, with a satanic frigidity, that we came to tell them stories. It's the border of shamelessness! It's true that the ones who say this are the merchants of the empire and some others, that don't even have a shirt, and have crossed the canal to cast their lots amongst these islanders; but they always have a merry time listening such a funny one-act farce.</p>	<p>中國人總是厭惡我們，對我們不感興趣，而且鄙視我們。他們不知叫我多少次的「狗」及「豬」等等?! 然而，在這些侮辱人的話中，最讓我無法忍受的，就是他們用撒旦般的冷淡方式說，我們只是來跟他們說故事的。太可惡了！說這些話的是中國的商人和其他的人，他們極其野蠻，為了渡河還拋下不少島上的居民，但他們卻還有閒情逸致，看著一幕幕令人發噁的鬧劇上演。</p>

Fr. Fernando Sainz
Dominican

3 “Camarín”: niche behind an altar where images are kept.

4 The author uses the word “covacha”, which means poor and small cubicle.

M.R.P.N. Fr. Domingo Treserra, Provincial Prior

前金 Cheng-Kin, June 1863

My very appreciated and venerated P.N.: On the day of the Holy Spirit's Easter¹ we had the comfort of blessing and dedicating to the worship of the true God the small church that, as Your Reverence knows, was started to be built long time ago. Before the blessing, we agreed to dedicate it to the Virgin of the Rosary, since we already have here the precious image of Our Lady that Your Reverence gave as a gift to this mission. The church, as I have said, is little, since it is a bit longer than 90 feet, and a bit more than 30 feet wide. Its shape required three doors: a main one with its own storm door² and two lateral ones. All of them are decorated with the coat of arms of the Order. It has three naves and eight inner columns with their tribunes aside. The altar has all the attributes and shape that correspond to an altar of the confraternity of the Rosary. The image of Our Lady, placed on the centre of the altar, represents her *glorious coronation*, and the rest of the mysteries surround it as prescribed by the Bull of the confraternity. Besides, on the altar there are images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and Saint Peter, along the one of the glorious Patriarch Saint Joseph. In the centre of the altar's table (that is the front table), there is a representation of the church; to the right (this is the side of the Gospel), there is a figure that represents the New Testament, and besides the Epistle there is another one that symbolizes *the antique*, in its own and most adequate expression. This small temple does not lack its own sacristy, whose form and proportions harmonize with the entire picture of the work. This beautiful church is an abbreviated form of the church of Saint Dominic in Manila, which has been

我最崇敬的神父：聖靈降臨節那天，我們在小教堂裡敬拜真神，如您所知，這間教堂從很久以前便開始興建。因為我們已有您所贈的聖母圖像，所以在祝福之前，我們將這間小教堂奉獻給玫瑰聖母。如我所說的，教堂很小，九十呎長，三十呎寬。共有三個門，大門則多設了道擋風門，另有二個側門。三個門都採用跟道明會本會一樣的來裝飾。教堂中分設三個中殿及八個圓柱，旁邊還附上講台。祭壇的特性及形狀與玫瑰經善會的相同。依照善會中教宗通諭的規定，聖母圖像放在祭壇中央，高舉她的榮耀，其餘的聖儀都圍著它。此外，祭壇上還有耶穌、聖彼德及聖約瑟的圖像。在祭壇中央（前桌的部分），有個教堂的代表物；右側（福音書的那一邊），放著代表新約聖經的塑像；在使徒書旁，則放有另一個能象徵古典希臘羅馬藝術風格的古董。

小教堂並不缺聖衣及聖器的收藏室，其形式及比例與整個教堂非常協調。這美麗的教堂就像是在馬尼拉的聖多明尼克教堂的縮小版，因為該堂是這座建築的範本。感謝上帝賜下恩典與安慰，讓我們充滿喜樂，親眼看第一座教堂的完成，讓勝利的十字架豎立在這海岸邊。

1 This is the literal translation. Probably, Fr. Andres Chinchon refers to the Solemnity of Pentecost.

2 The word used in the text is "cancel". "Cancel" is a storm door (an outer or additional door added for protection against inclement weather), that generally has a front board and two lateral ones joined to the jambs (which are a pair of vertical posts or pieces that together form the sides of a door, window frame, or fireplace, for example) of an entrance door, with all the group enclosed by a roof.

<p>our pattern of construction. We thank God one and a thousand times for granting us the grace and the comfort of seeing the first church of this mission finished with joy, that has just hoisted in these beaches the victorious standard of the Cross.</p>	
<p>From Your Reverence's minor servant, S.S.Q.B.S.M. Fr. Andrés Chinchon Dominican</p>	<p>閣下的僕人僅上。</p>

M.R.P.N. Fr. Domingo Treserra, Provincial Prior

前金 Chen Kim, 12 June 1863

<p>My very appreciated and venerated P.N.: The small church, whose description Fr. Chinchon sent to Your Reverence, is already being used for our tasks, which we try to do with the greatest solemnity possible, though the fervour of these neophytes¹ make up the lack of splendour in the worship.</p>	<p>我最崇敬的神父：楊真崇神父寄給你的信中，所提到的小教堂，已經正式啓用了，並且開始進行宣教工作。儘管新進的教友不太熱心，但我們還是盡可能地舉行莊嚴的儀式。</p>
<p>How beautiful is the church, how beautiful is the altar with the pretty steps that have arrived from Emuy! Last Sunday we had a procession around the small lateral naves, with the carrying of the image of Our Lady by these new Christians, whose hearts have been stolen by her heavenly graces. How beautiful is religion everywhere!</p>	<p>教堂是多麼的華美啊！從廈門運來，附著精美階梯的祭壇是多麼的尊榮阿！上週日，我們聚集在教堂的小中殿裡圍成一圈，有位新教友拿著聖母圖像，心已被她那屬天優雅佔領。處處充滿神的愛是多麼的美妙啊！</p>
<p>(From now on, the Provincial Vicar of the mission continues writing detailed news on the expedition to the island's interior, and warning about the noticeabl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aborigines of the country and the degraded race that has been dominating them for civilization's shame, he tenderly exclaims in these terms:)</p>	<p>(以下，省區會長神父將繼續報告深入島內探訪的細節，並且提出統治者對原住民與一般人之間的差別待遇。他在下面滿心憐憫地說：)</p>
<p>What a joy, Father, what a satisfaction and pleasure I experience as I am surrounded every night by twenty or</p>	<p>多麼令人高興及滿足啊！神父，每天晚上，我都被二三十個人圍著，他們自動並虔誠地來聽</p>

¹ The word used in the Spanish text is "neófito." Neophyte means "newborn," and in this case Fr. Fernando Sainz refers to some recently baptized people.

thirty people, that come spontaneously to listen with religious attention the civilizing maxims² of the Gospel! Men, women, and children, after their daily work, come in a rush, singing the *Our Father*, and asking and answering with acclaiming voice the most important points of the Christian doctrine that they learn with eagerness, docility and trust. Oh, what a contrast between these poor and simple Indians and the Chinese, their dominators and tyrants, that don't have any other God, another law, nor another conscience but money, robbery, and lechery! Will the few that have survived the mean ferocity of these tyrants be converted? Let's hope in God; let us sow the good seed with patience, since it will bear fruit on its day; if necessary, may it be watered with our blood. However, there is a great obstacle to the propagation of the Gospel: it is to be armed as armies, so as to defend ourselves from these barbarian "Attilas"³, that don't respect anyone's life and interests, and attack and wound in any occasion as long as they can escape without punishment. Oh my God, I have said some time from the bottom of my soul, how incomprehensible are your judgements, how deep are your designs, how inextricable are your ways! Formosa today could have converted to Christianity: her inhabitants would be Your sons, oh my God, and Your name would be glorified here, if the Catholic Spain had consolidated its domination on these beaches. Blessed be You forever, my Lord, and let's adore all Your secrets, which are above the judgements and miserable calculations of men. What an affront by the nation that prevented these inhabitants from having such an ineffable fortune! Glory be to the Spanish nation that carried the cross and the civilization to every place,

我宣揚福音！結束一天的工作後，不分男女老少，他們趕來唱主禱文，並用頌讚來問答基督教要義。他們以熱切、順從及信任的心，不斷學習。哦！這些貧窮又單純的印地安人，與那握有統治權的漢人之間，存在多麼大的差別阿！除了金錢、強盜與淫穢，那些人心中根本沒有神，沒有法律，沒有良心！人們會因經歷殘暴的統治而改變信仰嗎？讓我們寄望上主。讓我們播下耐心的種子，因為或許哪天將開花結果。若有需要，我們願用自己的鮮血灌溉。

然而，在傳佈福音上，仍舊困難重重。為了防止野蠻人的侵擾，我們被迫武裝。他們不尊重其他人的生活及利益，只要不受懲罰，他們就會把握機會傷害別人。天哪，我說了一些心底的話！人民的判斷力是如此的不清，城府是如此的深，生活是如此的混亂！即便如此，福爾摩沙還是可能成為基督教國家。我的神啊，假使西班牙天主教能堅守這些海岸的屬地，當地居民會成為祢的子民，祢的名將傳揚四方。我的主阿，求祢賜下祝福，讓我們追求祢那超越人能想像與算計屬天的奧秘。禁止人民擁有這不可言喻的財富，對這個國家來說，真是個天大的恥辱！帶著十字架及文明，到世界上各個角落，並為神贏得新世界，這一切會為西班牙帶來榮耀。難道她會不慎遺忘她的任務及命運嗎？她在這島上神聖的任務尚未完成，如果成功，她的皇冠將加上美麗的花朵，難道她會遺忘，將來有一天，這些海岸將會出來迎接她勝利的旗子嗎？就將一切交托給神，期

2 Maxim: a succinct formulation of a fundamental principle, general truth, or rule of conduct.

3 Attila: A.D. 406-453. He was king of the Huns (433-453) and the most successful of the barbarian invaders of the Roman Empire.

4 Fr. Fernando Sainz is referring to the possession of Formosa by the Spaniards.

5 This expression's meaning is that the possession of Formosa and its evangelization would add an attainment on the Spanish crown and royal family.

<p>conquering for God new hemispheres, new worlds. Will she forget by chance its mission and destiny? Will she forget that these beaches greeted her victorious pennants one day, and that maybe her providential mission on this island is not yet over, that this possession⁴ would add a beautiful flower on her crown⁵? But let's leave to God these things and the future times.</p>	<p>待未來。</p>
<p>From Your Reverence's minor servant and S.S.Q.B.L.M. of Your Reverence. Fr. Fernando Sainz Dominican</p>	<p>閣下的僕人僅上。</p>

M.R.P.N. Fr. Domingo Treserra, Provincial Prior

前金 Cheng Kim, 12 December 1863

<p>My very appreciated and venerable Father: I continue the account of the state of the mission, as I promised Your Reverence in my last letter.</p>	<p>最崇敬的神父：就如上封信答應你的，接下來我將繼續說明我們的宣教工作。</p>
<p>In my last letter I was saying to Your Reverence that the Englishmen stationed in this island helped us perfectly, serving us much. In fact, after a letter the Fr. Vicar wrote to them from the place where he was lodged arrived to these Englishmen, they set sail towards that port (since by then he was in Tayanfú) to help us. On the day of our Immaculate Mother's Patronage, they came home and one of them handed me a paper stamped with his own seal, so I could make several copies and spread it throughout the villages. The aim of this paper is no other than to scare these Chinese, threatening them with a bloody fight, given the case they dare to destroy the church and the house of the missionary. It is to no wonder, dear Father, that these means may be adopted, since we are amongst people who apply the law that the strongest is the one who triumphs, and that if they are not addressed with a high voice, none or very few fruits can be obtained; amongst these men —I dare to say and without any regret—, that had filled their measure and delivered to</p>	<p>上封信我告訴過閣下，島上的英國人幫了我們很多忙。事實上，區會長神父從他暫住的地方寫了一封信給英國人後，他們就開船到港口來協助我們(之後神父就轉往台南府)。聖母無染原罪主保瞻禮日那天，英國人回來，其中一人交給我一份文件，上面蓋有他的印記，我複製了幾份並且發送到全村。這份文件是爲了嚇唬中國人而寫的：假使他們敢來破壞教堂及房子，將引發戰事。親愛的神父，無怪乎我們會採取這樣的手段，因為在所有人裡面，我們是最擅長運用法律途徑來解決問題的人。如果不大肆宣揚，我們無法解決任何問題。當地人——我直截了當地說——詭計多端、態度無賴，採用這種方式來恐嚇他們極為恰當。如此一來，他們就不會妨礙宣教的種子，散佈在這美麗的島嶼上，開花結果。</p>

the reprobate sense, it is suitable to apply a bit of fear, so that they may not impede with their violence the fructification of the seed of the divine word that has started to be extended in this beautiful Island, which promises abundant ripe grain. On the same the day, the Mandarin came down to these towns, in which he fixed an edict forbidding the people “to damn the religion of the Lord of heaven, since everything that was said was false.” This measure was useful to hold the towns from this part, but it was not this way on another part, where the Fr. Vicar is, since with a bad interpretation of the mentioned edict, they said it was true what was cursed, and that they wanted to kill the master (the Fr. Vicar) and whatever Christian that may come here. Similar news were not only alarming in their substance, but also in the way they were said, whereon one felt lively affected on their hearing. And what side could we take in these critical moments? May I be granted the word to say it for the glory of God and of her Immaculate Mother.

同一天，滿清官吏來到這些城鎮，公佈政令，禁止人民「迫害基督教，因為傳言都是錯的。」從這點來說，命令對約束當地居民相當有效；但文告的另外一點卻曲解區會長神父的意思。人們說詛咒是真的，而且他們還想殺掉教頭（區會長神父）跟所有會來到此地的基督徒。類似的消息不僅讓當地人擔心他們財產安全，就如他們所說，聽到的一切影響了生活。在這關鍵的時刻，我們該支持那邊？願上帝的光榮與聖母的大能，賜予我分辨是非的智慧。

Entirely distrusting men, and leaving my trust in Her that has so deservedly merited the honourable title of *Auxilium Christianorum*,¹, I exhorted the Christians to pray to Her, and to encourage them, I reminded them of the strength and efficacy of the Holy Rosary, and I told them that, for a period of three days, after hearing Mass (the one that was offered for the needs of the Mission) they should pray with all due fervour the sorrowful mysteries of the Holy Rosary and the litanies. Indeed: on the last day of the triduum², which was the day of the Presentation of Our Lady, after the morning's offices, I sent two Christians to the Mandarin with a letter, in which I made clear the irrationality and falseness of the calumnies, and the mischievous plans of some people. At the same time I was begging him to, as a Father of the people, take

不要輕信人言，全心倚靠聖母，我們將同享基督徒榮耀之名。我勸告並鼓勵基督徒向聖母祈禱；提醒他們聖玫瑰經的力量及功效；告訴他們（獻身宣教使命的人）在望彌撒後的三天內，用聖玫瑰經及連禱文，不住地禱告。三天的最後一天，也就是聖母日，在晨間的服侍後，我派遣二位基督徒帶著一封信到官吏那兒。信上我澄清不實的誹謗及他人惡意中傷的詭計，同時我也請求人民的父母官，想點辦法，阻止這些對我們的迫害。

1 “Auxilium Christianorum” is a Latin phrase that means “of the Christians.”
 2 ‘Triduum’: period of three days.

some measures to stop this persecution.	
---	--

From Your Reverence's minor servant and S.S.Q.B.L.M. of Your Reverence.

Fr. Andrés Chinchon
Dominican

M.R.P.N. Fr. Domingo Treserra, Provincial Prior

前金 Cheng Kim, 7 November 1863

<p>My very appreciated and venerated Father: assuming that the Provincial Vicar cannot write to Your Reverence, I feel in the duty to give you some very displeasing news, which I don't doubt will grieve your fatherly heart, being a very sad moment for me to make a participant in this disgrace.</p>	<p>我最崇敬的神父：由於區會長神父無法寫信給閣下，所以我覺得有義務要告訴你一些非常令人不悅的消息，這無疑地將讓你非常傷心，而對我來說這真是一個難堪又屈辱的時刻。</p>
<p>More than four months had passed since Father Vicar had started to live amongst the local Christians of the island, and he had not been able to come down to this residence until last month, when we had the relief of seeing him again to deal about conscience's matters and about the mission. After several days, Father Vicar decided to go back to his unforgettable Christendom, and his departure was fixed for the third day. However the Chinese carriers (here travel is done in hand-chairs at times) with whom he had agreed the fee decided to exploit our poverty and refused to take Father Vicar as decided. The departure had to be delayed until the next day, and we had to yield all their demands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previously agreed payment, so as to permit the return of Father Vicar to the mountains, where the Christians were waiting for him anxiously. Finally he started his way, after the many difficulties that made us foresee a sad ending to his day.</p>	<p>區會長神父與當地島上的教友住在一起已經四個多月了，到上個月他還無法來到我們中間，我們知道他一直在救濟民眾並且傳揚救恩。來到這裡幾天後，區會長神父決定從我們這兒回到他那難忘的基督國度，預定本月三號離開。然而原本已談好工資的中國轎夫（在這裡旅行有時是坐轎子）卻突然要求加價，否則他們就拒絕載區會長神父回去。行程被迫延誤一天，我們逼不得以只好同意他們索價的要求，以便能讓區會長神父早日回到山上，那裡的教友們正焦急地等待著他。最後在歷經重重困難後，他終於起程了。</p>
<p>Effectively, they had walked some two leagues, when the chair-carriers left the chair on the ground and left. Anyone could have thought they were taking a rest, or that they had stopped to look for food, or to satisfy any other need of the moment. It was anything but that. Some minutes had gone by when eleven men suddenly</p>	<p>當轎夫把他放下來離開時，眾人已經走了好一段路。任何人都會認為轎夫是去休息一下，或找吃的東西，或是做些其他的事情。然而事實並非如此。過了幾分鐘後突然出現了十一個全副武裝的人（矛、刀及獵槍）朝向教區長神父走來，</p>

<p>appeared, armed to their teeth (spears, knives, and shotguns), and headed towards the Father Vicar, making similar intimations to the ones of these cases: “the bag or your life.” Anything could be effectively feared from their foul appearance and their fierce attitude. And they were not satisfied with stealing the money he had, but they also took his baggage away. Clothes, books, the breviary, the hosts, wine, a chasuble, a music instrument... everything, absolutely everything was prey of their rapine and their voraciousness. But the most grievous thing was that, so as to avoid a knife strike on a Christian, Father Vicar had a serious injury in one hand. The few Christians that were accompanying the Father bravely tried to defend him and themselves, and one of them, already renowned for his courage before becoming a Christian, was preparing to shoot his shotgun, but he reluctantly held himself from shooting, so as to obey Father Vicar, who forbade him to open fire. Some two hundred pagans were impassive spectators of this depredating and violent strike of rapine, committed, without any punishment, by these outlaws, against an inoffensive, forsaken, and defenceless priest.</p>	<p>意思是說：「要錢還是要命？」所有的人都會被他們醜惡的外表及兇暴的態度嚇到。他們不僅要錢還要他的行李。衣物、書、祈禱本、聖餅、酒、十字褙、樂器等每樣東西，幾乎所有東西都被他們貪婪地搶去。但最令人傷心的是，為了避免一位教友被刀子攻擊，區會長神父的手受了嚴重的傷。幾個跟隨他的基督徒試著保護神父及他們自己，其中更有一個在成為基督徒前就以其勇敢著稱的人，他本來準備要開槍還擊但卻沒有開火，因為神父不讓他開槍。二百多名異教徒在這場掠奪及激烈的攻擊中，面無表情地在一旁看著，看著這些不法之徒肆無忌憚地攻擊毫無威脅、沒有防禦能力的神父。施暴的人沒有任何懲罰。</p>
<p>After this evil had occurred, Father Vicar saw himself in the need to seek a hospitable refuge, which was generously offered by a poor gentile, while a message was passed to the Christians to go to that point, so as to lead Father Vicar to his mission with all the safety possible. Effectively, on the next day he was able to start his way, guided and escorted by his beloved Christians. I have not heard anything else about Father Vicar since his departure from that point, nor I know about any other personal misfortune.</p>	<p>當這罪行發生後，區會長神父覺得需要尋求庇護，一位貧窮的異教徒幫助了他，使得他的口信能夠傳到教友那兒，讓神父能安全地回到會院。隔天在親愛的教友護送及引導下，神父再度上路。自從區會長神父從那離開後，我就再也沒有聽到任何有關他的消息，也不清楚有沒有發生其他任何不幸的意外。</p>
<p>This is the exact account of what happened to Father Vicar during his journey. May God’s grace return for his mission soon, and may He give us a fatherly and compassionate look. This does not mean that we don’t ask men for their help, to protect us (since it is fair)</p>	<p>這是區會長神父在他旅行期間所發生事情的完整紀錄。願主保佑他能儘快完成任務回來，並祈求祂賜福給我們祂的慈愛與憐憫。這並不表示我們不須要別人的幫助及保</p>

<p>from similar abuses. That's why on this occasion it seemed convenient for us to address our complains to the Englishmen actually stationed in this port, with the aim to keep these hordes of gangsters under control, and see if we could recover anything back from what was cowardly taken away from us. Indeed, the Englishmen served us perfectly on this affair, and we owe them a vote of thanksgiving for their generous protection.</p>	<p>護，以使我們不再受到類似的傷害。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要趁這個機會對英國人表達我們的不滿，我們希望能讓這群歹徒就範，並看看是否我們能追討些被搶走的東西。事實上，這件事情英國人幫了我們很大的忙，因接受他們慷慨的保護，我們還欠他們一份人情。</p>
<p>I have been told of the peremptory departure of a ship, and I make use of this occasion to write quickly these brief and disarranged lines, leaving for another time the considerations that arise in the presence of these events.</p>	<p>我得知有艘船即將啟航，所以我利用這機會很快且匆忙地寫了這封信，日後我會再跟你報告其他的事情。</p>

From Your Reverence's minor servant, and S.S.Q.S.M.B.

Fr. Andrés Chinchon
Dominican

(三) 日文資料：

台灣拾掇——伴隨使節記行（上）
《聲》，1923/3/15, 頁 20-28
早坂善奈朗 著，古偉瀛譯

(譯者註：日本在 1895 年入台後，積極統治，對台灣天主教會也不例外，1913 年台灣脫離廈門監牧區而獨立成為一台灣監牧區，並由道明會玫瑰省在台灣傳教的林茂才 (Fernandes) 擔任首任監牧，並開始與日本四國監牧區的西班牙道明會士多所交流，逐漸去中國化。1917 年 6 月 8 日道明會總會長 Rodriguez 來台視察數日。1923 年春再派一教廷使節 Giardini 樞機主教來台旅行巡視，可惜其背景及全名仍無法查出。本文乃當時隨行的神父早坂所記經過，分三次刊登在當時日本的天主教雜誌《聲》上，頗能反映出二零年代的台灣及台灣教會的情況。譯者遠赴日本蒐集到此文，特此譯出，以供有興趣者參考。)

一稱台灣就讓人感到幾許興奮，雖然以前人稱之為高砂島，外人稱之為福爾摩莎，一生中總希望能來一次，心中被吸引而產生想像，並有感想的島。自己意外地在今年一月陪同使節閣下前來此美麗之島巡視而感到很光榮及幸福。所謂巡視並非普通的遊山玩水之謂，而是在此島之道明會承擔天主教會的工作情況及其傳教現況之視察，本人任使節之隨從而對此地及其天主教會能有所觀察。然而此島與內地（指日本）不論氣候也好，居民也好，及其風俗習慣也好，語言也好，大到天地自然，界小到一粒米都十分不同，因而自己有很大的好奇心想滿

足，一面想學習，一面想考察。乃隨興所至寫下雜感以饗讀者，同時並藉此感謝那些島上盡情接待我們的教會內弟兄及全島官民。

台灣的住民除了極少數的歐美人以外，都是中國人日本人及蠻人。中國人除了比較少數從大陸渡海來台的以外，原來住在此地的稱為台灣人，其人佔有大多數，因此所謂台灣話也不過是對岸的中國話罷了。蠻人之謂及住在深山中被迫擊的取人頭的危險種族。然而此族中的一部分早就歸化與中國人一樣，為數不少，但不具危險性。日本人主要是領台後移民來的，其中一半是殖民官員公司職員，其他一半是商人。

一月十日從東京出發，十一日早上在郵船因幡丸號甲板上與大阪主教及 Huarji 神父告辭，並告訴畏友片岡夫婦，中午將從神戶離港，在如圖畫般的瀨戶內海儘情眺望美麗的日本國土，同行之人均有同感。幸好天氣很晴朗，在疊蓆地上滑動著的長床之間掛著文人畫，眺望之餘十分愉快，從六千噸船上窺視內海之兩側。次日十二日早上八點到達門司，很快地我們去找廣石町教堂，得到 Martan 神父的許可，使節閣下舉行彌撒聖祭，遊玩了半天，與埋頭研究神學的 Martan 神父一起從小倉走來參觀，並與 Berutoran 神父一起有說有笑。因為當天下午四點船要再度離岸，乃與我一起踏著雨中的泥濘再度回到因幡丸船上。

十三十四日兩天波浪平靜，以十二海里的速度航行，天氣晴朗，邊讀書邊看風景地渡過了。船往西南方向走，一天時差約遲個二十分鐘，而氣候也日漸暖和。

船客之中每天漸漸熟悉，也與大多數之人交談，意外地見到了同鄉以及我認識的教友之親友及認認之人等，每天交談趣味大增，與我一起共用的服裝附近的偶爾談話時常常觸及宗教，而也想到在人間也有見到不信教的人以及有某種宗教信仰的傾向的人，也有很煩悶的人，在船上旅行真是給與傳教的好時機及場所。十五日上午就到達台灣的基隆港。前一天就從船上發了無線電，思索會有那位起早前來迎接，有幸住在基隆的教友，也就是我敬愛的老師新谷神父的外甥來迎，從台北來的有教區長楊多默神父與會計神父與傳教員及律師小宮氏同來見面。

在甲板上早有二三位新聞記者想來與大使見面。從總督府來的代表也見了面，並互相致意。不久，我們與來迎者前往基隆停車場。在車站入口處，站長隆重歡迎，我們遂坐上巴士。實在相當週到。不久從基隆開車，約一小時就到了台灣首府的台北。一到就有總督府的外事課長親切問候。有很多教友高興地來迎接我們。看到他們穿的服裝，而不懂他們的言語，真正感覺已經到了台灣。乘坐已準備好的車子前往教堂，眺望市容，感覺真不愧是台灣首都，氣派的建築的商家，家家都堂堂，相當開發，而且漂亮。不久就接近了大稻埕的教堂，旁邊則是道明會修女經營的靜修女中，大約有五百位學生列隊敬禮歡迎我們。另一方則有很多教友成列在等著與我們打招呼。教堂的鐘樓因著大使的到來而響起，音韻鏗然。抬頭一望，見到由瓦片建成的聖堂高聳，使節立刻從車上下來進入聖堂，行進堂禮，莊嚴地走到祭台前，此時教堂外有震耳欲聾的爆竹聲大作，不久聖堂內的風琴聲由響亮而漸趨平復，大使閣下開始彌撒聖祭，伴隨風琴聲，有很美妙的聖歌唱著，誠然是在西班牙長大的修女才有的出神入化的境界。這種美妙的歌聲音樂在台灣聽到完全是出乎我的意料。

我們隨後一直要到十八日早上為止，都住在台北。其間參觀了西班牙道明會修女管理的靜修女學校，接受總督府的午宴招待，女學校的歡迎會，台北教

友的歡迎會等，過了三天很有變化的生活。靜修女學校本來只是從小學程度到補習科專修科的程度，大約從去年開始提升為高中程度，而正式得到承認，現在女生約有四百人，據說該校還有約一百名以前殘留下來的小學校學生。學生中約有三分之二是日本人，三分之一是台灣人，不過由於語言的關係，日本人與台灣人的教育全部分開，這是因為台灣人原來住在家中一向不懂日文，所謂公學校是只有台灣人上的小學，這才開始學日語並接受日本式的教育，然而自然與日本人比起來其語言較差，結果不得不在女校中實施日台分教制，這並不太好，無論如何，學校日漸發達，校舍增築不在話下，誠可賀也。由於住宿生很多可知，從各地來的學生有不少。與修女交談得知，目前在傳教方面並未有太大的效果，這是時間的問題，年年很多的畢業生離開這學校，將來也有可能有些皈依的淑女，正如其他的多少教會學校的例子，台灣出現了來自靜修女中培養的天主教的婦女，懷抱得救的真理，她們將會感謝那些身著白衣的道明會修女在靈修上的努力，承認她們的努力而且清楚地表達。

總督府對大使的厚待值得特書一筆，給予很多方便，十它在總督官邸午餐，主客當然為大使閣下，陪客則有司令官福田大將及府內內閣及各省大臣等，另有各國英美及荷蘭領事，楊多默教區長及會計神父及本人，還有教友代表小宮元之助律師均被招待。當時總督閣下返回東京述職，一切事務由內務長官賀來佐賀太郎處理，在甜點上來時，此人的誠懇鄭重言談看來不像是一個政治人物的樣子，未任官前確是仁者賢者，使節閣下答辭時亦可看出以真情感激表達。

台北市仍有一事對我仍有紀念意義，亦即和我同教區的函館教區的法歐利神父在此去世而埋骨該地。此人乃法國傳教士，同時也是有名的植物學家。凡是日本沒有的東洋植物他都採集，因此給予世界植物學界一縷光明，同時也因此予以日本東北各地的天主教會的建設之功，理應對此教會及植物界的偉人致意弔祭，於是有一天在台北近郊的三板橋墓地去掃墓。他是在十年前在台灣深山中採集植物標本時，意外生病在台北去世而埋葬於此。由於是拉丁文墓碑，容易認出。我自己是日本天主教會，特別是函館教區的代表在去世的神父前面為其安息而祝禱，並感謝其宏恩，其風範及個性，從遠方來此的感情，而今日在此故人之墓前感慨萬千，而今人已亡，寂寞之感湧上心頭，對於死亡的問題乃奧妙的靈藥，在平靜中深感其有反省的並令人發奮的況味。

十八日使節一行人向台中出發，這是一個十分繁華的都市，而教堂是在直接面對著第一流的道路上的，沒有庭院或門，與歐美一般的教堂的建造不同，在經濟考量是很方便的地點，傳道所及教堂講道時路上行人可以聽到而駐足來聽，雖然稱不上是雄偉大堂的瓦屋，但也是相堂大的水泥鋪的教堂。男女傳教不同的傳道館井立其旁，大使來時，在街上有一個傳道集會，當天晚上及次日晚上都有吸引外教者來參加的佈道大會，以台語佈道，並無給我們翻譯，我們自己台語即中國話並不太感興趣，由於有頗多會日本話的居民，因此住在日本四國十七年傳教的楊多默教區長一個晚上使用日本話佈道，有人以台語加以翻譯。在此地台中教會，不是台灣料理，而是中國料理，開始吃了一頓大餐，有一位非教友李振鵬及一位頗富有的慕道者請客，菜色品味之多，對我們這些毫無經驗之人，單單其數量就令人咋舌。陪客有一人乃慶應大學的畢業生的台灣醫生，此人能說日語，令人感佩，聽說他還不是教友，在日本人經營的醫院上班，難怪日語十分高明，因為同文同種，口音很道地，比起一般歐美人士較佳。又這間教會我見到比較多的日本教友，心中十分高興。教皇的使節來台固然是首次，但日本籍神父正式來台或者本人是第一位。在台灣仍有一些異國的情調，日本教友在此能與日本

神父會面怪不得大家特別高興，我也能深深體會他們的心情。在台北別離之際與教友一同拍了紀念照，在台中也同樣，只不過大家在路邊整齊排列，由攝影師在對面路邊調整鏡頭，路人在旁邊悠然行走，像是無事一般，不愧是台灣的獨特的現象，行人客氣，不會因為好奇心而過去，每人也都在路傍站立，注視著顏面，只有目中無人的鷄除了只重視自己的腸胃，沒天沒地自由自在地走入攝影的場地，快樂得不得了。因此在台灣各地豬雞等家畜隨地放牧，黑豬在路上堂堂走來走去地過著日子。

在台北若有餘暇在市內遊觀，逛逛台灣人開的商店，但在台中在十九日晚上從員林教會來的神父擔任導遊也逛了商店，換了一地品物也不大相同，而我看到的不只是珍奇之物，也注意到一般的物價比起內地至少約便宜二三成，而物品差不多是半價，而同類東西若在日本人開的商店裏買的話，高出二三成有人說這可見日本商人的暴利傾向，這也沒辦法回答。當然由於生活水準有差異、勞力工資的不同影響到物價的高低，但我想不管如何總不會高過日本內地的物價。我想這種商業策略是應該考慮之處，而台灣人就是中國人，其經商的態度一言以蔽之，真正的主張是薄利多銷，只是買方有殺價習慣，因而賣方也斟酌一番而定其價格，一件號稱十元的東西大約六七元就可買到，這樣一來一往與那些商人日常接觸後自然會了解，而且中國商人的特色是再麻煩的客人，或是沒誠意半開玩笑的客人把架上東西全部拿下來後卻一件也不買，空手而歸的事，店家絕不惡言相向，反而「一再請進」的予以溫言好語相對待，不愧是東洋的猶太人，以低於成本拋售的事的這種大氣概是沒有的，．．我們聽說日本商人對其招牌與廣告始終是一致的．．．而那些商人卻為十元的東西爭十錢二十錢，一丈二丈的東西爭一寸兩寸之事的極小氣之性格。將很少金錢也看成極貴重之事，事事都以功利考量的中國人滿腦子都是這些事情。

在台中有從其他州廳派來的汽車，載我們來到公園物產陳列場、鑿井給水場、農產依托場及製糖公司等參觀，在此地為了台灣人而建立的中學，總督對教育也非常的努力加以普及化，然而地方至今仍有一大段路要走，初等教育在全島有百分之三十普及率，由此可見台灣人功利主義的心態之一面。一看之下有台灣中央山脈之山麓下有廣大的原野，其中今天種有甘蔗、蔬菜及水田；而其外又種有香蕉，檳榔及其他熱帶果園及茶園之耕作。單就米而言，一年可以兩收就可知此地之土地及氣候十分有利，所到處水牛，多為七八歲的小男孩，在日本內地應是上學的兒童，在此地卻是當牧童從事家庭實務工作而荒廢學習機會，思之令人痛心，不得不說這是功利主義下的犧牲品。所謂鄉下只是一些打赤腳的小孩子在路邊游蕩著的，也就是有養著黑豬的牧童，想起上天賜給此地多麼大的恩惠而見到這些目不識丁醉生夢死的毫無光明可言的人，惻隱之心油然而生。

二十日離開台中，再乘車到台灣南部的重要港口高雄，此時是正月月中旬，若是在內地日本正當嚴寒之時，而此地乃亞熱帶地區，而南部更加溫暖，有如內地九月間的氣候，在太陽直射下，我想已成為內地一年中最熱的時候，目光所及，平野與山脈均為綠油油，不知名的花樹，多采多姿，綠的綠，紅的紅，熱帶地方的草木就是這樣，也因此人們所製作的東西及衣物也受到熱帶地方的影響而喜愛濃厚色彩的衣物，此乃自然與人文之間的互相影響的例子。當天下午三時過一點到達高雄的停車場，立刻乘腕車到荳雅寮的天主教會。高雄原來是叫打狗，近年要改成日本風格的文字，而給予新生地的名稱，亦即給此新又漂亮的地方，想起最近遊歷的北海道的札幌，然而該地只有日本人的住宅、商店、公司及機構等，而在台灣島上的街道行走則有感到大異其趣，在教所在地是位在本島人

的街上，而成為教會街，佔有一區之地，前往途中要經過一條河，由於無橋而需乘坐渡輪而下車，對面則有穿白衣打綁腿約四五十名的少年團每人手上持有一短棒很高興地在那邊嬉戲，而教友則許多人集合在一起，對面遙遙相對的鐘樓聲音宏亮，不久聽到少年團三呼萬歲，則已將達到岸，迎接使節的音樂團稱為台灣樂隊。首先表演的，是跳舞，向天向地，並演奏很高的調子，亂彈一番，我感覺愈來愈有台灣本土的味道，不久有轎子在等著我們，我想起十八年在香港曾一度坐過後就一直沒有機會，此時在台灣再有機會想起昔日之大氣派被勸後自己乘坐上，經過有如沙漠的砂原，一方面聽著極熱鬧的爆竹與台灣音樂，一方面轎子一步步向前走，此地乃道明會的修女所經營的孤兒院與女修院剛好在教堂旁邊，在門前看到一些孤兒以及初學修女由穿著白衣的修女帶領著（彼此之間互稱背亞大）整齊列隊向我們致敬，轎子不久就到達教堂，台灣樂隊演奏最得意的歌曲，加上震耳欲聾的爆竹聲，使節一行人先到教師館內，休息時由少年團表演得意的節目，其中有一種遊戲，我姑且稱之為西班牙舞，一方面是未曾預想過的一種舞步，用鑼鼓來伴奏，揮舞著厚紙板製成的牌子，一聽之下乃類台灣原住民的舞蹈，我稱之為筋骨舞踏，不論其技巧及音樂如何，我們只充分感受到其善意及真情。

其後與信友打招呼，他們排成一列在使節閣下前跪下，一人接著一人親吻其權戒，而我們也只有手指，他們也來親吻手指，「從有生以來，一輩子被吻最多的時候」在旁的道明會神父笑著說。此間台灣天主教友中間彼此有很漂亮的打招呼的習慣，亦即他們用「願天主賜給你平安（閩南語發音）」來致意，這乃平素傳教士代代累積下來的教導而以這句話作為教友們打招呼的用語。我們日本人乃至於歐洲人「早安」、「日安」、及「晚安」等等招呼語比起來的話，台灣的作法是相當具有宗教的以及天主教色彩的味道。此招呼語的來由乃是原來中國人之間是沒有的，他們只以「呷飽沒」，亦即「您吃飽了嗎？」，而只改以日本式的「您過得怎麼樣？」不論如何都可見是以中國式的口腹滿足，此可見到那些人具有實利主義的缺點，現在經過天主教會的傳教士將之靈性化而改成這種說法，我對這些傳教士之神聖努力既感謝又佩服。

參拜完教堂後，眺望內外的風景，都是具有古色古香的時代故事，聽說台灣傳教開始時最古老的聖堂之一。稍可見到一點台灣的味道，經過六十年以上的歲月，比起自己更古。菩提樹及椰子樹高聳其旁十分繁茂，豬群左右走來走去找東西吃，他們所謂的小孩子（閩南語）赤腳各地跑跑跳跳，所講的話可是聽不懂。若在日本內地應該是四面雪景的銀色世界而此間是完全最熱的時節，人人都是夏天的裝束，人人的樣子仔細看來跟我等不同，自己是從外國來的，更感覺到自己來到中國人的國度中，而自己深深感謝天主自己生來是日本人。（上集完）

（1923/4/15）（中）頁 39-45.

在高雄參觀主要的是：

第一乃聖道明會的修女院及其經營的孤兒院與初學院及女傳教員學校。修女院其實只有三位修女，為了避開赤熱的大太陽，房子蓋得很古色盎然，看起來很像中古時代意大利或西班牙或法國的修道院，相當陰鬱的建築，一進其中感到肅然，決無陽剛之氣，而一提到西班牙則立刻勾起地理的以及歷史的快樂氣息，但在此地台灣孤島上充滿陰柔之氣的孤兒院及以婦女為主的事業由這些西班牙修女從事，一生奉獻事主，其神聖之信仰，其對神的超自然的愛也施給人，又其獻身及犧牲的勇敢精神，若非信仰的恩賜及結晶是不可能的，此為人精打細

算所無法想像到的成就。

這些女子在此修道院中將孤苦無依的孤兒當成自己的子女一般來養育——包括肉體與精神在內的孤兒院事業是非常不簡單的工作，而在我們日本此種成績乏善可陳，反而在中國或台灣據說有其效果。何以在我日本沒有相當的成績，這可從日本人的性格、家庭及國情等方面來推測，是值得深入探討的問題，特別是以救靈事業標榜博愛的天主教的一種慈善事業，也可以說是一種副業而言是更重要的。

可憐的是自從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物價大漲，匯率市場頗不利，此孤兒院事業想要擴大卻是完全不可能了。沒有具義氣的慈善家，每個月只要約十圓就可以使一位孤兒得到很好的教養，如此，則每月酒錢或衣物錢省下來即可拯救一位孤兒的靈魂及肉身，應該可說，這是一種很有智慧的用錢方式。

「此道明會修女的其他事業有訓練女傳教員及培育修女，特別是女傳教員是很有急需的，而其效果又頗大。按台灣婦女由於漢字關係很少有讀書能力的，因而若要研究教理及其他宗教事務多由口授方式為捷徑。然而只有神父一人要持續對數百位男女老幼教下去有其困難，為補此不足，遂有男女傳教員之培養為主，而在高雄即為培養此女傳教員之地。該女畢業之後被派往各地，以口傳方式傳授小孩子要理，並親自傳教，實在對教會內部幫助甚大，而這些人又欣然接受此光榮的天職。

參觀的第二項是台灣街與台灣性情，所謂苓雅寮原是在高雄的台灣本地人的街市，狹小又髒亂，太陽很難照射得到的相當麻煩的市街，決不是令人愉快的。是政府批准迄今仍為抽鴉片之處，其販賣店所在，生意很好實令人同情的亡國之民，前來購買的人多為臉色憔悴枯槁的模樣，恐怕未能改掉此惡習。

日本人與台灣人在性情上的比較有很大的不同，可以提到的有幾點。日本人常常令人敬而遠之，而台灣人像小孩一樣容易親近。通俗地說看起來帶有較容易不怕生的特質。日本人一開始見面時頗客氣，很重視禮節，待人很鄭重；反之台灣人則一開始就不怕生，超越禮儀，與其說是尊敬，不如說是令人親愛。我自己目前住在高雄教堂中，每次經過教友家庭時，教友們見到我都會在自己家中打招呼，雖然我不懂他們的話，但他們卻講個不停，令人有一見如故之感。在講話時其姿體語言很豐富，很像南歐諸國的人民。

第三，我們去到離高雄約有三里路的地方，那邊有台灣的原始人——據說恐怕是與今日之菲律賓人同一人種的吧——，我們見到其村落並與其中的百名天主教信友接觸。這些人與中國人同族系的台灣人完全不同種，是相當原始的人民；而本人在與這些人接觸時，絕無裝腔作勢，十分天真無邪的小朋友可以感受到其天真瀟灑的快樂氣息；而且同時這些人返璞歸真的神情令人覺得十分的可愛。

以讀書等方式將這些人加工是很不好的，使得原始人的天真無法保持，令我想到夏目漱石的話：「希望見到一出生落地之時的所有人，我要在他們之前伏地朝拜」，我想今天自己實在是很幸福的。我想有必要考慮體面超越與普通人的講話，也有必要基於善意，進入旁若無人的境界，不，甚至於有必要考慮這樣生活。

有一天使節閣下應高雄州政府的好意而與我們一同被招待乘船導覽高雄港的內外，記得是一月二十二日的一個好天氣，陸上仍是天氣熱而海上很清涼，譯者用英文很詳盡地將此港口的沿革說明，以及在台灣居住的舒適，在此二

三年之後可能就不要回去日本內地等等有關自己身世的話也講給我們聽。此港可以容納數千噸級的船停泊，狹窄的港口四週有山岳自然圍住，荷蘭時代起就有燈塔存在，但是目前不點燈，如今只講述一些以前的故事，在遙遠的外海西北邊應該有澎湖群島，而其對岸的中國大陸則當然是見不到的。只有蒼茫的海水從中國方面湧來，一脈相通。夏的海實在很棒，水，躍動的水給與人清晰的思路，然而若無綠山相伴則終顯單調，而高雄有山有水是南台灣的要港。

在高雄之南有萬金庄，我們一行人於一月二十四日前往，該日天氣很好，汽車開到潮州，其後約五里路乃以手拉車載行，眼前是綠油油的台灣山岳縱斷之地，其英姿及清新的空氣，使在身居紅塵萬丈下的我能像看破一切的原始人，其所住之處乃十分天然，絕無人工之造作之迹，毫無裝飾，絕無造偽的純粹天然，極富吸引人的氣氛，令人想起這不是耶穌在出來傳教前在曠野中四十天的隱居之處嗎？然而自己不過是凡人，來到山中卻眷戀都市，而來到都市卻又嚮往山中，畢竟山及都市都不是我的東西，只好斷念。正在一沈思一邊眺望那些平原與山巒時不覺已近中午，很快就要到達教堂了，這時先來到旌旗飄揚，伴隨著樂隊出迎，並見到了第一批教友，群集在使節閣下的車前，照例大家親其權戒，而車伕因而跑不動，連步行都無法，只能停留在車上，這種情況再三發生，而西樂與台灣樂交相亂奏，越過一望無際的水田，再從遙遠的群山中傳來回音；此間風景可說是，如果手中有一枝彩筆，便可畫出入選的佳作題材。然而不能說達到萬丈，而自己卻完全在十丈內的黃塵包圍中，以前的那種清楚的氣氛及人間仙境早已消失不見了。

萬金庄是台灣原住民接受漢人歸化的村落，然而未接受歸化的人仍住在山麓中，與之為鄰，到達此村之時，也就是到達圍繞有熱帶樹林的教堂時，想到十二年前見到的檳榔嶼的郊外，然而當時只見到有半裸體的黑人在路旁，氣味不太好的不愉快感覺，而今天在這裡有不招即來的信友們十分可愛，在一定的進堂式結束之後，打開教師館的門窗之際，有原住民武士的跳舞，聽到高亢的台灣音樂，並有其他地方金錢買不到的場景。跳舞也好，音樂也罷，其色調及表現，在台灣不論是自然或是人的情緒，我認為都是很誇張的，是毫無人工雕琢的歡樂氣氛。

雖然自己本來是胆怯的個性，但喜歡冒險的事情。來到遙遠的台灣，有名的斬首的原住民的生番以及熟番等若沒有見到就回來是如何令人無法忍受的遺憾。我自己有很想見到這些人的願望，而今天正好有這樣的機會，是命運吧，在此萬金庄到達的黃昏，有一群蕃人，稱之為蠻人太殘酷，就稱之為蕃人吧，這些人從山上下來，而在教堂門口集合而見面，令人欣喜，受到吸引，到其前面，自己就進去，看到一些年輕的男女，一見到有點像神化時代的古代原始日本人裝束，男子穿著類似夾克的衣服及短褲，打赤腳留長髮，腰間稍前部位佩有類似日本的古劍，手持長棍；而女子頭上有新鮮的花圈裝飾，並佩掛有首飾，手鐲，戒指，耳環等，穿的褲子比男生的長些，手上有刺青；不論男女都嚼著檳榔，因而口中顯出鮮明的紅色，這種模樣看來不得不承認是原始人。看來有慍悍之氣，臉色黑黝黝，樣子及氣味都不好看，我自己被他們的魅力所吸引而接近，但同時也有說不出的幾分胆怯，只是裝做無事的樣子和顏悅色地一步步靠近他們，從外表看不出來的樣子，我怕他們也害怕我而一步步退卻而溜走就糟了。我略以點頭打招呼向他們表示懷柔，此招果然有效，他們看來多少有點安心，不久我得以接近他們，然而言語不通，陪著他們的有公（譯者按，應該是從台南來的游智謀神父，Rev. Eutimio Perez, 1920-1923年為台南本堂）神父，他是一位西班牙道明會的傳

教士也是能使用台灣話的雄辯家，他的台灣話此時也無用武之地，無法之餘，看到他們帶劍，要拔出來，得寸進尺的樣子，看起來這些刀劍像是博物館中的貴重品的日本古代刀劍，其上又有裝飾彫刻。這些人看來也不像是會將人頭砍下來的樣子。依據附近村人以本島語言的說明，那些人是與村民以「以物易物」的方式進行交易，從山上以此劍將樹木砍下來，並帶來此地交換鹽、火柴及米等等；婦女等人相當害羞，有點像日本能幹的婦人，他們恐怕是我等日本人的祖先或也未可知。我們因為他們的話一點也不懂而有點焦急，幸好有些台灣人能與他們講一些話，又恰好可以通過有公神父請這些台灣人將他們的一二三四，或父母兄弟姐妹，日月星辰，火石等，手足眼耳鼻口牙齒、人、兒童、女子及老人等問他們怎麼講，而將其一一以羅馬字加以記載下來，中國話是單音字而相反地他們的話是像日本話的複音語，但是與目前我們的日本語很少有共通之處，而且我推測我們這些人乃是阿爾泰蒙古種，並且是後期的複式組合的混雜人種，而他們卻是菲律賓土人的漂流人種自行流傳下來的，不可思議的是，「是這樣吧」的句子所發的音與字的用法與法國的 oui 完全一樣，不論如何與這些不可思議的人種面對面半小時自己就可以感受到其歡樂氣息而覺得難能可貴。冬天的白晝在台灣比較長，此地的六點鐘相當於日本國內的七點，住在五六里的山道上的那些人，回到綠色的山中，夕陽西下，婦女催促大家返回自己的家中，離開俗界在充滿清淨空氣的山中，是這些人的家，我自己學到蕃語的「謝謝，再見」兩句話。(mali, wuyeku)，他們當中有一人以日本話說了謝謝再見，而令我不知所措。

1923/05/15(下)，頁 26-32。

一月二十五日聖保祿皈依的瞻禮日，我們從萬金庄的原始村落出發，回到高雄，遠眺在晴朗的日光之下，又有值得讚賞的茂盛的竹林，仰望老樹亭亭玉立，直衝雲端，而聽說若有不同的形狀的在此地還有人當做神加以祭拜，不禁令人感到憂愁悲哀。那些人頑固迷信的心靈在此地還很強，在祈禱使靈明光照此地加惠此地之後離開此村。村裏的教友列隊數百公尺歡送使節閣下，隨隊的有三種樂隊，西樂、台樂及蕃樂……本來以為送行僅有一小段路，歡送的路有三里長。他們從心深處呈現的對我們的感謝，我們也在降福他們後告別而去。這次道別是在現世的永別。我們再度到達潮州車站，汽車在下午五點回到高雄。

二十六日上午離開懷著深情的高雄一地，到達台南。台南是台灣的首都，此地有名勝古跡，台南有優雅的氣質，教會離停車場不遠的一處安靜所在。只是作為新的傳教地區，教友數目很少。這個聖堂也有一個小的日本式的教師館，讓我印象深刻。到了聖堂後按例前往進行入堂儀式之後，前去拜訪台灣州廳的知事。地方當局派遣汽車附上譯員帶我們參觀市內的名勝。照例有公園及博物館等地，較少見的是歷史上的荷蘭 Providential 城，作為開山神社的日本今日稱呼的國姓爺廟及孔子廟等。中國式的建築在此可一覽無遺。以前在中學時代聽到老師講十八史略等書時有所謂的「登龍門」，來到孔廟後才初次了解，自己也從此登上龍門。自己以後將像龍一樣地青雲直上，想到此自己不免不好意思地笑了起來。

台南教會的本堂神父，台灣的教友稱之為「有公」(亦即前文提到的游智謀神父)，他是年青的活動家，利用使節閣下訪問之際，開始進行晚間的佈道大會，用三百燭光的電燈將教堂照得無一處不是光明非凡吸引路過的人，其中以

中學生及女學生居多，這些人聆聽日本神父純日語的講道，以試驗其日本話的功力，令人誇讚。而使節閣下本人對聽眾以法國話講道，我則將其譯為日本語給聽眾聽。此外，道明會的兩位傳教士用台語佈道。眾人都驚嘆他們能說如此流利的台灣話。有位日本警官比他們早來台灣，但卻誠實地告訴我他是萬萬不及這些人的語言能力。聽說台南又是台灣物價便宜的一個地方。有公神父的導遊之下，逛了台南的商店，心中深深吸收了台灣的味道及氣氛。

從優秀的台南出發，二十七日下午五時許，到達埔姜崙教堂。第二天從早上出發約十一點的時候順便訪問了斗南教會，此地是一個小的神父巡迴視察時的分堂，只駐有一位傳教員，小小的聖堂兼講道理之處。從此處我們一行上乘坐大日本製糖會社的小火車向虎尾的總部前進。這天該公司聽說使節閣下經過，乃邀請大家以及當地的傳教士一起吃午餐。公司還特地派了一位翻譯來斗南陪伴協助，接待週到，歡迎熱烈。此人出身慶應大學，本身是基督徒，英語非常流利。在他引領下乘坐會社的輕便火車，下午一點到達公司。公司董事鈴木重臣以及公司多數員工迎接我們，一行前往公司的清交俱樂部吃午餐。使節這一行教會人士共七人，與公司的人加起來共約二十人，實在是一盛宴。更重要的是在公司這邊的人都很誠懇熱心令人感到很溫馨。餐桌上也偶而談及宗教的問題。天主教的傳教士來到傳教的地方而不再歸國，在工作之處奉獻一切，除了生活費以外，並沒有其他的俸祿，依長上的命令派往工作地，一生不結婚等等事情，同時也聽聽迄今發生的新鮮事。公司董事則表達：「本公司的職員也有類似的看法而無不平之處，大家多為達到快樂滿足的幸福生活而使公司日益發展」等這種期望。在吃飯後甜點的時候，共有鈴木董事，社長藤山雷太表達對使節閣下歡迎之意，而且也對公司中信教的員工表現之忠實勤勞表示感謝。對此使節閣下也對公司之盛情款待宗教人士表示由衷謝意，並且對於員工的忠勤深表欣慰，同時將天主教的精神體現而希望公司諸人也能傳佈此精神，以此代替對員工的致意。宴會後大家一起攝影留念。如果我自己從鈴木那兒預先知悉一切，早可將使節閣下從皇室所頒授一等旭日大綬勳章帶來佩掛，這連做夢也沒想到的事，我把原可在台北預備好了勳章的事，將此告知對方後，答稱使節閣下待人溫厚，這本身就令人值得紀念了，而也可以此滿意了。

大日本製糖會社社長藤山雷太受到擁戴而任職，掌控虎尾的大工廠，周圍幾十里鋪上鐵軌搬運甘蔗，從地方上的農民收購得來。同時這些鐵路也供地方上的旅客便宜使用。公司內各種專家從事各種工作，都是很好的君子，天主教友有兩人是台灣人，他們能講日語而正逐漸成為純粹的日本人。兒童們只學習日語。我們大家在午餐後進入工廠參觀，我們日常所需的砂糖的製作過程經過詳細的說明，所得匪淺。大夥對糖廠一再致謝後，乘坐小火車往埔姜崙的方向出發。

此村很偏僻，下火車後大約又花了一小時坐在前曾在高雄坐過的轎子才到達，我們一行人通過了甘蔗田、竹林、樹林、香蕉園及早田等。下午四時半到了教堂，一間平坦且平凡的教會。然而教會在設立的當時受到村民很大的反對，也受到相當的迫害。

一行人在此教堂過了一夜，次日早上完成教堂工作後再度乘轎子到達昨天火車停留之地，中午再到糖廠接受茶果的招待，糖廠也以特別的小火車送我們到一處叫做「樹仔腳」的地方。使節閣下與大家對糖廠的親切招待深深感動。此次我們一行以小台車走了五里路，最後在太陽快下山時的下午六時半到達斗六教會。如此跑來跑去，席不暇暖，結果到了堅固的教堂後才安下心來。

斗六是台灣中部的教會中心，建有很漂亮的教師館，前曾在鐵路線外偏僻之所的巡視，今晚好不容易回到正式的鐵路線上了。台灣教會內出色的教師館進入之時，不知不覺有了安全感。屬於熱帶的教堂的床，雖說是一月天，仍吊著一頂蚊帳，在榻榻米上並無墊被，只有一條被單，睡在其上，如果見慣了這種台灣生活，在你疲倦時也可以安然入睡的。特別是兩三位年輕的傳教士好夥伴從他處教堂前來聚會，所用的語言不幸自己講出來的西班牙語一半是英文一半是義大利文，最後多數人總是用大家都通的拉丁文來交談。天主教的突出的長處於此可見。傳教士之間可以使用全世界通用的拉丁文的優勢。從斗六出來後一行人在次日清早乘坐汽車前往田中，一到停車場，有著與高雄一樣的少年團跳著西班牙式的舞及樂隊來迎接，從車站到教堂約有半里，有轎子接送，諸位讀者可以想像我們一行人在市區內行走的樣子頗像中古時期日本大名的巡行隊伍。目前實際上正是在接受這樣的待遇，實在是並不實用，傷財耗時，然而頗為莊嚴。如此就在眾人環視下我們一行人到達市外的田中教堂，圍繞在多樹木當中，進入種有紅花而其葉子珍貴的庭樹的教師館，與兩三位日本教友見面。

在此地，我看到全部都是竹子製成的家。從屋頂、柱子、門窗等，從一角落到另一角落都是竹細工的商店住宅。這些地方的傢具很多是用竹子做成的。竹椅子不但漂亮而且便宜，頗有雅韻。

第二天三十日一早從田中啟程前往員林，十點到達員林教堂，此地是蜜柑的主要產地，亦即俗稱的「極柑」的生產地。而少年團與我們大家同行，從停車場到市內熱鬧之區有樂隊及跳舞者作為前導，實在熱鬧得不得了。市區繁榮，七月及正月一起來的人潮，所謂人，是路上的行人及站立著的人。屋內瞪著大眼睛跑出來的人，狂叫聲，喋喋不休的聲音的人，跟隨著我們一行人車子的人、受到驚嚇的豬狼狽不堪的樣子、小孩嬉戲的樣子，這是與內地多麼不同的社會景象。

在此教堂中完成一定的禮儀後，見到稍有不同的歡迎儀式。該教堂是一普通聖堂，尚未有可以住宿的教師館。我們要住在離此有四里的鄉下的教堂。此次乃員林教會的教友從未見到過的貴客，為紀念此事，乃為使節一行人，以及從田中等外地來的教友及員林教會中的有力人士，在室外搭起帳篷大開宴席，有百餘人參加。我們一行吃的是台灣式的西洋料理，他們吃的則是純台灣料理，菜色不斷，可見台灣人乃是健啖家。宴席中，有兩三位致歡迎辭，而有英文及西班牙文的翻譯，以便使節閣下可以了解，隨後使節閣下也致答辭。我們一行先吃完後，而台灣教友已是第二輪了，還看不出有結束的跡象。

當天下午兩點，使節閣下以及楊多默教區長坐轎，剩下的我們乘車到約四里外的鄉下一羅厝庄。教友們列隊一直送到市郊，經過野地，水田、竹林、甘蔗田及果園等，走在鄉間小路上西北風吹來稍感涼意，途中經過一道所謂的橋，此橋已壞損，但無人想修的樣子，我們一再從車上下來過橋。為了大家的緣故，今日我認為很缺公德心是台灣人數百年來傳統的缺點。然而，一想到以前中國統治時期，清廷官員壓制的情況，那些人今天所表現的情形也難怪，而令人同情。在途中迎接我們的是一批教友，他們當嚮導向我們介紹這邊的教堂。此地處於安靜的鄉下，屋宇佔地頗廣。聽說這邊教友的數目比員林還要多，我們與教友們寒暄過後，接著與校長及警官一起打招呼。這兩位，其中的一位將全校師生集合在校門口列隊歡迎我們；另一位則將台灣的警佐集合起來，在使節閣下通過時，表示敬意。這就是如此遇到的人士。

當天晚上，有興趣的教友擠滿了傳道場，與使節閣下一行人共同晚餐，

我們見到約有五六十名的教友，再度致上歡迎辭。台灣話與我無關，因此先樂一下，校長先生以日語寒暄，而使節閣下致答辭等一再的翻譯，有助於我有時間消化。我是想，台灣料理數量很多，吃完後有閒情，能安靜一下也很好。前方的兩邊不止有數十個人一起在吃飯，以自己的筷子互相挾菜給對方，我靜靜地眺望這番光景，看到如此家庭式的共同體的樣子，另一方面覺得這樣嘈雜又是很殺風景的。自己吃飯一種食物要吃好幾次，而且又被勸抽台灣的煙草及茉莉花茶，可說是「無邪氣且毫無掩飾的人」。

第二天三十一日早上聖堂禮儀結束後，攝影留念，與神父們拍了兩三次，從昨天來時路返回。此行與昔日的清朝官員出巡時的場景相似。照例有台灣音樂及鞭炮等之外的約四尺有三四位喇叭手在行列中吹奏行進。其中也聽到有噴吶的聲音。如此的情景，漫步其間實在花時間，而且非常不舒適的冷風天我坐在車上自己想如果能這樣在街上走走也是很優雅的。那樣將很自然而且安詳。悠閒的農民與水牛為友，或是照顧著豬群。年輕的男女一早起來在水田中腳沒入水中地在種田。在我的東方有一大山，應該是日高山吧，但更遠則見不到什麼了。台灣的天空到底如何，現在是不記得了，可能是缺乏清澄的平常樣子也說不定。約十一時到達員林教堂。由於今天就要踏上歸途因而有較大的焦燥氣氛。僅匆匆吃了一簡餐，下午一點，與不會再見到的教會中人一一告別，就像昨天一樣的許多教友及少年團送到員林車站，一點二十五分出發。

汽車向北進行，一改過去的熱鬧，此行少了三人。自己的腦海中儘是這三週來各地旅行的活動樣貌，回憶起來頗有珍奇之感，當天下午六點結束了三個星期的旅行返回台北。

翌日二月一日告別台北，從基隆上了商船笠戶丸，下午四點出發，開往門司，與台灣最後告別了，此美麗之島，內心祈求台灣內外居民永遠美麗，也祈求道明會朝氣蓬勃的傳教士，具有賢明果斷的進取心，更為上主的名而努力。出帆之際，想起在高雄的情形，有一天在房中聽到很大的叫聲，才發現到是一隻壁虎，而令人感到憎惡，住在隔壁的主任神父說，這東西一點都不會害人，反而會吃許多害蟲，我回想起他平靜的語氣，娓娓道來的樣子。

(四) 中文資料：

《清末教案》

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續編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福建師範大學歷史系合編

第一冊

本卷主編 朱金甫 本卷編者 呂堅

中華書局，1996

頁 439 恭親王奕訢等奏陳臺灣及潮汕英艦逞兇案辦理情形摺

同治八年四月二十日(1869年5月31日)

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

竊照上年十二月間，臺灣英領事官在安平地方違約縱兵索費，經臣等照會英國使臣，將領事官撤退懲治等因。于十二月初七日鈔錄照會奏聞，旋據該公使阿禮國照覆，將索去兵費一萬元交還閩省地方官收清，并飭實任領事官郇和回任，先令固翻譯官前往代理，尚未據該公使將如何懲治領事官吉必勳、帶兵官【口茄】噹之處，照覆議結。臣等旋接英桂、卞寶第來函，均稱兵船業已出口，地方安靖，足以上慰宸廑，本年正月，又據閩省咨報福州口川石山，英國兵官有槍斃華民一案。經英桂專摺密陳，奉旨：該衙門知道，欽此。

正在辦理間，又據兩廣督臣瑞麟奏報，潮州汕頭地方，英國兵船又有殺斃鷓汀鄉民一案，臣等查核起衅緣由，或因租地蓋屋，或因口角細故，均經英桂、瑞麟等于起衅之初，飭令該道府州縣即日勸諭紳民妥籌辦理，該領事官理應靜候，乃迫不及待，輒即自行帶人往辦，閩省之案，槍斃鄉民王克明一名，粵省之案，傷斃男婦六十九名，燒毀民房四百四十五間，擄捉及受傷者甚多，似此肆行無忌，必應示以懲創。況近來各口洋人滋事之案，多係英國兵船，亦多起于英國領事官，若不早為禁戢，深恐迫百姓以不能忍受之舉，激成變故，且恐各國紛紛效尤，動輒擅動兵船，履霜堅冰，尤不可不防其漸。現據英桂將川石山租房之案辦理完結，而開槍之洋人，亟應查究的確姓名，其從中聳恿之華人林大恩，亦應交地方官分別嚴辦，潮州案情較重，雖經瑞麟飭令地方官將被害被擾之家給予埋葬賞恤銀兩，所有該領事及帶兵官不容稍事輕縱。臣等已分咨該督撫曉諭地方紳民，妥為安撫。一面照會英國使臣，飭令將各該領事官、帶兵官撤退治罪，暨賠補賞恤等項銀兩，并責問調用兵船之權，何以任聽領事官主持，尚未據該公使照覆，應候覆到，再由臣等酌核辦理，謹將臣等給英國照會二件鈔錄，恭呈御覽。

御批：依議。

夷務清本

頁 480 閩浙總督英桂等奏為密陳將臺灣洋案通英主謀構衅各員斥拿正法摺

同治九年正月十六日(1870年2月15日)

閩浙總督臣英桂，福建巡撫臣卞寶第跪奏，為密陳臺灣洋案現經查明主謀

構衅之武員劣生，請旨斥革，嚴拿正法，以靖岩疆，恭摺奏祈聖鑒事。

竊照同治七年十月間英國領事吉必勳，洋弁【口茄】噹在臺灣安平地方違約妄為，前經臣等將始末情形暨查明洋人在臺并無冤抑緣由，恭摺奏蒙聖鑒。嗣承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來咨，以英國公使照覆內所敘各節與咨報不符，令即逐款指駁。復經臣等飭據前任興泉永道曾憲德，署臺灣道黎兆棠先後指駁，并摺稟覆，均即咨呈總理衙門核辦在案。

伏思臺灣洋案既經臣等派委曾憲德渡臺查辦，何以吉必勳始則推病不見，及接晤後，首以撤臺灣道為請，約外要求，迨曾憲德再三辯論，并將各案與之當面議結，吉必勳已無異言，何以復令【口茄】噹開炮占署，逼死副將大員，傷斃兵勇，焚燒局庫。曾憲德等馳赴安平，向吉必勳、【口茄】噹面詰，該領事，洋弁又互相推諉。至臺灣縣廩生許建勳與其堂兄許廷道涉訟，于洋案毫不相干，何以吉必勳出為力爭？恐有內地奸徒從中主謀構煽，至啟戎端。臣等于黎兆棠赴任時，囑其密行察訪。茲據黎兆棠稟稱安平之役，構衅雖由洋人，實則廩生許建勳、副將蕭瑞芳主之，英人必麒麟者，海關之杆子手也，因事逐出，許建勳月以洋銀百圓雇之，開設怡記棧，冒稱洋行，用必麒麟作爪牙，私販樟腦，為前護臺灣道梁元桂拿獲，適其堂兄許廷道呈控吞騙家產，發交府經歷看管，乘間脫逃，遂託必麒麟重賂吉必勳，必撤梁元桂而後止，此許建勳主謀啟衅之實跡也。【口茄】噹兵船駐四草湖，本係吉必勳調往恐嚇，并非有意開仗。因蕭瑞芳覬覦安平協之缺，該員向通洋語，寅夜駛杉板船偷見【口茄】噹，煽其必開炮而後事可成，費可索。【口茄】噹信之，遂開炮占署，勒索兵費銀元，此蕭瑞芳主謀逞兵之實跡也。蕭瑞芳原名蘇阿成，籍隸廣東香山縣，駛船為業。咸豐六年充華艇船主，領洋人旗幟以為護符，其時因縣役緝匪，逕到該艇查拿，誤將洋旗落去，蕭瑞芳即稟領事巴夏禮，謂中國故落其旗，失洋人體面，極力煽惑，因此構禍。先攻粵城，次由天津直犯京師，蕭瑞芳實為禍首，即無安平之役，亦已萬死不足蔽辜。至其煽攻安平之據，則洋人夜入協署時，有廣勇同往搶掠，副將江國珍逼死時，其家人目擊蕭國珍立於對門，至今臺民猶有見其夜駕杉板，私泊洋船者。此案與洋人辯論，自當以吉必勳，【口茄】噹為罪魁，然律貴誅心，許建勳、蕭瑞芳二人之罪實在洋官之上，現在許建勳日引洋人深入內山，蕭瑞芳私造戰船，希圖出海，若不將蕭瑞芳等明正典刑，後患伊于胡底，擬即拘案懲辦，惟事雖實情而案難傳質，勢必狡展，且皆與洋人聲息相通，稍緩須臾，即恐別生枝節，可否准予從權辦理等情，請示前來。

臣等查蕭瑞芳、許建勳或係武職大員，或已身列青衿，應知大義，乃一則懷挾私嫌，一則欲謀署缺，輒為洋人主謀，違約逞兵，肆行要挾，幾開邊衅，已屬罪不容誅，而蕭瑞芳前在廣東構煽洋人，至有庚申之變，尤為普天同憤。臺灣孤懸海外，久為彼族所垂涎，今蕭瑞芳又私造戰船，許建勳引洋人深入內山，後患誠難悉數，黎兆棠請將蕭瑞芳等明正典刑，係為做官邪懲奸逆并圖綏靖海疆起見，相應請旨將花翎留閩補用水師副將蕭瑞芳即行革職，臺灣縣廩生許建勳即行斥革，一并嚴拿正法，以伸眾憤而絕禍根。

是否有當，謹合詞恭摺密奏，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軍機大臣奉旨：另有旨，欽此。

軍機處原檔

同治九年五月初一日(1870年5月30日)

閩浙總督兼督福建巡撫臣英桂跪奏，為主謀洋人構衅之要犯，現已遵旨正法，恭摺密奏，仰祈聖鑒事。

竊臣前因臺灣洋人違約逞兵各案，飭據署臺灣道黎兆棠查係副將蕭瑞芳、廩生許建勳主謀構衅，經會同福建撫臣卞寶第，恭摺奏請一并斥革，嚴拿正法。嗣承准軍機大臣密寄，同治九年二月初五日奉上諭，蕭瑞芳、許建勳均著先行斥革，英桂等即密飭黎兆棠迅將該二犯一并嚴拿正法，以絕後患。惟該犯等與洋人聲息相通，而必麒麟因扣留樟腦一案，屢唆駐京英使向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曉瀆，此事辦理之後，該洋人能否不致另生枝節，滋擾地方，該督等惟當責成黎兆棠妥為辦理，將此由五百里各密諭知之，等因，欽此。仰聖慮之周詳，切下懷之欽悚。遵即恭錄密行黎兆棠，欽遵諭旨，妥為辦理。

茲據黎兆棠密稟，許建勳先與兄弟控爭家產，又有民婦屠孫氏控其欠債，適因該道與領事官爭論腦案，以理折服，許建勳知洋人勢無可恃，即行潛逃，一時驟難弋獲。密查蕭瑞芳與洋人無肝膽之交，不過隨時賄買以為護符，英國現任領事有雅芝，人雖狡猾，尚愛體面。上年后壠腦案，合前領事固威林，美國領事李讓禮全力相爭，終至認錯而後已。今年調兵船來臺，該道屹不為動，亦俯首帖耳而去。洋人未必為蕭瑞芳復仇，但恐辦理疏虞，洋人中梗，或致棘手，遂日以鄉誼與蕭瑞芳多方籠絡，層層佈置，俱甚謹密。本年四月初四日由代理臺灣府知府祝永清押蕭瑞芳至道署，因思欽奉密旨，未可全宣，恭摺數語，飭府縣宣讀。又於軍機大臣字寄之前，掇入有人奏蕭瑞芳即蘇阿成，此人係屬欽犯數語。所以必指出蘇阿成者，俾該犯知獲罪有由，所以渾稱欽犯者，恐洋人事後饒舌，則以海洋強盜接濟賊匪等事著其罪狀，以杜洋人之口實。即于是日將蕭瑞芳押赴市曹正法，閩郡紳民歡聲雷動，共懾天威，并無一人預知底蘊，即臺灣鎮府至今亦未見全案，察看情形，臺灣洋人斷不至從中作祟，設或無理取鬧，該道必有詞以折之。至許建勳如何辦理，容隨時妥籌，務使一塵不驚，所有蕭瑞芳私造戰船，已飭毀拆，估價充公等情。

臣查蕭瑞芳先在廣東，原藉煽惑洋人構禍，至今流毒海疆，繼又在臺偷見洋弁，唆其開炮占署，釀成巨案，實屬殺有餘辜，黎兆棠痛念庚申之變，密籌懲辦，為普天伸公憤，為海疆除隱患，皆係激自血忱，且辦理深合機宜，洋人不至另生枝節，堪以仰紓宸廑。

除密飭確查許建勳蹤跡妥籌辦理外，臣謹恭摺密奏，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再福建巡撫係臣兼署，毋庸會銜，合并陳明。謹奏。

軍機大臣奉旨，另有旨，欽此。

(軍機處原摺)

《清末教案》二冊，(1888-6)頁470-471

頁929 台灣巡撫劉銘傳奏為台北屬教案償銀

清由防費項下造銷片

光緒十四年正月二十二日(1888年3月4日)

再，查光緒十年間法人構釁，台北府艋舺、錫口、三角涌、新站、和尚洲、大龍峒、水返腳等處，英國原設教堂七所，先後被民拆毀。經臣于法事定後，飭

派署台北府知府劉勛，會同通商委員浙江候補知府李彤恩分別查辦。疊准英國領事費里德轉據教士將各教堂及所失物件估贖一萬二千余員，開單照請籌償。當飭李彤恩覆勘各處，核實估計，邀同領事及教士再三議減，反復商辦，允以一萬圓了結，折合銀七千二百兩，飭發承領，由臣照會事銷案，並咨呈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查照在案。

伏查中外交涉有非常用之款，閩省歷經奏准造銷。此案拆毀教堂，系當法人滋事，居民未知砥別，相率拆毀，以抒義憤，與尋常民教不協，因而肇釁者有間。所給前項教堂償銀七千二百兩，應請在于海防經費項下作正造銷，由通商委員候補知府李彤恩詳請奏咨立案前來。

臣覆核無異，除咨部查照外，所有法防案內籌給英國被毀各教堂一款，請由防費項下動銷緣由，理合附片具陳，伏乞經鑒，飭部立案施行。謹奏

硃批：該衙門知道。軍機處〈光緒朝月摺檔〉丁日昌片(光緒三年(1877)年2月27日)

再臺北淡水廳轄境五六百里，官長威令之所不及，天主教因而簧鼓其間，數年以來尤覺恃勢橫行，無惡不作，臣於去冬路過艋舺時，訪知該教民等魚肉鄉里，稍有身家之人，被其凌虐，不可勝計。必遵逼使入教，而後始安死生。其尤甚者，有該廳所轄之和尚洲民人李東面，並子李先登即李溫岸，倚侍入教多年，自稱教首，疊犯各案，拒捕傷差，實堪痛恨。當經查吊原卷，該犯李東面父子積案累累，後因同教霸產，業控經該廳同知陳星聚訊斷歸還原主，李東面父子恃勢□訟，糾合教黨李顏等多人，於上年八月二十五日乘陳星聚在艋舺倉署審斷之際湧入遞稟，齊聲吶喊，李東面並持刀闖堂，經紳民舖戶公憤，當場擒獲，復於李先登，李顏身旁各搜出小刀一柄。交驗提訊，供認不諱，並據舉人張書紳等及郊行舖戶稟請就地懲辦，萬口一聲，咸以該犯李東面父子不除，地方受害無已各等情在案。臣到郡後飭臺灣道夏獻綸、署臺灣府向燾據實覆訊，詳稱供證確鑿，請照光棍為首斬決例斬立決等情前來，臣細核案情，遍訪輿論，該犯李東面父子恃教橫行，罪惡昭著，從前該處地方官多屬因循畏□，凡遇教民犯法之事輒將就敷衍，釀成靡所不為，現在若不嚴加懲創，予以顯戮，誠恐教民見法之不足畏，趨附日多，百姓知冤之不可伸，怨毒日積，於風俗人心所關非淺，當即批准，將犯法教民李東面、李先登二名就地正法，俾萬目共覩，稍挽頹風。其聽糾從犯李顏、陳得、陳士美、陳炎四名，當李東面闖堂時僅站堂下吶喊，尚無逞兇情事，從寬貸其一死，飭令鎖繫石墩，永遠不准釋放，以儆凶邪。臣為殄除民害，使教民稍有忌憚起見，不得不變通辦理，所有教民倚勢逞凶，變通嚴辦緣由，理合附片密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台灣日日新報》 昭和 11 年 (1936) 8/22 11 版

私立靜女校改革 小宮氏將就任校長

由教會分離組新財團

屢報今川台北州知事。已著手改革之淡水中學。將見圓滿解決。而知事非僅欲改革淡中。且將對州下一切私學。努力改革。即于五月下旬。對靜修女學校。及國民中學。台北中學等。各私立中等學校。令其提出學校計劃案並改善案。蓋為國民精神養成上。校長欲用內地人。惟對宗教學校。於其教育方法。雖認其加味宗教的情操。然于國民教育與宗教教育之間。不得始有混同此點須為嚴戒。知

事將以此主旨。從速認定中等學校。故對前記私校責任者。就其改善措施。屢次折衝。已見漸次具體化。就中私立靜修女學校。為欲早得認定。自前即著手新築校舍。並圖充實職員等。一路邁進。經已漸次實現。茲為顧慮知事方針。將率先由財團法人台灣天主教會分離。組織新財團。以當經營學校。且校長杜馬斯氏。決定勇退。內定該校顧問小宮元之助氏為新校長。以其改革徹底。右據今川知事所談如左。為圖中等教育機關設施擴充。並州下私立中等學校改革充實所關。已對各學校當局。命其講究對策。者番財團法人台灣天主教會所經營之私立靜修女學校。亦體當局之意。為其改革第一階段。率先任命內地人為校長。且對學校經營機關。亦將由教會分離設新財團。以當經營之衝。此案由學校當局。屢與教會一邊折衝結果。茲得馬尼拉駐在大管長正式承認因得具體實現。此後將對學校內容之刷新充實。一路邁進。俾得從速認定。顧現任校長杜馬斯氏。自大正十一年。該校設立認可以來。多年為校長。盡瘁校務。者番自行勇退。而初代內地人校長。內定小宮元之助就任。惟小宮氏因社會的事務多忙。現尚固辭。第氏自該校創立以來。即為顧問。關與校務。且學校設立者一邊。亦極力懇請。經得其內諾。該校前途。頗多期待。一面因與淡水中學即淡水女學校問題。同時解決。於州下教育界。可為額頌云爾。

〈雲林縣傳教史略〉

一. 斗六教會

斗六地方，本是平埔番 Lochua 族居住的 Taulak 社(又名柴裏社)。平埔番始於康熙末年，移住此地開荒，結成部落。乾隆初年，有泉州人楊仲熹招集漢人來此開店行商，逐漸繁榮。迨台灣被日本竊據後，隨將 Taulak 社的名稱，改為斗六。

光緒八年(一八八二)，始有王靈牧神父(Jose Nebot O.P.)由沙崙仔教會來斗六傳教，建立教會曾有教友數十人。迨日本侵略台灣後(光緒廿一)。土匪流氓蜂起，斷絕交通，劫奪民財，焚毀教堂；流言蜚語，到處皆是，說神父是洋人的間諜，領導日軍攻佔台灣，污言謗語，一言難盡；並出賞格：「凡拿到神父，賞三千白銀，殺天主教徒首級，每顆白銀一百元」等。甚至把聖堂的祭服儀器，打劫一空，教堂燒毀成一片廢墟。至今談及，猶令人悲痛不已。光緒廿二年十月，日軍攻佔斗六後，為保護教會及安民之計，乃捕殺流氓及不法之徒。那時神父獲悉其中有無辜之人，以惻隱之心，秉承耶穌博愛精神，毅然出面與日軍交涉求情，釋放了不少人。不料因此善舉，竟惹起無知的教外人妒恨，誤會神父與當地匪徒朋比為奸，是土匪流氓的保護者，天主教是惡教。一人傳虛，百人傳實，謠言四起，以致再無人敢奉教，因此當時在斗六傳教，實是一大困難！

三年後(一八九八年)，高熙能神父(P. Giner O.P.)重整旗鼓，任勞任怨，冒了生命危險，到處講道，並找回前斗六逃亡的十餘教友，有日軍駐紮，始得平安傳教。他在百忙中，又在雲林縣境內，開設數處佈道所，派了許多傳教員去主持。當時交通不便，車輛很少，來往路途，只靠兩腳安步當車。高神父日常生活非常刻苦耐勞，吃的是青菜地瓜，住的是竹屋草寮，穿的是粗布長衫，節省的經濟，皆為傳教費用；在台灣傳教史上，實乃模範超群的老功臣，使人敬仰追念不忘，(他在台灣光復後民國卅六年三月十日，德備功全，主賜永安，善終於員林羅厝庄，享年八十六。)

民國七年(一九一八年)，西班牙道明會總會長，巡視教務至斗六，不忍教會荒廢，遂捐助許多金錢，命游神父(P. Eutimio Perez O.P.)興工建築磚造二層樓房，樓上是神父住房，樓下是臨時教堂，為斗六教會再放異彩。後游神父被調往臺南，由洪神父(P. Angel O.P.)主持，再後接任神父是白神父(P. Philippe O.P.)、德神父(P. V. Parada O.P.)、包神父(P. Faustino O.P.)、山神父(P. Sanohez O.P.)「他因病回西班牙善終」。光復後三年，山神父在任時，嘉雲曾發生大地震，該樓房倒塌。

民國卅四年，日本主教里脇淺次郎，再議集資重建，後因日本軍閥阻止而停擱。民國卅八年八月二十八日，筆者由高雄到斗六接任，重整一切教務。民國四十二年三月，新任主教牛會卿至斗六巡視，並召集數位神父開會討論，認為嘉雲教區的教友多集於雲林區域，所以他決定以斗六為教區中心，捐出數十萬元，興工建築主教公署、主教座堂等。此後歷任本堂是國籍神父：方懷正、石汝昌、江多默，現在苗懷竹。

二. 樹子腳教會

光緒廿三年（一八九七），樹仔腳林有才先生，因事到員林羅厝庄，偶然在那裡聽道，遂請神父到他家佈道，並召集鄰居親友入教，又把他的房屋暫借一部分，充作佈道所。當局遂派洪瑕玉神父（P. Angelus O.P.）去主持開教。洪神父不辭勞苦，日夜講道，他會講一口流利的臺語，甚得當地人的歡迎，因此進教者日增。光緒廿七年（一九〇一），遂即購地建築土質聖堂「本地人稱土角」。越三年，又重建木造聖堂，神父的竹造宿舍。迨至民國十九年（一九三〇），白神父主持該處本堂時，因恐木造聖堂被白蟻蝕倒，又再提議集資興工，重建磚造聖堂，當時教友數目將近四百左右。且每次大瞻禮及本堂大聖若瑟主保日，各地教友都到樹子角慶祝望彌撒，以致聖堂不能容納，大有人滿之患。為此於民國廿九年（一九四〇），斗六德神父兼管樹子腳本堂時，提議把聖堂加寬增長，並委任某某先生（醫師）監工並管理帳目。工程將近完成時，因帳目不清，德神父與某某先生各執一詞，互不相讓，遂起衝突，鬧的天翻地覆，起初只辱罵神父，而後竟敢公然毆打神父。當時西班牙楊監牧(Thomas de la Hoz O.P.)遂下令將某某開除教籍，某某不但不悔改，反而變本加厲，當時正值中日戰爭第二年，他藉日本軍閥的惡勢力，控告神父是間諜，應予驅逐出境，並禁止教友進堂望彌撒，違者皆被警察拘捕處罰，以致教友裹足不前，談堂色變，門可羅雀連最有聲望的老高公神父，亦被侮辱不堪！某某的父親臨終時，亦不准領臨終聖事。回想當時的教難，實令人膽寒痛心不已！

民國卅年九月十二日，台灣教區在台北召開一臨時大會，討論結果，遂委任筆者為全權代表，由台北移居樹子腳達十個月之久，維持教務。筆者先往訪某某，曉以大義，促其悔改。然後到警察局，以種種的方法，並得刑事組一個好友暗中幫助，使得消除誤會，撤銷禁令，經過數月的苦心奮鬥，才得雙方諒解，一場風波才逐漸平息。而筆者調到高雄，樹子腳教務由包神父去主持。

民國卅八年，重劃教區風聲，傳遍全島。所以西班牙神父大部分調到高雄；包神父亦調到萬金庄。當時筆者趁此好機會，要求陳若瑟監牧，將筆者調回中部，住在斗六兼管樹子腳本堂。

民國四十三年正月牛會卿主教決定每一鄉鎮，要有一座教堂，所以命筆者為開路先鋒，到林內去開建教堂。而樹子腳的教務，委託給國籍神父—臧詳明及高樹人兩位去接管，現在李西滿。

八、附錄

此部分主要為臺灣天主教歷史的大事年表，並與大陸天主教歷史相對照，以供讀者比較參考。

年代	台灣	大陸
1661	鄭成功逼降荷人，建立鄭氏王朝。	清順治帝命令「遷界」北起山東，南到廣東沿海居民一律向內地撤遷 18 公里。
1662	鄭芝龍在北京柴市被斬首。 鄭成功在台灣住十三月又七天後	

年代	台灣	大陸
	病逝，子鄭經繼位。	
1663		科舉廢八股文政策論。
1664		楊光先興起曆獄，誣告湯若望，又著「不得已」書，散佈誣言。 1650-1664 年全國增加教友十萬人，是年全國教友共約二十五萬四千八百人。
1665		羅文藻神父今後數年，一身獨任全國教務，南北奔走，成績卓著。
1666	鄭經接受輔政的陳永華建議在寧南坊興建孔廟；仿明制，三年考試一次。	
1668		應漢族士大夫要，求恢復八股文取士。
1669		‘禁’天主教。 清廷復還湯若望原官職銜，賜銀建瑩立碑碣石獸，並遣官致祭。曆獄昭白。
1671		是年中國有二萬領洗者。
1672		帝令：著取澳門通曉曆法之徐日昇，來京供職。
1673		吳三桂叛清，三藩之亂爆發。
1674	耿精忠與吳三桂邀鄭經重返大陸，參與叛亂，聯合擊清軍。鄭經率軍佔廈門。	道明會閔明我到羅馬呈遞中國禮儀爭執案意見書。 利類思譯「聖事禮典」出版。
1676		殷鐸澤任中日兩國耶穌會巡閱使。 南懷仁為耶穌會副省會長，接成際理任。 道明會閔明我在歐出版「中國歷史政治宗教概論」，於是中國禮儀在歐引起熱烈爭論。
1680	鄭經敗歸台灣，鄭軍十萬以上官兵降清。	畢嘉接南懷仁任為耶穌會副省長。
1681	鄭經歿，權臣擁立十二歲鄭克（土爽）繼位。	柏應理司赴羅馬，請求教宗准培植本籍神職人員，改用華語經文施行聖事。
1683	施琅攻澎湖，鄭克（土爽）投降，鄭氏二十二年獨立王朝結束。	
1684	台灣府隸屬福建省，下設台灣、鳳山、諸羅三縣。台灣正式納入清朝版圖。	南懷仁為中國耶穌會副省長。

年代	台灣	大陸
	清廷取消海禁，但不許移民攜眷，也不准惠州、潮州客家人移台。	
1686	客家人至下淡水平原（今屏東）開墾。	
1687	允許台灣人赴福建參加鄉試，並有一名保障名額。	四月十四日，康熙令地方官在禁止條約內，將天主教同于白蓮教謀叛字樣，著刪去。
1688		南懷仁卒於京，由殷鐸澤接任耶穌會副省長，閔明我頂補南懷仁治理曆法。
1689		中俄尼布楚條約簽訂。
1690		帝召徐日昇、張誠、白晉、安多等，諭後每日輪班至養心殿講授西學，至數年之久。
1692		康熙降旨，准教士自由傳教，中國人民，自由信教。 馮秉正司鐸以全部通鑑綱目譯成滿文，印成。後又譯成法文。 安多為耶穌會副省長。
1695		閔明我任耶穌會副省會長職。 在中國共有耶穌會士三八人（內六人華籍），西班牙籍道明會士九人，奧斯定會士五人，巴黎外方傳教會士六人，方濟各會士十六人。
1696	施琅去世，惠州、潮州之民始得渡台，客家人開始大量移民來台。	
1697		耶穌會士者加祿兼任中日耶穌會巡閱使。 耶穌會士白晉回法國，康熙送法王甚多禮物，其中有中國書籍，是為法國國家圖書館有中國書之始。
1699		白晉重行來華，同來者有十會士。
1700		閔明我徐日昇奏呈尊孔祭祖之真義。康熙帝宣言中國祭祖敬孔之禮為一種禮俗，與宗教無涉。
1701		教廷任多羅為教宗欽使來華 全國有耶穌會士五十九人，方濟各會士二十九人，道明會士八人，巴黎外方傳教會士十五人，奧斯定會士六人。全國共有聖當會口等二百五十處。

年代	台灣	大陸
1703		禁城內天主教聖堂行開堂典禮。 安多又任耶穌會副省長職。
1705		教宗欽使多羅為中國禮儀問題抵華。四月六日抵廣州，上飭廣東督撫優禮接待，派員伴送來京。十二月四日抵京，上遣內大臣到堂問好。覲見時，賜坐賜酒，並賜筵宴。但一知其目的在禁止中國禮儀，態度立變，令其速離北京。 紀理安司鐸任中日耶穌會巡閱使。 自一六九四至是年，耶穌會士共有八十八人。
1706		康熙出令，凡教士在中國傳教，須領票。又令驅逐多羅顧問嚴禱主教及畢天祥。
1707		一月二十五日，多羅欽使在南京頒布教宗禁止祀孔祭祖令。康熙下令逐多羅。 教廷陞多羅為樞機。 嚴禱主教赴羅馬控告中國禮儀。 十月康熙派龍安國、博世賢、艾若瑟、陸若瑟四耶穌會士，分兩批往羅馬呈遞有關禮儀之文件，並陳述對禮儀問題之意見。龍博二人死於海中。
1708-1717		康熙派西洋傳教士到全中國各地測繪地圖，完成「皇輿全覽圖」。
1714	清廷派耶穌會士馮秉正、雷孝思、德瑪諾來台測繪台灣西部地圖，訂定經緯度。	康熙帝令德理格為中國禮儀問題上書教宗。 三月十九日，教宗格來孟第十一又頒諭令遵守一七〇四年對中國禮儀之禁令，並要求教士宣誓服從。
1716		康熙字典編撰成書。
1717		康熙命白晉等測量全國地圖，歷九年之久，至是各省地圖測繪畢，名皇輿全覽圖，是為我國有地圖之始。與康熙永年曆法為康熙時文化雙璧。 全中國教士有四十七位領「票」傳教。
1719	施世榜在二水一帶興建水圳，引濁水溪灌溉二水到鹿港的土地，人稱施厝圳或八堡圳，為清代台灣最大水利工程。	

年代	台灣	大陸
1720		教宗為中國禮儀問題，又遣欽使嘉樂攜國書來華，帶來禁約譯成漢文呈覽，上不悅，並硃批「以後不必西洋人在中國行教，禁止可也」等語。嗣後諸多教難均種因於此。
1721	清廷下令，文武官職，不許攜眷渡台。 朱一貴以復明為口號抗清，這是台灣民變史上唯一佔有全台的事件。首次閩粵移民械鬥。	二月初四嘉樂陞辭，離京赴港。在港頒佈中國禮儀案准行八條。 康熙派馬安能、喜大教攜嘉樂使華經過文件覲見教宗。 德理格因反對中國禮教被禁。
1722	清廷豎石畫界，防漢人入侵原住民土地。	西曆十二月二十二日，康熙帝崩。
1724		雍正准滿寶奏，'禁'在中國傳教，並除在京教士外，全國教士限於六個月內遷移澳門。後復准留居廣州，約有五十位，數年內全國計有三百多教堂被佔。馬國賢率領四位中國少年在義國拿坡里創立聖家修院。
1726	清廷將台灣鹽業由民營改為官營。	
1727		開福建海禁，同時允許廣東人民往來南洋貿易。
1729		雍正令耶穌會士巴多明開辦譯學館，選滿漢子弟，入館習拉丁文。
1732	清廷准許人民攜眷來台。	雍正令圈禁在廣州之三十位教士押解澳門；四月七日教宗格萊孟第十二批准聖家修院及聖家書院。
1733	清廷在台實行保甲法，一家犯法，九家連坐。	
		西曆十月七日雍正崩。
1736		朝廷下令禁教。巴多明戴進賢司鐸繕奏，請乾隆弛教禁，由郎世寧呈皇上。
1737	清廷嚴禁番漢通婚。	巴多明戴進賢又申請保教。
1738		戴進賢任中國耶穌會副省會長。
1742		教宗本篤十四禁止教士再爭論中國禮儀問題，且須宣誓，遵守禁令。
1746		福建巡撫周學健仇教，道明會士被捕。
1748		全國有一百左右聖當充公。
1749		清廷迫令澳門政府不准華人傳習天

年代	台灣	大陸
		主教。
1769		京中謠言教友行剪辮邪術，曆局中二十二奉教官員被革或申斥。
1773		教宗格萊孟第十四於七月二十一日下令解散耶穌會。
1775		中國耶穌會奉令正式解散，由遣使會接管。
1785		各省教難大作，以四川山東及江西最嚴重。
1794		北京主教遣江蘇蘇州周雅各司鐸至高麗開教。
1799		二月七日乾隆崩。
1800		全國教友二十一萬五千餘。
1805		教士德天賜由北京差專人至澳門，寄中國傳教地圖至歐洲，興起教難。嘉慶下令禁教士入內地傳教。
1810		全國有外國教士三十一位，華籍教士八十位。
1811		嘉慶出諭，令西教士回國。在北京供職之教士亦有限制，正式禁教，禁令刻於大清刑律，全國通行。
1814		教宗庇護七世頒諭，恢復耶穌會。
1820		嘉慶於公曆九月二日被雷擊斃。
1827	英人開始到滬尾販賣鴉片。	
1837		鴉片量輸入突破三萬箱。
1838		林則徐為欽差大臣，往廣東查禁鴉片。
1840		中英鴉片戰爭爆發。
1842		中英簽訂「南京條約」，並有保護傳教士一款。傳教士列入不平等條約，教案亦由此而起，實為憾事。
1844		簽訂中法條約，中美條約，准人民自由奉教。
1845		英國在上海設租界，為租界之始。
1848		全國國籍司鐸一百三十五人。
1850	清廷訂「台紳民公約」，以禁絕鴉片並遏阻外人入台。	洪秀全在廣西金田村起義，建號「太平天國」。 道光駕崩（二月二十五日）。
1852		曾國藩建立湘軍，為晚清重要軍事力

年代	台灣	大陸
		量。
1858		與中英中法訂天津條約，准自由傳教。
1859	道明會郭德剛洪保律兩神父重來台灣高雄傳教。	
1860	「北京條約」規定台灣開放淡水及安平港為通商口岸。台灣經濟邁向第一次繁榮。	英法聯軍攻陷北京，毀圓明園。訂立天津續約，規定信自由。中法續約更私增「並任法國傳教士在各省租買田地建造自便」一項。
1861	郇和出任英國首任駐台領事，將英領事館由台南移至滬尾（淡水）樟腦出口達六千擔，成為出口大宗，官府改樟腦為專賣，實施官辦。	
1864		太平天國敗亡。
1865	英國長老教會馬雅各在台灣府城（台南）傳教。	全國有國籍司鐸二百五十七人。
1866		英國傳教士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帶領二十餘教士至廣州，開始了中華內地會（China Inland Mission）在中國的傳教活動。
1867		拯救煉獄亡靈女修會會士（簡稱拯亡會）隨郎懷仁主教於十月回到中國，是為拯亡會在華傳教之始。
1868		英國聖公會傳教士傅蘭雅（John Fryer）正式受聘於江南製造局翻譯館，任翻譯館譯員。在以後三十餘年時間裡，他單獨翻譯或與他人合譯西學書籍達一百二十九部，其中七十七部在江南製造局出版。 兩江總督曾國藩以教士辦理育嬰堂易招流言，請總理衙門及各公使商議禁止。
1869		貴州遵義因紳民在炎帝廟打醮求神驅逐疾病，與教民發生衝突，竟至聚眾數千人，將新老城中天主堂及附設學堂醫館，悉形搗毀，教民被殺二十餘人，法司鐸一名受傷而死，是為遵義教案。 法國天主教教士韓石貞（Plerre Hende）與內地會教士抵安慶，購地建堂，後湖南反教揭帖傳到安慶，時

年代	台灣	大陸
		值府院考試的各地文武考生，在揭帖號召下，反教情緒激昂而約期擊毀教堂，英傳教士接獲消息後，欲前往府署要求查辦，卻遭考生與民眾攔阻，並搗毀其住所，後經英、法使節向總署交涉，清政府遂賠款及懲戒筆事者，是為安慶教案。
1870		天津教案爆發，天津亂民焚毀天主堂，殘殺法領事、教士及仁愛堂修女，引發各國公使聯合照會清政府提出強烈的抗議。
1872		耶穌會士在郎懷仁主教的主持下，成立江南科學委員會，準備開展科學與文化傳教工作。
1873		同治皇帝成年，大婚且親政。
1874		同治皇帝駕崩。
1876		英國聖公會傳教士傅蘭雅在上海創立《格致彙編》，這是晚清最早的一份科普雜誌。
1877		直隸、山西、河南大旱，教會從事賑濟事業，歸化者特多。
1879		羅馬教廷傳信部頒發部令，劃分中國為六大傳教區域。 上海耶穌會中國籍神父李欽創辦了中國第一份天主教報紙《益聞錄》。
1884		中法戰爭在安南爆發。
1885		中法戰爭中，教宗致書清帝請保護教士。
1887		上海耶穌會創辦《聖心報》，為近代天主教歷史最長刊物。
1891		沿江一帶哥老會周漢等散佈謠言，謂教中女醫迷拐幼童，民眾遂焚教堂，丹陽、江陰、無錫、如皋、武穴、宜昌、九江等處先後發生教案。
1894		中日甲午戰爭爆發。 教宗良十三世宣布撤銷在華建立聖統制及與清廷建交的計畫。
1895	清廷戰敗，與日本訂立《馬關條約》，割讓台灣及澎湖列島。	余蠻子在四川倡亂，肆擾十餘州，燬成都天主堂。
1897		德國藉口巨野教案中兩教士被殺為由，出兵強佔膠州灣。

年代	台灣	大陸
1898		戊戌變法失敗，慈禧太后復掌大權。
1899		毓賢補山東巡撫，獎勵拳民。 清廷頒布《傳教章程》。 義和團運動暴發。
1900		毓賢任山西巡撫，拳民起事，北方各省天主教遭匪禍極烈，由以河北、山西、內蒙、東三省危甚，殺教士教民，焚教堂等等，其中進入北京的拳民與董福祥的甘軍合流，德國公使克林德與日本使館書記杉山彬皆為其所殺，清廷並向八國宣戰。
1901		清政府與西方列強議定庚子賠款。
1909		清宣統皇帝即位。
1911		武昌起義。
1912		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 頒布《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第六條第七款規定「人民有信教的自由」。 中華公教進行會，由甘肅王志遠，山西成捷三司鐸發起成立，旨以教友協助闡揚宗教，以《廣益報》為華北通訊機構。
1913	台灣脫離廈門教區成為監牧區。以林茂才(Clemente Fernandez)為首任監牧。	全國公教進行會聯合天主、基督、道、佛、回教反對定孔教為國教。
1914		天津開全國公教進行會大會，全國教友一百五十一萬九千人。
1916		段祺瑞政府恢復的國會在袁世凱頒布的「中華民國約法」基礎上，提出「天壇草案」，草案第十九條為「國民教育，以孔子之道為修身大本」。馬相伯與雍劍秋等在北京聯合天主教教民，聚會反對定孔教為國教。又成立天津信教自由會，聯合其他宗教信徒擁護信仰自由。
1917	台北靜修女中成立；道明會總會長Rodriguez 巡視臺灣教務。	
1918	。	教廷派彼得來利維總主教為駐華公使，我國派戴陳霖為駐教廷公使，因法國反對而中止。
1919		五四運動爆發。天津愛國教友組織了「公教救國團」，號召教內同胞，後

年代	台灣	大陸
		在《益世報》及《聖教雜誌》上，揭先後發表支持天津教友的愛國行為，表現出南北之間的呼應。教宗本篤十五世派光總主教視察中華全國教務。教宗宣布擴充傳教事物通牒〈夫至大〉(Maximum illud)。
1922		教宗庇護十一世任命剛恆毅總主教為第一任宗座駐華代表，於是中國政府與教廷直接往來，使我國教務進入一新階段。
1923	教廷特使 Giardini 樞機主教訪台。	
1924		剛恆毅總主教在上海召開主教公會會議，議定傳教方針。
1925		美國本篤會會士來華籌建公教大學事宜，輔仁大學建校工作正式展開。
1926		教宗庇護十一世頒布擴充傳教通牒。教宗親自為六名中國主教在梵蒂岡聖伯多祿大殿舉行隆重的祝聖典禮。
1928		北伐成功，教宗庇護十一世通電承認中國國民政府，是為八一通電。中華公教教育聯合會成立。剛恆毅總主教通令全國教區設立公教進行會。
1931		九一八事變。
1932		一二八淞滬會戰，上海天主教徒有非常愛國的表現，將天主教的房子及學校等改建為傷兵收容所，全力投入救難工作。
1933		耶穌救世一千九百週年紀念，羅馬舉行聖年大典。中國組織朝聖團赴羅馬。徐光啟逝世三百週年紀念，在天主教界人士徐宗澤和學術界人士竺可楨、向達的共同努力下，在全國範圍內舉行紀念徐光啟的活動。
1934		羅馬教廷與偽滿州國建交，東北各教區脫離中國教區而獨立。
1935		羅馬傳信部允許中國教徒尊孔祭祖。中華公教進行會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舉行。
1937		對日抗戰爆發後，各地公教、施診所多改為傷兵醫院，聖堂、學校多改為

年代	台灣	大陸
		<p>難民收容所，而以上海、杭州、漢口、長沙等地成績特著。</p> <p>南京主教于斌向代牧區內神職人員及教徒發出牧函，如爭取和平失敗，面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人人應有守土抗戰的職分。</p> <p>第二次上海淞滬會戰爆發。上海天主教教友積極參加抗戰。</p>
1939		<p>駐華宗座代表蔡寧向全國主教發出一封信，要求教牧人員及教徒嚴守中立政策，此舉引起輿論大嘩，更引起國民政府蔣委員長授權顧維鈞向教廷駐法公使提出抗議。</p> <p>教宗庇護十二世解除中國禮儀禁令。</p>
1941		<p>中國天主教文化協進會在重慶成立，于斌任理事長。</p>
1945	台灣光復，時臺島有一萬八百二十名教友。	<p>日本投降。國共內戰爆發。</p>
1946	台灣監牧里脇歸國。台灣籍涂敏正神父任代理監牧。	<p>教宗庇護十二世建立中國教會聖統體制。</p>
1947		<p>第一次全國公教出版會議在上海舉行。</p>
1948	西班牙籍陳若瑟任台灣監牧。大陸有些神父修女開始轉來台灣。	<p>天主教中華全國教務協進會在上海建立。</p> <p>全國天主教教育會議在上海召開。</p>
1949	<p>方豪神父到達台灣，即在台大任教，並成立台大天主教師生聯誼會。</p> <p>台灣劃分為台北及高雄兩監牧區：台北監牧區轄台北、桃園、新竹、苗栗、宜蘭、花蓮六縣，台北、基隆二市及陽明山管理局，以主徒會郭若石任監牧；其餘屬高雄監牧區。陳若瑟為高雄監牧。</p>	<p>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p> <p>《益世周刊》載，關於教會人員撤退問題，教廷已有明確表示。</p>
1950	<p>台中監牧區成立：自高雄監牧區劃出台中、彰化、南投三縣及台中市。</p> <p>郭若石任台北監牧。</p>	<p>中共在北平先向基督教七領袖發動自治、自養、自傳「三自運動」及「愛國教會」。</p>
1951	<p>基隆益世電台成立。</p> <p>台大、師大學院成立天主教同學會。</p>	<p>中共迫害天主教的計畫大綱：一、要求天主教徒與教廷割斷關係。二、要求天主教接受以馬列主義為基礎的新教義。三、要求天主教的活動為共</p>

年代	台灣	大陸
		<p>黨總活動的一部分。</p> <p>上海為加強教友信德與靈修，在金魯賢神父領導下，有計畫的翻譯歷史及神修著作。</p> <p>董世祉神父在重慶發表「[信仰宣言]」，全國教會為之振奮。</p> <p>中共驅逐黎培理公使出境，是年有一千二百以上外籍教士被中共驅逐出境，三百餘被捕入獄。</p>
1952	<p>台灣成立教省，台北升格為總主教區。</p> <p>黎培理公使轉來台灣。</p> <p>郭若石總主教將新竹全縣委託耶穌會傳布福音。瑪利諾會蔡文興神父(William F. Kupfer)為首任台中監牧。</p> <p>成立嘉義和花蓮兩個監牧區：嘉義區轄嘉義、雲林兩縣，均自高雄區分出；花蓮區轄花蓮、台東兩縣；花蓮自臺北區劃出，台東自高雄區劃出，以陽穀主教牛會卿兼任嘉義代理監牧，以營口主教法籍費聲遠(A.J.Verineux)，兼任花蓮代理監牧。</p> <p>成立台灣聖統，為中國第二十一個教省。</p>	<p>中共頒布改造教會六項命令。</p> <p>教宗庇護十二世頒發「勗勉中國被難同胞」文告。</p>
1954	<p>思高聖經學會譯竣全部舊約。</p> <p>大專天主教同學會總會成立。</p>	<p>共黨「三自運動」、「革新教會」計劃失敗後，改變方針，訓令共黨停用「獨立教會」、「革新教會」名稱，改稱「愛國教會」。要求教宗與愛國教會互相承認。</p> <p>教宗庇護十二世頒發第二道「致中國教會書」，鼓勵中國教友，並駁斥中共發動的「三自運動」。</p>
1955	<p>衛道會在台中創辦衛道中學。</p>	<p>中國政府在本年九月，在上海一地，兩次大逮捕教會人士。</p>
1956	<p>光啟出版社在台中成立。</p>	
1957	<p>田耕莘樞機回國訪問，各界熱烈歡迎，田樞機又在三軍球場舉行祈禱國家中興大禮彌撒。</p>	<p>中共在北京召開會議，組織「中國天主教徒愛國協會」，強迫主教神父教友參加。</p>
1958	<p>台灣最大教堂，新竹北大路聖母聖心堂落成。</p>	<p>三月中國漢口及武昌革新教會分別選出董光清、袁文華為主教，並於四</p>

年代	台灣	大陸
	美籍耶穌會神父卜立輝在台中光啟出版社設錄音室，錄製宗教音樂與英文教學節目，公全省各廣播電臺採用。	月十三日祝聖，請求教廷承認，教廷拒絕。六月教宗庇護十二世第三次頒發「致中國教會通諭」，指責所謂「愛國教會」及擅自選任主教之非法，並闡述真正的愛國之道。
1959	耶穌會鄭聖沖神父所辦天主教事業展覽會在台灣各地展出，歷半年之久，觀眾逾四十萬人，登記聽道者近萬人。 教廷應北平總主教田耕莘樞機來台的要求，委為台北總教區代理總主教，同時接受郭若石總主教的謙辭。	教宗於聖神降臨節譴責中共企圖製造裂教。
1960	台中光啟錄音室遷往台北，改稱光啟社。	
1961	思高聖經學會全部新舊約譯竣。 成立新竹和台南兩個教區：新竹教區所轄新竹、桃園、苗栗三縣都從台北教區分出，以國人杜寶晉為新竹主教；台南教區所轄台南市，台南縣和澎湖縣，都從高雄區分出，以國人羅光為台南主教。從此，臺灣已有七個教區。 高雄監牧區升格為教區，並改委國人鄭天祥為高雄主教。	
1962	嘉義、台南兩監牧區升格為主教區。	
1963	台灣七教區均已升格為聖統制主教區。 台灣最大之大專學生中心—耕莘文教院落成。	
1964	台港澳主教團通令自明年元旦起，彌撒中部分經文及行聖洗、堅振、婚姻、病人傅油四聖事，准用中文。	
1965	于總主教在台北中國大戲院主持烽火鐘聲—雷鳴遠傳—首映典禮。此為我國天主教第一布宗教巨片。	
1966	台南主教羅光調任為台北總主教，前台北輔理主教成世光調任為台南主教。	中共發起文化大革命運動，並組織紅衛兵。紅衛兵訪查、搗毀各地教會及教會學校。最後一批外國教士，八位

年代	台灣	大陸
		在北平聖心學校服務之聖方濟聖母傳教會修女被紅衛兵驅逐抵港。
1968	中華學術院設立天主教學術研究所。 思高聖經學會新舊約全書出版。 金門成立教區。	
1969	響應教宗世界和平日，台北舉行盛會，由于斌主教主持，參加者中外人士兩千餘人，嚴副總統應邀在會中致詞，並自元旦起，彌撒全部經文可用中文誦念。 台南教區成世光主教兼嘉義教區署理主教。	
1970	澎湖成立宗座署理區。 前大同教區署理主教比籍范普厚(Alfons Van Buggenhout)出任金馬署理主教。 賈彥文出任嘉義教區主教。	

資料來源：

〈走過台灣三百年〉，收錄於《發現台灣》，天下文化。

顧保鵠編著，《中國天主教史大事年表》，台北市：光啟出版社，1970/12。

顧衛民，《中國天主教編年史》，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3/4。

光啟宗教資訊中心編，《民國七十五年 台灣天主教手冊》，台北市：光啟出版社，1986。